版本目錄學論叢（二）

昌彼得著

學海出版社印行

昌彼得著

版本目錄學論叢（二）

學海出版社印行

版本目錄學論叢（二）

著　者：昌　彼　得
出版者：學海出版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一〇〇二號
發行人：李　善　馨
發行所：學海出版社
台北市信義路三段一五七巷十弄二號三樓
電　話：七〇七－六九六三號
台北市郵政信箱二四－一二八九號
郵政劃撥帳號一四三五四號
定價：新台幣[illegible]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八月初版

版本目錄學論叢 第二輯

目次

目錄釋名

近代社會上的一般人士，甚至於有一部份圖書館的從業人員，對我國的「目錄」或「目錄學」這個名辭，究竟包含些什麼意義，還不甚了了。以圖書作為研究對象的學問，在英美國家稱作Bibliography，日本稱作書誌學或書史學，我國早期稱為校讎學，近世始通用「目錄學」一辭。Bibliography 一字是從希臘文Bibligraphia而來，Biblio是書冊，graphia 的本義是圖象，或者是書寫的過程或形式（Process or Styles of Writing），用作接尾辭，則有說明科學的意味（例如geography 是地理科學），兩個字連起來即是以圖書為對象的說明科學，對書籍的著述、印刷、出版等作有系統的敘述。日本所用的書誌學，其名辭則係採自我國。我國的目錄學雖也是以圖書為研究對象的學科，但在體制上與英美等國有所不同。在了解它包含的意義與研討的範圍以前，先要明瞭這個名辭的淵源。

「目」是一個象形字，甲骨文作[illegible]（見鐵雲藏龜十六・一，殷虛文字乙編九六〇，殷虛書契後編卷下三四・五）、或[illegible]（見鐵雲藏龜十一・一，殷虛書契前編卷四・三二・六）等形，金文

中作[illegible]（見金文編引屰目父癸爵）形，都是取象人的眼睛外匡內瞳的形狀。管子宙合篇云：「目司視」。所謂「目」的本義是人眼。周禮考工記弓人：「斲目必荼」。鄭玄注：「目、幹節目也」。又呂氏春秋離俗覽貴信篇：「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瓋」。樹本幹節處的形狀與人眼相似，所以也稱為「目」。人眼僅有兩個，而樹木的幹節却有無數，因之後世對於多數的名物，稱之為目，如論語顏淵篇：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此處的「目」字概括多數的條目，即由幹節目的意義引申而來。「目」字尚有「要點」的意義，小爾雅廣詁：「最、凡、目、質，要也」。周禮春官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四曰巫目」鄭注：「目謂衆事，筮其要所當也」。賈公彥疏云：

是要目之事，故論語顏回云，請問其目，鄭云欲知其要。顏回意以禮有三百三千，卒難周備，故請問其目。此云事衆，故亦筮其要目所當者也。

不僅如此，「目」字還含有逐一條舉的意思。按周禮天官宰夫：「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鄭注：「

治要，若歲計也；治凡，若月計也；治目，若今日計也」。

又僖公五年公羊傳云：「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春秋繁露卷十深察名號篇：「號凡而略，名詳而目。目者，徧辨其事也；凡者，獨舉其大事也」（茲據武英殿聚珍本，餘本無「大」字）。皆以目對凡而言，則「凡」的意義，是概括一切，而「目」適與之相反，乃將多數的名物項目一件一件的縷列稱敘。古人着書往往從書中採擷二三字作為篇題，其情形有二種：或是隨事立意，概括一篇的要旨，如莊子內篇的逍遙遊、齊物論、養生主，墨子的天志、明鬼、尚同，荀子的勸學、修身、性惡等篇都是。另一種情形是全篇無中心主旨，則因篇命題，摘篇首的二三字當作篇題。如莊子外篇的秋水、馬蹄，及論語、孟子的各篇都是。這些篇題就是目。故劉向校書，漢書本傳稱他「比類相從，各有條目」。漢書藝文志說他「輒條其篇目」。即是他將一書的各篇名目，皆逐一的條舉。

「錄」之一字，甲骨及鐘鼎文中都沒有，僅有「彔」字。「彔」，甲骨文作[illegible]（殷虛文字甲編一一二三）、[illegible]（同上五八九）、[illegible]（鄴中片羽三集四五一一）、[illegible]（殷虛佚存四二六）[illegible]（殷虛文字乙編八六八八）等形，金文作[illegible]（大保簋）、[illegible]（彔簋）、[illegible]（彔伯簋）、[illegible]（頌鼎）、[illegible]（散氏盤）等形，與甲骨文字相似。關於這個字的解釋，許慎說是象形字。說文解字云：「

刻木彔彔，象形」。究竟象什麼形？許慎未作說明。今人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則從而推衍云：「疑彔為井鹿盧的初字，上象桔槔，下象汲水器，小點象滴水形」。然看凡從彔的字，都沒有鹿盧之義，故許慎所謂象形之說，後人頗為懷疑。清王筠說文釋例云：「上象其交互之文，下象其分披之文，要之不定為何物，不得云象形也」。而說文部首訂則逕說「錄」係指事字。說文對於「彔」字解釋說：「金色也，從金，彔聲」。俞樾兒笘錄則辨其非，云：

樾謂錄為金色，於古無徵，許君蓋依綠字說之。綠從糸，為色青黃也，故錄從金為金色。金之色亦在青黃之間，然非字之本意。今按錄者，彔之或體也。彔部：彔，刻木彔彔也。刻木必用刀，故或從金。周官職幣曰：皆辨其物，而奠其錄。杜子春曰：定其錄籍也。隱十年公羊傳曰：春秋錄內而略外。蓋古人文字，著在方策，故謂之錄，即從刻木之義而引申之也。

又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云：「錄假借為彔。按今抄錄字，古刻木為書，故曰錄也」。章太炎著小學答問也說：

凡言記錄者，借為刻木彔彔之彔。古為書契，本刻木為之也。朱、縷、錄，古音皆在侯部，得相通假。縷、錄，同為束，猶鏤、朱同為刻矣。

俞、朱、章三氏都謂錄是彔的假借字，訓錄為彔的或體，要比許慎的解釋能得其實。不過朱章二氏謂古代圖書，本刻木為之，則於古無稽。因為我國自殷商時代用簡策作圖書以來，卽已用筆墨作為書寫的工具，從來未有用刀代筆刻字在竹木上的事。只有商代的貞卜文字，才用刀契刻在甲骨上，故二氏的這種解釋則未可相信。「彔」旣是錄的本體字，彔字的意義究竟是什麼？說文解字釋為「刻木彔彔」，段玉裁注云：

小徐曰：彔彔，猶歷歷也，一一可數之貌。按剝下曰：彔，刻割也。彔彔，麗廔嵌空之貌。

則是彔的本義是刻割雕鏤，而且清晰得歷歷可數。刻割須用刀，遂從金而成錄，因殷商卜辭係用刀刻割，乃引申為記錄、著錄。關於先秦時代「錄」字的意義，清孔廣居撰的說文疑疑解釋得比較清楚，他說：

彔卽錄本字。一訓記也，檀弓「愛之斯錄之」、公羊傳「春秋錄內而略外」是。一訓次第也，國語「今大國越錄」是也。又卽祿之古文，鐘鼎銘祿多作彔是也。刻本者，方册也；彔彔者錄祿也，謂錄其功而祿之也。从工、象規榘；从ㄣ、象繩墨，皆所謂刻工也，亦卽王者之所以程才也。从人，所彔之人也，从二，象所刻功與祿之次第也。左右等者，祿之

厚薄必準其功之大小也。（卷上）

雖然他以象形解釋篆文錄字，未免穿鑿，但訓錄字有次第之義，能發前人所未發。按國語卷十九吳語，記載晉吳等國黃池之會，吳師昧明進逼吳師的軍營，晉定公遣使質問，云：

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今大國越錄，而造於敝邑之軍壘，敢請亂故？

韋昭注「錄」字，云：「第也」。則吳國所越的「錄」，當是現代會議所依據的議事日程。原來商定日中開會，今吳師昧明進軍，故晉使責吳國越錄，卽指斥他不遵守程序。故「錄」字不僅為記錄、著錄，還兼有一定的次第秩序的意義。所以後代每一部書前的目錄，也可以稱曰目次。

「目」字是將多數的名物逐一條舉，「錄」字是含有一定次序的記載，這兩個字在先秦時代卽已分別的成為習用辭。至於將這兩個字連成一個專門名辭，始於什麼時候？四庫總目目錄類小序云：「鄭玄有三禮目錄，此名所昉也」。但根據其他的資料來看，四庫總目的說法是不對的。按漢書敍傳云：「劉向司籍，九流以別，爰著目錄，略序洪烈，敍藝文第十」。是記載目錄一辭最早的典籍。又文選李善注任彥昇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引劉歆七略曰：「尚書有青絲編目錄」，注王康琚反招隱詩引「劉向列子目錄曰：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據此，可以知道西漢成哀帝時劉氏向歆父子校書，所著作的卽已稱為目錄。然就今存劉向的各篇敍錄來看，或稱序錄

，或但稱錄。如文選注引的列子目錄之文，在原書實稱書錄。故劉氏父子校書時，雖有目錄之實，是否已居其名，尚未敢遽定。但在東漢的初葉班固撰漢書時，目錄已達成一個通行的專門名辭，則是無可懷疑的。

何謂目錄？漢書藝文志云：「劉向校書，每一書已，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所謂撮其意旨，即是指敘述一書的大意。所以目錄者，目是指一書的篇目，將篇目逐一列舉出。錄則是合篇目及撮述一書大旨的敘而言。錄既是兼包敘與目，則單舉「錄」即可以概括篇目。故劉向校定書後所奏上的篇目及一書的旨意，載在本書前面者，稱之曰「錄」，或「敘錄」。譬如現今流傳劉氏向歆所校定的戰國策、荀子、晏子、管子、鄧析子、韓非子、列子、說苑、山海經等九書書前的敘錄，即是其例（另有關尹子、子華子、於陵子三書書前也冠有劉向敘錄，但因此三種書係宋明人偽作，敘錄當亦出杜撰，故不計入）。將各書的敘錄編集起來而單行者，則稱為別錄，猶之於四庫全書總目之與各書前提要。隋書經籍志著錄劉向別錄凡二十卷。其所以又特著「目錄」的名稱者，蓋劉向奉詔校書，主要在釐定各書的篇目，故特標舉「目」字。因為當時的古書大多是篇卷單行的，如王充論衡正說篇載河內女子獻泰誓，後漢書竇融傳載：光武皇帝賜竇融太史公書中的五宗、外戚世家及魏其侯列傳各一卷。循吏傳載明帝賜王景史記河渠書一篇，即

是例子。古書既然篇卷可以單行，所以同是一書，各家收藏的本子多寡不一。劉向乃集合每一書中外的藏本，加以讎校，除去重複，定著為若干篇，於是列舉出篇目，以防散佚，且以顯見此校定本與各舊本的不同。如管子敍錄云：

所校讎中管子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重複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

又說苑敍錄云：「今以類相從，一一條列篇目」。在篇目之後，又作敍錄一篇，發明這部書的旨意，隨書奏進。因為校讎的本意，即以釐定篇目為主，故並擧目而言之，總稱為目錄。各書所載向歆的奏文，或謂作「錄」與「敍錄」者，不過是擧偏以概全耳。

漢魏之世所謂的「目」僅是指一書的篇目，「目錄」一辭，是指一書的篇目及敍錄而言。如上面所擧的文選注引列子目錄、尚書青絲編目錄、及鄭玄三禮目錄等等。故雖以劉氏向歆父子所著的別錄七略，有後代目錄之實，但尚未用此辭作為書名。總括羣書也不稱作目，而名為簿，如魏鄭默編的中經簿、晋初荀勗編的中經新簿等即是。把若干的書名編類成為一部書，名曰「書目」的，就現存的資料來看，大概始於東晋，最早的是李充所編的晋元帝四部書目。此目隋志未著

錄，見唐釋道宣廣弘明集卷三所收阮孝緒七錄序後附古今書最，云：「晉元帝書目四部三百五帙，三千一十四卷」。又如南史任昉傳：

昉家雖貧，聚書至三萬餘卷，率多異本。及卒後（梁）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無者，就其家取之。

則「書目」之名，南北朝時使用已漸普遍。用「目錄」二字作為書名的，始於劉宋邱淵之所編的晉義熙已來新集目錄。這部目錄，隋志著錄三卷。從其目卷數的簡少，可以推知這本目錄僅載書名，而沒有敘錄，與李充晉元帝四部書目相同。從此以後，一般編書目的，遂相襲沿用。以「錄」字附屬於「目」後，於是但記書目，不列載篇目及敘錄的書目，皆冒用「目錄」之名，如隋志所著錄的六朝各官修目錄，及近世明陳第世善堂藏書目錄、清金檀文瑞樓藏書目錄等皆是，則已失去了「目錄」一辭的原義了。

我國的目錄學淵源於別錄七略。劉氏向歆父子領校中秘書，在分類編次撰述之先，須經歷整理校讎的過程。別錄云：

讎校者，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曰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故曰讎也。（見太平御覽卷六一八引，又文選左太冲魏都賦李善注引風俗通亦同）。

校讎者，原意指校勘文字篇卷的錯誤而言。然而自向歆的校讎秘閣圖書，乃將篇章不一，雜亂無序的古籍，經過整理，釐定其篇章，校正其文字，撰述各書的敍錄，以固定它的形質，然後繕寫定本，分類編次，以便於庋藏尋檢。這一種工作，自校讎至編定目錄，實有一貫性，而不可劃分。其後如晉代的荀勗、劉宋時的謝靈運，皆嘗領秘書監，奉詔整理典籍。以至於唐代的羣書四部錄、宋代的崇文總目、清代的四庫總目等，未有不經歷這些過程的，以校讎始，以編定目錄終。故前人把這一連串的過程，用「校讎」這一名辭來統括之。而研究這一門的學科，稱之為校讎學。宋鄭樵着通志二百卷，內有校讎略一卷，發揮校讎的學理，以訪求遺籍、校書、詳類例、明編次等項工作，為校讎的主要任務。清章學誠撰校讎通義三卷，也是推闡向歆的錄略之學。且說：

> 校讎之學，自劉氏父子淵源流別，最為推見古人大體，而校訂字句，則其小焉者也。千載而後，鄭樵始有窺見，而未盡其意，人亦無由知之。世之論校讎者，惟爭辨於行墨字句之間，不復知有淵源流別矣。近人不得其說，於古書有篇卷參差，敍例異同，當考辨者，乃謂古人別有目錄之學，其屬詫聞。（章實齋先生讀書劄記卷一信摭篇）

近人范希曾氏曾為校讎學下一定義，曰：「故細辨夫一字之微，廣極夫古今內外載籍之浩瀚，其事以校勘始，以分類終，明其體用，得其綱理，斯稱校讎學」。觀以上諸家所說都是標擧校讎學

以統括現代所謂的目錄學。尤其章實齋並否認在校讎學以外，別有目錄學。其實章氏所說的目錄學，乃是指的校勘學，大概他對這新興名辭的意義，還不甚瞭解的緣故。然而世代遷替，今與古異：自晋以後，私家藏書漸盛。自雕版印刷術發明以後，一部書刻成，印行不下千百部，傳本容易獲得，是故收藏家的藏書，也比往代豐富。而私家藏書，不像前代秘閣的收藏，須要經歷校讎、整理、繕定等等過程。祇要詳類例、明編次，俾使人能夠依據目錄以窺學術的門徑，即類以求書就夠了。故目錄學從校讎學中分化而出，也是時勢之所趨。「目錄學」一詞，始見於清乾隆中王鳴盛所著的十七史商榷（見卷一），謂：「目錄之學，學中第一要緊事，必從此問塗，方能得其門而入」）。盛清時代，因受明代人刻書校勘不謹，喜加纂改的反應，校勘學——即章實齋所抨擊「惟爭辨於行墨字句之間」的所謂狹義的校讎學——極盛。目錄學已有與它衍分為二途，自成為一門學科的趨勢。自從西洋學術大量的介紹來我國，國內的新式圖書館紛紛建立，目錄學遂與校勘學分道揚鑣，由往日的附庸而蔚成大國。雖然近人的撰著，如胡樸安的校讎學、孫德謙的校讎學纂微、蔣元卿的校讎學史、劉咸炘的校讎述林、姚名達的中國目錄學史等書，所討論的仍為廣義的校讎學，兼包校勘與目錄。目錄與校勘二者之間，在歷史上固然有密切的關係，但在近世衍分成為兩種不同的學科，也是不爭的事實。「目錄」這一名詞，起於劉向，涵蓋一書的篇目與

敍錄，晉末或用為簿錄書名，入唐，且用來作為分類上部類的名稱，實淵源有自。故用此名辭以稱條別源流、分類編次的學科，實遠較鄭章以下諸氏所標擧的校讎一詞來得妥切。

目錄學的意義

要研究我國的目錄學，不可不先明瞭我國目錄學的意義究竟是什麼？我國的目錄學淵源於漢代劉氏向歆父子的別錄七略。漢成帝時劉向領校秘書，在每一種書經過專家校讎整理編定後，則條舉它的篇目，並撮述其書著作的旨意，撰寫爲敘錄，以之奏進。劉歆又根據向及他自己所校定的秘閣所藏各種圖書的目錄，依書的內容及學術流別，予以分類編排，著成七略七卷。凡分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等六個大類，內含三十八個小類，另外有輯略一篇，總論各門類學術的源流及旨要。依據別錄七略撰著的宗旨，則可以知道著作一部目錄，必定先要通盤瞭解一代學術的大勢，及各學派與各書的宗旨，而後乃可以將雜亂無序的圖書部次類居，才能免除凌亂失紀，雜而寡要的弊端。使人一讀目錄，就可以知道某項學術屬於那一家，某書屬於那一派。而對於古今學術的興衰隆替，作者的得失優劣，都可以從目錄中考索而得。是以目錄的目的有二：第一、在將凌亂繁雜的圖書，予以分類部次，使得井井有序；第二、要區辨各書的學派，考述各門類學術的淵源流別，也就是章學誠所謂的：「考鏡源流，辨章學術」。此兩者不可缺一。因

目錄的編著，是以書籍為對象，而不是以學術為對象。如以學術為對象，而為之條析源流，寫成一部著作，僅可以稱為學術史，不得稱作目錄。但如以書為對象，而不知道學術的源流，與各書著述的宗旨，則無從部次類居，而致凌亂無序。將正如章學誠所譏評的：「如徒為甲乙部次計，則一掌故令史足矣」，不足以稱為學。後世的目錄書，雖然體制或有不同，要皆以這兩個目的作為編撰的依歸。

我國前代的目錄，就可以考知者，從其體制的不同，大別可以區分為三類：一為部類之前或後有小序，書名之下有解題或提要者；二為僅有小序，而無解題者；三為小序解題俱無，祇載書名、篇卷，及作者者。前人討論目錄學，對於這三類，雖然各有他們的主張，但對於撰著目錄的宗旨，必求其可以考見學術的源流，則無二致。茲分別加以研討：

有小序及解題的書目，今已佚傳的如齊王儉七志、梁阮孝緒七錄、隋許善心七林、唐元行冲群書四部錄、及毋煚古今書錄等。尚存的如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元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清四庫總目等，及名存而實亡的宋崇文總目之類都是的。隋唐經籍志簿錄類小序說：

漢時劉向別錄、劉歆七略，剖析源流，各有其部，推尋事跡，疑則古之制也。自是以後，不

能辨其流別，但記書名而已。博覽之士，疾其渾漫，故王儉作七志，阮孝緒作七錄，並皆別行。大體雖準向歆，而遠不逮矣。

隋志抨擊晋以後的各家目錄，而獨尊向歆，蓋因爲劉向的別錄，每一部書都有敘錄，對於其書的指歸訛謬，皆有論辨。劉歆的七略，有輯略剖析九流百家學術的源流，所以極爲推崇。自晋元帝時李充編四部書目，下迄隋代，歷朝的官修書目，都只有少數幾卷，不著小序與解題，所謂「不能辨其流別，但記書名而已」。故評爲「渾漫」，認爲它們不能達到目錄的功用，故無足輕重。

清章學誠校讎通義互著篇也說：

古人著錄，不徒爲甲乙部次計。如徒爲甲乙部次計，則一掌故令史足矣，何用父子世業，閱年二紀，僅乃卒業乎？蓋部次流別，申明大道，敘列九流百氏之學，使之繩貫珠聯，無少缺逸，欲人卽類求書，因書究學。……古人最重家學，敘列一家之書，凡有涉及一家之學者，無不窮源至委，竟其流別，所謂著作之標準，群言之折衷也。

按漢書成帝紀，河平三年（西元前二六年）秋八月，劉向奉敕校中秘書，綏和元年向卒，而由劉歆繼續主持其事。據楚元王傳載建平元年（西元前六年）歆改名秀，今傳山海經前載有歆上書表，卽署名秀，知在這一年他仍在主持校讎的事。同年歆移書責讓太常博士，觸大司空師丹之怒。

師丹於綏和二年十月為大司空，僅一年，建平元年十月被策免。而歆亦因此忤執政大臣，懼誅而請求外調郡縣。則劉歆奏進七略，當在建平元年的夏天以前。從向校書中秘，至歆編成七略，前後二十一年。章實齋說「閱年二紀」，乃舉其成數而言。這二十一年，蓋包括圖書的整理、校讎、及繕寫等項工作在內。若僅編一部著錄尚不足六百種書的目錄，當然不需要這麼多的時間。章實齋所舉的例子，雖不甚恰當，但他認為向歆撰著目錄的目的，在使人能即類以求書，因書以究學，凡涉及此一家學術的，無不窮源至委，條其流別，兼包學術的歷史，則並不錯。而論析學術的源流，概述圖書的大旨及優劣得失，非有小序及解題兩種體制，無法達到它的功用。帳簿式的目錄，是這一派學者所不取的。

僅有小序而無解題的書目，如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及明焦竑的國史經籍志等。漢志是增刪七略而著成，七略原有解題，班固予以刪削，而但保存了它的輯略這篇文字，分散編入各類之後作為序。如大序論學術折衷於孔子，諸子略的小序皆推言某家學術出於古代某官所掌，其流而為某某氏之學。又書名之下往往有簡注，於書名之晦澀者加以註明，例如諸子略儒家董子一篇，注云：「名無心，難墨子」。六藝略易類蔡公二篇，注云：「衛人，事周王孫」，將書的內容或著者的學術背景作簡略的介紹。隋書經籍志則依據阮孝緒的七錄而增益之，書名之下也多有注

。這種情形不過是刪繁就簡，是史學家著述目錄的一種體裁，其重點在存一代的文獻，並不是認為解題沒有用處。至於辨章學術的得失，考鏡各家的源流，僅有小序也足以來發明。不過自唐以後的史志，僅列載書名，而不撰小序，且不足以保存一代的文獻，則是史家目錄的變體，不足以作為準則，明焦竑撰國史經籍志，他在魏徵隋志之後九百多年，能規復小序，尚是通於史家目錄著述的宗旨，比起宋代諸賢來要勝過得多。

既無解題又無小序的書目，已佚者如晉迄隋歷朝的官修目錄，存者如唐宋明諸史藝文志、通志藝文略、以及明以來的各家藏書目之類均是。這一類的書目，不辨學術流別，但記載書名、卷帙、著者，而分類部次，深為隋志及章氏等所譏評。然而學術重在條別門類，假若能夠周悉它的淵源沿革，因而製訂出周詳的分類法，來部次圖書，也就是作到章學誠在和州志藝文書序例所說的「以部次治書籍」，則可以秩然不紊，也足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宋鄭樵即主張此說，他嘗云：

類例既分，學術自明，以其先後本末具在。觀圖譜者，可以知圖譜之所始；觀名數者，可以知名數之相承，讖緯之學，盛於東都；音韻之學，傳於江左。傳注起於漢魏，義疏盛於隋唐。觀其書，可以知其學之源流。或舊無其書而有其學者，是為新出之學，非古道也。（通志

校讎編次必謹類例論篇）其意以為只要詳類例，學術的淵源流別自然可以顯現出來。鄭氏並且譏評崇文總目的解題為毫無意義，他在校讎略泛釋無義論篇中又云：

> 古之編書，但標類而已，未嘗注解，其著注者人之姓名耳。蓋經入經類，何必更言經？史入史類，何必更言史？但隨其凡目，則其書自顯。唯隋志於疑晦者則釋之，無疑晦者則以類舉。今崇文總目出新意，每書之下必著說焉。據類自見，何更用為之說？且為之說也，何用一一說焉？至於無說者，或後書與前書不殊者，則強為之說，使人意怠。

崇文總目的解題，是遠紹承劉向別錄的成法，並不是王堯臣、王洙、歐陽修等人自創的新意。鄭氏唯尊隋志，故發此論。所以四庫總目批評他是海濱寒畯，非出公心。鄭氏對崇文總目的譏評，固有未當。不過他的詳類例，而學術源流自明的見解，揆諸劉氏向歆父子的錄略，實導源於先秦學術的分類，也算得上不易之論。但如鄭樵之說，其編次必須要著錄亡佚的書（樵有編次必記亡書論篇），始能顯現其學的本末源流。而我國的典籍，累代遞增，歷朝書目，不論存佚，均予以著錄，則篇目依舊，頻煩互出，斯真難免如劉知幾對史書藝文志的評詆：「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乎」（史通書志篇）？何況目錄的作用除了明學術源流外，還要供人即類以求書，若不論存

佚，概予著錄，則不便於檢書。是故鄭氏詳類例而學術自明之說，雖然也是目錄的一端，但尚非極則。

綜以上所論三類目錄的體制雖各有不同，前兩類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來部次群書。換句話說，即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為主，分類部次為輔。後一類則反是，以分類部次群籍來顯現學術的源流本末，主從的關係雖然有殊異，但其目的則無二致。

目錄書對於不同的本子，兼載併收，以標擧其書的異同，其來甚古。我國最早的一部目錄書——劉歆七略，雖然原本不傳，但它的體例，從漢書藝文志還可以窺見。漢志書類在伏生二十九卷之外，又著錄古文經四十六卷；春秋類於左氏國語二十一篇外，又有劉向編的國語五十四篇；於論語，分別的著錄了齊、魯、古三『本子，於古論二十一篇，注云：「出孔子壁中，兩子張」；於齊論二十二篇，注云：「多問王、知道」。目錄書不厭重出者，蓋不如此，則書本的異同，無從窺見。不過這種道理，自隋以來，不甚為目錄學者所重視。自雕版印刷術發明以後，書籍大都用雕印的方法來流傳。清乾嘉以降，版本校勘之學興起，而目錄的著錄項，已經不能像前代的目錄僅僅記載書名、篇卷、著者就夠了，必須著明它的版本，始能使閱者知道這部書的流別內容。因為書版本的不同，不僅是文字有正誤之別，它的內容往往有很大的差異。有的是卷數相同，

而書的內容詳略各異：例如宋魏泰的臨漢隱居詩話，今流傳的有說郛、學海類編、歷代詩話、知不足齋叢書、湖北先正遺書等刻本，都是一卷。但前兩種本子僅有三十五條，歷代詩話本更少一條，只有三十四條。後兩種本子則有六十九條，不僅篇帙多到一倍，而且各條的文句也比前三本多出很多，因為前三本係出之於元人的刪節。有的是因校勘精粗有別而脫誤的不同：例如水經注，明代的各刻本率多經注混淆，文字脫誤，清武英殿本及全祖望、趙一清等校刻本，補脫正誤多達七千餘字。或者有輯本與原本的不同：例如元張養浩著的雲莊類稿，今流傳的有出自清四庫館自永樂大典輯編本，與今尚存的元代刻本，卷數內容各異。假若不載明是什麼版本，則目錄編著者與讀者所見的本子，可能不是同一版本而不自知。編撰目錄中敘錄或解題的論說，不能不依據原書。假若撰目錄者所依據立說的是足本，而讀者所看的是節本，則目錄書中所敘述的，在他所持有的書中往往尋覓不到。假如目錄撰者所依據的是善本，而讀者所見的是誤本，則考對起來往往不相符合。假如目錄撰者所依據的是原本，而讀者所見的是別本，則篇卷的分合，目次的先後，往往互相乖剌。目錄的作用本來是指導讀者治學的門徑，而彼此所見的不是同一書本，好像治絲而棼，反令讀者困惑而無所適從，故關係甚大。反過來說，假如編撰目錄的人，沒有見到善本、原本、足本，而執着節本、誤本、別本以為之論說，則他所說的是非得失，可能與事實大相

背謬。譬如四庫總目卷一二二宋江少虞事實類苑提要，說此書傳本只有六十三卷、二十四門，因而批評書前所載的江氏自序謂為二十八門，是傳寫之誤。按這部書近代發現通行的日本元和七年活字本，乃翻印宋紹興間麻沙坊本，凡七十八卷，確分二十八門，江氏的序並不誤，只不過四庫館臣未見到罷了。又譬如宋馬永易實賓錄，四庫提要云：「自元以來，其書久佚，陶宗儀收入說郛者，僅寥寥數條」。按今通行出自明鈔本的說郛，陶氏所錄的，多達二百八十八條。蓋四庫館臣所依據立說的，是明末陶珽重編的本子，而不是陶宗儀的說郛原本。若此之類，是不僅厚誣古人，而且貽誤後學。故清代校勘學家顧廣圻序他的朋友秦恩復的石研齋書目云：

> 蓋由宋以降，版刻衆矣。同是一書，無弗夐若逕庭。每見藏書家目錄，經某書，史某書云云，而某書之為何本，漫然不可別識。然則某書與否，且或有所未確，又烏從論其精觕美惡耶？（思適齋文集卷十二）

顧氏畢生從事校勘，深深了解書因版本的不同，其內容差異甚大。故若不著明版本，所謂的某某書，是不是它的本來面目，閱目錄的人則無從確定。我國目錄書之載明版本，就今流傳者來看，始於南宋孝宗時尤袤的遂初堂書目。這部書目中所著錄的，有的一書多至數本，但大抵限於經史典籍，因為這些書宋代刊刻比較多的緣故。明代則有嘉靖時晁氏寶文堂書目，清嘉道以後，始漸

普遍，衍及近代，則著錄益詳。標擧百宋千元，並不僅僅是務在矜炫，也是事實上有這種必需。

綜合前面的討論，則對於我國目錄學的意義，可以瞭解。所謂「目錄學」者，是詳分類例來部次群書，並進一步推闡各書的旨要，辨學術的源流本末，誌版本的異同優劣，使閱者能夠即類而知道學問，因學問而知道求書，求書時知道選擇版本的一種專門學術。是以目錄不僅限於記載書名，目錄學也不僅在於將繁富雜亂的圖籍，分類編目，以便於尋檢而已。而應該積極的介紹書的內容，使學者得依據以爲指南，來從事於學術的研究。

目錄學的體制

劉氏向歆父子的別錄七略，是後世編著目錄者所取法的，故評論目錄書的優劣，不能不拿錄略作為衡量的標準。綜括錄略著作的體例，主要有三項：一曰篇目，是概括一書的本末；二曰敘錄，是考述作者的行事，與論析一書的大旨及得失；三曰小序，是敘述一家一派的學術源流。所有這幾種體制，其作用卽是章學誠所謂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後代的目錄書，無論其內容是或詳或略，或損或益，大抵不出這三個範圍。自從雕版印書術普及後，宋以來的目錄書中間有記載版本的。清乾嘉以來，版本之學倡盛，各家藏書目錄的編撰，大多詳記版刻的源流，則所以考版本的源流異同。這種體例雖然屬於後起，但已為近世研治目錄學者奉為圭臬。以上四項體制，如有不備，則目錄的功用不全。茲分別論說於後：

甲、篇目

篇目的體例，是條別全書，著明某篇第幾。劉向別錄雖然不傳，但他的敘錄尚有若干存在原

書中，固然其中已有數種經過後人更易，未必保存原貌，姑就晏子春秋、戰國策、荀卿新書、列子等四書敍錄觀之，都是在敍錄之前先列舉篇目次第。如晏子八篇云：「內篇諫上第一凡二十五章，內篇諫下第二凡二十五章……」，其下云：「右晏子內外八篇凡二百十五章」。如戰國策云：「東周第一，西周第二、秦一第三、秦二第四……」，其下云「右定著三十三篇」，卽其例子。篇目的作用，是概括一書的本末，使讀者一覽目錄，卽了然全書的首尾，而後閱書，卽可知其殘缺與否。這項體制在漢世非常重要，欲知其故，須明瞭古代圖書的形制。

古代的典籍，是用筆墨書寫在竹或木製成的簡牘上，集若干簡，而以韋皮或絲繩編連之，名之曰一篇。因為簡策厚重，故一篇的文字不能過多。一部書既然分為若干篇，必需各為之立一名目，題於篇首，以資識別。其用意在便於察檢，有如後代的書冊，在下方題寫書根的意義一樣。凡是古人自著的書，係記述一件事情，或是闡明一個道理，則以事或義來題作篇名。如尚書的堯典、舜典，春秋的隱、桓、莊、閔……十二公等，皆是以事作篇名；如莊子的逍遙遊、齊物論，墨子的兼愛、非攻，荀子的性惡、正名等等，則是以義題篇。其有非出自著，而係將言行雜記，積章成篇，出於後人編次，首尾初無一定者，則摘其首簡的二三字作為篇題。如莊子的秋水、馬蹄，論語的學而、為政，孟子的梁惠王、公孫丑等篇皆是。凡以事或義未分篇的，文字的長短，

作者著書時卽已固定，故雖僅數簡，亦可自爲一篇。其他則編次之時，大抵視字數的多寡，以絲繩韋皮能夠勝任編連簡策爲度，斷而爲篇，如論語分爲十四篇，晏子諫篇分爲上下兩篇。及卷秋末年，以帛寫書盛行，因有改篇爲卷的。帛書一幅所能容納的字數，與簡篇約略相當，故大抵以一篇爲一卷。譬如尚書二十九篇，漢志載「大小夏侯章句二十九卷」，卽是以一篇爲一卷。也有篇幅過短的，一篇不能自爲一軸，則往往將幾篇合爲一卷，例如漢志所載：「爾雅三卷，二十篇」。然而帛書過長也不便於舒卷，故偶而有將一篇分寫作幾卷的，如尚書二十九篇，漢志載歐陽經三十二卷，卽是將其中的盤庚篇分作三卷，又有書序一卷，故成爲三十二卷。這一類篇卷的分合，大抵發生於漢以後。

因爲古書的篇卷自成單元，不相聯屬，則容易淩亂散佚，所以流傳的書本大多不是全書。又古書以一事或一義爲一篇，往往篇卷可以單行。如漢武帝末年河內女子進獻尚書泰誓一篇（按見論衡正說篇，唯作宣帝時，據近人考證實誤），東漢光武帝將史記的五宗世家、外戚世家、及魏其侯列傳等三卷賜與竇融（後漢書竇融傳），又明帝賜給王景河渠書一卷（後漢書循吏傳），卽其例子。旣然篇卷可以單行，所以同一書各家所收藏的篇卷往往多寡不一。劉向校書除了勘定文字的異同外，主要的目的是確定書的形質，把內廷及官府或私人所藏篇卷多寡不一的本子，集聚

一處來校勘，刪除其中重複的篇卷，所餘下不重出的篇數，就是這部書的定本，如管子書錄云：

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複重四百八十四篇（按此數誤，應為四百七十八篇），定著八十六篇。

又如晏子敘錄云：

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三十篇，為八百三十八章。除複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按應作六百二十十三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

劉向校書的過程，就今存的敘錄來看，大都類此，經過整理校讎而刪除重複後，定著為若干篇。所以一定要將所定著的篇目條列在敘錄之前，以顯見此新定的本子與各家的藏本不同，而且可以固定這部書的形質，以防散佚與錯亂。這種體制能使後人檢覈古書的完缺與否，也可供人考逸篇的崖略，用意頗善。不過後世的目錄書仿效的甚少，僅四庫全書總目於各書間有著明篇目的，如傅子、公孫龍子等提要。揆度其緣因，西漢以前，雖說是竹帛並用，然帛貴而竹賤，所以當時的圖書大多用簡策來書寫，只要看漢書藝文志著錄的書，篇多於卷，就可知道了。圖書既然多用

簡策寫，則容易淩亂錯脫損失，所以校讎的工作，必以釐定篇目為首要。自東漢和帝元興元年（西元一〇五年）蔡倫發明用樹皮、破布等廉價原料造紙的方法以後，圖書多用紙卷來書寫，唐宋以來，書式復由卷軸演進成書册，均易藏易檢。故魏晉以後職司校讎者，以勘定文字為主要任務。而且後世的書，卷帙越來越多，編撰者大都紹述司馬遷史記自序、班固漢書敍傳的餘緒，仿效劉向敍錄的成法，在書首列有篇卷目次，以概括全書，這種目次多的自數卷以至數十卷。若果撰述敍錄一一條舉篇目，除了徒增篇幅，令讀者生厭以外，實無甚意義。近代研治目錄學的學者還有喟嘆篇目體制的失墜，竟欲起廢於千載之下，實在昧於事理，未免失之泥古不化。

篇目的功用既在概括全書的始末，如果因篇目繁多，刪削不載，則又使後世的人無從考叢存佚。關於這點，四庫總目建立了一個很好的範例。四庫提要斟酌劉向的成法，於諸書大多著明其卷目。如長短經九卷提要，云：

> 第一卷八篇，題曰「文上」。第三卷四篇，題曰「文下」。第二卷四篇，則有子目而無總題，以例推之，當脫「文中」二字。第四卷一篇，題曰「霸紀上」，第五卷一篇，論七雄之事，題曰「霸紀中」。第六卷一篇，論三國之事，亦無總題，當脫「霸紀下」三字。第七卷二篇，題曰「權議」。第八卷十九篇，題曰「雜說」。第九卷二十四篇，題曰「兵權」。

又如王文成公全書三十八卷的提要，云：

是書首編語錄三卷，為傳習錄，附以朱子晚年定論……次文錄五卷，皆雜文。別錄十卷，為奏疏公移之類。外集七卷，為詩及雜文。續編六卷，則文錄所遺，搜輯續刊者附以年譜五卷，世德紀二卷。

這一種的敍述方式，於卷幅無所增，雖未列篇目，而對於一書的始末仍可顯見，後世即令有亡篇佚卷，猶可據以檢覈，於例最為得之，是編著目錄者所應當師法的。

乙、敍錄

敍錄體例的要點，是考述作者的行事，與論析一書的大旨及其得失。漢志大序云：「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廣弘明集卷三阮孝緒七錄序云：「昔劉向校書，輒為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所謂的「撮其旨意」，是概論作者著書的宗旨及書的大意。所謂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乃論析作者的學術淵源及評論書的優劣得失。欲明瞭作者著書的宗旨，必須先要明瞭他的生平。生平既明，則他的學術淵源及著書的原委，也就可以清楚了。劉向撰寫敍錄，所立下的義例有三項：一曰介紹著者的生平。如晏子敍錄云：

> 晏子名嬰，諡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彊記，通於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親附。不用，則退耕于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

綜敍作者的生平出處進退，言簡而意賅。又如韓子敍錄云：

>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其為人口吃，不能道說，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李斯自以為不如。

列子敍錄云：

> 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

並敍述作者的學術淵源及其師承。其他如孫卿敍錄、管子敍錄等，介紹作者的生平，尤為詳盡。劉向的其餘各書敍錄雖然多已亡佚，僅就清嚴可均、姚振宗諸氏所輯的佚文觀之，很多都是介紹

著者的文字，可以說是無書而不述其作者。至於不知其作者為誰，也考出其著書的時代。例如道家鄭長者一篇，別錄云：「鄭人，不知姓名，六國時」。禮類王史氏二十一篇，陰陽家南公三十一篇、周伯十一篇，並云：「六國時人也」。卽有作者的時代不可考者，也予以註明，如農家的宰氏、尹都尉、趙氏、王氏等都注云：「不知何世」。不強以不知為知，蓋如此可以免得學者再花費時間來作考證。

第二個義例為說明著書的原委，及書的大旨。如孫卿敘錄云：

> 孫卿卒不用于世，老於蘭陵，疾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

韓子敘錄云：

> 韓非病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擧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廉直不容于邪枉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五十五篇，十餘萬言。

此皆說明作者何以著此書而其書的主旨亦可以見。又如易傳古五子敘錄：「分六十四卦，著之日辰，自甲子至於壬子，凡五子，故號曰五子」。周書敘錄：「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

之餘也」。世本敍錄：「古史官明於古事者之所記也。錄黃帝已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謚名號，凡十五篇」。這些都是概述一書的內容。

第三項義例是評論書的得失。如戰國策敍錄：「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管子敍錄：「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晏子敍錄：「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為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為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為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觀」。周訓敍錄：「人間小書，其言俗薄」之類皆是，對於書的優劣得失皆予以評述。

劉向敍錄，是後世撰著目錄者所師法的，然而能與劉向所立的義例完全相合的實甚罕見。隋書經籍志總序對魏晉六朝的幾部有敍錄的目錄批評說：荀勗中經新簿「但錄題及言，盛以縹囊，書用緗素，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辯」。是說這目錄但重在抄錄書題及內容，並着意裝飾，而不能論述作者著書的原委。其評王儉的七志說：「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論阮孝緒的七錄說：「其分部題目，頗有次序。割析辭義，淺薄不經」。對於這幾部目錄的不滿，溢於言表。因為敍錄撰著的目的，是在使讀者在未讀其書之先，能對其書作者的生平、著書

的目的等等有所知悉，帮助他們讀其書時可以有進一步的了解。所以敘錄的義例不僅止於介紹作者的生平，還須闡明著書的原委及書的內容。然而後世的目錄學家大都昧於這種道理，清章學誠校讎通義漢志六藝篇云：

> 藝文雖始於班固，而司馬遷之列傳，實討論之。觀其敘述戰國、秦、漢之間著書諸人之列傳，未嘗不於學術淵源，文詞流別，反復而論次焉。劉向、劉歆蓋知其意矣。故其校書諸敘論，既審定其篇次，又推論其生平，以書而言，謂之敘錄可也。以人而言，謂之列傳可也。

也是紹述王儉七志的觀點，把敘錄的體制，視同列傳。實則敘錄與列傳撰述的重點是不相同的。章氏但執其一偏，而昧於劉向敘錄義例的整體。

唐以前的目錄現今雖不傳，但根據記載尚可以知道隋許善心所撰的七林，還能闡明作者著書的意旨。隋書卷五十八許善心傳：

> (開皇)十七年除秘書監。于時秘藏圖籍，尚多淆亂，善心放阮孝緒七錄，更製七林，各為總敘，冠於篇首。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其類例焉。

許氏的七林，隋唐史志都未著錄，不詳它的體例及區類如何。不過僅就隋書本傳所載，雖說規模

阮氏七錄。其敍錄還能發明作者著書的原委，通達劉向的義例，實超過六朝王阮諸氏。後代的解題提要的撰著，淵源雖出於別錄，然而許善心的七林，也不能說他沒有承先啓後之功。唐代元行冲等所修的羣書四部錄二百卷，此書久佚，其敍錄撰寫的優劣，無從詳悉。不過據舊唐志總序所載毋煚古今書錄序對此目的批評有云：「新集記貞觀之前，永徽已來不取；近書採長安之上，神龍已來未錄。此則理有未宏」。「書閱不徧，事復來周，或未詳名氏，或來知部伍。此則體有未通」。知道這部目錄大抵依據隋代的舊目錄，新增的書撰寫敍錄的，只有唐初太宗貞觀以前的著作，高宗以後的則無，而中宗以後的新著且不入目，故毋煚批評說「理有未宏」。按新唐志載開元七年，詔公卿士庶之家，所有異書，官借繕寫。到九年十一月羣書四部錄二百卷修成奏上，前後不過二年多，而完成此著錄八萬二千多卷的目錄巨著。大概敍錄多依據六朝的舊目錄，新撰的殆僅隋及初唐人的著作，才能於短期內修成，所以考證多疎，或有於作者姓名不詳的。未幾毋煚因此目多疎舛，乃刪略增補，撰成古今書錄四十卷，書名下也有敍錄論釋。據他自云：「改舊傳之失者，三百餘條」。永徽以後的新著，也「釋而附之」。但此目南宋以來不傳，其敍錄的優劣，也未見前人評論，不知道是否合於劉向的義例。宋代以降的敍錄之作，能紹述別錄的，祇有清乾隆間所修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其他如宋代的崇文總目、晁氏郡齋讀書志、陳氏直齋書錄解題

、明高儒的百川書志等，大多僅撮述各書的大旨，而對於著者的生平，及書的得失，但偶爾述及之，也不能詳明，為例已不純。四庫總目雖說是一部相當詳贍的目錄，但其提要對於作者僅載爵里始末，而對於其立身行己，則罕加敍述，已經稍變別錄的義例。而且提要述作者爵里，大多止參考常見史傳一類的書，或依據本書中所有的未記載，不能旁搜博採，所以提要中常見：「始末未詳，仕履無考」的話。目前正在印行中的續修四庫全書提要，僅就已出版的兩册來觀，是頗能繼軌四庫總目，且有若干篇詳贍過之。不過此新出版的續修四庫提要，係雜出衆手，妍媸互見，未能斠一，還不能視作定本。目錄書編撰的目的，是指引讀者如何治學涉徑，節省他們盲目探討的勞費，而收事半功倍之效。假若編寫敍錄而畏繁難，當考而不考，則就無貴乎其為目錄書了。近世題跋的書，如陸心源儀顧堂題跋、續跋，傅增湘藏園羣書題記、續記，莫伯驥五十萬卷樓羣書跋文等書中，介紹作者的生平，大多博採雜史、方志、文集、說部諸書，能詳以前目錄所未詳的。固然這些題跋書以詳記版本為主，並不完全符合敍錄的體裁，然其博徵繁引，考作者的行事，實在是撰寫敍錄提要的人，所應當取法的。

丙、小序

小序的作用，是條別學術的源流與得失。劉歆繼續其父未竟的工作，校讎內府的圖書，將整理竣事的各書，移貯天祿閣上，部次類分，編成我國第一部目錄書——七略。他把當時的藏書區為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技等六個大類，其下再細分為三十八個小類。又敘述各家各派學術的淵源流變及利弊，合為一篇，放置目錄之前，謂之輯略，作為發凡起例。班固著漢書，依據七略，扼要刪取，編為藝文志，因此將輯略一篇文字，解散分載於各類書目之後，作為小序；每一略各小類書目載完後，復有撮述這一略的總序。在藝文志之首並有大序一篇，為全書的綱領，這些敘述學術流變的序文，尤足以表見其類學術的淵源。茲酌列舉六藝略的易、書，及諸子略的儒、法等四類的小序，來說明小序撰著的體例。

易類小序：易曰「宓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於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及秦燔書，而易為卜筮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訖於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

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書類小序：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儒家類小序：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為最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

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寖衰，此辟儒之患也。

法家類小序：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漢志六藝略的各小序，也就是七略輯略的文字，大都是首溯各經的起源及與孔子的關係，其次敘述傳授的源流與衍分的派別，再次敘古文經的來歷，及其與今文經的異同，使人讀後即可以清楚這門學術的流變。而於諸子略各家，除了追溯其學的淵源外，並敘述其學的主旨，並評騭其得失。其他各略的小序，亦大多類此。每略之後的總序，則撮述各類而予以總論之，以挈綱領。漢志小序所述，據後人的考訂，固然其中不無可議之處，如魯共王壞孔子宅，按論衡在景帝末年，而謂作武帝時；如言孔子作易十翼，刪詩書等等，皆未必事實。然而能以極簡扼的文字，敘述其學的淵源流變，非深通於其門學術，而能辨識其得失之故，則不足與此。目錄書的撰述，敘錄固非易易，而小序尤難。章學誠校讎通義敘云：

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羣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後世部次甲乙，紀錄經史者，代有其人

。而求其能推闡大義，條別學術異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見於墳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

卽是指的小序而言。

自漢書藝文志以降，歷朝的官私目錄，於每類皆撰有小序者，各代偶或有之。而求其小序能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者，實不多見。有小序或部類總序的目錄，除漢志而外，今存者有隋書經籍志、宋崇文總目、晁氏郡齋讀書志、陳氏直齋書錄解題，明焦氏國史經籍志，及清四庫全書總目六家。已佚傳而尚可考知的目錄，則有宋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隋許善心七林、唐元行冲等羣書四部錄、毋煚古今書錄、宋三朝藝文志、兩朝藝文志、中興藝文志、中興館閣書目等九種。王儉作七志，隋志稱儉「又作九篇條例，編乎首卷之中、文義淺近，未為典則」。已是批評其未善。復按七錄序，謂七志係倣別錄七略的體例，則其置在卷首的九篇條例，有若七略的輯略。然考七錄序又云：

王儉七志，卽六藝為經典，次諸子，次詩賦為文翰，次兵書為軍書，次數術為陰陽，次方技為術藝。以向歆雖云七略，實有六條，故別立圖譜一志，以全七限。其外又條七略及兩漢藝文志、中經簿所闕之書，並方外之經：佛經、道經，各為一錄，雖繼七志後，

而不在其數。

據此則知七志雖以七爲名，實合佛道而分爲九大類，由此推知其卷首的九篇條例，應當是每類各撰總序一篇，九類的總序合成一編者，與漢志的小序尚略有不同，後來晁公武作郡齋讀書志，僅四部各撰一總序，大概淵源於此。或有以爲九篇條例卽同漢志的小序，實則非是。阮氏的七錄有無小序，他的自序中未明言，只說斟酌王劉。按隋書許善心傳云：

善心倣阮孝緒七錄，更制七林，各爲總敍，冠於篇首。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別其類列焉。

近人或有解釋此處的「類例」卽是指的小序，然細玩味這段文字，前面旣云各爲總敍，冠於篇首，部錄之下，不應再有小序，古代目錄書中尚無如此體例者。故「類例」一辭，仍當如鄭樵校讎略編次必謹類例論篇所云，係指的圖書分類。七林倣自七錄，七錄倣自七志，仍與劉歆輯略，漢志小序不同，只有總序，而無小序。隋志旣批評七錄：「割析辭義，淺薄不經」，則此總敍也寫得不一定佳。許氏的七林，隋唐史志皆未著錄，大概是成書未久，旋卽亡佚，不詳其總敍的義例善否。唐元行冲羣書四部錄凡二百卷，係開元中元氏與毋煚等奏進者，據舊唐書經籍志引毋煚的四部都錄（卽古今書錄）序云：

彙之所修（卽指羣書四部錄）……所用書序，咸取魏文貞；所分書類，皆據隋經籍志。

理有未允，體有不通，此則事實未安。

由此可以知道羣書四部錄的小序，全採魏徵所修的隋書經籍志。然魏徵所撰，敍述止於隋代，元氏等所修時在開元，相去百餘年，而全取舊序，所以毋氏批評說：「理有未允」，「事實未安」。古今書錄四十卷，係毋氏等刪節增補重訂羣書四部錄而成，舊唐志序曰：「煚等選集，依班固藝文志體例，諸書隨部皆有小序，發明其指」。玉海卷五二藝文門載此目錄也說：「並有小序，詞簡事具」。評語尚佳，則是這部目錄的小序尚能步武漢隋二志。後來劉昫修舊唐書時，其經籍志雖全採古今書錄，而以小序「卷軸繁多」，「序敍無出前修」，給全刪去了，實在是件很可惜的事。新唐書及宋明諸史志，也不撰小序，蓋皆舊唐志之始作俑。宋代幾次所修的國史多有藝文志，如三朝藝文志、兩朝藝文志、中興藝文志等書雖不傳，其小序於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中所引錄的，尚略可窺見。經籍考引三朝藝文志的孝經、小學、起居注、雜史、傳記、故事、農家、天文、神仙、釋氏、文史等十一類的小序；引兩朝藝文志的傳記、天文、別集三類的小序；引中興藝文志的時令、文史兩類的小序。從所引的各篇小序來看，皆敍述簡略，尚不足以明學術的流變。中興館閣書目，據玉海卷五二所載，為淳熙五年陳騤等奏上，凡七十卷，又有序例一卷，計

五十五條。按此目條分四部五十二類，序例五十五條當是小序及總敘，惟尙短少一條，或玉海所記的門類數字有誤。其目不傳，無從考索，亦不詳小序撰述的義例如何。宋崇文總目，按玉海引國史志云：「六十六卷，序錄一卷，多所謬誤」。序錄卽倣輯略而作。六十六卷的原本及序錄現今雖然不傳，但據清錢東垣、秦鑑等人合輯本所得的小序三十篇觀之，皆尙空談而少實證，實在無足輕重，所以宋國史志批評它「多所謬誤」。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這兩部目錄，近世雖然號稱爲比較好的目錄書，而晁氏但能爲四部各作一篇總序，至於各類則無所論說，不過其總敘雖然簡略，於學術的流變得失，還略能涉及。陳氏解題，則無總序，而間有小序，見語孟、起居注、時令、農家、陰陽家、音樂、詩集、章奏等八類。惟書錄解題原本早佚，今通行的廿二卷本是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輯出重編的。提要雖說「永樂大典尙載其完帙」，又說「當時編輯潦草，譌脫宏多」。則原本是否每類皆有小序，或不止此八篇，已無可考。姑就傳本的小序來看，也僅是解說門類分合的緣由，未能條別學術的源流。焦竑的國史經籍志每類後各有小序，共四十八篇，而無總敘。其小序大抵說明他著錄的旨意及分隸之故，雖也偶能敘及學術淵源兼評論得失，但尙不能通其流變。清章實齋曾批評他：「未悉古今學術源流，不於離合異同之間，深求其故，而觀其所議，乃是僅求甲乙部次」（校讎通義卷二焦竑誤校漢志篇）。雖然這是章氏針對焦竑國史

經籍志後所附糾繆一卷的評話，但也正可適用來評他的小序。今世所存目錄書中的小序勉強可以繼軌七略漢志的，也僅有隋書經籍志及四庫全書總目而已。所以章氏謂「千百之中，不十一焉」。

隋書經籍志前有大序一篇，敘述歷代典籍的源流甚詳，足以上繼漢志之闕。其述漢魏六朝目錄書的體例，與阮孝緒七錄序互有詳略，皆可供我們稽考隋代以前的目錄。其經子兩部的小序，皆依仿漢志，凡所論溯淵源，不出劉、班的範圍，及其補敘源流，又每每失考，故四庫隋書提要極為譏抑，云：

> 惟經籍志編次無法，述經學源流，每多舛誤。如以尚書二十八篇為伏生口傳，而不知伏生自有書教齊魯間。以詩序為衛宏所潤益，而不知傳自毛亨。以小戴禮記有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為馬融所增益，而不知劉向別錄禮記已載此三篇，在十志中為最下。

雖然隋志經子兩部的小序不乏舛誤之處，其實少許的錯誤在漢志及四庫總目也不能避免，因為研究總是進步的。但隋志小序對學術的流變得失條析得相當簡明扼要，使人讀後對其類學術的興衰情形有概括的認識，可指導學者進而研究。比較來說，比四庫總目的小序敘述還要得法得多。所以四庫提要雖批評隋書經籍志在十志中為最下，但其下又云：「然後漢以後之藝文，惟藉是以考

見源流，辨別真偽，亦不以小疵為病矣」。於禮類附錄夏小正戴氏傳提要中亦云：「隋志根據七錄，最為精核」。可見四庫館臣對隋志仍多所推重。

隋志的經子兩部小序，尚可說大體依仿漢志而補敘源流。其史、集兩部，則是漢志所無的，隋志也能辨章學術，窮源竟委。如序古史而推本於竹書紀年，序起居注而推本於穆天子傳，序舊事溯源於周官太史掌萬民的約契與質劑，序職官知即周官御史所掌在位的名數，序譜系溯源於周官小史所掌定繫世，辨昭穆。至於雜傳序言史傳應當紀窮居側陋之士，足以辨正後世或謂地理書不宜記人物的非是；簿錄序言應當辨流別，亦足以糾目錄書但記書名之失，皆獨具卓識。道佛兩部則僅有總序，而無小序。此六部的總敘對其門學術的源流，也皆能作提綱挈領的概敘。隋志小序實為漢志以後所僅見，固不宜因偶有疏略，而輕肆譏評。

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凡例云：

> 四部之首各冠以總序，撮述其源流正變，以挈綱領。四十三（按三應作四）類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詳述其分併改隸，以析條目。如其義有未盡，例有未該，則或於子目之末，或於本條之下，附注案語，以明通變之由。

我國古代的目錄書，其敘述學術源流正變的文字，原輯為一卷，置於目錄之前，或名輯略，或名

條例，或稱作序例。自漢志採輯略，將總序、小序放置於部類之末，成為定例，隋書經籍志、國史經籍志等皆沿此式。這種體例，源來甚古，古書中如淮南子的要略訓，史記的太史公自序，法言的十三篇序，班固的漢書敍傳等莫不如此，將發凡起例撮抄的文字，置於書末。把小序放置於部類之前，不知起於何時，就可考見者，則有晁氏讀書志的四部總序，及陳氏解題的八篇小序。陳氏解題因傳本係出輯本，尚未可確定原書是否即如此。四庫總目大概是因襲晁志，將總序、小序放置部類之前，可謂已變改舊例。四庫總目的總序、小序，考證論辨，可以說是相當的精詳，初學者莫不奉為津逮。四部序中大抵以經部為最精，於學術流別興衰能說明其所以然，對漢宋門戶的分析亦詳。其次集部，於別集之特盛與總集的雜濫，也能道出其故。其餘二部，則如其凡例所言，多敍其著錄與分隸門類的義例，於學術的流變及古人著作的旨意發明較少。又往往不考本末，舉爾立論，例如地理類小序云：

古之地志，方域山川風俗物產而已，其書今不可見。然禹貢、周禮職方氏，其大較矣。元和郡縣志頗涉古蹟，蓋用山海經例。太平寰宇記增以人物，又偶及藝文，於是為州縣志書之濫觴。

按地志記載人物，晉摯虞所撰的畿服經即已有此例，隋志地理類小序明言之，實不自樂史太平寰

宇記始，近人余嘉錫在四庫提要辨證卷七太平寰宇記提要辨證中考辨甚詳。至於地志中載古迹，自漢晉以來幾乎成爲定例，譬如今傳世的三輔黃圖及輯本晉周處陽羨風土記等，均有古跡一門。元和郡縣志之頗涉古跡，實可謂淵源有自，也不一定用山海經例。又如「目錄」一辭，始見於班固的漢書敍傳，而四庫總目目錄類小序謂昉於東漢末年鄭玄撰三禮目錄。以上等等都是四庫小序失考的地方。再者、他論析學術的源流，大都依據現存的書來立說，比起漢隋二志來，精到還有不足。但大體而論，能條列百家的優劣，進退古今的作者，隋志以後實僅見於這部目錄的小序。

敍錄的體制，自別錄七略，以及古人所作的書序，大抵相同。在結構及行文方面，皆有一定的法度。而小序的撰述，則漢志各篇已自不侔，故未可立爲成例，來繩後來的作者，所以隋志、四庫總目等論敍各異。余嘉錫氏嘗引章學誠的話來論二者的差別，云：

> 章氏之論文史也，以爲「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文史通義書教下）。持此以衡目錄，則敍錄者記注之事，小序者撰述之事也。夫圓則無方，神則無體，惡可於字句之閒求之？（見余著目錄學發微頁五九）

這是相當恰當的譬說。易繫辭云：「智以藏往，神以知來」。敍錄重在介紹作者生平及書的大旨與得失，皆就已有的來考述，故云藏往。而小序則溯學術源流演變之迹，可以測見未來的趨向，

故謂之知來。雖然小序沒有一定的體式以資遵循，但只要通曉學術流變得失的原由，因事行文，文成則自然法立了。

丁、版本題識序跋

以上所敍述的，是就歷代的目錄書，上起別錄七略，下迄清修的四庫全書總目，相互參稽，討論其體制的功用與優劣，以說明目錄書的義例。但自宋代以後，目錄書中尚有記載版本，抄錄序跋的，對於正統的目錄學而言，雖可說屬於別體，然而這種晚起的體制，用意頗善。蓋書因版本的不同，內容或可能有差異，其道理在「目錄學的意義」一章中已論說過，故近世的目錄書罕有不明確記載版本的源流種別，也是現代研究目錄學者所不可不知。記版本的目錄書，就其體例的不同而言，大別可分為三類，一曰僅只着明版刻，二曰詳載賞鑑考訂，三曰引錄刻書的序跋。茲分別予以論敘。

什麼叫做「版本」？「版本」是一個代表兩種意義的連合名辭。「版」是雕版，「本」是指的書本。「版」本來是中國古代圖書形制的一種，又名作「方」，用木做成，形狀為長方形。儀禮旣夕禮云：「知死者贈，知生者賻。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鄭玄注：「書賵奠賻贈之人

名與其物於版，若九行，若七行，若五行」。又聘禮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從而可以想見古代方版的形制，每片可書寫五至九行，約容納一百字。百字以上書於策者，因簡策可以任意編集，故字數不受限制。唐代發明雕版印刷術後，刻書的版與古代的方版相似，故借用其辭以專指雕版。「本」字，說文解字說：「木下曰本，從丅」，有本根的意義。別錄云：「讎者，一人持本，一人讀書」，劉向校書，盡取中外所藏的各種本子勘對。顏氏家訓書證篇中常引江南書本，以示與江北書本有所差別。皆說明各書本的本根有所不同。故古代官校書籍，必須博采許多的本子來校讎。自印刷術普及後，印刷代替了手抄，一種書刻成，往往印刷千百部，則版同而本子也無區別，是故校勘者，須選用不同的版刻，而同版的印本，則毋庸采取了。例如明南監本漢書列載北宋時宋祁校勘，採用有古本、唐本、淳化、景德、景祐歷朝監刻，以及各地公私刊刻等十六種不同的版本。故後世的書目必需記明版本，始能達到目錄的功用。古代的公私書目，初不著錄所藏的係什麼本子。書目之記明版本，就現今所傳的來看，始於南宋初葉尤袤的遂初堂書目。尤目不載卷數與作者，然而偶記版本。書林清話卷一古今藏書家紀版本篇云：

> 古人私家藏書必自撰目錄，今世所傳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無所謂異本重本也。自鏤版興，於是兼言版本，其例創於宋尤袤遂初堂書目。目中所錄，一

書多至數本，有成都石經本、秘閣本、舊監本、京本、江西本、吉州本、杭本、舊杭本、嚴州本、越州本、湖北本、川本、川大字本、川小字本、高麗本。此類書以正經正史為多，大約皆州郡公使庫本也。

自尤氏以後，編書目能仿用其例的尚甚罕見，在明代唯有嘉靖間晁瑮編寶文堂書目，於書名下偶有註明所藏的是什麼刻本。明末以來，藏書家特重宋元版，故清初的書目於所藏的宋元本始予以標注，如汲古閣宋元版書目、絳雲樓書目、季滄葦藏書目等是。而錢曾的述古堂書目除記明宋元版外，於抄本書也加以著明。一直到嘉慶間秦恩復編其藏書為石研齋書目，才推廣尤氏遂初目的陳法，始備注明所藏各書的版本。顧廣圻作書目序云：

今先生此目，創為一格，以入錄之本，詳注於下。既使讀者於開卷間，目憭心通而據以考信，遂不啻燭照數計。於是知先生深究錄略，得其變通，隨事立例，惟精惟當也。特拈出之，書於後，為將來撰目錄之模範焉（思適齋文集卷十二）。

嘉慶以後，藏書家所編的書目大都注明版本，實為一進步。惟各家書目所記的版本，多僅注明為宋為元為明，稍詳者亦不過標擧元號，如「明嘉靖刻本」、「明萬曆刻本」、「清康熙刻本」等，若求如遂初堂目一樣，能載明刻地的，可以說甚罕。然而兩宋歷祚三百餘年，元朝歷史雖短，也

有九十餘年，明代則有二百餘年。一種書的刊版，每一代不僅只一次，雕印出版者也不僅止一人，也不只一處地方，如統曰宋刻、元刻，則這家書目的宋元本，與另一家書目的宋元本，是否同一版刻，如不見其書，則無人敢予斷言。即以標擧元號，題「明嘉靖刻本」等而言，一朝年限雖短，然亦無法確定所藏究為何本。例如史記一書，明嘉靖四年至十三年凡十年中，其刊印可考者不下四次。有四年金臺汪諒、四至六年震澤王延喆、八至九年南京國子監、十三年秦藩等四家刻本。若但題嘉靖刻本，則此目所收的，未必就是另一書目著錄的藏本。自從西洋的圖書目錄學輸入我國後，對於圖書編目必須著明出版的年代、地域及出版者，影響於我國舊籍的編目頗大，近代的書目如江蘇國學圖書館書目、吳興劉氏嘉業堂明版書目、國立中央圖書館及其他圖書館的善本書目等尚多能儘詳的著錄。不過近年影印古籍出版的很多，一般圖書館編目只著明現代出版的年代與地域，而未能把據以影印的原本刻印的年代與出版者標擧出來，也一樣的未能盡目錄之用。所以這種義例，仍有待吾輩研治目錄學者來推而廣之。

我國雕版印書，肇始於唐代，迄宋而大盛。然而一直到明正德年間以前，還未聽說有特別珍視宋版者。自明代中葉以後，覆刻宋版的風氣甚盛，藏書家開始寶重宋刻。最膾炙人口傳為士林佳話的，如嘉靖年間華亭朱大韶用所寵愛的美婢向人交換一部宋版後漢紀，萬曆時蘇州的王世貞

賣了一座田莊，為的是收購一套宋刻兩漢書。明末常熟的毛子晉，更張貼告示，出高價徵求宋版，計葉付錢。到了清代，錢牧齋謙益、季滄葦振宜等人復倡之於前，黃蕘圃丕烈、吳兔牀騫等更推波逐瀾於後，不僅寶宋，而且珍元，到了近代，明版也為藏書家所重視。舊本書既為收藏家所珍貴，然而歷時幾百年，屢經兵燹水火蠹蟲之災，傳世的也就日漸稀少了，徵求的既多，販鬻的自然無以為供，坊間商人因緣射利，不惜偽造來欺騙購藏者，於是藏書家中出現了珍賞鑒訂的一派。就是洪亮吉在北江詩話卷三所稱：「第求精本，獨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縱未盡窺，而刻書的年月日最所深悉，是謂賞鑒家者是也」。這些藏書賞鑒家將他們所藏的精本，記錄版式行款、序跋題記，敘述其本遞藏的源流，並取通行本校勘異同。其目的固在炫耀所藏的宋元版，也可供後來收藏者考訂真偽，免上書估的當。這類的藏書目錄雖然所記載的多屬辨別版本的事，但從目錄學體制而言，也可說是敘錄的另一種體裁。鑒別版本，雖說是現代編目的人所應當具有的智識，但版本學今已發展成為專門學術，欲研究者，應閱專書。茲目錄學所討論的，只是在詳究它的體制。

版本的賞鑒，導源於書畫的賞鑒。在南北朝時代，因為士大夫間重視書畫，因之有許多有關書畫的著作出現，然而尚不過是倣班固漢書古今人表的方式，品評作者的優劣高下，如南齊謝赫

古畫品錄、梁庾肩吾書品、陳姚最續畫品等都是這一類性質的著作。到了唐代才漸漸別為賞鑒一途。唐玄宗時有竇臮撰述書賦，其中兼記收藏印章太平公主等十一家，為賞鑒的萌芽。到了唐代末葉有張彥遠撰歷代名畫記十卷，其第十一篇論鑒識收藏閱玩，第十二敍自古跋尾押署，第十三敍自古公私印記，第十四論裝褙褾軸。又按郡齋讀書志載張氏別有名畫獵精六卷，云：「論畫法，並裝背褾軸之式，鑒別閱玩之方」。在論書人畫法之外，兼敘收藏的印記及裝褫等外表，開後代賞鑒一派的先河。其後遞相祖述，到了明代發展成不論書畫的本身，專記載其上的題跋文字及遞藏源流與印記的純鑒賞一派。如朱存理鐵網珊瑚、汪砢玉珊瑚網、張丑清河書畫舫諸書卽是。明清之際，舊本書既為收藏家所特別寶貴，遂有做書畫賞鑒的前例而倡為版本賞鑒者，當首推錢曾的讀書敏求記。曾字遵王，自號也是翁、述古主人，江蘇常熟人，是錢謙益同族的曾孫。自其父裔肅卽喜歡搜購圖書，至曾收藏益富，其中頗多舊本秘笈。他將他的藏書先後編成述古堂書目及也是園書目，又遴選所藏的精本各撰解題，編成述古堂書目題詞，後來改名為讀書敏求記。這部目錄係以四部分類，而類目毫無義例。所撰的解題，不敘介作者及書的內容，但討論繕寫刊雕的工拙。四庫總目僅存其目，提要批評它分別門類，不甚可解，考證也多乖謬，然而仍稱許其「述授受之源流，究繕刻之異同，見聞既博，辨別尤精，但以版本而論，亦可謂之賞鑒家矣」。其

後，乾隆四十年于敏中等奉敕編昭仁殿所藏的善本書，成天祿琳琅書目十卷。嘉慶三年彭元瑞又奉敕整理昭仁殿續集的善本，編成天祿琳琅書目後編二十卷。這兩部書目以經史子集分類，每類中以宋金元明刊刻的時代順序著錄，每書各有解題，也是僅詳載槧梓的年月，刻印的工拙，及收藏家的題識印記，並一一考其時代與爵里，以述明授受的源流。所記載比錢曾讀書敏求記還要詳細，然而鑒別未精，版本多錯誤，未可全部採信。是後藏書家撰藏書志更遞事踵華，嘉道間海寧陳鱣的經籍跋文、吳縣黃丕烈撰百宋一廛賦注，又增錄舊本書的版式行款，開後來元和江標宋元行格表但記行格的一派。黃氏所撰寫的藏書題跋，他的友人王芑孫作陶陶室記云：

> 於其版本之後先，篇第之多寡，音訓之異同，字畫之增損，及其授受源流，繙摹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廣狹，裝綴之精粗敝好，莫不心營目識，條分縷析。

為書志題跋及於校勘與敘版本源流的濫觴。道光七年虞山張金吾撰愛日精盧藏書志，除記版本及遞藏源流外，又仿朱彝尊經義考的體例抄錄書中的序跋，不過僅錄元代以前人所撰而且比較稀見者，至於前賢及時人手書的題跋，則備錄其文。又凡四庫未收的書，並紹介作者及書的內容。後來編著藏書志的，如同治光緒間的吳縣潘祖蔭滂喜齋藏書記、常熟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聊城楊紹和楹書隅錄、歸安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及儀顧堂題跋、杭州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江陰繆荃

孫藝風藏書記、順豐丁日昌持靜齋藏書紀要、宜都楊守敬日本訪書記、民國以來的江寧鄧邦述羣碧樓善本書錄、吳興張鈞衡適園藏書志、長沙葉德輝郋園讀書志、江安傅增湘藏園羣書題記、東莞莫伯驥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等等，雖然是詳略或異，大抵皆師其法。而賞鑒之精，考訂之密，後來者居上。清代的各藏書志大多著錄宋元舊刻與舊抄秘笈，對於明版或明代人的著作僅選載較罕見者。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及繆氏藝風藏書記於所藏的明刻本始多予著錄，至葉氏郋園讀書志，莫氏五十萬卷樓目錄，雖明版或明代著作也均詳予賞鑑。清人所撰的題跋於版式不列載刻工及諱字，民國二十八年海鹽張元濟為南海潘氏寶禮堂編撰宋本書錄，始詳加記載。稍後北平文祿堂主人王文進編訪書記，也沿用其例，而現代作題記圖錄者，則無不詳載，體例愈臻精密。

賞鑑書志的編撰，在記錄一書的版式行款、刻工、避諱字、刻書牌記、裝訂、前後的序跋、收藏的印記及題識，以及紙墨字體與刊雕的工拙，如同敍錄一樣。不過僅以書的版刻及外形為記述的對象，而不以闡介書的內容為主旨。雖有資於版刻的考訂鑒別，而無關於學術的本末源流。然而自張氏愛日精盧藏書志於四庫所未著錄的書，撰寫解題，陸氏儀顧堂題跋續跋對於作者，能考四庫所未詳。降及近代，藏園羣書題記、五十萬卷樓羣書跋文，論述的範圍益廣，寖有兼具敍錄體制的趨勢，故為研治目錄學者所不可不知。

古代目錄家編著目錄，論其體例的源流，都是自撰敍錄，未嘗有採錄他人的序跋者。惟釋家典籍中有梁朝和尚僧佑所撰出三藏記集十五卷，其中卷六至卷十二，全錄各經典的序文。佑自序云：「一撰緣記，二銓名錄，三總經序，四述列傳。緣記撰，則原始之本克昭；名錄銓，則年代之目不墜；經序總，則勝集之時足徵；列傳述，則伊人之風可見」。他的採序文入目錄的體例，大概襲自劉宋時陸澄所撰的法論目錄。法論目錄一〇三卷今雖不傳，其目次尚載於出三藏記集卷十二，就目次所列，多集錄前人的序論。僧佑序云：

> 所以記論之富，盈閣以仞房；書序之繁，充車而被軫矣。宋明皇帝，摽心淨境，載餐玄味，爰敕中書侍郎陸澄，撰錄法集。陸博識洽聞，苞舉羣籍，銓品名例，隨義區分，凡十有六帙，一百有三卷。其所閱古今亦已備矣。

不僅錄序文，且集前人的記論，為元代馬端臨撰文獻通考經籍考的張本。陸氏的這種體例不知是自創？抑或取法於前人？因書缺有閒，無從考訂了。其後唐釋道宣撰大唐內典錄、智昇撰開元釋教錄，也仿僧佑的例子，目中間採錄作者的自序。到了元朝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始推廣陸氏的體例，全採前人的論記序跋，自下論斷的甚少。馬氏撰經籍考，除採崇文總目、中興藝文志、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等目錄而外，時從文集或本書中抄出序跋，並自雜說筆記中摘錄有關其

書的論辯。間有書已亡而序尚存者，也將之錄入，凡書名下無卷數者，皆是其時不傳的書。他的這種著錄方法收羅既不能完備，而且資料衆多，也不可勝採，有點近似爲例不純。然而其體制頗善，對於學者甚爲有益，而且頗存佚文。譬如宋李燾的文簡集一百二十卷已亡，經籍考採用了其序跋題記凡四十二篇（註），大都考證精確，遠在晁陳二家解題之上。可惜馬氏僅就一時所見的資料，隨手抄錄，於唐宋人的文集，未能廣事搜羅。清康熙間朱彝尊又仿經籍考之例撰經義考。四庫提要云：

每一書前列撰人姓氏、書名、卷數，次列存、佚、闕、未見字，次列原書序跋、諸儒論說及其人之爵里。彝尊有所考正者，即附案語於末。惟序跋諸篇，與本書無所發明者，連篇備錄，未免少冗。

蓋宋以後人所作的書序，喜歡借題發揮，橫空起議，雖朱氏僅考經義，所收尚不至甚濫，猶不乏無關學術的言詞，所以四庫提要說：「未免少冗」，不如馬氏經籍考尚能稍具翦裁。馬朱二氏於所引前人的論說，概標某氏曰，不著出處。所引的書序，也多刪去其年月。翁方綱評經義考云：

經義考於每書之序多刪去其歲月，覩者何自而考其師承之緒及其先後之迹乎？又所載每書考辯論說皆渾稱爲某人曰，不著其出於某書某注某集，則其言之指歸無由見，而於學

人參稽互證之處亦無所稗助。蓋竹垞此書因昔人經籍存亡考而體，專留意於存佚，而未暇計及後人之詳考也。（蘇齋筆記卷一）。

而經義考的著錄體例，則是襲自文獻通考經籍考。

嘉慶初年謝啓昆撰小學考，亦沿襲朱氏的體例，但於採及他書論說者，則著明所出。道光中張金吾編愛日精廬藏書志，光緒八年陸心源刻皕宋樓藏書志錄其藏書的序跋、及名家手書的題識，悉載年月，一無刪裁。惟於明以後人的書序，略加選汰。又於習見書的序跋，亦不錄其文，皆僅存目，以備稽考。所謂青出於藍，後來者居上。清末孫詒讓撰溫州經籍志，更斟酌諸家，擇善而從。其敍例云：

敍跋之文，雅俗襍糅，宋元古帙，傳播浸希，自非繆悠，悉付掌錄。明氏以來，略區存汰。大抵原流綜悉，有資考校，義旨閎眇，足供誦覽，凡此二者，並爲擷采。或有瞀士剽剟，雅馴既少，書林衒鬻，題綴猥多，則屢存凡目，用歸簡要。（原註：張氏藏書志于習見之書序跋，皆屢存目，今略放其例）。若編帙既亡，孤文屢在，則縱有疵纇，不廢迻謄。復以馬朱兩考，凡錄舊文，不詳典據，沾獵塗竄，每異本書，偶涉讎勘，輒滋歧牾。今亦依張志之例，凡舊編具在者，並迻寫原文，不削一字，年月繫銜，亦仍其舊

（原註：凡敍跋文字從他書采入者，並依朱考，於文首揭著某某敍跋。其據本書甄錄者，既備載全文，則姓名已具，故不復冠以某某敍跋之題，亦張氏藏書志例也）。其有名作孤行，散徵他籍者，則備揭根柢，並著卷篇，庶使覽者得以討原，不難覆檢。至于辨證之語，刺剟叢殘，實難稽覈。朱考概標某曰，尤為疏略。今則直冠書名，用懲肊造（原註：謝啓昆小學考已有此例。特此書名之下兼及卷數，與彼小異耳）。有删無改，亦殊專輒。

義例益臻邃密。民國初年徐世昌修大清畿輔書徵、項元勳編台州經籍志，也多仿孫氏例，於明以後人的序跋，亦全錄其文，更為週詳。

關於目錄書中錄序跋的體制，近人余嘉錫甚贊其善，他說：

夫班固漢書採史公之自敍，錄法言之篇目，誠以學問出於甘苦，得失在乎寸心，自我言之，不如其人自言之深切著明也。論賈誼、東方朔，則徵信於劉向，論董仲舒則折衷於劉歆，誠以則古稱先，述而不作，前賢既已論定，後人無取更張也。考訂之文，尤重證據。是故博引繁稱，旁通曲證。往往文累其氣，意晦於言。讀者乍覩淺嘗，不能得其端緒。與其錄入篇內，不如載之簡端，既易成誦，又便行文。此所以貴與創之於前，竹垞

踵之於後，體制之善，無閒然矣（目錄學發微頁七六）。

除了余氏所說的優點而外，宋以後人的序跋中，大多述及刊雕的事，也可以考見其書繙刻的源流，體制誠然甚佳。惟目錄學的意義，在於指示讀者治學涉徑的方法，故撰述宜鈎玄提要，簡明出之。錄序跋論說的體裁，雖然也是目錄的一端，自考訂經籍而言，固然甚善，然而不是目錄學體制的準則，這是學者所應當知道的。

綜以上所討論的，自別錄、七略、漢志以降，目錄的體制有若干種，各有其優點。然而篇目的體制，宜於古而不適於今；錄書的序跋，乃是纂輯工作，非著述的體裁。敘錄闡釋一書的大旨與得失，而不及版本的異同；書志題識記載版本賞鑑，而不及書的內容，皆各得一偏。研治學術的方法，貴在能變通，並不是一成不變，亘古常新的，端在吾人研究錄略之學，通悉古今，而開創新例。近世撰述版本題識的學者，如陸心源、傅增湘、莫伯驥諸氏的著作，已開融版本、敘錄體制為一的端倪，雖然其例尚未臻於完善，但頗值得思考效行。因之拙意宜斟酌舊制，擇善而從，並因時損益。小序宜仍存留，以明各科學術的淵源；撰敘錄則應兼述卷目及版本的源流與異同，如此始能盡目錄的功用。雖則陳義未免稍高，然要在看吾人治學的態度如何，如果認其制對學者有益，雖有困難，亦當勉力以赴。

註：按通考經籍考收錄李燾的序論，凡經部十一篇，見晁以道古易、春秋指掌、春秋摘微、帝王曆紀譜、春秋得法志例論、左氏紀傳、春秋外傳國語、說文解字繫傳（又後序二篇）、字林。史部二〇篇，見漢紀、唐歷、唐紀、資治通鑑、續資治通鑑長編（進書奏狀共三篇）、高宗實錄、汲冢周書、建隆遺事、溫公日記、唐制科舉目圖、續會要、百官公卿表、中興館閣錄、歷代宰相年表、天禧以來御史年表、天禧以來諫官年表、劍南須知、西南備邊。子部十篇，見說玄、章氏太玄經註、太玄經疏、太玄發隱、信書、鬻子、墨子、雜纂、齊民要術、武經總要。集部則僅錄趙韓王集序一篇，共計四十二篇。余嘉錫錄學發微謂錄三十三篇，殆有漏計。

互著與別裁

「互著」與「別裁」是我國的目錄學家為了使圖書的分類部次趨於妥當，俾便於讀者能很容易地依據書目來尋檢資料，所創訂的兩種編目方法。因為我國的古籍中往往有內容所涉廣泛而難以確定應歸隸於某一部類，或者是一部書之中包含有零星的著作，而與全書的性質不同隸於一類者。編目的人遇到此類圖書往往斟酌為難。宋鄭樵在所著的校讎略編次之訛論篇中嘗說：

古今編書所不能分者五，一曰傳記，二曰雜家，三曰小說，四曰雜史，五曰故事。凡此五類之書，足相紊亂。又如文史與詩話亦能相濫。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雜說的案語亦云：「案記錄雜事之書，小說與雜史最易混淆，諸家著錄，亦往往牽混。」都在說明有若干的古籍，它的內容可以通於幾類。我國自來編目法，一種書只可歸入一類，倘若遇到幾類皆可部次入的情形，則使編目的人取捨維艱。舉例而言，譬如宋滕元發所著的孫威敏征南錄，該書的內容是記述孫沔討平廣西蠻夷儂智高的作亂，故可以編入雜史類。然而這部書並非完全記載儂智高作亂的史實，作者著書的主旨，是在表彰孫沔的功績。如從這

個觀點來分類，其書也可編入傳記類。至於像筆記體一類的書，它的內容，或記軍國大政，或述時事見聞，或是讀書時偶有心得，而發揮自己的意見，或是考訂相傳的謬誤。這一類體裁的書，大抵作者隨興之所至而筆錄，無所翦裁。歸入史部的雜史、掌故，或子部的雜家雜說，小說家筆記，皆無不可。編目的人往往費盡斟酌，難以確定。又自宋以來的別集，大多是網羅其人的詩文及零星短篇著作，彙為一書。或是刻某人一著作而以其他作品附刻於後。這一類的全書，其中或經或史，或儒或墨，兼包有之。像上面所述的兩種類型的圖書，假如編目的人僅著錄於一類，則其書中所載不同於該類學術的內容則無從顯示出來，讀者即難以依據分類書目來尋檢資料。為了彌補這種缺憾，我國前代的目錄學家於是創始了「互著」與「別裁」兩種編目的方法。

所謂「互著」者，凡一部書的內容可以通於兩類或兩類以上的學術時，則各依其可以隸入的部類分別重複著錄，一個是主類，其他處則於目下註明互見某類。所謂「別裁」者，凡一部書之中附有若干著作，這所附著作的內容與原書不隸屬於同一部類者，則將其篇卷裁別出，標注於它應歸入的部類，並註明它原在某書之內。這兩個名辭創自清代章學誠氏，章氏所撰的校讎通義，有「互著」、「裁別」二篇，以解釋他創立這兩種編目方法的理由。互著篇云：

一書本有兩用，而僅登一錄，於本書之體既有所不全；一家本有是書，而缺而不載，於

一家之學亦有所不備矣」。「書之易混者，非重複互注之法，無以免後學之牴牾；書之相資者，非重複互注之法，無以究古人之源委」。「不知重複互注之法，則遇兩歧牽掣之處，自不覺其牴牾錯雜，百弊叢生，非特不能希縱古人，即僅求寡過，亦已難矣。

別裁篇云：

古人著書，有採取成說襲用故事者（原注：如弟子職必非管子自撰，月令必非呂不韋自撰，皆所謂採取成說也），其所採之書別有本旨。或歷時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於全書之內自為一類者，並得裁其篇章，補苴部次，別出門類，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書篇次具存，無所更易，隸於本類，亦自兩不相妨。蓋權於賓主重輕之間，知其無容互見者，而始有裁篇別出之法耳。

在我國圖書的分類迨無妥善安排之際，尤其是圖書與學術不能契合無間，為了避免編目的人確定一書的類例，不致顧此失彼，取捨困難，而讀者查檢也不致有所遺漏，這的確是兩種非常良好的編目輔助方法。章氏創立這兩種方法，據他說是研究劉歆的七略而推衍得來的。然而我們細檢七略所載，劉歆當日是否曾立下了互著與別裁的編目義例，實不能不令人懷疑。

章學誠氏考訂七略中重複互著的書，凡有十種。他在互著篇云：

劉歆七略亡矣。其義例之可見者，班固藝文志注而已（班固自注，非顏注也）。七略於兵書權謀家，有伊尹、太公、管子、荀卿子（漢書作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九家之書。而儒家復有荀卿子、陸賈二家之書，道家復有伊尹、太公、管子、鶡冠子四家之書，縱橫家復有蘇子、蒯通二家之書，雜家復有淮南王一家之書。兵書技巧家有墨子，而墨家復有墨子之書。惜此外之重複互見者，不盡見於著錄，容有散逸失傳之文。然即此十家之一書兩載，則古人之申明流別，獨重家學，而不避重複著錄明矣。

按劉歆的七略雖失傳，然班固已採之修纂為漢書藝文志，其大序明言「今刪其要，以備篇籍」。雖略有刪改，但班固在其書下或各類之後皆有注明，故於漢志仍可推考見七略著錄的原貌。所謂七略重複互著的，僅此十家而已，故不能相信章氏所說的「容有散逸失傳之文」。考漢志兵書略權謀類下有班固注，云：

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篇重

（此據王先謙漢書補注改，原文「篇重」二字作「種」字）

可以推知在七略的兵書權謀家中原著錄了伊尹等九家二百五十九篇，班固以其重出而省去。按漢志諸子略儒家載孫卿子三十三篇、陸賈二十三篇；道家載伊尹五十一篇、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內

計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管子八十六篇、鶡冠子一篇；縱橫家載蘇子三十一篇、蒯子五篇；雜家載淮南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這九家也就是原七略諸子略中著錄的，一共為五百三十一篇，遠超過班固所刪省在兵書權謀中九家的篇數。即令太公一書不計謀與言各篇，僅計議兵的八十五篇，則共有三百六十九篇，也與班固所省的篇數不符。關於這一點，王先謙漢書補注說：「重者，蓋七略中伊尹以下九家，其全書收入儒道縱橫雜各家，又擇其中之言兵權謀者，重入於此，共得二百五十九篇」。可見七略兵書略所著錄的並非與諸子略中所載的完全相同，而僅著錄諸家著作中論兵法的各篇。這情形從兩略中著錄墨子的篇數來看可以更清楚。按班固於兵家略下又注云：「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除了上述九家二百五十九篇外，可以推知所省兵技巧中的墨子僅有十二篇。而諸子略墨家所著錄的墨子凡七十一篇，更可以證明七略原本諸子兵書兩略所著錄的此十家，並非如章學誠氏所說的重複互著，兵書略中所載的此十家不過僅是諸子略中所著錄的部分議兵的篇第，若說為別裁，倒也可通，章氏舉此為七略中互著的例子，實為大謬。

七略中其他各略間都沒有重複著錄的例子，何以獨獨兵書略中有此情形？其故殆由兵書自漢初以來即受到政府的特別重視，整理編目自成為一系統。漢代初興，有張良、韓信序次兵法，

於一百八十二家中，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是兵書的第一次整理編目。其後因呂產呂祿等奪權謀變，偷竊了內府所藏的兵書。武帝時命軍政楊僕捃摭殘餘而加以整理，又編了一部兵書目錄奏呈，但不甚完備，故成帝時徵求遺書，又命任宏再整理編目。成帝時內府校讎圖書，雖說由劉氏向歆父子主持其事，其中兵書、數術、方技等書實皆由專家來負責校讎，尤其是兵書的整理當仍循漢初以來的舊貫。漢志的小序於其他各略皆未明述校讎者的名姓，獨兵書略小序特著：「至於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以顯示兵書純出任宏的校讎，劉向未嘗予以論定。向歆校讎諸子，彙集中外的藏本，整理刪除其中重複的篇章，釐定其存世的篇目，編為全書，故爾偶有與兵書略中所已著錄的篇第重複，然而不能因此即說劉氏在當日曾創立了互著的凡例，何況兵書略與諸子略所著錄的書名雖同，而篇第並不盡同。假若劉氏當年編目時果真運用了互著的義例的話，則戰國策除了附著於六藝春秋家外，應互著於諸子的縱橫家；道家的管子應互著於法家，雜家的子晚子應互著於兵書，像這類的例子很多，無煩縷擧。

關於別裁，章氏擧七略中的弟子職及孔子三朝記兩部書為例，他說：

> 管子、道家之言也，劉歆裁其弟子職入小學。七十子所記百三十一篇，禮經所部也，劉歆裁其三朝記篇入論語。

按漢志六藝略論語家著錄孔子三朝七篇，史記五帝本紀索隱引劉向別錄云：「孔子見魯哀公問政，比三朝退而為此記，故曰三朝，凡七篇，並入大戴禮」。據孔廣森大戴記補注序錄及沈欽韓漢書疏證謂孔子三朝七篇卽大戴禮記中的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閒等，然在戴記中並未標明孔子三朝的書名。而古人書中如鄭玄注禮，臣瓚注漢書等常引有孔子三朝記的原文者，清馬國翰嘗輯成一卷收入玉函山房輯佚書中，知此書在漢晉閒本未單行，不因戴德編入戴記中而原本不傳。可以證明七略漢志所著錄的孔子三朝，並非是從大戴記中別裁出來的。弟子職原來不是管仲所著，而係漢世的儒者所著，為後人編入管子一書中，想亦係原本單行已久，故劉氏並不因其已收入管子書中而不著錄其原本。在七略目中所著錄纂輯的書頗多，倘若劉歆編目有意別裁的話，那些纂輯的書大多可以裁篇別出而分別著錄的，決不致僅有此一二個孤例。章學誠氏對於七略目中的這種情形說是用的別裁法，而對於其他書目中的同樣情形則說是幸而偶中。他說：

> 夏小正在戴記之先，而大戴記收之，則時令而入於禮矣。小爾雅在孔叢子之外，而孔叢子合之，則小學而入於子矣。然隋書未嘗不別出小爾雅以附論語，文獻通考未嘗不別出夏小正以入時令，而孔叢子大戴記之書，又未嘗不兼收而並錄也。然此特後人之幸而偶中，或爾

雅小正之篇有別出行世之本，故亦從而別裁之，非真有見於學問流別而為之裁制也。不然，何以本篇之下不標子註，申明篇第之所自也哉？

這番話全然是強辯，因為七略的著錄，依據漢志所載，也並來在本篇之下，注明其所出。卽依劉向孔子三朝記的敘錄，也只說其篇「並入大戴禮」，並未說其書是從大戴禮記中裁別出來的。關於一部書分別著錄於兩類，章氏對七略稱道為互著，而於其他書目中的同樣情形，則譏評為編次的錯誤。這種隨意出入完全是章氏的主觀論定，並無客觀的證據。章氏也深深地知道僅就七略中所有的例證來強調劉氏曾創立了互著與別裁的編目義例，實不足以勝人之口，服人之心，所以他在補校漢藝文志篇說：

今觀劉略，重複之書僅止十家，皆出兵略，他部絕無其例，是則互注之法，劉氏且未能深究，僅因任宏所稱存其意耳。

以為自己留餘地，於以顯示他推廣之功。

七略既未嘗創立互著與別裁編目法的義例，何以章氏必定要推本於劉歆，而不逕自表示是自己的創見？一言以蔽之，他不過是想假託古人來掩飾他掠奪前賢之美的嫌疑，實際上他是竊取了明代祁承㸁的編目方法，而別創了這兩個新的名詞。祁承㸁在萬曆四十八年整理他的家藏圖書編

成濬生堂藏書目錄，並撰有庚申整書小記一篇及整書略例四則，來闡釋他整理編目及分類部次的原則與方法。他分類編目的原則有四，第一二兩項屬於分類問題與本篇無關，茲不贅述。其第三法為「通」，他說：

通者，流通於四部之內也。……古人解經，存者十一，如歐陽公之易童子問，王荊公之卦名解，曾南豐之洪範傳，皆有別本，而今僅見於文集之中。惟各摘其目，列之本類，使窮經者知所考求，此皆因少以會多者也。又如靖康傳信錄、建炎時政記，此雜史也，而載於李忠定之奏議；宋朝祖宗事實及法制人物，此記傳也，而收入朱晦翁之語錄；如羅延平之集，而尊堯錄則史矣；張九韶之集，而傳心錄則子矣。凡若此類今皆悉為分載，特註明原在某書之內，以便檢閱，是亦收藏家一捷法也。

其第四法曰「互」：

互者，互見於四部之中也。作者既非一途，立言亦多旁及。有以一時之著述，而倏爾談經，倏爾論政；有以一人之成書，而或以攄古，或以徵今，將安所取衷乎？故同一書也，而於此則為本類，於彼則為應收；同一類也，收其半於前，有不得不歸其半於後。如皇明詔制，制書也，國史之內，固不可遺，而詔制之中，亦所應入。如五倫全書，勅纂也，既不敢不

尊王而入制書，亦不可不從類而入纂訓。又如焦氏易林、周易古林，皆五行家也，而易書占筮之內，亦不可遺。又如王伯厚之玉海，則玉海耳。鄭康成之易、詩、地理之者、六經天文、小學紺珠，此於玉海何涉，而後人以便於考覽，總列一書之中，又安得不各標其目，毋使溷淆者乎？其他如水東日記、雙槐歲抄、陸文裕公之別集、于文定公之筆麈，雖國朝之載筆居其強半，而事理之詮論亦略相當，皆不可不各存其目，以備考鏡。至若木鐘臺集、閒雲館別編、歸雲別集外集、范守己之御龍子集，如此之類，一部之中，名籍不可勝數，又安得概以集收，溷無統類。故往往有一書而彼此互見，有同集而名類各分者，正為此也。

祁承㸁所說的通，乃將一書內所收不同於全書類別的篇卷目析出，分載於應入之類，而註明原在某書之內，正同於章氏所謂的別裁法；他所說的互，乃將內容廣泛的書互載於幾類中，一為本類，其他則為應收，正同於章氏所謂的重複互著法。而祁氏所闡釋的這兩種部次方法及舉例，實遠比章氏校讎通義所解釋的易於使人明瞭。庚申整書小記及略例載在祁氏澹生堂集卷十四，其集原刻於崇禎六年，雖然是清初政府禁燬的書，但在藏書家之中想頗不乏暗中密藏的。乾隆四十四年鮑廷博曾自其集中輯出了澹生堂藏書約一卷，刻入知不足齋叢書第五輯，全集以及澹生堂書目現在仍有傳世的，可為明證。祁氏從承㸁的高祖司員起，世代簪纓相繼，是會稽的望族。而澹生堂

也是明末著名的藏書樓，與四明范氏的天一閣相埒。清康熙年間祁氏家族始衰，澹生堂藏書散出時，成為江南藏書家爭相收購的對象，呂晚村與黃梨洲原本是師弟，後來交惡互訐，即是因收購澹生堂藏書所引起的。承㸁生於嘉靖四十四年，卒於崇禎元年（一五六五—一六二八），章學誠生於乾隆三年（一七三八），距祁氏之卒為一百一十年，距澹生堂藏書散出之際約六十年，他對這樣一位鄉賢似乎不應一無所知。而且鮑氏刻澹生堂藏書約，正是章氏着手校讎通義的時候，明刻澹生堂集或者可以說因遭查禁而難得讀到，於知不足齋叢書本的澹生堂藏書約，似不應該謂為未見。以古人之重視鄉賢，以章氏的博學多聞，對於一位著名的本鄉藏書前輩的編目方法，似不致毫無所聞。章氏創立互著與別裁兩種編目方法，但推本於原無其例的七略，支吾飾辯，而於祁承㸁及他所編的澹生堂書目曾無一語道及，怎能不令人懷疑他有掠前賢之美的企圖。然而這兩種編目法，雖然發明於祁承㸁，但祁氏所用的「通」、「互」二名辭，不及章學誠氏改用的「別裁」與「互著」來得明晰，可以望文而知義，也不能不推許章氏改進的功績。

互著與別裁，誠然是部次我國內容龐雜的古籍而使之分類恰當，以便於查檢的兩種重要編目方法。我國前代的目錄書中常常有一部書重複著錄於兩類以上的情形。比如隋書經籍志中的嘉瑞記、祥瑞記二書，既載於史部雜傳類，又列於子部五行類；諸葛武侯集誡、曹大家女誡等書，既

入子部儒家，集部總集中也收有其書；衆僧傳、高僧傳等書，旣收雜傳，又入雜家。新唐志在儀注類旣著錄有玉璽、國寶一類書，在雜傳記類又收了此等書。宋四庫書目於月令一書，在經部禮類及子部兵、農家等三類中均重複著錄（以上均見鄭樵校讎略編次之訛篇中所糾出）。崇文總目於兩「書，雜家及小說兩類均有著錄（見黃伯思東觀餘論所糾指）。鄭樵雖然對前代書目中一書兩載的編次錯誤情形指摘頗多，而他所編的通志藝文略中也不免有同樣重複分載的情形。據明焦竑國史經籍志糾謬所指出者，如素履子一書，儒家道家兩載，淮南子一書，道家雜家兩出，玉堂閑話一書，雜史小說兩類均載等等。其他的目錄書如周中孚鄭堂讀書記所糾擧的明文淵閣書目，在法帖及韻書兩類，都著錄有許慎說文解字這部書。至若宋史藝文志，所著錄重見迭出的書尤其多，僅據近人汪辟疆在所著目錄學研究一書中指出的就不下十多種，實無煩縷數。以上祇不過列擧已經前人所指出的，其他尚未見糾擧的目錄及書，還不在少數。至於同一部書，在甲目錄中著錄於此類，在乙目錄中則載之於彼類的情形，更是司空見慣。其緣由無他，因為我國古籍中頗有內容複雜的書，著錄於此類中固然應該，若部次在另一類中也不悖旨，往往斟酌為難，編目的人稍有失察，卽造成了前後歧出。或則是編目者不僅一人，見仁見智，各部次於其視作應入的部類中，所以難於一統。遇有這一類的古籍，倘若前人知道運用互著的編目法，一方面部次入本類，

於其他適當的部類中也予以著錄，並注明互見本類，則編目的人既省斟酌之勞，讀者也易於卽目以檢書，更可勿勞後人再來糾擧了。

至於別裁法，對於我國古籍的編目也非常重要。因為書目本是因書而設置，俾便於據目來檢提書，所以書目的編次與書的置架須相契合，惟自宋以後的出版者，往往將一人或一家的著作彙編成為全集，或是網羅各家的著作彙為叢書，而此書中所包含的各種著作並非屬於同一門類學術者。設依全書來區類，固然置架取書方便，但其中與所隸屬的部類相異的著作則無法自書目上顯示出來，而無法使讀者據目來求書。假如這些彙編的書完全依據其內容分別部次，則全書又不便於折散分別置架，以使書與目相配合。倘若運用別裁編目法則此等困難皆可迎刃而解，只要在別裁而出的書名或篇卷下註明其所從出就可以了，如此則藏者與讀者兩獲其便。別裁法雖是最方便卽目以尋檢資料，但亦須運用適宜，不要使它流於瑣碎。章氏在校讎通義焦竑誤校漢志篇云：

或曰裁篇別出之法行，則一書之內，取裁甚多，紛然割裂，恐其破碎支離而無當也。答曰：學貴專家，旨存統要，顯著專篇，明標義類者。專門之要，學所必究，乃掇取於全書中焉。章而釽之，句而釐之，牽率名義，紛然依附，則是類書纂輯之所為，而非著錄源流之所貴也。且如韓非之五蠹、說林，董子之玉杯、竹林，當時並以篇名見行於當世，今皆會萃於

全書之中，則古人著書，或離或合，校讎編次，本無一定之規也。月令之於呂氏春秋，三年問、樂記、經解之於荀子，尤其顯焉者也。然則裁篇別出之法，何為而不可以著錄乎？

依章氏的見解，雖然他反對有如類書式摘章釐句的別裁，但主張以篇為單位來別裁。只是我國的典籍，時代愈後，篇第愈富，如總集一類的書，一書之中，篇第動輒以千計，而別集與子書說部包含也非常廣泛，假若均裁篇別出，實際上有如篇目索引，對讀者而言，查檢雖然方便，然而非目錄書所為當。而且近代索引的編纂，已成為一項專門學問，或專編一書，或專編一類，都是網羅所有存世的書來加以編纂索引，實在毋庸一個收藏未必完備的圖書館的書目來越俎代勞。目錄書貴在鉤玄提要，而不是貪多務得，能夠將藏書予以條理分明的展示出來，指導讀者很容易地尋檢到他所研究需要的資料；就已經達到了一部書目的功效。是故別裁之法，宜仿祁承爜氏裁卷別出卽可，遇有彙輯的書或內容廣泛的書，其中所收的內容凡有與全書不同隸屬於一個部類者，卽裁卷別出，標舉大題，著錄於它所應隸入的部類，而在下方注明其原在何書中。如此，則研究者按類索書，卽不致於失檢了。

互著與別裁，無疑地是適應我國圖書的特性，能使分類趨於妥當的兩項編目輔助法。其法創始於明末的祁承爜氏，而試驗於他所編的澹生堂書目。惟因此等編目法比較繁難，而且祁氏的著

作在清初遭受燬禁，所以未能發生影響。乾隆中章學誠又從而鼓吹，並託始於七略欲以推廣之，但也未收到效果，原因在清代的藏書家重視善本，而目錄學不甚發達之故。至近代才稍稍有運用其法編目的，如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總目、日本京都人文科學研究所漢籍目錄等，雖然僅只將叢刻書別裁著錄，已給予讀者據目檢書以莫大的便利。倘能再推廣別裁其他典籍，及運用重複互著法，其成效當更著。此兩種方法是我國目錄學部次編目的精義所在，吾人不當畏其繁難，應予以推廣之。假若運用得宜，其功用較之西洋編目法中的標題目錄，實不遜色。

章實齋的目錄學

在清代的史學家中，其見解新頴，而具有大膽創意的，無疑地要首推乾嘉間的會稽章實齋。章氏是一位史學家、方志學家，或有人說他是文史學家。而他在文史學方面的創見，若推本溯源，實得力於他在目錄學上的造詣。所以章氏在他文章中常以文史、校讎二事並稱，自謂皆頗涉藩籬（見與孫淵如觀察論學十規），並且很自豪的說：

如古文辭，近雖為之者鮮，前人尚有為者。至於史學義例、校讎心法，則皆前人從未言及，亦未有可以標著之名（章氏遺書卷六、家書三）。

關於章氏在史學上的貢獻，近代學者研究並著論闡釋的較多。而關於他在校讎學方面的見解，則鮮有專文論介的。就是胡適之先生所撰、姚名達氏訂補的章實齋先生年譜，也僅着重於章氏在文史學方面思維的演進，涉及他在校讎學方面的見解甚罕。筆者不揣翦陋，擬就章氏在校讎學方面的貢獻，試加探討，以就正於方家。唯章氏所云的校讎學，在現代學科的分野，實屬於目錄學的領域。雖然他在信摭篇云：

校讎之學，自劉氏父子淵源流別，最為推見古人大體。而校訂字句，則其小焉者也。絕學不傳，千載而後，鄭樵始有窺見，特著校讎之略，而未盡其奧，人亦無由知之。世之論校讎者，惟爭辯於行墨字句之間，不復知有淵源流別矣。近人不得其說，而於古書有篇卷參差，敘例異同，當考辨者，乃謂古人別有目錄之學，真屬詫聞。且搖曳作態以出之，言或人不解。問伊：書止求義理足矣，目錄無關文義，何必講求？彼則笑而不言。真是貧兒賣弄家私，不值一笑矣（章氏遺書外篇卷一）。

根本不承認在校讎學外，別有目錄之學，且予以譏訕。然而「校讎」這一名辭，其本義原是指書中文字的校勘而言。劉向別錄云：

讎校者，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曰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故曰讎也（太平御覽卷六一八引）。

而後代也已習用來指文字的勘對，如南宋朱弁曲洧舊聞卷四載：「宋次道（敏求）家藏書，皆校讎三五遍。世之蓄書，以次道家為善本」。元陳良弼通鑑紀事本末序云：「趙與簒以為嚴陵（刻本）字小且訛，於是精加讎校，易為大字，成為天下之善本」。不過，因為漢成帝時劉氏向歆父子奉命整理內府藏書，其工作自蒐輯藏本比勘，校正文字的譌誤，釐定各書的篇章，而後撰寫敘

錄以介紹其書的內容，到繕抄定本進呈，再將定本分類排次放置，編成藏書的目錄——七略。這一連串的工作過程，實有一貫性，不可劃分。從魏晉歷唐宋以至清修四庫，歷代秘閣整理圖書，其過程大都如此。故後人或用「校讎」一辭來統括。研究其事的，稱為校讎學。如宋鄭樵所撰的通志校讎略即是。然而到了清初，因版本學的萌芽，藏書家有覓求宋元舊本專致力於文字校勘工作的。校勘學到了乾隆時遂自校讎學中分化而出，成為一種專門的學科，即是章實齋所抨擊「唯爭辨於字句行墨之間」狹義的校讎學。所餘下的對於圖書採訪分類編目方法的研究，當時人採用原起甚古的「目錄」一辭來名這種學科。「目錄學」一辭，最早見於乾隆間王鳴盛所撰的十七史商榷卷一，謂：「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必從此問塗，方能得其門而入」。在當時尚是一個新興的名詞。雖然尚不為章氏所接受，他根本不承認在校讎學外別有目錄之學。實則從章氏的著作中來看，他所反覆研討的，只有詳類例，明編次，而不及文字校勘的方法，正是乾嘉以降目錄學研究的領域。故本文題目用「目錄學」，而不用章氏所習稱的「校讎學」，應當比較妥切些。

章實齋名學誠，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出生於原籍浙江會稽。自幼性耽典籍，雅好史學。廿三歲遊學京師，肄業國子監。廿八歲從大興朱筠學古文辭，並居幕府。卅八歲再往京師，充國子

監典籍。四十二年四十歲時始中順天擧人，翌年成進士，而絶意仕途，迭任畿輔及河南、山東等地書院的講席。殫精著述，至老不輟，嘉慶六年（一八〇一）卒，年六十四。他平生的撰著頗多，不過在他生前，文稿曾遭遇過一次盜匪的刼掠，及身後輯錄的失收，散佚了不少，現傳以民國初年吳興劉氏嘉業堂所輯刻的章氏遺書三十卷、外編十八卷，補遺一卷為最豐富。後來錢賓四先生又從抄本遺書中輯得劉刻所未收的文章十七篇編為一卷，排版印行。其中所研討涉及目錄學的除單篇文字外，其專著今僅存有校讎通義四卷。其餘如天門縣志藝文考，和州志藝文書，及史籍考三百二十五卷等全書今俱不傳，但尚有序例收在遺書中。

章氏生於中國目錄學極度衰敝的時代。中國傳統的目錄，自漢代的別錄七略，歷南朝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隋許善心七林，迨唐宋秘閣所編藏書目錄，雖有優劣之分，除了分類書目的著錄，都包含有敍錄、小序的體制。自蒙古人入主華夏，武功之盛，超軼前代，而文治則有未逮。秘書監藏書雖然豐富，而未曾派官整理校讎編目，只編寫了一份置櫥的藏書簿。風氣影響所及，經明至清乾隆初期，歷時達五百年，無論官私的藏書，都沒有編撰出一部合乎傳統體制的目錄。就是在理論方面有創見的也很少。尤其是自明正統年間內府所編近似排架書目的文淵閣書目通行了後，明至清初私家編的藏書目大都受著它的影響，可以說毫無類例條理可言，部次淩亂無序。

卽沿用傳統四部分類的目錄，除少數一二家外，也鮮具有特色。章實齋自研究漢書藝文志入手，而推考劉氏向歆父子的錄略之學。鑒於後世的學術不能專精，實由於校讎之學失傳。他嘗說：

古人有專家之學，而後有專門之書；有專門之書，而後有專門之傳授。卽類求書，因流溯源。部次之法明，雖三墳五典，可坐而致也。自校讎失傳，而文集類書之學起，先自不勝其龐雜。後之興者，何從而窺古人之大體哉（章氏遺書卷六、文集篇）。

因之特撰校讎通義四卷來發揮校讎學的精義。可惜此書原稿於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在他自京師赴河南的途中，遭匪搶刼，連同其他文稿及行囊均佚去，其第四卷以無副本竟亡。現傳校讎通義外篇一卷，所錄廿一篇文章已非原本。章氏有若干新穎的見解，固然未必盡當，但在目錄學極微的時代，的確具有振聾發聵的作用。

章氏在目錄學上最重要的貢獻，是他特別強調目錄的目的，不僅在部次甲乙，用備稽檢，而主要的意義在條別學術的淵源流變。他說：

古人著錄，不徒為甲乙部次計。如徒為甲乙部次計，則一掌故令史足矣，何用父子世業，閱年二紀，僅乃卒業乎（按指劉向於成帝河平三年奉詔領校中秘書，迄哀帝建平元年劉歆奏進七略，歷時二十年西元前廿六年至六年）！蓋部次流別，申明大道，敍列九

流百氏之學，使之繩貫珠聯，無少缺逸，欲人卽類求書，因書究學（校讎通義互著篇）。

劉歆七略，班固刪其輯略而存其六。顏師古曰：輯略謂諸書之指要，蓋劉氏討論羣書之旨也。此最為明道之要，惜乎其文不傳。今可見者，唯總計部目之後，條辨流別數語耳。卽此數語窺之，劉歆蓋深明乎古人官師合一之道，而有以知乎私門初無著述之故也。何則？其敍六藝而後，次及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蓋出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為某氏之學，失而為某氏之弊。……由劉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載籍，則著錄部次，辨章流別，將以折衷六藝，宣明大道，不徒為甲乙紀數之需，亦已明矣（同上原道篇）。

章氏特提出「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八個字，作為目錄學的主要意義。固然，自劉氏向歆以後的目錄學家也不乏強調目錄的目的在條別學術源流的，但應用的方法卻各有不同。如唐初魏徵等所修隋書經籍志簿錄類小序云：

漢時劉向別錄，劉歆七略，剖析源流，各有其部。推尋事蹟，疑則古之制也。自是以後，不能辨其流別，但記書名而已，博覽之士，疾其渾漫。

抨擊六朝以來僅記書名的書目，認為需要有若別錄七略的小序與敍錄兩種體制，方能剖析源流。

宋鄭樵條別學術源流的方法是用週詳的分類來顯現。他在通志校讎略中說：

類例既分，學術自明，以其先後本末具在。觀圖譜者可以知圖譜之所始，觀名數者可以知名數之相承。讖緯之學，盛於東都；音韻之學，傳於江左。傳注起於漢魏，義疏盛於隋唐。觀其書，可以知其學之源流。或舊無其書而有其學者，是為新出之學，非古道也（編次必謹類例論）。

古人編書，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襲，故學者易學，求者亦易求（編次必記亡書論）。

所以他編藝文志，詳分類例，將古今學術區為十二大類，一百個小類，小類下再細分四百廿二個屬目，非常纖細地來條別部次所有古今的圖書，不論存佚，均加著錄。他不贊同隋志用小序與敍錄的主張，並譏評崇文總目的序錄毫無意義，僅從類例即可顯出其書的內容及其學的源流本末。章實齋既標舉「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要如何達到其目的呢？他所用的方法與隋志及鄭樵又不完全相同。他雖然也重視分類，但不主張像鄭氏的在大類之下分小類，小類之下再細分屬目，而是想規復劉歆七略之分類法。觀章氏一生對於分類的見解，經歷了幾度的改易。乾隆二十九年他協助父親章鑣修纂天門縣志，所撰修志十議，第四議論藝文雖云：「一做班志劉略，標分部彙，

刪蕪擷秀，跋其端委，自勒一考」。而分類實沿傳統的四部法，天門縣志藝文考序云：

今採摭諸家，勒為一考，厥類有四：曰經、曰史、曰子、曰集。其別有三：曰傳世、曰藏家，俱分隸四部；曰亡逸，別自為類，附篇末（章氏遺書卷十五）。

到了三十八年二月應聘修纂和州志時，他的思想精進，認為劉班以後的目錄，無論是四部或其他的分類，都是以書籍淆亂部次，根本無法達到辨章學術的目的。所以學術不能專精，無專門之學，也無專門之書。唯有劉歆七略的分類能推究古代學在王官的遺法，而使後代分歧的學術，一一探本溯源。所以他撰和州志藝文書即師法劉歆的部次，並撰例議一篇充作輯略，作理論上的闡述。這是中國目錄學史上非常有價值的一篇文章。他首先批評後世的目錄學家但取簡易，不求探本溯源，遽以為傳世衆多的文集、類書、雜纂及評選之屬的書，無法一一條別源流，故不得不用四部法各依其體裁來歸類，實在是識見膚淺，使得記誦之書愈來愈泛濫，學術日下。他說：

魏晉之間，專門之學漸亡，文章之士以著作為榮華。詩賦表章，銘箴頌誄，因事結構，命意各殊，其旨非儒非墨，其言時離時合，裒而次之，謂之文集。流別之不可分者一也。文章無本，斯求助於詞采，纂組經傳，摘抉子史，譬醫師之聚毒，以待應時取給。選青妃紫，不主一家，謂之類書。流別之不可分者二也。學術既無專門，斯讀書不能專

一，刪略諸家，取便省覽。其始不過便一時之捷給，未嘗有意留青。既乃積漸相沿，後學傳為津逮。分之則本書具在，合之則非一家之言，紛然雜出，謂之書抄。流別之不可分者三也。會心不足，求之文貌，指摘句調工拙，品節宮商抑揚。俗師小儒，奉為模楷。裁節經傳，摘比詞章，一例丹鉛，謂之評選。流別之不可分者四也。凡此四者，並由師法不立，學無專門，末俗支離，不知古人大體，下流所趨，實繁其熾。其書既不能悉付丙丁，唯有強編甲乙。而欲執七略之舊法，部末世之文章，比於枘鑿方圓，豈能有合？故曰七略流而為四部，是師失其傳也。謂史籍浩繁，春秋附庸，蔚成大國，以謂七略之勢，不得不變而為四部，是又淺乎論著錄之道也（明時篇，遺書外篇卷十七）。

他認為七略是可以恢復的，所以接着在復古篇說：

聞以部次治書籍，未聞以書籍亂部次也。漢初諸子百家，浩無統攝，官禮之意亡矣。劉氏承西京之敝，而能推究古者官師合一之故，著為條貫，以溯其源，則治之未嘗不精也。魏晋之閒，文集類書，無所統繫，專門傳授之業微矣。而荀李諸家，不能推究七略源流，至於王阮諸家，相去逾遠。其後方技兵書，合於子部，亦文集自為專門，類書列於諸子，唐人四部之書，乃為後代著錄不祧之成法，而天下學術，益紛然而無復綱紀矣

。蓋七略承六典之敝，而知承六典之遺法；四部承七略之敝，而不知承七略之遺法，是七略能以部次治書籍，而四部不能不以書籍亂部次也。且四部之籍口於不能復七略者，一曰史籍之繁，不能附春秋家學也。夫二十一史，部勒非難。至於職官故事之書，譜牒紀傳之體，或本官禮制作，或涉儒雜家言，不必皆史裁也。今欲括囊諸體，斷史為部，於是儀注不入禮經，職官不通六典，謨誥離絕尚書，史評分途諸子（原註：史評皆諸子之遺，入史部非也），變亂古人立言本旨，部次成法以就簡易，如之何其可也？二曰文集日繁，不列專部，無所統攝也。夫諸子百家，非出官守，而劉氏推為官守之流別。則文集非諸子百家，而著錄之書，又何不可治以諸子百家之識職乎？夫集體雖曰繁賾，要當先定作集之人。人之性情，必有所近，得其性情本趣，則詩賦之所寄託，論辨之所引喻，紀敍之所宗尚，掇其大旨，略其枝葉，古人所謂一家之言，如儒墨名法之中，必有得其流別者矣（如韓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蘇軾之縱橫家、王安石之禮家）。存錄其文集本名，論次其源流所至，附其目於劉氏部次之後，而別白其至與不至焉，以為後學辨塗之津逮。……家法既專，其無根駁雜，類鈔評選之屬，可以不煩而自治。是著錄之道，通於教法，何可遽以數紀部目之屬，輕言編次哉」？

他所說的後世「以書籍亂部次」，史評是諸子之遺，文集可通於諸子百家，眞是精闢之論，識見獨具，發前人所未發。所編和州志藝文書卽仿七略而分爲八大類，另有輯略一卷。大類之下如何細分？因原目不傳，玆據輯略所敍引列之於下：

一、六藝類——易部、書部、詩部、禮部、樂部、春秋部、論語部、小學部、經義部

二、紀載類——地理部、方志部、譜牒部、故事部、傳記部、小說部、傳奇部

三、諸子類——儒家部（附制義）、道家部、名家部、雜家部

四、詩賦類——詩賦部（附詞曲、雜詩）

五、數術類——天文部、形法部、推占部

六、方伎類——醫經部、藥書部

七、釋敎類——經部、律儀部、論部

八、金石類

與七略來比較，少兵書類而增紀載、釋敎、金石三類。因和州先賢無兵法著作故未列兵書類。釋敎、金石係後起之學術，在先秦中無可溯源，不得不新增。至於記載本屬後代的史部，章氏在復古篇云：「至於職官故事之書，譜牒記傳之體，或本官禮制作，或涉儒雜家言，不必皆史裁」。

蓋其原意欲去史部。然而輯略記載類小序又云：

「記載簿錄若傳記故事譜牒方志之倫，其書當周官之行，各有掌故，歸於所司。掌故既失，書籍散著，若盡歸六藝，則部次實繁，難以條別。特立史部，則全奪六藝，傳業無復源流。今以職官儀注之屬隸禮經，記傳專家屬春秋，詔誥號令起居時政之屬屬尚書。其餘識大識小，簿籍具存，裁為記載之篇，以次六藝之後。」

是章氏也不能不牽就事實，後代的書，無法悉推究古代官師之掌，全做七略來部次。

到乾隆四十四年章氏撰寫校讎通義時，他的見解突又一變。原來他認為可以師七略推究古代官師合一之故的家法，裁去自晉以來的史集兩部，現在則以為時勢之所趨，已無法挽回。他在校讎通義宗劉篇說：

七略之流為四部，如篆隸之流而為行楷，皆勢之所不容已者也。史部日繁，不能悉隸以春秋家學，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一。名墨諸家，後世不復有其支別，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二。文集熾盛，不能定百家九流之名目，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三。鈔輯之體，既非叢書，又非類書，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四。評點詩文，亦有似別集而非別集，似總集而又非總集者，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五。凡一切古無今有，古有今無之書，其勢判如霄壤

，又安得執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

距修和州志不過只有六年，章氏的思想何以會有這種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若揆其原因，大概不出下列二者：第一，他所編的和州志藝文書一共不過著錄了三百五十八家。若減去新增的釋教類七家，金石類一七四家，其餘六類只有一百七十七家，其部次卽非常的紊亂。譬如將吳翰、孫廷鐸、孟思誼三家制義附入諸子儒家部，韓文年編、陶詩攷異兩家歸名家部，鳴道集、淵源集、四書指月等歸儒家部，釋常談入六藝小學部，而續釋常談卻歸入諸子雜家部。如此的部次法，不但不足以辨章學術，反而令人有無從查索之感。再如王安石的文集，他在和州志藝文書敍例中定為禮家，而在校讎通義宗劉篇中又云為法家，前後歧異。可見他定後世的文集為諸子一家之言，也沒有一定的主見。名家的別集尚且如此的分歧。至於那些偶而一得之見，旨趣不顯著的，更不易定其為諸子何家之言了。當四十二年五月他應聘修纂永清志時，對於文集為諸子之遺的語氣，已經開始和緩了。永清文徵論說敍錄云：

自學不專門，而文綺麗，於是文人撰集，說議繁多。其中一得之見，與夫偶合之言，往往亦有合於古人，而根本不深，旨趣未卓。或諸體雜出，自致參差；或先後彙觀，竟成複沓。此文集之論說，所以異於諸子一家之言也。

諸子一變而為文集之論議，再變而為說部之劄記。……義理學多可觀，宗旨終難究詰（章氏遺書外編卷十五）。

又在文史通義內篇卷六文集篇中亦云：「後世應酬牽率之作，決科俳優之文，亦泛亂橫裂，而爭附別集之名。是誠劉略所不能收，班志所無可附」。大概是經歷了編和州志藝文書所遭遇實際的困難，史部既不能全裁，文集熾甚，也無法悉定九流百家的名目，而深知「執七略之舊法，部末世之文章，比於納鑿方圓，豈能有合」了。

第二個原因，恐怕是促使他改變主張主要的原因。正當章氏纂修和州志的同時，四庫全書館已開，高宗皇帝曾有上諭說：「朕意從來四庫書目，以經史子集為綱領，裒輯分儲，實古今不易之法」（辦理四庫全書檔案）。章氏於四十年秋再往京師，翌年任國子監典籍，與參與四庫館纂修的文人學士時相往還，當然知道有此道上諭，言論的語氣開始和緩。四十二年秋天，考中順天的鄉舉，第二年接着中了進士。有了功名的人，自然不便也不敢與皇帝唱反調而自找麻煩了。但是他對於目錄的意義在於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主張並未因之而改變。

七略的部次既因時勢所逼而無法規復，四部的體質又不可能改變，要如何方能達到辨章學術的淵源流變的目的呢？考章氏的方法有兩種，一是運用目錄學中「小序」的體制，二是運用他所創

的「別裁」與「互著」兩種編目方法。校讎通義宗劉篇云：

七略之古法終不可復，而四部之體質又不可改，則四部之中附以辨章流別之義，以見文章之必有原委，亦治書之要法。

家法不明，著作之所以日下也；部次不精，學術之所以日散也。就四部之成法，而能討論流別，以使之恍然於古人官師合一之故，則文章之病可以稍救，而七略之要旨亦可以有補於古人矣。

他所說的「討論流別」、「辨章流別」，卽指用他所謂的「敍錄」。在章氏的著作中，提到「敍錄」或「序錄」這一名詞之處甚多，不過他說的「敍錄」，實是指漢志每一類及每一略書目之後，敍述該類略學術流變的文字說明，在目錄學體制中應名為「小序」，卽舊唐志序所云：「（毋煚）等選集，依班固藝文志體例，諸書隨部皆有小序，發明其指」的小序。「敍錄」則是劉向校書，每一書說所寫介紹其書的作者，與論析其書的大旨的文字說明，後輯為別錄者是也。章氏將二者混淆不清，如他在文集篇中所云：「劉向校書，敍錄諸子百家，皆云出於古者某官某氏所掌」，實指漢志的小序可為證明。章氏在校讎通義中舉了很多的事例來說明如何辨章流別。如

二十三史，皆春秋家學也，本記為經，而志、表、傳、錄亦如左氏傳例之與為終始發明

耳，……明乎其繼春秋而作也。他如儀注乃儀禮之支流，職官乃周官之族屬，則史而經矣。譜牒通於曆數，記傳合乎小說，則史而子矣。凡此數者，即於史部敍錄中明宗旨。名家者流，後世不傳，得辨名正物之意，則顏氏匡謬，邱氏兼明之類，經解中有名家者矣。墨家者流，自漢無傳，得尚儉兼愛之意，則老氏貴嗇，釋氏普度之類，二氏中有墨家矣。

因集部之目錄，而推論其要旨，以見古人所謂言有物而行有恒者，編於敍錄之下，則一切無實之華言，牽率之文集，亦可因是而治之，庶幾辨章學術之一端矣（以上均見宗劉篇）。

其他如類書，鈔書、評點之書等類書籍如何辨章流別，章氏均曾論及。關於紹介一書作者生平及其書大旨的敍錄體制，章氏著作中雖未嘗顯明的論述其重要性，似並非不重視其功用。因為小序是辨章各門類學術的源流，而敍錄則是討論一書的學術源流，同具辨章學術的效用。觀章氏嘗批評鄭樵主張删去崇文總目的序錄，而使讀者如閱甲乙簿注。又嘗云：

藝文雖始於班固，而司馬遷之列傳，實討論之。觀其敍述戰國秦漢之間著書諸人之列傳，未嘗不於學術淵源、文詞流別，反復而論次焉。劉向劉歆蓋知其意矣，故其校書諸敍

論，既審定其篇次，又推論其生平。以書而言，謂之敍錄可也；以人而言，謂之列傳可也」（校讎通義漢志六藝篇）。

是章氏未嘗不瞭解各書敍錄在辨章學術方面的重要。卅七年冬安徽學政朱筠上校書奏章，請皇帝「詔下儒臣，分任校書之選，或依七略，或準四部，每一書上，必校其得失，撮舉大旨，敍於本書卷首，並以進呈，恭俟乙夜之披覽」（笥河文集卷一）。時章氏正在朱氏幕中，據胡適之先生所撰章氏年譜，謂此章奏章氏似曾預聞。可徵章氏並非不重視敍錄，而今傳的校讎通義中未有關論者，或在失傳的第四卷中亦未可知。

章實齋為了使目錄書達到考鏡學術源流的目的，除了強調小序的功用外，又發明了「別裁」與「互著」兩種編目的方法。他在乾隆卅八年修和州志藝文書時，即已提出了這兩種編目的方法，其例議中的家法篇即推本七略，闡釋這兩種方法的意義，不過初用的名詞為「別出」與「互見」。家法篇云：

管子列於道，而敍小學流別，取其弟子職篇，附諸爾雅之後。則知一家之書，其言可採，例得別出也。伊尹太公，道家之祖；蘇子蒯通，縱橫家言。以其兵法所宗，遂重錄於兵法權謀之部次，冠冕孫吳諸家。則知道德兵謀，凡宗旨有所統會，例得互見也。

其運用來編目可以考見者，如輯略記載類云：「水都記、名山記二家，歸地理部。……至於相地家言，當於地理家末，條其流別，其有卷次目錄，仍登術數之家，亦互見之義例也」。釋教類云：「名僧傳一家，已歸記傳部，當互見於此，所以明家學也。至於別出，輯略中則尚未見舉例。迨章氏撰校讎通義，始定名為「互著」、「別裁」，特各立專篇，作理論上的闡釋。互著篇云：

蓋部次流別，申明大道，敘列九流百氏之學，使之繩貫珠聯，無少缺逸，欲人卽類求書，因書究學。至理有互通，書有兩用者，未嘗不兼收並載，初不以重複為嫌。其於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檢而已。古人最重家學，敘列一家之書，凡有涉此一家之學者，無不窮源至委，竟其流別，所謂著作之標準，群言之折衷也。如避重複而不載，則一書本有兩用，而僅參一錄，於本書之體既有所不全，一家本有是書，而缺而不載，於一家之學亦有所不備矣。

若書之易淆者言之，經部易家與子部之五行陰陽家相出入；樂家與集部之樂府、子部之藝術相出入；小學家之書法，與金石之法帖相出入；史部之職官與故事相出入；譜牒與傳記相出入；故事與集部之詔誥奏議相出入；子部之儒家，與經部之經解相出入；史部之食貨，與子部之農家相出入。非特如鄭樵之所謂傳記、雜家、小說、雜史、故事五

類，與詩話、文史之二類易相紊亂已也。若就書之相資者而論，爾雅與本草之書相資為用，地理與兵家之書相資為用，譜牒與曆律之書相資用。……書之易混者，非重複互注之法，無以免後學之牴牾；書之相資者，非重複互為之法，無以究古人之源委。一隅三反，其類蓋亦廣矣。

至於此法如何運用，他在論漢志各略中，舉出了許多應互著的例子，如謂書部的劉向、許商二家的五行傳記，應當互著於術數略五行類，詩部的韓詩外傳應當互著於春秋類等。關於別裁，他說：

管子、道家之言也，劉歆裁其弟子職篇入小學。七十子所記百三十一篇，禮經所部也，劉歆裁其三朝記篇入論語。蓋古人著書，有採取成說襲用故事者，其所採之書，別有本旨；或歷時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於全書之內自為一類者，並得裁其篇章，補苴部次，別出門類，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書篇次具存，無所更易，隸於本類，亦自兩不相妨。

至於如何來別裁？章氏反對斷章摘句的裁別，而主張以篇為單位。他說：

或曰：裁篇別出之法行，則一書之內，取裁甚多，紛然割裂，恐其破碎支離而無當也

。答曰：學貴專家，旨存統要，顯著專篇，明標義類者，專門之要，學所必究，乃掇取於全書之中焉。章而釬之，句而鑿之，牽率名義，紛然依附，則是類書纂輯之所為，而非著錄源流之所貴也。且如韓非之五蠹、說林，董子之玉杯、竹林，當時並以篇名見行於當世，今皆畚萃於全書之中。則古人著書，或離或合，校讎編次，本無一定之規（焦竑誤校漢志篇）。

他也舉出了些 的例子來說明別裁的方法。如云：

書之無逸、詩之豳風、大戴記之小正、小戴記之月令、爾雅之釋草、管子之牧民篇、呂氏春秋任地諸篇，俱當用裁篇別出之法，冠於農家之首（漢志諸子篇）。

敘天文之書，當取周官保章、爾雅釋天、鄒衍談天、淮南天象諸篇裁列天文部首。而後專門天文之書，以次列為類焉，則求天文者無遺憾矣。敘時令之書，當取大戴禮夏小正篇、小戴記月令篇、周書時訓解諸篇裁列時令部首。而後專門時令之書，以次列為類焉。敘地理之書，當取禹貢職方、管子地圖、淮南地形、諸史地志諸篇裁列地理部首。而後專門地理之書，以次列而類焉。則後人求其學術源流，可無遺憾矣（焦竑誤校漢志篇）。

諸記本非一家之言，可用裁篇別出之法，而文不盡傳。今存大小戴二家之記，亦文繁不可悉擧也。大約取劉向所定，分屬制度者，可歸故事而附尚書之部；分屬通論者，可歸儒家而入諸子之部。總持大體，不爲鉤鈲割裂，則互見之書，各有攸當矣（漢志六藝篇）。

章氏所創的「別裁」、「互著」兩種編目的方法，的確是中國目錄學上了不起的發明。因爲自漢以後，中國的古籍中常有一書的內容可以通於幾種門類學術的，或是一種書之中包含有若干不同學術的著作。自來的編目法，一部書只能編入一類，所以目錄家對於部次那些內容比較複雜的圖書，常感顧此失彼，左右爲難。昔鄭樵曾說過：

古今編書所不能分者五：一曰傳記，二曰雜家，三曰小說，四曰雜史，五曰故事。凡此五類之書，足相紊亂。又如文史與詩話，亦能相濫（校讎略編次之訛論）。

清四庫目子部雜家類雜說的案語也說：「案記錄雜事之書，小說與雜史最易混淆，諸家著錄，亦往往牽混」。編目的人對於那些內容複雜的圖書，費盡斟酌，歸在此類，則其他的內容不顯；歸於彼類，則此義不顯。或是前後複出，或是見仁見智。故自隋志以後的目錄書中常有同一書而著錄在兩類以上，或是在不同的書目中各隸入不同的類別，致使查檢不易。又自宋以來的學者，常

有囊括一個人的著作或許多人的著作，彙編成一書，如大全集、叢書等。其中有經有史，或子或集，兼包有之。像這些書，若僅著錄在一類，則其中一部分其他的內容不能顯示出來，讀者難以依據書目來找書。章氏發明的「別裁」、「互著」兩種編目方法，可以解決一千多年來編目的人所遭受的困難，真是了不起的貢獻。他所用的「別裁」法，有些相當於西洋目錄中的標題目錄；其「互著」法，在西洋圖書館學中尚未有可以比擬的。

章氏所發明的這兩種編目方法，據他說是研究劉歆七略編目的家法而得來的。然而我們研究七略，劉歆實來曾運用此二法來編目，章氏所舉的例子不足以作為證明。倘若探本追源，這兩種方法實淵源於十七世紀初葉、明末的一位著名藏書家祁承㸁。祁氏也是浙江會稽人，是章氏的同鄉前輩。他編其澹生堂的藏書目錄，曾首創了「通」、「互」兩種編目方法，並撰「庚申（泰昌元年、一六二〇）整書略例」一篇來闡釋。祁氏的「通」、相當於「別裁」，「互」、相當於「互著」，不過祁氏未使此二法理論化而已。關於祁章二氏此兩種編目法的淵源，筆者嘗撰「祁承㸁及其在圖書目錄學上的貢獻」（載東海大學圖書館學報第十一期）、及「互著與別裁」（載故宮圖書季刊二卷四期）二文，論析頗詳，茲不贅述。

章氏為達到條別學術源流的目的，除強調小序功用及創別裁與互著二編目法外，在部次先後

認爲應當道器分明，先道而後器，庶幾使不知其學者，閱書目亦可知其學的統要。他說：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善法具舉（原注：徒善徒法皆一偏也），本末兼該，部次相從，有倫有脊，使求書者可以卽器而明道，會偏而得全。則任宏之校兵書，李柱國之校方技，庶幾近之。其他四略，未能稱是。……夫兵書略中孫吳諸書，與方技略中內外諸經，卽諸子略中一家之言，所謂形而上之道也。兵書略中形勢，陰陽、技巧三條，與方技略中經方、房中、神山三條，皆著法術名數，所謂形而下之器也。任李二家部次先後，體用分明，能使不知其學者，觀其部錄，亦可瞭然而窺其統要（補校漢藝文志篇）。

他不僅認爲在一部的各類應依道器的先後部次，就是在同一類的各書亦應先道而後器他說：

「後世法律之書甚多，……就諸子中掇取申韓議法家言，部於首條，所謂道也。其承用律令格式之屬，附條別次，所謂器也。後世故事之書甚多，……就諸子中掇取論治之書，若呂氏春秋、賈誼、董仲舒諸家之言，部於首條，所謂道也。其相沿典章故事之屬，附條別次，所謂器也。例以義起，斟酌損益，惟用所宜，豈有讀著錄部次而不能考索學術源流者乎」？

這種任李著錄的遺法，劉班承用已不能精，後世的目錄學家更不復知其微意。章氏所修的和州志藝文書，從例議輯略中尚看不出他是否運用先道後器的部次法。他所撰的史籍考原稿不傳，也無法考知他部次先後的方法。但從所存史籍考總目來看，其中史學部以義例列在考訂之後，似他亦未遵先道後器的部次原則。不過他曾說明考訂與著錄用力不同。著錄貴明類例，求於書之面目；考訂貴詳端委，求於書之精要（章氏遺書補遺史考釋例）。則這種部次法，章氏也未曾試用來編次目錄過，尚僅屬於理論。

章氏在晚年藉浙江巡撫謝啓崑之力，修纂史籍考。後獲得畢沅所修史考的殘稿，乃為之重訂凡例，一半借助畢稿的原文，而增加潤飾，撰成了史籍考三百二十五卷。這是一部目錄的專著，今全書已不傳，僅有史考釋例附總目一篇，尚收入章氏遺書補遺卷中。另在校讎通義外篇內有論修史籍考要略一篇，則為他草創時候的擬議。從這兩篇文字中，對史籍考的內容及他編修的凡例尚可獲得一個清晰的輪廓。史籍考係仿朱彝尊經義考，而專考史部的典籍及其存亡，是一部屬於考訂的專科目錄。他在釋例中自云，考訂與著錄二者雖相通貫，但用力之處不同。所以史考並不像編書目般太重視類例，他在目錄學上的若干卓見，似多未運用到編纂史籍考中。史籍考把中國古今史籍共分十一大類五十五小類，書首並冠制書部二卷二類，這是仿朱氏經考，也是自明文

淵閣書目以來編目的傳統。嚴格說來，在分類方面並無甚特色，只有星歷部的天文、歷律、五行三類，及小說部的二類，這五類圖書在傳統的四部法中原隸屬於子部，今則視作史書，與舊目分類不同，但在各類所著錄考訂的書則範圍較廣，據章氏說：實上援經部而下合子集。因為章氏的看法，六經皆史，盈天地間，凡一切的著作，都是史料，故收錄的範圍也不僅限於傳統的史部典籍。這部目錄在編輯體例方面，有若干勝過前人的地方，茲酌列舉之。

論修史籍考要略云：

> 三曰翦裁宜法：……一書之中，但取精要數語，足以該括全書足矣。篇目有可考者，自宜備載。其序論題跋，文辭浮汎，與意義複沓者，概從刪節。但記作序作跋年月銜名，以備參考而已。按語亦取簡而易明，無庸多事敷衍，庶幾文無虛飾，書歸有用。

他在韓柳二先生年譜書後亦云：

> 凡立言之士必着撰述歲月，以備後人之考證。而刊傳前達文字，慎勿輕削題注與夫題跋評論之附見者，以使後人得而考鏡焉。

按自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朱彝尊經義考，其收錄前人的書序題跋，皆全文照錄。而於作序的年月及姓名卻缺而不載，往往只題某氏曰。使人無從考學術的源流及所引資料的出處。翁方綱蘇

齋筆記卷一評經義考云：

經義考於每書之序多刪去其歲月，覽者何自而考其師承之緒及其先後之迹乎？又所載每書考辯論說皆渾稱曰某人曰，不著其出於某書某注某集，則其言之指歸無由見，而於學人參稽互證之處亦無所裨助。

又四庫提要註朱氏經義考，謂其「序跋諸論，與本書無所發明者，連篇備錄，未免少冗」。其實豈只是少冗，宋代因為黨爭，所作書序，喜歡借題發揮，橫空起議，大多無涉於學術。章氏於序跋，但摘取精要之語，並錄序跋年月銜名，則糾正了朱氏此方面的缺失，此其一。

論修史籍考要略又云：

十二曰版刻宜詳……板刻之書，流傳既廣，訛失亦多。其所據何本？較訂何人？出於誰氏？款識何若？有誰題跋？孰為序引？版存何處？有無缺訛？一書曾經幾刻？有何異同？惜未嘗有人倣前人金石錄例，而為之專書者也。……如有餘力所及，則當補朱氏經考之遺，史考亦可以例倣也。

版本之學，當章氏之時，尚在萌芽階段，一般所珍視的，尚只是宋元古本。而章氏提出記載版本並敘源流異同的意見，雖然從史考釋例中尚看不出他在修史籍考時見諸實行，但卻開稍後黃蕘圃

撰士禮居藏書題跋敍版刻的源流，秦恩復石研齋書目的記版本。此其二。其他如著錄各書的卷數，必標出處；篇卷不同者，則著錄其可徵的卷數，並注異同於其下，皆較馬朱二氏的體例為邃密。

在章氏著作中其他涉及目錄之學的領域者，則是他提倡編製索引。校讎通義辨嫌名篇云：

欲免一書兩入之弊，但須先作長編。取著書之人與書之標名按韻編之，詳注一書源委於其韻下。至分部別類之時，但須按韻稽之，雖百人共事，千卷雷同，可使疑似之書，一無犯複矣。

又著錄條理篇云：

竊以典籍浩繁，聞見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無遺，況其下乎？以謂校讎之先，宜盡取四庫之藏，中外之籍，擇其中之人名、地號、官階、書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數可稽者，略倣佩文韻府之例，悉編為韻，乃於本韻之下，注明原書出處，及先後篇第，自一見再見，以至數千百，皆詳注之，藏之館中，以為群書之總類。至校書之時，遇有疑似之處，即名求其編韻，因韻而檢其本書，參互錯綜，即可得其至是。此則淵博之儒窮畢生年力而不可究殫者，今即中才校勘可坐收於几席之間，非校讎之良法歟？

倡議編纂人名、地名、書名、官名等類索引，以供校勘時查檢之助。後來撰「論修史籍考要略」，又重申做佩文韻府之例、編製書名索引的建議，即該文第五條「嫌名宜辨」章所論者。章氏對於當時的學術風氣，重記誦徵實，而不能發揮，比喻為蠶食桑葉而不能抽絲，多所譏評。唯獨對於編製各種索引，則認為是專門之學，不同於一般此類徵事的書。索引的功用，在現在，凡治學者，可謂眾所共曉。而章氏在兩百年前即一再地倡議，其識見的卓越，不能不令人欽敬。

綜觀章氏一生在目錄學方面的許多真知灼見，除了若干較平實的尚為人所接受。譬如嘉慶間汪輝祖編史姓韻編、廿四史同姓名錄，阮元編經籍纂詁等索檢的書；黃蕘圃撰題跋述版刻源流異同，秦恩復編石研齋書目記版本；謝啓崑撰小學考，於所採的書，均明著出處；道光初張金吾編愛日精廬藏書志，錄序跋而悉載年月等等，不能不說是多少受了章氏的影響，然而章氏目錄學的真正精義所在，在當時反而沒有發生什麼影響。若察其原因，並不是他的見解到了驚世駭俗的地步，無法使人接受；而是陳義較高，不容易使人接納。因為章氏終究是一位理論家，而非實行家。他自從編和州志藝文書提出目錄的意義，不僅在部次甲乙，而主要能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意見後，自己未再編目實驗過。後來所修的永清志、亳州志、湖北通志，俱未立藝文書，而只有文徵一門，想見他或感覺到依其理論來編目的不易。一直到民國以後，他的別裁編目法，才逐漸有

人試用。例如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書目、日本京都人文科学研究所書目，均將叢書別裁。近年坊間出版的叢書子目類編、並將別集總集亦予以別裁編目，不過尚僅只於依卷裁別、還未達到章氏裁篇別出的理想而已。但其效果頗佳，雖尚不能做到條別學術淵源，但給予學者尋覓資料已便利不少。可見章氏的意見，倘能作適當的修訂，雖說比較繁難，並非全然不可實行者。近年來西洋圖書館學的發展已到盡頭，西洋的分類編目方法固然甚佳，但僅適合於公共圖書館，方便一般公衆查借圖書，而對於作學術研究者並不能給予尋覓研究資料的便利，更不能對初學者作研究的指導，是以西洋學者對於學術圖書館的分類編目近有改弦易轍的趨勢。而章氏目錄學的意見是以學術為對象，供學者之參考，正足以濟西洋目錄學之窮。如何研究改進章氏分類編目及部次的方法，使它能合乎現代的需要，尚有待我們的努力。

清代的目錄學

在我國目錄學演進的歷史上，清代是一個變動最遽的時代，初由衰而盛，再由盛極而漸趨式微。有清二百六十餘年間，有過輝煌的成就　也遭受到外來無情的衝擊。清代目錄學發展的歷史，我們可以把它區分為三個時期來看。第一個時期從清初至乾隆卅八年開設四庫全書館的一百三十年間，是因襲前代的衰敝而孕育新的時期。自乾隆卅八年迄同治末此一百年間，是目錄學的輝煌時期。自光緒元年書目答問出版迄清末，是遭受外來的冲激而分類趨於紊亂時期。

清初的一百多年間承襲元明以來目錄學的亟敝，不僅不曾出現一部能夠合乎目錄學體制的目錄，就是明代人在分類上及編目方法上些許的成就，也許因朝代的更迭，異族的入主而湮沒無聞，更不要說有所發揚了。清初一般編著藏書目錄的，仍沿襲明代官修書目的遺風，僅視作供點檢的藏書簿，毫無類例可言，正如隋書經籍志批評六朝秘閣書目所說的：「不能辨其流別，但記書名而已」。也就是後來章學誠所譏為祇要隨便一個掌故令史卽可優為之的書目。清初若干著名的藏書家，大多編有書目，如虞山錢謙益絳雲樓書目、錢曾讀書敏求記、述古堂書目、吳縣王聞遠

孝慈堂書目、徐乾學傳是樓書目、徐秉義培林堂書目、以及泰興季振宜藏書目等，無論依四部或不依四部分類，多無條理。所列門類，瑣碎冗雜。各書的分隸部次，也多舛謬錯譌。四庫總目評讀書敏求記云：「其分別門目，多不甚可解，如五經併為一，而字學韻書小學，乃歧而三。紀傳編年雜史之類併為一，而器用食經之類，乃多立子目……皆離合未當。又如書法數書，本藝術而入經；種藝豢養，本農家而入史，皆配隸無緒。至於朱子家禮入禮樂，而司馬氏書儀、韓氏家祭禮則入史……以至北夢瑣言，本小說而入史；元經本編年，碧雞漫志本詞品，而皆入子。編列失次者，尤不一而足」。其評述古堂書目謂為較讀書敏求記更無條理。四庫總目所評，雖止錢曾一家，而清初私家的藏書目，皆可作如是觀。

在清初當然也並不是全無足述的書目，也偶有編次略具典則的，然而皆不是收藏書目。其一為黃虞稷的千頃堂書目。虞稷字俞邰，本福建晉江人，其父居中在明末官南京國子監丞，遂定居其地，為上元人。父子兩世均喜藏書，多達八萬卷，嘗編為千頃齋書目，其目不傳。康熙中虞稷被薦修明史，分纂列傳及藝文志，遂不以家藏為限，專蒐有明一代的著作，並參考友人朱廷佐所輯的古今書目，附錄宋金元人著述，編為千頃堂書目卅二卷。此目有如阮孝緒的七錄，鄭樵的通志藝文略，乃參取書目而成，不必自有其書，蓋備作修史志的參考。此目分為四部五十類，大抵

據明祁承㸁澹生堂書目分併改隸而成。類下雖未再標舉屬目，然而編次明晰，屬類隱然可見。如地理類首載總志之書，次列輿圖、次府志、邊域、海防、河流、水利、海塘、遊記、域外朝鮮、琉球、日本、土司諸夷、山岳、祠志、書院、寺廟等共分十七屬類。千頃堂目除了著錄書名卷數作者姓名外，並略敍作者的年里仕履，雖然還不足以當敍錄，但比起明代的內閣書目及百川書志還要差強人意。四庫總目曾評其有四不當：一、既以論孟各為一類，又以學庸入於三禮類中，不當再立四書類。二、不當刪樂類，使律呂諸書無所附。三、史部在典故類外，又立食貨、政刑二門，頗嫌贅設。四、子部刪併名墨縱橫入雜家，以傳述者希，尚可。而並法家亦刪去，無乃太簡。然按今通行的適園叢書本千頃堂目，在三禮類後有禮樂一門，以收錄律呂之類的書，殆四庫提要作者偶爾失檢，或據別本而立論，故有此誤。明代注釋四書的著作甚多，依據分類的原理應以大統小，單注論孟學庸的書宜統在四書之下，而四庫提要反其道，而云不當立四書類，不知合注四書的著作如何部次？至於名墨縱橫的書，明代人無此類著作，故未列其門目。法家的書，千頃目著錄的僅有二三部，故附在雜家。其實無論名墨縱橫法家皆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與不專一家的雜學不同，不應同科。千頃目以法入雜，雖然不當，四庫以名墨縱橫入雜，又豈能說是。故四庫所評千頃目除了第三條還有點道理外，其餘的並不當。固然千頃目在部次方面有若干錯誤，

如將姜璉喪禮書、倪復禘祫議入禮樂，實應入三禮；何景明古樂府、梅鼎祚古樂苑入禮樂，實應入總集；楊朝英太平樂府、梁辰魚江東白苧入禮樂，實為詞曲。這些大概是黃氏見名而未見其書，所發生的錯誤。然一般而言，編次較有條理，尤以別集能依科第先後排次，不能不說是他的優點。清初第二部比較好的目錄書是康熙間朱彝尊的經義考，這是仿元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的體例，而專考歷代的經學著作。每一書也是著錄其書名、卷數、作者姓名爵里、原書序跋、各家著錄及諸儒的論說，己見則加按語，與通考經籍考同，並增注其書的存、佚、闕、未見。固然此書有少許缺點，如四庫提要所評：把無關經義的序跋文字連篇累牘抄錄。如翁方綱所評：引諸儒的論說僅渾稱某人曰，不載出處及年月，使讀者無從考覈，皆中其失。但我國專考一科的目錄，實以此目為嚆失，為後來章學誠考史籍、謝啓昆考小學的先導。

清初的史家目錄也開了一個變例。自漢代班固採七略為漢書藝文志，不論古今著作，總錄西漢一代所藏，立下了史書志藝文的楷模。後漢、隋、兩唐、宋諸史藝文志莫不如此，可供後人考書的存佚而辨別真偽。康熙中纂修明史，預修的人對於藝文志的纂修分為兩派，一派主張仿隋志的纂修，合修遼金元明的著作為四朝志，以倪燦、黃虞稷為首。一派主張但收有明一代人的著作，以尤侗為首。後來王鴻緒所撰的明史稿，張廷玉奉勅修的明史，其藝文志均採用了尤侗的意見

。自此例一開，其後補史志者紛紛，如金門詔補遼金元三史藝文志，黃任恆補遼志，錢大昕補元志，錢大昭補續漢志，侯康補後漢、三國志，丁國鈞補晉志，湯洽名補梁志，顧懷三補後漢、五代志，皆用尤侗之說，致使後人無從考存佚、別真僞了。

自乾隆卅八年開四庫館，使清代的目錄學步入了一個嶄新的歷程，由衰而趨盛。四庫全書的修纂，固然我們誅心而論，不過是異族統治者為了懷柔文人，使之埋首故紙堆中，以銷蝕其民族精神。並藉詔求遺書，整理典籍為名，而收禁焚之實。又四庫館臣挾六朝以來的衛道觀念，凡他們認為不能「敦崇風教」的著作或文章，概予刪削不收；或認為「言非立訓，義或違經」的書，則僅附存其目，而不鈔入四庫。雖然是主觀的評鑒取捨，但對歷代典籍的整理與保存，不能不說有重大的貢獻。把四庫中各書的提要及存目書的節略合編成為二百卷的四庫總目，其卷帙的繁鉅，在目錄史上祇有唐玄宗時元行冲所主編的群書四部錄可以匹敵，但精審則過之。四庫總目於所著錄的每一書皆有敍錄，亦即提要，以介紹著者的生平，與其書的內容及優劣得失。每一部類前有小序一篇，以說明學術的淵源流變或門類的分併改隸。這兩種體制，自南宋寧宗時張攀撰中興館閣續書目及理宗時陳振孫撰直齋書錄解題以後，元明兩朝以迄清初逾四百年間的目錄書皆未曾具有，一旦於四庫總目見之，不能不令人有重睹漢家旗幟的感覺。在分類方面，四庫目把所著錄的

書區分為四部四十四類六十六屬目，即：

經部——易、書、詩、禮（分周禮、儀禮、禮記、三禮通義、通禮、雜禮書六目）春秋、孝經、五經總義、四書、樂類、小學（分訓詁、字書、韻書三目）。

史部——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別史、雜史、詔令奏議（分詔令、奏議二目）傳記（分聖賢、名人、總錄、雜錄、別錄五目）史鈔、載記、時令、地理（分宮殿疏、總志、都會郡縣、河渠、邊防、山川、古跡、雜記、遊記、外紀十目）職官（分官制、官箴二目）政書（分通制、典禮、邦計、軍政、法令、考工六目）目錄（分經籍、金石二目）史評。

子部——儒家、兵法、法家、農家、醫家、天文算法（分推步、算書二目）術數（分數學、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書相書、陰陽五行、雜技術七目）藝術（分書畫、琴譜、篆刻、雜技四目）譜錄（分器物、食譜、草木鳥獸蟲魚三目）雜家（分雜學、雜考、雜說、雜品、雜纂、雜編六目）類書、小說家（分雜事、異聞、瑣語三目）釋家、道家。

集部——楚辭、別集、總集、詩文評、詞曲（分詞集、詞選、詞話、詞譜詞韻、南北曲五目）。

固然四庫的分類不乏可議之處，如把紀傳體的史書，其經敕修或政府頒佈者，列於正史以示尊崇

；其非審斷者，則抑之於別史。使得分類以義的理論固不復保存，且紊亂了依體裁區類的義例。再如把名墨縱橫三家併入雜家，固然三家的書傳者不多，然皆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一家之學，豈能與儒墨名法釋道兼而有之的雜學合而為一，破壞了學術的系統。然而一般而論，類目清晰有序，實較自宋以來的四部書目為有條理。尤其在部次隸類方面有它的特色，值得一述：㈠每一類所著錄的書編次的先後，自來的書目雖然按朝代排列，然而同一朝代的著作，其編次的先後，皆沒有定例。如漢志道家類，把時代較晚的莊子排在列子、老萊子之前；隋志別集類，把時代較早的劉珍集次在崔瑗之後。自鄶以下，更無論矣。四庫的編次，除了帝王的著作或敕撰書仿隋志例，各冠在其代人之前外，其餘則師法千頃堂書目別集類依科第先後的前例，概以登第之年為次。無功名者則依生卒先後，或據所往來唱合之人為次。無可考者，則附在本代之末。這種編次法不僅較前代書目有秩序，也要比西洋按姓氏字母或現代依作者四角號碼為便於考檢。㈡圖書的分類，應以其內容為主，不可僅從書名來部次。因為書名，尤其是我國的古籍，常有與內容不相符合者，故宜細心檢閱審定，庶免錯誤。然而古來各家著錄，往往循名失實，歸隸乖謬。正如鄭樵所譏評的：「有見名不見書者，有看前不看後者」。即是鄭氏自己也不乏這類錯誤，例如把樹萱錄入於種植。四庫總目部次的優點，在能考校原書，詳為釐定部類。譬如同名者舊傳，分類即

有異，京口耆舊傳入於傳記類，錦里耆舊傳則隸入載記類，因為這部書的內容是紀載王氏孟氏據蜀時的史事。又如倪石陵書名似子書，實為文集；陳埴木鍾集名似文集，實為語錄。若此之類甚多，四庫不為書名所惑，皆能一一核其實際內容而部次之。㈢、圖書的分類，應以著者撰述的宗旨為主，不宜但據書名。如明徐晉卿撰的春秋經傳類對賦，舊目多入春秋類。固然此書採取左傳編成，而但摘取駢儷的辭語，俾便記誦，與經義無關，故四庫總目隸入類書。如宋俞琰的易外別傳，舊附於其周易集說之後，入之易類。四庫目以其乃闡釋黃老丹家之旨，故列入道家。又如宋滕元發著的孫威敏征南錄入於傳記類，不列雜史。因為滕氏著書的宗旨在表彰孫沔的功勳，而非記載儂智高變亂的史事。若此等書，四庫皆能以著書的宗旨而定其類。㈣、四庫總目的卷首，有凡例二十條，對於各類應收何書，或某些書應入何類，能釐定其義例，於從前各家分類不妥的書多能詳審其內容而歸入適當的門類。如其凡例有云：「筆陣圖之屬，舊入小學類。今惟以論六書者入小學，其論八法者，不過筆札之工，則改隸藝術。羯鼓錄之屬，舊入樂類。今惟以論律呂者入樂，其論管弦工尺者，不過世俗之音，亦改隸藝術。……孝經集靈、舊入孝經類，穆天子傳、舊入起居注類，山海經、十洲記、舊入地理類，漢武帝內傳、飛燕外傳、舊入傳記類，今以其或涉荒誕，或涉鄙猥，均改隸小說。如揚雄太玄經、舊入儒家類，今改隸術數……凡斯之流，

不可殫述，並一一考核，務使不失其真」。四庫目能釐定各類的義例，故梁任公謂：「雖其分類繫屬之當否，可商榷者正多，然其述作義例之周備，實已為崇文總目以下所莫能逮。其關於類隸所提供之意見，亦多足為後人討論此問題憑藉之資也」（圖書大辭典簿錄之部）。

乾隆以後，於四庫失收的書，來能繼續搜求整理。嘉慶時阮元上進四庫未收的書一百七十五種，但貯之宛委別藏，未再校讎編目。但四庫目對私家編目影響甚大，一般編著書目書志的，在分類及部次方面，大都遵循四庫總目。幾乎經明人突破的四部分類法，自四庫後遂又能定於一尊。敍錄提要的體制，後人也頗有遵循之者，嘉道間有周中孚撰鄭堂讀書記七十一卷，咸豐中有朱緒曾撰開有益齋讀書志六卷，皆能沿襲四庫提要的遺制。就是一般撰賞鑑書志者，於四庫來收的書，也多能介紹書的著者及其內容。

乾隆時代除了承襲舊有的目錄體制並予發揚外，且能新創一種體制來發展，那就是乾嘉以後幾乎成為目錄主流的賞鑑書志。賞鑑書志是仿自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以降的書畫賞鑑而作。因為自明中葉以來，舊本書為藏書家所特別寶貴，於是有仿書畫的前例而倡為版本賞鑑的，當推康熙間錢曾讀書敏求記開此派的先河。錢曾把他所藏的精本圖書各撰一篇解題，編成述古堂書目題詞四卷，後來改名讀書敏求記。這部目錄係以四部分類，所撰的解題，不敍介作者及書的內容，但

討論繕寫刊雕的工拙。四庫總目存目提要批評它分門別類，不甚可解，考證也多乖謬，但稱許它「述授受之源流，究繕刻之異同，見聞既博，辨別尤精，但以版本而論，亦可謂之賞鑑家矣」。讀書敏求記始創其例，但發展則在乾隆以後。乾隆四十年于敏中等奉敕編昭仁殿所藏的善本書，成天祿琳琅書目十卷；嘉慶三年彭元瑞又奉敕整理昭仁殿續集的善本，編成天祿琳琅書目後編二十卷。這兩部書目的解題，也是僅詳載槧梓的年月，刻印的工拙，及收藏家的題識印記，並考其時代與爵里，以明遞藏的源流，所記比讀書敏求記還要詳細。是後藏書家撰寫藏書志的，更以天祿琳琅書目為標準而遞事踵華。嘉道間有陳鱣經籍跋文、黃丕烈百宋一廛賦注，又增錄舊本書的版式行款。黃氏所撰寫的題跋，為書志題跋及於校勘與敘版本源流的濫觴。道光七年張金吾撰愛日精廬藏書志，除記版本及遞藏源流外，並仿經義考的體例抄錄書中的序跋。降及清末民初，著名的藏書家莫不有目，皆志其所藏珍本的版式行款、刻工、避諱字、刻書牌記、裝訂、序跋、收藏印記及題識、以及紙墨字體與刊雕的工拙等，如同敘錄一樣。不過僅以書的版刻及外形為記述的對象，而不以闡介書的內容為主旨。雖有資於版本的考訂鑒別，而無關於學術的本末源流。自清末以來，書志論述的範圍益廣，已寖有兼具敘錄體制的趨勢。這種體制雖發端於清初的錢曾讀書敏求記，而促使其發展而趨於盛，實源於乾隆時的天祿琳琅書目。

其次書目記載版本的推廣，也是在此一時期。固然書目記版本，宋尤袤遂初堂書目、明晁瑮寶文堂書目已有其例，但僅偶記所藏的版本，並非備載。清初的書目如絳雲樓書目、季滄葦藏書目、述古堂書目等等於所藏的宋元本始予以標注，偶或抄本書也加以著明。而推廣尤晁的陳法，備載所藏各書的版本，實始於嘉慶間秦恩復所編的石研齋書目，他的朋友顧廣圻作序，特別指出這一點，說：「今先生此目，創為一格，各以入錄之本，詳注於下。既使讀者於開卷間，目憭心通而據以考信，遂不啻燭照數計。於是知先生深究錄略，得其變通，隨事立例，惟精惟當也。特拈出之，書於後，為將來撰目錄之模範焉」。嘉慶以後，編書目的，鮮有不注明版本者，這也是乾嘉時在目錄學上的貢獻。

在我國目錄學史上對於理論的發揮最有貢獻的，無疑地要推章學誠。章氏是一位史學家、方志學家，也是一位目錄學家。他在乾隆三年出生於浙江會稽，字實齋。自幼性耽典籍，雅好史學，肄業於國子監，有聲譽，數應聘纂修天門、和州、亳州、永清諸州縣誌及湖北通志：乾隆四十一年任國子監典籍，翌年中順天舉人，再登進士，而絕意仕途，乃去。疊主近畿及河南山東各書院講席，殫精著述，至老不輟。嘉慶六年卒，年六十四 ，他的著作很多， 但散失的也不少，關於目錄學者有天門縣志藝文考、和州志藝文書、史籍考、及校讎通義。前三者是目錄書，後者

為繼宋鄭樵之後，推闡向歆校讎的義理。學誠生當目錄學亟敝的時候，編目錄的人僅把目錄當作藏書的帳簿，而不知其意義。所以他特別強調目錄的意義，「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他說：

> 古人著錄，不徒為甲乙部次計。如徒為甲乙部次計，則一掌故令史足矣。何用父子世業，閱年二紀，僅乃卒業乎？蓋部次流別，申明大道，敍列九流百氏之學，使之繩貫珠聯，無少缺逸，欲人卽類求書，因書究學。（校讎通義互著篇）

至於如何使目錄書達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目的，章氏也與宋鄭樵一樣的認為要重分類。所不同之處，鄭氏的重類例是在大類之下分小類，小類之下更細分屬目，而將所有的圖書，區為十二類、一百家、及四百二十二屬目來分別部次。但章氏認為後代的四部以及其他的分類法都是以書籍亂部次，故主張回復到用劉歆的七略分類法。他在乾隆三十八年春所撰的和州志藝文書卽師法劉歆七略來分類部次，將圖書分為六藝、紀載、諸子、詩賦、數術、方技、釋教、金石八大類。和州志藝文書雖不傳，但有一篇例議卽輯略尚存。他說：

> 聞以部次治書籍，未聞以書籍亂部次者也。漢初諸子百家，浩無統攝，官禮之意亡矣。劉氏承西京之敝而能推究古者官師合一之故，著為條貫，以溯其源，則治之未嘗不精也。魏晉之

閒，文集類書，無所統繫，專門傳授之業微矣。而荀李諸家，不能推究七略源流；至於王阮諸家，相去逾遠。其後方技兵書，合於子部，而文集自為專門，類書列於諸子，唐人四部之書，乃為後代著錄不祧之成法，而天下學術，益紛然而無復綱紀矣。蓋七略承六典之敝，而知存六典之遺法；四部承七略之敝，而不知存七略之遺法，是七略能以部次治書籍，而四部不能不以書籍亂部次也。且四部之藉口於不能復七略者，一曰史籍之繁，不能附春秋家學也。夫二十一史，部勒非難。至於職官故事之書，譜牒紀傳之體，或本官禮制作，或涉儒雜家言，不必皆史裁也。今欲括囊諸體，斷史為部，於是儀注不入禮經，職官不通六典，謨誥離絕尚書，史評分途諸子（史評皆諸子之遺，入史部，非也），變亂古人立言本旨，部次成法以就簡易，如之何其可也？二曰文集日繁，不列專部，無所統攝也。夫諸子百家，非出官守，而劉氏推為官守之流別。則文集非諸子百家，而著錄之書，又何不可治以諸子百家之識職乎？夫集體雖曰繁賾，要當先定作集之人，人之性情，必有所近，得其性情本趣，則詩賦之所寄託，論辨之所引喻，紀敘之所宗尚，撮其大旨，略其枝葉，古人所謂一家之言，如儒墨名法之中，必有得其流別者矣（如韓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蘇軾之縱橫家，王安石之禮家）。存錄其文集本名，論次其源流所至，附其目於劉氏部次之後，而別白其至與不至焉

，以為後學辨途之津逮。……家法旣專，其無根駁雜，類鈔評選之屬，可以不煩而自治。是著錄之道，通於教法，何可遽以數紀部目之屬，輕言編次哉？但學者不先有以窺乎天地之純，識古人之大體，而遽欲部次群書，辨章流別，將有希幾於一言之是而不可得者。是以著錄之家，好言四部，而憚聞七略也。

認為史集兩部的書並非不可討論源流，而返歸七略。但在六年後，乾隆四十四年撰校讎通義的時候，論調又變了。他說：

「七略之流為四部，如篆隸之流而為行楷，皆勢之所不容已者也。史部日繁，不能悉隸以春秋家學，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一。名墨諸家，後世不復有其支別，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二。文集熾盛，不能定百家九流之名目，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三。鈔輯之體，旣非叢書，又非類書，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四。評點詩文，亦有似別集而實非別集，似總集而又非總集者，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五。凡一切古有今無之書，其勢判如霄壤，又安得執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然家法不明，著作之所以日下也，部次不精，學術之所以日散也。就四部之成法，而能討論流別，以使之恍然於古人官師合一之故，則文章之病可以稍救，而七略之要旨其亦可以有補於古人矣」（宗劉篇）。

章氏何以會有這種一百八十度的大改變，揆其原因，不外有二：他在撰和州志藝文書的同時，四庫全書館方開，曾有上諭說：「朕意從來四庫書目，以經史子集為綱領，裒輯分儲，實古今不易之法」。章氏四十一年任國子監典籍，四十二年中順天舉人，四十三年登進士科，雖然並未做官，但是有功名的人，懾於帝王的威勢，自然不敢再唱反調以攖其鋒，此其一。其次，他的和州志藝文書一共不過僅著錄了三百五十八家，其部次卻非常的紊亂。如將吳翰、孫廷鐸、孟思誼三家制義附入諸子儒家部，韓文年編、陶詩考異二家歸名家部，釋常談入六藝小學部，而續釋常談卻歸入雜家。這種部次分類法，不惟不足以辨章學術，反而淆亂體例，令人有無從查索之感。章氏大概經歷了編和州志藝文書實際的困難，深知「執七略之舊法，部末世之文章，比於枘鑿方圓，豈能有合」。也承認「其體既謂之集，自不得強列以諸子部次」。故不得不返歸四部，但目錄的意義在於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主張則仍未改變。

章氏初認為惟有恢復七略的部次法始能辨章學術的源流，後來格於客觀的形勢及實際編目的困難，而不得不回復到他評為以書籍亂部次的四部法。四部法如何討論流別，則只有乞靈於小序與敘錄了。校讎通義宗劉篇云：

七略之古法終不可復，而四部之體質又不可改，則四部之中附以辨章之義，以見文字之必

有源委，亦治書之要法。而鄭樵顧刪去崇文敘錄，乃使觀者如閱甲乙簿注，而更不識其討論流別之義焉，烏乎可哉」？「因集部之目錄，而推論其要旨，以見古人所謂言有物而行有恆者，編於敘錄之下，則一切無實之華言，牽率之文集，亦可因是而治之，庶幾辨章學術之一端矣。

章氏之重視小序與敘錄以討論流別，則已超越了宋代的鄭樵而上承隋書經籍志，直窺向歆別錄七略的堂奧。此外他並提倡「別裁」與「互著」兩種編目方法，作為達到考鏡源流目的的工具。在校讎通義中章氏對於這兩種編目法均撰有專篇來討論，所謂別裁，凡是一部書中包含有與原書不同性質的零星著作，把它們裁篇別出而歸入應入的部類中；所謂互著，是一書的內容所涉廣泛，可以通於兩類或兩類以上的學術時，則各依其可以隸入的部類分別重複著錄。這兩種方法，實際上是因襲明末祁承㸁編澹生堂藏書目時所用的「通」、「互」二法而改名，章氏託古於劉歆七略固不足信，但祁氏著作清代遭焚毀，這兩種用意甚佳的編目方法，能夠影響後代，不能不說是章氏提倡的功勞。

章氏所撰的史籍考三百二十五卷，係代畢沅所作，仿朱彝尊經義考的體例，上援經典，下採子集，以考乙部。其目凡分十一部五十五類。可惜原稿不傳，今僅存有殘帙。此目雖仿經義考，

但也頗有改進。朱氏採錄前人的序跋，連篇累牘，全部抄入；而刪去作序年月，為四庫提要所譏評。章氏則有剪裁，他在論修史籍考要略中云：「一書之中，但取精要數語，足以該括全書足矣。篇目有可考者，自宜備載。其序論題跋文辭浮汎，與意義複沓者，概從刪節，但記作序作跋年月銜名，以備參考而已」。在書韓柳二先生年譜後亦云：「立言之士，必著歲月，以備考證」。又朱氏的考證僅記刊版的原委，而不載刊本的異同。章氏則認為「板刻之書，流傳既廣，訛失亦多，其所據何本？校訂何人？出於誰氏？刻於何年？款識何若？有誰題跋？孰為序引？板存何處？有無缺訛？一書曾經幾刻？諸刻有何異同？……則當補朱氏經考之遺，史考亦可以例倣也」。他所撰的史籍考是否一一作到他所擬議的，因原稿不傳，無從考覈。但後人多能循其所論，體例益見詳密，如道光中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引序跋詳載年月，嘉道間黃丕烈作藏書的題跋，多涉及版本的源流及校勘其異同。此外他在校讎條理篇中說：

竊以典籍浩繁，聞見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無遺，況其下乎？以謂校讎之先，宜盡取四庫之藏，中外之籍，擇其中之人名、地號、官階、書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數可稽者，略倣佩文韻府之例，悉編為韻，乃於本韻之下，注明原書出處，及先後篇第，自一見再見，以至數千百，皆詳注之，藏之館中，以為群書之總類。至校書之時，遇有疑似之處，即名而

求其編韻，因韻而檢其本書，參互錯綜，即可得其至是。此則淵博之儒窮畢生年力而不可究殫者，今即中才校勘可坐收於几席之間，非校讎之良法歟？

這就是現代所謂的「索引」之法，後來汪輝祖的史姓韻編、阮元的經籍纂詁，皆是如章氏所說一類索檢的書。章學誠氏在乾隆嘉慶間不僅在史學上有貢獻，而在目錄及板本學方面也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對後人啓廸甚多。

自四庫總目頒行後，藏書家編撰書目書志的，在分類方面率遵四庫，但也偶有違之者，那就是嘉慶五年陽湖孫星衍所編的孫氏祠堂書目七卷。這部書目把他的藏書分為內外兩編，以學有淵源，可資誦法者著錄於內編；以詞有枝葉，不合訓詁者放在外編。孫氏的區分內外全憑其主觀，並不能據以辨別典籍的優劣高下，因為孫氏是為了指導其族內子弟讀書所作，不能拿一般的著作標準來繩之。這部書目的分類不用四部，而分為經學、小學、諸子、天文、地理、醫律、史學、金石、類書、詞賦、書畫、小說十二大類，再細分四十五小類。其中有若干可取之處，如將小學自經學中析出獨立，天文、醫學、類書、書畫不附入子部，把書目列入類書下，而不歸入史部，金石獨立為部等等，都可糾正四庫法的不當。尤其在四庫成書之後，能夠矯然立異，其膽其識誠有足多。清末繆荃孫撰藝風藏書記及續記的分類，即採孫氏祠堂書目，但併天文、醫律入諸子，

復書畫為藝術，成為十類而已。

自乾隆以後，有四庫總目的頒行，有章學誠在目錄學理論上的發揮，有各種編目方法的改進，有新創的目錄體制——賞鑑書志不斷的演進發展，促成了中國目錄學史上的輝煌時期。但在極盛中卻潛伏了一個不利的因子，即是在我國沿用了千餘年的四部分類法。四部法創於晉荀勗，修訂於李充，至隋志而確定。並不是其法良意善，足以成為永久的楷模，但因獲得歷代秘監內府的沿用，遂能歷久而不衰。自南朝以來，雖歷代有目錄學家期圖改革分類，終因所製訂的分類法各有瑕疵，不能獲得普遍的採用而成為制度。然而自雅片之役後，海禁大開，西學東漸。同治光緒間，同文館、製造局相繼設立，學者紛紛譯介東西洋的學術著作，多是我國固有的學術所無以範圍的。而國人著作的內容與體裁，也與舊籍不同。乃因此外來的冲激，使得乾隆以後定於一尊的四庫分類，遂呈動搖之勢，而形成了清末時期圖書分類的紊亂。

清末改革四庫者，以光緒元年張之洞的書目答問為最早。此書是張氏任四川學政時編刊作為尊經書院諸生讀書的指導，雖然不是藏書目，但將我國各科的重要典籍俱收入，故分類亦頗細。因為是官修，不得不遵四部，但與四庫頗有出入。最顯著的，是將叢書獨立成部，與經史子集合為五部。因為張氏的離析，暴露了四庫制並不能包含一切書籍的弱點。張氏的分類雖予四部法有

所改進，也為後來的若干書目所沿襲，然仍不能符合當時的需要，未幾有江人度上書張文襄討論其事。江氏說：

第思目錄之學最難配隸適當。四庫提要所列門目與昔之目錄家頗有出入。中堂書目答問，與四庫復有異同。移甲就乙，改彼隸此，要亦難為定論也。章實齋致慨於四部不能復七略，由史籍不可附春秋，文集未便入諸子。然處今之世，書契益繁，異學日起，匪特七略不能復，即四部亦不能賅，竊有疑而願獻也；藝文一志，列於漢書，後世遂以目錄歸史部。不知班氏斷代為書，秦火以後，所存篇籍，自宜統加收纂，以紀一代之宏規，而目錄家豈可援以為例？蓋目錄者，合經史子集而並錄，安得專歸史部乎？史氏可以編藝文，而目錄不得登乙館，此配隸未當者一也。隋志以類書入子部，考諸子之學，儒墨無礙於並立，名法亦有所取材，宗旨各殊，不嫌偏宕，畦徑獨闢，別具精深，所謂自成一家言也。類書者，餔餟經史，漁獵子集，聯百衲以為衣，供獺祭於枵腹，豈可雜廁丙籍，混跡子家？此配隸未當者二也。金石之學，隋志列經，宋志屬史，已覺歧異。且昔之考核者少，尚可附麗；今之研究者多，豈容牽合？六義附庸，蔚為大國，夾漈通志所以別為一略也。蓋其中有證經者，有資史者。居之甲部，既病其偏枯；置之乙帙，亦嫌其泛濫，此配隸未當者三也（四庫以金石入史部目錄

類之子目尤非）。他若譜錄、圖畫，清心殫慮，各有專長，經史非其族者，子集亦非其倫，橫牽強附，究多未安。且東西洋諸學子所著，愈出愈新，莫可究詰，尤非四部所能範圍，恐四庫之藩籬終將衝決也。蓋七略不能括，故以四部為宗；今則四部不能包，不知以何為當？夙懷此疑，敢以質之左右（載書目答問箋補卷首）。

江氏所論四部法不當的三點，實為張氏祠堂書目張目。雖然四庫分類有所不當之處，但對於部次中國舊籍，在前人的目錄中猶可擇善因襲。至於有關東西洋學術的新著作，則就不是四庫，甚至編究前代的簿錄，也無有能予以適當部類之者。張文襄對於江氏的懷疑未聞有何解決之道，故其時編目錄者無所遵循，於是或在四部分類之外，別立西學一部來部次新書，如光緒二十一年安徽中江書院尊經閣藏書目，在四部外，別立方志、西學叢書二部。二十三年浙江藏書樓目錄分為甲乙二編，甲編依書目答問分類，「為國粹的保存」；於新書則仿王儉七志附錄、阮孝緒七錄外編的前例，編為乙編附後，使「各行其事，而不相師」。宣統三年上海涵芬樓也將藏書分別舊新各編目錄。或有將新舊圖書統一分類編目的，如光緒二十八年編的杭州藏書樓書目，分為經學（小學附）、史學（掌故、輿地附）、性理（哲學家言附）、辭典、時務、格致（醫學附）、通學（印叢書）、報章、圖表共九大類。稍後古越藏書樓編目，初在四部之外別立時務一部，以收新書

。繼因時勢的要求，改為統一編目，區為学政二大部，學部收理論方面的典籍，如六經、諸子、哲學、文學、及倫理、政治、教育等純學理的書；政部則收史學及有關實用的著作。在学政二部之下再分四十七類，類下又各分若干的子目，系統分明。此外也有將新書勉強納入四部類目中的。清代末年的書目，無論是新舊分別編目，或新舊統一編目，都是各行其道，不相統一，形成了圖書分類的紊亂。這種紊亂情形、一直要等到民國初年西洋圖書分類法介紹來我國，並經改良以適合部次我國圖書後，才漸趨於統一。清代末年除了賞鑑書志因版本學的進步，還在繼續發展外，有小序及敍錄體制的書目未再產生。民國以後，西洋的圖書館學傳來我國後，中國目錄學更日趨式微了。

中國目錄學的源流

目錄學是以圖書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學科，雖然這門學科在我國已經有近二千年的歷史，但「目錄學」這個名辭却起源甚晚，始出現於清乾隆年間，到近代才為人所習用。在古代，這門學科稱作校讎學，它的意義較為廣泛，舉凡圖書的採訪方法、選本、校勘、分類、編撰目錄等等，都是它研究的對象。清代初年校勘學發達，乃自校讎學中分化而出，另發展成為一種專門的學術。近代又受西洋圖書館學的影響，圖書採訪也脫離了目錄學的範圍。故現代中國目錄學研究的範圍比起古代的校讎學要狹窄得多，僅以研究圖書的分類與編目為主，與西洋目錄學似乎沒有什麼大區別。但因我國目錄學的體制與西洋有所不同，所以在意義上也就有了差異。除了研究如何分類編目以便查檢外，還要達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目的。

談到我國目錄學的起始，無疑地要推漢代劉氏向歆父子所著的別錄七略為鼻祖。但是循流必溯其源，任何一項學術上的造就，都不是一蹴可幾的，必須要在舊有的基礎上更創新意，所以隋書經籍志的大序，懷疑劉氏父子的目錄是「則古之制」。我國是一個文明古國，歷史文化悠久，

相傳五千年前黃帝的史官蒼頡已發明了文字，有了文字的記載就有圖書，有了圖書就應當有管理的方法，可惜有關上古史可靠的記載太過缺乏，不要說不清楚上古圖書管理的方法，就是那時的圖書是個什麼樣子，也無從想像。現在我們所能知道最古的圖書，是商代盤庚遷殷以後的圖書。其形制，一種是甲骨卜辭，一種是簡策。簡策書是用筆墨將文字寫在狹長形的竹或木片上，單指一根稱作簡，將若干簡用絲繩或韋皮編連起來稱為一策（或册）、或叫作一篇。甲骨卜辭是用刀將文字刻在龜甲或獸骨上，也有先寫而後刻的。因為這種記載方式係由太卜所掌專供占卜用，所以稱為卜辭。據民國十七年在河南安陽所發掘出第三十六坑整年的龜版卜辭中，發現有幾塊在尾右的尖部刻有「册幾」或「編幾」字樣，可以看出當時收藏的卜辭，曾經整理編目過，而非隨意放置。又據國語魯語記載：宋國的正考父曾到周王朝太師那裏去校對他所藏的十二篇商頌的先後順序，足以證明周太師所典掌的圖書皆經過編次。只是商周時代編目的方法如何？也無可考。

戰國時代，我國的學術思想蓬勃，私家著述興起。當時的圖書除了用竹木簡策書寫而外，用原本供裁製衣裳的帛來寫書也漸漸地普遍起來了。一部書的篇數既多，各篇間倘使無一定的順序，則不便於收藏檢點，也無法確知所藏的是否有殘闕。於是有人設想出替古籍編寫一篇序，來說明其書各篇先後的順序及其內容。現存先秦的古籍如尚書、毛詩、周易都有序文。書序相傳是孔

子所作，毛詩序相傳是子夏與毛公合著，不過這兩篇序據後人的考證，認為是漢代人所作，而不是先秦的作品。只有周易的序卦傳，雖然相傳以為孔子所作的說法並不可靠，但它是先秦時代的作品，而為現存古籍中最早的序則無可疑。序卦傳列舉六十四卦的卦名順序，並說明各卦的意義，與後來劉向寫敍錄，「條其篇目，撮其旨意」的體例大抵相符，無疑地是劉向所取法的，這可以說是我國目錄學的萌芽。由替古籍編定篇目，逐漸演進為作者自定著作目錄，如漢初淮南子的要略訓篇、史記的太史公自序篇，都是作者自撰其書的目錄。

除了一部書的目錄外，將許多的藏書經過校勘整理編成目錄的工作，在劉氏向歆以前也有人做過。漢高祖時有張良、韓信整理內府所藏的兵書，從一百八十二家中，整理刪定為三十五家而予以編次。武帝即位之初曾下詔徵求遺書，選文學之臣來校讎整理，分類編目，並親自主持。復增建藏書庫，添加繕寫官吏的員額。武帝時的編目工作，見於正史記載的，只有軍政楊僕編定的一部兵書目錄奏進了。全部的目錄，並未校編竣事。此外，關於學術的分類，前人也有很多討論的，如孔子以六藝教人，莊子的天下篇，荀子的非十二子篇，淮南子的要略篇，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等，各有區分學術門類的意見。劉氏向歆能採用前人的各種成法而予以融會貫通，編成別錄七略，建立了一套慎密完善的目錄學體制，俾後世得以遵循，我們推他為目錄學的鼻祖，並不為

過。

劉氏向歆的校讎方法，第一步廣集內府、官府及私人收藏的各種本子勘對，刪除其中重複的篇卷，而後校勘文字的異同，繕寫定本。因為古代用竹帛寫書，一篇一卷本可以單行的。譬如武帝末年河內女子獻泰誓一篇；漢光武帝將史記的五宗世家、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等三卷書賞賜竇融；明帝賜治河的王景一卷史記河渠書，卽是其例。全書的篇卷究有多少，如無目錄，藏者難以確定。所以劉向的首要工作，在固定各書的形質，採集各家的藏本而刪去重複，剩下來不重複的篇卷卽為該書的全部。第二步工作，是在每一種書經過整理校勘繕定本之後，撰寫敍錄一篇放在書的前面，隨同書一併進呈給皇帝觀覽。將各書的敍錄另外抄集出來單行，就是別錄。敍錄的撰寫，先條列全書的篇目次第以確定形質，而後介紹著者的生平，師承淵源，與書的內容主旨，並評於其優劣得失。使學者在讀其書之先，可從敍錄中獲得對其書扼要的認識，以便進而研讀。第三步工作是將所有整理校勘寫定的書，分門別類，編成有系統的目錄，這項工作是在哀帝時劉向死後，由劉歆繼續完成的。劉歆在所有的書校讎寫定後，把原貯藏在溫室中的書全部移到天祿閣上予以分類排列置架，編成了我國第一部藏書分類目錄——七略。他把當時的圖書依照學術門目區分為六個大類，卽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六略下再細分為

三十八個小類，一共著錄了六百〇三家的著作，一萬三千二百一十九卷。另外還有一篇輯略，放在分類目錄的前面，是六略的總最，各門類學術淵源流變的文字說明。

劉氏向歆所編著的別錄七略兩部目錄，體例完善，所創有系統的圖書分類，大綱細目，條理井然。東漢明帝時班固撰漢書，採劉歆的七略刪訂編為藝文志。除了留存六藝諸子等六略的書目，刪裁敘錄外，並將輯略的文字打散，分別繫在各類書目的後面作為小序，每略之後，並有總序一篇，卷前加撰大序一篇，敘述緣起，立下了後代史書志藝文的楷模。漢志雖說採自七略，但也不完全相同。例如刪去了兵書略中重出的十家二百七十一篇，並增入了劉向、揚雄、杜林三家五十篇。此外部次也微有歧異，如軍禮司馬法，七略收在兵書權謀家，而漢志改入六藝禮類；蹴鞠二十五篇，七略部次在諸子雜家，班固改入兵書技巧家等即是其例，猶能權宜適應，並不墨守成規。別錄是後代解題提要之祖，七略為分類編目之宗，班志示史家目錄之準則。三家的派別不同，而同為後世目錄學的鼻祖則一。

劉歆所創的圖書分類法，為東漢以迄曹魏秘閣藏書置架典守時所沿用。直到西晉初年荀勗領秘書監時，還仍「依七略以為書部」。迨武帝太康年間，在汲郡的一個先秦古墓中發現了大批的古文竹簡書，交秘書整理，命荀勗撰次。勗乃將秘監的新舊藏書重編了一部目錄，名曰中經新簿

，始改變七略法，另創四部分類。荀勗不標類名，僅將圖書約略依其性質分為甲乙丙丁四部：

一、甲部　紀六藝及小學等書

二、乙部　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

三、丙部　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

四、丁部　有詩賦、圖贊、汲冢書

另外還附有佛家經典，不在四部之中。這部目錄是我國圖書以四部分類的開端，而後來南北朝以迄隋代的各目錄，或有將佛經道經書附列在書目之後，也以中經新簿為先導。晉元帝東遷江左，命李充重編秘閣藏書目，當時因為內府的藏書甚少，僅只有三千零一十四卷，充於是但以甲乙丙丁四部部次圖書，其下不再標舉子目，只是將荀勗乙丙兩部所著錄的書的地位先後互換，於是歷史類的書部次在諸子書之前，成的甲經、乙史、丙子、丁集的順序。李充的分類編目法成為南北朝迄隋代秘閣藏書編目所遵行的制度，他所立下的四部順序歷時迄今千餘年而未有改易。「目錄」一辭，漢魏時代本指一部書前的篇目及敘錄而言，總括群書編成的目錄稱為「略」，為「簿」，並不僅列書名卷數作者。李充所編的晉元帝書目不僅四部分類影響於後世，他僅載書目，不撰敘錄，也為南北朝隋代秘閣編目所沿襲，只是他尚未冒用「目錄」之名。到東晉末年，邱淵之編

晉義熙以來新集目錄三卷，有目無錄，而冒用「目錄」之名，使「錄」字成爲「目」字的附屬品，而失去它的原義，則更名實不符了。這就是隋志所批評的：「不能辨其流別，但記書名而已」。晉代是我國目錄學的意義及分類轉變最遽的一個時代。

東晉以後以迄隋代，秘閣的藏書目雖沿用李充所定下的四部分類法，然四部法但着重按書的體裁分類而漠視書的本質，依據書目無從考索學術的源流，故私家編目並不悉遵，也有承襲劉歆七略法而改進其部次的，則是劉宋時王儉的七志、梁阮孝緒的七錄、及隋許善心的七林。王儉曾任秘書丞，在任內編過元徽元年四部書目，七志是他私撰的目錄，則不依四部分類，而改從七略，只不過略變其名稱而已。因七略雖以七爲名，其中的輯略是學術源流的文字說明，而非書目，實分爲六大類，王儉因增設圖譜一志，湊成七大類。所謂七志者，據隋志載：

一、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

二、諸子志——紀古今諸子

三、文翰志——紀詩賦

四、軍書志——紀兵書

五、陰陽志——紀陰陽圖緯

六、術藝志——紀方技

七、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

此外並將道經佛經各為一志，附在七志的後面，而不具名，則是仿荀勗中經新簿的方法，故名雖為七，而實分為九志。王氏分類悉仿劉歆七略，亦步亦趨，其弊在刻意摹古，而忽略了學術的衍變分合。後人每推崇劉歆七略能「分類以義」，實則劉歆並不一味執著純依學術的源流來分類。譬如詩賦並不附於六藝詩類，蓍龜、雜占也不附於易類等等，因為這些學術在他的時代已經發展成為專門，不得不另立一略來統括。他將史書附在春秋之後者，不過是因為當時的史書甚少，所以能辨析源流，附於春秋。東漢以後史書漸多，且已成為專門的學術，若再附於春秋，顯然末大於本，有失分類別異同的原則。何況還有若干新創體例的著作出現，如魏文帝所勅編類輯的書——皇覽、晉庾仲容所編鈔輯的書——子鈔，後代頗有沿其體例而著作。其中或經或史，或儒或墨，都不是七略舊法所能部次的，故晉以後的圖書分類須要改變，也是形勢之所趨。荀李的四部，固然不盡當，而王儉必欲回復七略，也未免太泥古了。阮孝緒所編的七錄，其分類比王儉則要進步得多了。七錄雖早已佚傳，但阮氏的自序被唐朝和尚道宣編入廣弘明集卷三而保存下來，依自序所述，其分類為：

一、經典錄——易、尚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九部

二、記傳錄——國史、注曆、舊事、職官、儀典、法制、偽史、雜傳、鬼神、土地、譜狀、簿錄十二部

三、子兵錄——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兵十一部

四、文集錄——楚辭、別集、總集、雜文四部

五、術伎錄——天文、緯讖、曆算、五行、卜筮、雜占、刑（形）法、醫經、經方、雜藝十部

六、佛法錄——戒律、禪定、智慧、疑似、論記五部

七、仙道錄——經戒、服餌、房中、符圖四部

前五錄四十六部為內篇，佛法仙道二錄九部曰外篇。從上面列舉的類目來看，雖則阮氏自序說是「對酌王劉」，實際上兼採了四部之優點，尤其與他同時的劉孝標所編的文德殿書目，在四部之外，又分數術的書為一部相近似。阮氏不將史書附於春秋，不將講理論的諸子兵書，與談實用技藝的數術方技合為一錄，無論比起七志或四部的分類都要合理得多，沒有七志罔顧事實與四部含混籠統的弊病。雖然七錄對於後代影響頗大，只可惜唐代囿於六朝秘閣四部的制度，未能在阮氏

分類理論基礎上作改進。許善心著七林、隋唐史志未著錄，僅見於隋書本傳，說他「放阮孝緒七錄，更製七林」，大抵分類沿襲七錄，其詳則不可得知。六朝秘閣所編目錄大都僅載書名，此三部目錄均有敘錄小序，以條析學術的源流，勝過官修書目多多。

唐代初年秘閣的藏書，除了所獲得隋朝的舊書外，並購募遺書，延聘學者來校讎，但未編撰藏書的目錄。貞觀三年，魏徵等奉詔纂修隋書，乃據現存隋朝的遺書撰成經籍志。一共著錄了五四五六部，四四一二二卷。其目分為經史子集四部，其下細分四十類，並仿漢志，每類之後有小序，每部之後有總序一篇，另附道經佛經二部十五類的類目及各類部帙，不載書名，且僅有總序而無小序。據隋志大序說：「離其疏遠，合其近密，約文緒義，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條之下」。而今本隋志僅有小序四十篇，即令合總序而計，也只四十六篇，與大序所言不合。按隋書志書十篇三十卷，原名五代史志，合敘梁陳北齊北周隋五代的制度，本來是單行的。後來併入隋書，故通稱隋志。似是原經籍志的道佛兩部十五類也各有小序，併入隋書後而予以刪削，但是否如此，今已無可考。隋志的分類，雖說承襲六朝秘閣的制度，以四部為綱。然而從它的類目來看，實是由七錄刪併分合而來。隋志經部全取七錄的經典錄九類，而加上自七錄術技類移來的緯書一類，共十類。因為讖緯係託自於經，故改隸經部。史部即七錄的紀傳錄，而將國史類衍分為正史、古

史、雜史三類，而將鬼神附於雜傳中，其餘各類僅名稱略有改易，故由七錄十二類增至十三類。子部則是併合七錄的子兵、術技兩錄而成，由原來的二十一類併為十四類。即刪去術技錄的卜筮、雜占、刑法、陰陽四類而將其書併入五行類，刪去雜藝類而將其書歸入小說與兵家，將醫經、經方合為醫方類，並出緯讖入經部。集部僅刪去雜文類而將其書附入總集，餘三類悉同。兩目道書的分類相同，佛書則隋志係依據隋大業中智果所撰衆經目錄的分類，區為十一類，故與七錄異。故也可以說隋志的分類，是將七錄的七部併合而成為六部。自其精神言之，雖是遠承李充的四部，而實兼祧阮氏的七錄，是七錄四部揉合統一而成的一部目錄，類目詳密，後來的四部目錄雖間有損益，莫不奉為圭臬。而自李充以來的四部法，得隋志的繼承與改進，遂能盛極一時。

隋書經籍志對於後代的目錄影響頗大，約而言之，可以分為三點來討論。一、寓有褒貶之意。編撰目錄的本意，是將繁亂無序的藏書，整理得井井有條，辨章學術，部次流別，以便於查檢，並指導讀者治學涉徑。故對於所有的藏書，無所取捨，概予著錄；對於類例的釐定，應出之於學術的立場，客觀的態度，作平衡的支配，不可有所軒輊。隋志則不然，把目錄當作教化的工具。其序云：「其舊錄所取，文義淺俗，無益教理者，並刪去之；其舊錄所遺，辭義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又云：「雖未能研幾探賾，窮極幽隱。庶乎弘道設教，可以無遺闕焉」。所

以獨尊儒學，對於道佛經典，視為「方外之教，聖人之遠致」，而删其書名，但著其部類及卷帙數，附在目錄之末，不列四部之中。所著錄的書，也不能代表當時藏書的全部。蓋挾六朝以來衛道之見，作為是非的標準，寓有褒貶之意，開後來所謂正統派的目錄，實悖於目錄學的原理。這種觀念，到清乾隆間修四庫總目，更至其極。二、分類以體不以義。圖書分類的標準，不外乎「體」與「義」兩端。辨「義」者，在明學術的源流，其例始於劉歆的七略；崇「體」者，惟圖書的體裁是從，則隋志之作俑。如正史類是紀傳體，古史類為編年體，起居注為日記體等即是其例。因為崇「體」，所以記載神仙高僧事蹟的與人鬼傳記同入史部雜傳，而不隸於道佛。如內典博要、因果記乃佛家的著作，而附入雜家。故學者想在書目中，求學術的系統，實戛戛乎難矣哉。三、經史子集的界限並不謹嚴，開後來目錄隨意依附之先導。李充的四部，雖具有經史子集的雛形，尚無其名，所以無礙乎把六藝、小學共入甲部；史記、皇覽共入乙部；古今諸子、兵家、數術共入丙部，詩賦、汲冢書共入丁部。把甲乙丙丁四部明稱為經史子集，雖然並不始於隋志，梁元帝時秘閣校書已有經史子集的名稱以替代甲乙丙丁，但梁元帝時並未編成目錄，影響於後代目錄學者仍為隋志。隋志既以經史子集為部名，應該立下嚴格的義例，才能名至實歸。然而隋志的總序，並未把經史子集各立下界說。他把小學入經部，鬼神入史部雜傳，詔集入集部總集，已屬不

倫不類，但尚可以說係沿自七略七錄。而其子部，最為冗亂。所謂子書者，必須持之有故，言之有理，卓然能成一家之言者。故劉王阮諸家都以術技別為略錄，不與諸子相雜。隋志的子部有空談哲理的諸子，有記載實用的技藝，有涉及迷信的五行術數，有摭拾異聞的小說，五光十色，薰蕕同器，而統名曰子，名實之相乖，莫此為甚。其例一開，倒替後來編撰目錄的人開了一個方便之門，凡一切後出而無部可歸的書，都在子部來設立一類隸次。於是新舊唐志增藝術，則琴棋書畫成為子；遂初堂目增譜錄，而草木鳥獸蟲魚飲食器用也為子，以至於類輯叢抄的類書叢書都變成了子書，子部愈來愈冗亂，都是因為隋志不能覈核名實的緣故。

自初唐修隋書經籍志以後，四部分類法成為定於一尊的局面，只有玄宗開元年間常侍馬懷素主持整理內府藏書時，曾建議賡續王儉七志來編目，但沒有竣事而馬氏卒。繼馬氏任的弘文館學士元行沖乃沿用隋志的四部，編撰完成了一部足以媲美清代四庫總目的大目錄——群書四部錄二百卷。這部目錄在分類及小序撰述方法，大抵本於隋志。雖有敍錄，但不完備，於唐人的著作多略。因為這部目錄成書太倉促，致紕謬疏漏之處，不一而足，深招致當時曾參與纂修工作的修書學士毋煚的不滿。毋氏曾提出其不當之點有五，於是乃依據四部錄為之删略增補，撰成了古今書錄四十卷，凡著錄四部書三〇六〇部，五一、八五二卷，也撰有小序及敍錄。其卷數比四部錄少

者，殆有似如七略之於別錄，四庫簡明目錄之於四庫總目提要。此目大概亡於北宋末年，但五代劉昫修舊唐書經籍志，即全採其書目，而僅刪去了小序及敍錄而已。漢隋二志皆有小序，自舊唐志刪去此項體制，後代的史志遂相沿襲，成為一種變例。古今書錄的分類也大抵自隋志增益改易而成，但以甲乙丙丁與經史子集並用。其甲部經錄較隋志增經解、詁訓二類；丙部子錄增雜藝術、類事二類，並將醫方衍為經脈、醫術兩類。即由隋志四部四十類增衍成為四十五類，其餘僅類目名稱略有改易，如易古史為編年、霸史為偽史……等等。這部目錄部次的不當，尤甚於隋志。如釋道二教，本不同科，故七志、七錄、隋志都是分別各設一部。古今書錄與舊唐志所著錄釋典的書不多，而古來四部之目俱無佛家，於是把法苑、歷代三寶記等二十一種釋家典籍附於道家。又先秦以來的道家，本屬自然學派，與辟穀導引、符籙齋醮的神仙家迥異，故七略七錄隋志皆分別著錄，不在同一部類。而古今書錄以老子西昇經等書次於老莊之間，這都是有乖名實的地方，而為後代目錄所沿襲。

自天寶以後迄唐末，迭遭安史與黃巢之亂，秘閣藏書頗受損失，雖然肅、代、文宗諸朝曾搜訪遺文，屢詔購募，但均未能如初唐或盛唐時收藏的豐富。德宗、文宗時所編的書目今俱不傳，也未見前人論及，分類方面大抵陳陳相因，無所新創。私人藏書至唐也漸漸多起來了，據新唐志

所載，私家也頗有編著書目的，均無甚特色，今皆不存。只有吳兢西齋書目，據玉海云凡分五十七類，較古今書目增多十二類，只是不詳所增的類目為何。

五代之世，干戈相尋，各國的藏書都不甚多，除了蜀王建時曾編有書目一卷，見通志藝文略，此外未聞有其他的目錄。入宋以後，因為雕版印刷已普及全國，得書比較容易。是故官私藏書都要比前代豐盛得多，編著有書目而且尚存世的也不少，因之對於目錄學的演進也有若干新的貢獻。

宋代的官修目錄，大抵皆遵循隋志以來的四部，而無所更張，僅在類目方面略事增訂而已。在體制方面，尚能沿襲盛唐時代的目錄，有小序與敘釋。宋代內府藏書的處所有昭文、史館、集賢三館及秘閣，合稱為館閣，或統名曰崇文院。初真宗咸平中曾編成館閣圖籍目錄，目旋亡佚，藏書亦遭火焚燬。仁宗時新建崇文院落成，抄補圖書，命翰林學士王堯臣，館閣校勘歐陽修等整理校讎，編撰目錄，於慶曆元年奏上，賜名曰崇文總目。目錄計六十六卷，每種書下有敘釋，另有序錄二卷，有如七略的輯略、隋志的九篇條例，亦即小序。此目自元末以來僅存別行的書目一卷，有敘釋及序錄的六十八卷本不傳。清嘉慶間嘉定錢東垣、秦鑑等人輯得原序三十篇，原釋九百八十條，編為五卷。現存的目錄專書，以此輯本崇文總目為最古。依據輯本，此目分為四部四

十五類，與古今書錄或舊唐志類數同，類目則略有損益。經部刪去讖緯，蓋此類書入宋多不存；史部增歲時類，集部增文史類，則是崇文目所新創的；子部在道家外，新增道書、釋書二類，這是改正舊唐志部次的不合理。這些增改，大都為後代的四部目錄所沿用。崇文院館閣、神宗時改名曰秘書省，徽宗政和中以續得的書編入舊目，名曰秘書總目，今亦不傳。南宋時有孝宗淳熙間秘書少監陳騤撰的中興館閣書目七十卷，及寧宗嘉定間秘書丞張攀撰的中興館閣續書目三十卷。此二目也不傳，今有趙士煒輯考五卷。館閣書目據玉海及周密齊東野語說分為四部五十二門，較崇文目增多七類，不詳所增的類目為何。

除了館閣的藏書目錄外，史書經籍志曾修過五次。舊唐志既全採古今書錄，於玄宗以後的著作皆缺。歐陽修撰新唐書，作藝文志一卷，頗有增補。其分類也大體據舊唐志，僅將訓詁類併入小學而少一類，則是仿之崇文總目。宋代的國史纂修的國史，都有藝文志，每類皆有小序。史志雖然不傳，其小序在文獻通考經籍考中尚頗有引述，固然比不上漢隋二志的小序能條別學術的淵源流變，但能保存此項體制，比起兩唐志却要高明得多，諸史志的分類，大抵出入舊唐志、崇文總目，新增的類目，有史部史鈔一類。元修宋史，即採宋代的諸國史志，刪削小序，去除重複的書而編成藝文志。惟因宋諸史志分類及部次的標準並不一致，重見迭出的書，刪不盡刪。所以在

宋史藝文志中，同一書見於兩類以上著錄的，屢見不鮮，卽因此故，是以四庫總目批評宋志是各史志中最叢脞的一部目錄。

宋代私家編目則不像官府一樣，完全承襲自晉以來的四部分類。固然有不少仍採用四部法的，但也有突破四部的窠臼，而在中國目錄學史上放一異彩的。宋代的藏書家頗多，僅據王明清揮麈後錄、周密齊東野語二書中所敘及的，就有二十多家，藏書多者至十萬卷，少的也超過二萬卷，可以說與秘閣相埒，且或過之。藏書家中編有書目而依四部分類且現今尚傳世的，有昭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無錫尤袤遂初堂書目、及吉安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三家。郡齋讀書志編成於高宗紹興三十一年，分四部四十五類，大抵依據崇文總目而略有增刪改併，在史部新創了史評一類，為後代所沿襲。所著錄的書，皆有敘錄，或論析書中的要旨，或介紹作者的始末，或詳敘學派的淵源，或斠定篇章的次第，具有傳統目錄書的體制，只是沒有小序，僅在每部之前作一篇總序。漢隋二志及唐代目錄皆將小序總序放置於部類的後面，而晁志放在前面，則是一種變例。這種變例，為清代四庫全書總目所遵仿。晁志有衢州、袁州兩種不同的本子並行於世。衢本二十卷，袁本四卷附後志二卷，並附趙希弁附志一卷。兩本的編次及著錄的多寡，略有不同。

遂初堂書目編成於光宗時，是一部比較特殊的書目，書只一卷，無小序及敘錄，僅著錄書名

，偶冠上著者姓名，而不載卷數，但間註明版本，凡一書他收藏有幾部而版本不同者，分别予以著錄，這是與六朝以來傳統書目不同的地方，爲後世書目記版本的權輿。尤目雖以四部分類，但類目與自來的四部也大相逕庭。目共分四十四類，經部新增經總一類，以收經書合刻；史部在正史、編年、雜史、雜傳、故事以外，又將宋朝的國史、雜史、故事、雜傳別出爲類；子部將法名墨縱横四家删併入雜家，後二者實在是淆亂體例，破壞學術系統的部次法，而影響及於後代。此外他又在子部新創譜錄一類，以收舊目無適當部類可附的香譜、石譜、蟹譜等書，則是比較可取的創例。

直齋書錄解題撰成於理宗時，原本不傳，今本二十二卷，是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中輯出，並參校文獻通考經籍考而訂成。其體例大抵規仿晁志，唯無總序，而謹語孟、起居注、時令、農家、陰陽家、音樂、詩集、章奏等八類前各有小序一篇。每部書之下有解題卽敍錄，以品評其書的得失。全目分爲五十三類，類目之詳密，宋元以前的收藏目錄，實以此目爲最。其特點爲新創別史類，把紀傳體的史書區分爲正史、別史二類，實是有乖體例的地方。他又刪去經部的樂類，而在子部立音樂一類，則是受鄭樵的影響，其餘的類目雖繁，大都不出前代目錄的範圍。

自初唐編隋書經籍志，四部分類定於一尊後，最先突破其藩籬的，要推北宋仁宗皇祐元年李

淑編的邯鄲圖書志。李氏把家藏的圖書區分為五十七類，在經史子集四志之外，又有藝術志、道志、書志、畫志，總為八志十卷，故又稱圖書十志。他的這種分類法雖說不止四部，仍未脫四部的窠臼，實以四部為主，所增列的四志有如七錄的外篇，隋志的附錄。而真正能打破四部窠臼的，要數鄭樵的通志藝文略。他把中國圖書區分為經、禮、樂、小學、史、諸子、天文、五行、藝術、醫方、類書、文等十二大類，其下再區為一百五十五小類，小類之下，更分二百八十四目，非常的細密。另外他又編有圖譜、金石兩略，專著錄圖譜金石方面的書。我國自來的書目分類，僅只有部與類兩級，且從無如鄭氏所分的纖細。至於類下再析分子目，則創始於鄭樵，而為明清兩代的目錄學所沿襲。蓋鄭氏認為古書之容易亡佚，學術之不能專門世守，都是因為編撰書目的人，未能明類例的緣故。如果「類例既分，則學術自明」。所以他詳細地條列類例，無論現存或失傳的書，均予以著錄，俾使閱目錄者，可以知曉各門學術的淵源流變；從事專門學術研究者，可以據目以求書，而古籍也就不容易亡佚了。因此他不撰小序，並譏解題為無意義。固然鄭氏的詳類例而學術自明之說，在理論上並無不通，但其先決條件須著錄所有亡佚的書，就不是自來目錄書所能作到的。他不了解「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是目錄體制中的小序與敘錄的功能，而必欲詳類例以明學術，所以編目部次時往往進退失據，後來焦竑、章學誠等人糾舉他失當之處頗多

。

鄭氏的分類固然是突破了四部的藩籬，但仍可看出從四部脫胎出的痕跡。鄭氏將經部的禮、樂、小學三門析出，各自獨立為類；將術藝、方伎、類書從子部析出，分為天文、五行、藝術、醫方、類書五大類；史集兩部大體未變，僅門類小有分合，或是改易名稱。他的改革，頗糾正了四部法中若干不合理而為人所詬病的地方。譬如樂經早佚，後代的書目把律呂、曲調、管絃一類的書合稱樂類入經部；又把訓詁、字學、韻書等合為小學類列在經部，都發生了名實不能相符的弊病。因為這些書既非傳統的經典，也不是註釋經典的書，劉歆列入六藝略，荀勗、李充放在甲部皆無問題，既名為經部則就不可以了。術藝、方伎、類書之屬，其性質各有不同，都與空談理論的諸子書異。鄭樵能把這些不同倫類的書各自為類，足見他的識見高卓，自然比四部法要合理得多。只有三禮，自漢以來，即已尊為經典，鄭氏也把它自經部析出，與後代禮儀的書合為一類，則就不一定妥當了。後來他的族孫鄭寅把所藏書分為：經、史、子、藝、方伎、文、類書七大類，即從樵的類例併合而來，可惜其目不傳，對他的分類詳情無法知曉。

鄭氏通志中除了藝文、圖譜、金石三略外，又特撰校讎略一篇，來發揮他對於求書、校書、以及分類編目的意見。我國自漢以來，有目錄之書、有目錄之學，而研究目錄學的專著，則以此

篇為嚆矢。他所提出「即類以求、旁類以求、因地以求、因家以求、求之公、求之私、因人以求、因代以求」的求書八法，以及「一類之書，當集在一處，不可有所閒」；編目應當「以人類書」，不當「以書類人」；又不可苟且，「見名不見書」，「看前不看後」等意見，多為後代的藏書採訪編目時所採用。

元明兩朝可以說是我國目錄學衰微不振的時期，一般整理藏書編目的，大多視書目為供檢點的賬簿，不僅沒有產生過一部能合乎我國目錄學標準體制的目錄，能求其類例清晰，部次有條理，已經算得上難能可貴的了。至於對錄略之學作理論上的發明，則更不多見。但自分類而言，卻是一個解放的時代。蒙元秘書監的藏書，係獲自金秘閣及南宋秘書省及國子監所藏的典籍，數量應有可觀，只是未嘗編撰成目錄。僅將藏書編數成號，置簿謄寫，但藏書簿已失傳。私家藏書編有書目的，根據記載所知的只有松江府上海的莊肅，曾把他家藏書八萬卷，以甲乙分為十門，除了經史子集四部而外，另有山經、地志、醫卜、方伎、稗官、小說，相當於藏書簿冊，談不上是一部有系統的書目。比較有系統的目錄，只有元初馬端臨所撰文獻通考中的經籍考七十六卷。這部目錄鉅著並不是藏書目，著錄的也不一定都是他當時現存的書，完全根據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崇文總目等書目、以及各家筆記雜說、文集中的序跋等排比成書，以供

學者的稽考。自己偶有所發明，則酌加按語附於後。全書分為五十五類，大抵依據直齋書錄，並參考晁志及宋四代史志的類目而成，自己也無任何的創見。但這部目錄的體裁卻是新創的，與前代的目錄書不同。若推考其淵源，可上溯佛教目錄中的梁朝和尚僧祐編出三藏記集。該目錄自卷六至卷十二，皆抄錄各經典的序文。而下開清朱彝尊撰經義考、謝啓昆撰小學考，皆沿襲馬氏的經籍考而作，而體例更加邃密。

明代內府藏書除了獲得元秘書監所貯以外，並曾下詔徵求遺籍，所藏相當豐富，設有翰林典籍來掌管。到了英宗正統年間才由大學士楊士奇主持編了一部文淵閣書目二十卷。這部書目以千字文排次，自天字至往字凡二十號五十櫥，所著錄的書不載卷數及作者，僅記書名及册數，下注完全或闕、殘缺等字樣，一種書有許多部的，也一併載列。譬如御製文集有二十部，資治通鑑有十五部等等。本為閣中存記册籍的總帳，原來就不是編撰成目錄專書，所以編次草率冗亂，謬誤百出，毫無類例可言。首曰國朝，專著錄明初諸帝的御製、勅撰、以及政書、實錄。其次自易、書、詩以下一共列有三十七個門類，雖仍存有經史子集的名稱，然不以為部門，其門類實與歷代的四部目錄不同。所以清周中孚鄭堂讀書記批評這部書目說：「如此著錄，從來官撰私著所未有」。自晉以來，歷代秘閣的書目都以四部分類，相沿成習。自此目出，打破了往例，故明代的私

家藏書編目，頗多援引為護身符，任意新創部類，不復恪守四部的成規，在中國圖書分類史上，實為一大解放。自正統以後，因為保管不善，文淵閣中的舊籍日漸殘缺流散，新增的都是明代撰刻的書。神宗萬曆時，有中書舍人張萱就閣中的藏書，編了一部內閣藏書目錄八卷，每一書略記撰者的姓名爵里，間注卷數存缺，比正統書目為詳，但著錄的並不完備。此目共分為十八部，大抵依正統目省併而來，也無甚條理系統。明代官修的僅此二部書目，自目錄學的標準而論，殊無足道，僅能藉此略窺明代內府藏書的情形而已。

明代私人藏書家很多，而編有目錄的也不少，僅就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所著錄，即不下五十餘種，惟歷時既久，散亡亦多。今就現存及可考的來看，有特色有貢獻的却很少。其中依四部分類的，如高儒百川書志、朱睦㮮萬卷堂書目、徐𤊹紅雨樓家藏書目等，多受了文淵閣書目的影響。新創的類名雖不少，但是並無什麼條理，值得取法的。焦竑的國史經籍志，則比較有法度。此目大抵取法鄭樵通志藝文略。在部類之下，再細分子目。又所收的書，不論存佚與否。惟併鄭樵的十二大類一百五十五小類為四部四十七類。全目六卷，首列御製書類，以御制、中宮著作、敕修書、及記注時政等書附列，不在四部之中，係本之文淵閣書目，餘則分經史子集四部，末附糾繆一卷，則為駁正漢隋唐宋諸史志，及唐四庫書目、宋崇文總目、鄭氏藝文略、晁氏讀書志、馬氏

經籍考諸目編次分隸的錯誤。御制書及四部四十七類後各有小序一篇，雖然是大抵敘述門類分隸的原由，而不能如漢隋二志考鏡學術的淵源流變，但比起自舊唐書以下的史志連小序的體制都沒有，卻要高明得多。

明代對於目錄最有貢獻的，要推祁承㸁。祁氏是浙江會稽人，萬曆三十二年中進士，做過寧國、長洲的知縣，及吉安知府，皆有治績。崇禎元年升任江西參政，尚未到官就病故了，年六十四歲。祁氏喜歡藏書，他的澹生堂是明末清初有名的藏書樓。所編的澹生堂家藏書目不僅著錄豐富，達十萬卷，而在分類上及編目方法上有若干甚具價值的創見。他把圖書區分為四部四十六類，凡經部十一類，史部十五類，子部十三類，集部七類，類下有目，共二百三十五目，相當的詳盡。子目雖然是參考鄭樵藝文略及焦竑國史經籍志而來，但比起兩家來要審慎，有條理。在類目方面，他新增了幾個有意義的類名，在經部增理學類，史部增約史類，子部增叢書類，集部增餘集類，其餘子目中新增有價值的目名也有不少。經部列理學類還可以說是規仿文淵閣書目及百川書志，其餘的則是祁氏所首創。約史類專收那些在短短的幾卷書中，敘述千百年史事有似現代通史教本的著作，這比前代的書目各依其體裁來分類，或入編年、或入別史、雜史、史鈔，都要來得妥當，而且類名清晰，望文可以生義。總集許多種書而彙為一編，始於南宋，而盛於明正德嘉

靖以後，既非旁搜博採，以成一家之言，也不是別類分門，可供考覽之助。文淵閣書目及千頃堂書目附入類書，清四庫總目列在雜家雜編，都不妥當。祁氏在叢書剛盛行之初，就把它獨立成為一類，不能不佩服他有識見。近代研究目錄學史的人，多以為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始創立叢書部，或以為清乾隆間好古堂書目的區分「經史子集總」，是近世別立叢書部的濫觴，却不知道在前明萬曆末年祁承㸁就已經將叢書獨立成類了。餘集以收那些滑稽、艷語、或逸品的詩文集，也比分別錄入別集或總集類能顯示此類詩文的特性。在部次方面，譬如把名墨法縱橫與雜家合稱為諸子類，而不附入雜家中；經部不設樂類，而在史部立禮樂類，以部次後代律呂儀注一類的書，都要比前代的書目來得合理。他的類例有許多地方值得現代研究中國圖書分類的學者來研究參考。

祁氏對於我國目錄學貢獻最大的，是他發明了兩種編目的方法。他在庚申整書略例中說明他編澹生堂家藏書目，係採用「因」、「益」、「通」、「互」四種方法。所謂「因」，說明他何以因襲四部分類。所謂「益」，說明他何以新增若干類目的理由。所謂「通」，是流通於四部之內，古人有很多的著作，本來是單行的，因為卷帙甚少，後人或編輯入文集中，或附錄在其他有關的著作中，則單行本不傳。假若編目時僅著錄其文集或本書，則這些所附載與本書或文集不同性質的專篇或專卷，則讀者無從查檢，也無從知曉。所以他創立「通」的方法，將那些附載的而

與本書不同類例的專篇或專書，都分別摘出書名或篇名著錄於其應入的本類中，而在其下註明原載某書或某集之內，以便查閱。他舉例說：

古人解經，存者十一，如歐陽公之易童子問，王荊公之卦名解，曾南豐之洪範傳，皆有別本，而今僅見於文集之中，惟各摘其目，列之本類，使窮經者知所考求。又如靖康傳信錄、建炎時政記，此雜史也，而載入李忠定之奏議；宋朝祖宗事實及法制人物，此記傳也，而收於朱晦翁之語錄；如羅延平之集，而尊堯錄則史矣；張子韶之集，而傳心錄則子矣……凡若此類，今皆悉爲分載，特註明原在某集之內，以便檢閱，是亦收藏家一捷法也。

所謂「互」，是一種書可互見於四部之中，按其內容的分歧可以分別著錄於兩類以上所當入的部類。他說：

作者既非一途，立言亦多旁及，有以一時之著述，而倏爾談經，倏而論政。有以一人之成書，而或以攄古，或以徵今，將安所取衷乎？故同一書也，而於此則爲本類，於彼亦爲應收；同一類也，收其半於前，有不得不歸其半於後。如皇明詔制，制書也，國史之內，固不可遺，而詔制之中，亦所應入。如五倫全書，勅纂也，既不敢不尊王而入制書，亦不可不從類而入纂訓。又如焦氏易林、周易古林，皆五行家也，而易書占筮之內，亦不可遺……。

所以在澹生堂家藏書目中，往往有一書而彼此互見，有同集而名類各分者，就是他運用了「通」、「互」兩種編目方法的緣故。這真是了不起的一項發明，可以解決一千多年來目錄家在編目的定部類時所常感到的困惑。因為類例可以依學術來區分，學術萬端，各有它的淵源，不能夠兼包並蓄。然而書則不同，它的內容可以旁通四達，一忽兒談經，一忽兒論史，又可以討論哲學、文學，並容而無礙。所以世界上沒有包羅萬象的學術，而有六通四辟的書籍。古代的目錄家遇到這些包羅萬象六通四辟的書，編目歸類時常感到取捨困難，放在甲類固然可以，歸之乙類也不悖旨，與丙類也能相通，往往不知何去何從。故爾在前代的書目中，常常有一部書在同一書目中見於二類或二類以上的情形，即是在整理編目的人偶有失檢，前後歧出，或編者非一，見仁見智，各適其類的情況下產生的。如果運用了祁氏的通互兩種編目方法，不僅編目的人可以省去歸類時取捨維艱的困擾，讀者尋書時也不致於遺漏所需要的研究資料。清代會稽章學誠所創的「別裁」、「互著」二法，說是推衍劉歆七略而來，而隻字不提他的鄉前輩祁承㸁。實則劉歆既未運用也不知道這兩種編目方法，章氏所創乃承襲自祁氏，但更改其名辭而已。「別裁」即「通」，「互著」即「互」，內容並無區別。章氏隱沒祁氏不提，不無掠前賢之美之嫌。後人但推尊章學誠，也難免數典而忘祖。

明代因為官府所編的文淵閣書目打破了自來四部法的傳統，故私家編目不遵四部的也較多。僅就現存或可考的有：正德時陸深編江東藏書目，區分為：制書、經、性理、史、古書、諸子、文集、詩集、類書、雜史、諸志、韻書、小學醫藥、雜流共十四類。嘉靖時有晁瑮寶文堂書目，區為三十一類，亦以制書居首。孫樓博雅堂藏書目錄，分為十八類，也是特錄制書類，並附以鄉會試錄及墨卷。隆慶萬曆間則有沈節甫的玩易樓藏書目錄，分為制、謨、經、史、子、集、別、志、類、韻字、醫、雜等十二類。萬曆間有陳第世善堂藏書目錄，分為經、四書、子、史、集、各家共六部六十三類。上述的各家，前四家都是因襲文淵閣書目或內閣藏書目錄而來，雖則比起官目略有條理，但皆不是有系統的分類，類目也沒有什麼特色。陳氏世善堂目則是改良四部而成，把四書從經部析出，字學也析出不與爾雅同部，天文五行醫農等合為各家部而與歷代諸子書分別為部，尚具有創造的精神，但把道釋與術藝放在一部，金石法帖及字學書隸入集部等等，也不是一部好的分類法。明代不依四部的目錄而具有特色的，則數崇禎中歸安茅元儀編的白華樓書目，首創以學分類，所謂的九學十部，即經學、史學、文學、說學、小學、兵學、類學、數學、外學等九學之部，再加上世學。他所謂的世學指的舉業，僅是當世的制度，不足以傳來世。自來目錄的弊病，只知道類書，而不知類學。類目的有無，胥依書的多寡而定，正是章學誠所批評的，

不能以部次治書籍，而以書籍來亂部次。茅氏獨能以學術為區類的標準，而且劃一其名稱，整齊其部次，實值得稱道。可惜這部書目已失傳，只有一篇自述載在鄭元慶湖錄經籍志，不能詳細研討它的部次如何。

清代初年一般仍承襲明代官目的遺風，不依四部的如錢謙益絳雲樓書目、錢曾述古堂書目、季振宜藏書目、徐秉義培林堂書目、王聞遠孝慈堂書目等等，都不分部，而因書設類，類目的淆亂，視明文淵目尤有過之。較有條理的，只有一部依四部法的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千頃目並不是一部藏書目錄，是師法阮孝緒七錄、鄭樵通志藝文略，參取書目而作成，不論存佚及是否自藏。所不同的，是黃氏但以著錄明代的著作為主，而附錄宋史藝文志未載的宋末人及元人的著作。因為黃氏編此目的目的，是欲成有明一代的藝文志，張廷玉修明史，藝文一志，即以此目為底本。我國前代修史志，都是網羅一代的藏書，不論古今，皆予以著錄，可備後人徵文考獻，藉以知一代的名數。而元人修宋志，因係會萃宋四朝所修的國史志編成，對於前代的著作，僅略有著錄，已不足顯見一代藏書的概況。而明史志僅錄一代的著作，更無以考見古籍的存佚，實為修纂史志的變例，此變例則因黃氏此目有以啓之。

千頃堂書目分為四部五十類，類目大抵出入宋明各家書目，並無新創。除了著錄書名卷數撰

人外，雖然沒有敘錄，但略述撰者的里貫仕履，足資考證。部類之下，固然未如通志藝文略、國史經籍志、澹生堂書目標明子目；但編次明晰，屬目仍隱然可見。譬如地理類首列總志、次輿圖、府志、邊域、海防、河流、水利、海塘、遊記、次域外朝鮮、琉球、日本，次土司諸夷、山岳、祠志、書院、寺廟，實分為十七屬目，分類相當的細密。它另外還有一個特色，是別集一類，排列以朝代科第先後為順序，沒有登科的人的著作，則就其時代的附於各朝之末。前代的目錄，固然於一類書中大體依作者的先後編次排列，但沒有一定的標準，一遇同類書中同一朝代的書較多，則先後的順序顯得紊亂。黃氏的集部編次法所立下的標準，四庫全書總目即採用而予以推廣至所有其他的各類，而為乾隆以後的書目即沿襲。

我國目錄學的衰微不振，從元明至清初幾達五百年，到乾隆間才顯出中興的氣象，也結束了明至清初紊亂的分類。乾隆三十七年詔求遺書，開四庫全書館於翰林院，命文淵閣直閣學士兵部侍郎紀昀等為總纂官，編繕四庫全書。並把所著錄的各書的提要，以及僅存其目各書的略節，合編為四庫全書總目，於四十七年完成刊版。這部總目所載的合四庫著錄及但存其目的書共計一〇、二二三部，一七二、六二六卷，我國自來目錄著錄的繁富，沒有超過此總目者。此目依四部分類，為類四十四，類下或再分析子目，計子目六十六。其類目為：

經部——易、書、詩、禮（分周禮、儀禮、禮記、三禮通義、通禮、雜禮書六目）春秋、孝經、五經總義、四書、樂、小學（分訓詁、字書、韻書三目）共十類九屬目。

史部——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別史、雜史、詔令奏議（分詔令、奏議二目）、傳記（分聖賢、名人、總錄、雜錄、別錄五目）、史鈔、載記、時令、地理（分宮殿疏、總志、都會郡縣、河渠、邊防、山川、古跡、雜紀、遊記、外紀十目）、職官（分官制、官箴二目）、政書（分通制、典禮、邦計、軍政、法令、考工六目）、目錄（分經籍、金石二目）、史評共十五類二十七屬目。

子部——儒家、兵家、法家、農家、醫家、天文算法（分推步、算學二目）、術數（分數學、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書相書、陰陽五行、雜技術七目）、藝術（分書畫、琴譜、篆刻、雜技四目）、譜錄（分器物、食譜、草木鳥獸蟲魚三目）、雜家（分雜學、雜考、雜說、雜品、雜纂、雜編六目）、類書、小說家（分雜事、異聞、瑣語三目）、釋家、道家共十四類二十五屬目。

集部——楚辭、別集、總集、詩文評、詞曲（分詞集、詞選、詞話、詞譜詞韻、南北曲五目）共五類五屬目。

四庫的分類，係取隋志以下各目損益之，擇善而從。譬如詔令奏議，遂初堂書目、陳氏書錄解題、經籍考、及明代的各書目多隸入集部，四庫以其事關國家大政，則從漢唐志，改入史部。如香譜、鷹譜一類的書，舊目無所附麗，勉強附在農家。四庫則從遂初堂目，立譜錄一類，眾部次其類的書。如政書類，舊目名為故事，所收濫及稗官雜記，四庫唯以國政朝章六部所職的收入，其餘概不濫登。四庫並新增紀事本末一類。紀事本末體創自宋袁樞著通鑑紀事本末，以前的書目多附入編年。四庫始立為專類，以收凡一書備諸事的始末，與一書具一事的始末者。綜而言之，四庫的分類，實較隋志以降的各家書目詳審有序，只可惜囿於四部傳統的成見，但求部類整齊，於學術的源流，不復計及。如名墨縱橫三家，因為傳者書少，而併入雜家。如紀傳體的史書，其經勅修者，列入正史以尊崇之；其非經宸斷者，則抑之於別史。義既不存，體亦未周，誠使讀者有無所適從的感覺。又承襲六朝以來的衛道觀念，尊崇儒學，以能「敦崇風教，釐正典籍」作為著錄的標準。對於釋道教的著作，僅擇其可資考證者始收入。至於像經懺章咒，朱表青詞，又及民間俗文學平話劇曲，都屏棄不錄。還有那些「言非立訓，義或違經」的書，則附存其目。而其評騭取捨，全憑主觀。所以嚴格說來，四庫全書總目既不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目錄，也不是乾隆朝內府藏書的目錄。

在編目方面，四庫總目有若干的優點值得稱道。第一、前面已提到過，他能推廣千頃堂書目集部依作者科第先後編排的成例，而擴及於其他的部類。除了帝王的著作倣隋志例放在其朝代的最前面外，其餘「概以登第之年，生卒之歲，為之排比，或據所往來唱和之人為次。無可考者，則附本代之末」（四庫總目凡例）。這種編次法實要比現代用四角號碼排比容易查檢。第二、前代的目錄家編目，往往草率從事，不能細心檢閱審定，正如鄭樵所譏評的：「編書之家，多是苟且，有見名不見書者，有看前不看後者」（校讎略）。四庫的部次，能考校原書，詳為釐定。例如同一耆舊傳，分類卻不同。京口耆舊傳編入傳記類，錦里耆舊傳則編入載記類，因為這部耆舊傳是紀王氏孟氏據蜀時的史事。又如倪石陵書名似子書，實為文集；陳埴木鍾集名似文集，實為語錄……等等，四庫皆能不為其書名所惑，一一核其實際來部次歸類。第三，四庫的編目分類，能以著者撰述的宗旨為主。如明徐晉卿的春秋經傳類對賦，舊入春秋類。此書雖亦採取左傳，然但摘取儷句，取便記誦，而無關經義，故四庫目改入類書。如滕元發著的孫威敏征南錄，舊入雜史。四庫以其著書的原意在表章孫沔的功績，而非記載儂智高的作亂事實，故改入傳記。四庫的第四個優點是在能予各類釐定它的義例，對於前代書目分類不妥的書，多能詳審其內容而歸入適當的部類。如其凡例云：

筆陣圖之屬，舊入小學類。今惟以論六書者入小學，其論八法者，不過筆札之工，則改隸藝術。羯鼓錄之屬，舊入樂類。今惟以論律呂者入樂，其論管弦工尺者，不過世俗之音，亦改隸藝術……孝經集靈，舊入孝經類，穆天子傳，舊入起居注類，山海經、十洲記，舊入地理類，漢武帝內傳、飛燕外傳，舊入傳記類，今以其或涉荒誕，或涉鄙猥，均改隸小說。

是故在部次方面，四庫比起舊目來為能循名覈實。所以梁任公嘗論四庫目說：「雖其分類繫屬之當否，可商榷者正多。然其述作義例之周備，實已為崇文總目以下所莫能逮。其關於類隸所提供之意見，亦多足為後人討論此問題憑藉之資也」（圖書大辭典籍錄之部）。

四庫總目是一部合乎中國目錄學標準體制的目錄，在每一書下有一篇敘錄（提要），以介紹作者及書的內容與得失。每一部及一類之前有一篇小序，以條別學術的源流。固然它的提要，我們如果拿劉向敘錄所立下的義例來核覈，還多有未逮。它的小序也大抵敘述各門類的分併改隸，不能如漢隋二志的小序能詳學術的淵源流變，但已不是今存宋以來的目錄所能及。尤其是自南宋理宗時續中興館閣書目以後，未再產生一部合乎體制的目錄達五百年之久，四庫全書總目的修成，不能不令人有重睹漢家旗幟的感覺。

在四庫全書開始纂修的同時，另有章學誠也承元明以來目錄學衰敝之餘，推究劉氏向歆錄略

之學，而欲振衰起敝。章氏字實齋，浙江會稽人，登乾隆四十三年進士，雅好史學，著述甚富，其有關目錄學者，有天門縣志藝文考、和州志藝文書、史籍考及校讎通義。前三種是目錄書，後者則是繼鄭樵之後，推闡劉氏向歆校讎的意義。他高唱目錄學的意義是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而不僅是部次甲乙，紀錄經史。所以他與鄭樵一樣，也着重類例。他說：

古人著錄，不徒為甲乙部次計。如徒為甲乙部次計，則一掌故令史足矣，何用父子世業，閱年二紀，僅乃卒業乎？蓋部次流別，申明大道，敘列九流百氏之學，使之繩貫珠聯，無少缺逸，欲人即類求書，因書究學。古人最重家學，敘列一家之書，凡有涉此一家之學，無不窮源至委，竟其流別。（校讎通義互著篇）。

鄭樵詳類例，而學術自明的方法是必記亡佚之書，才能明其學的本末源流。章氏敘列九流百氏之學，使之繩貫珠聯，無少缺逸，使人即類求書的方法是因襲祁承㸁的「通」「互」而改名的「別裁」與「互著」兩種編目法。鄭氏的明類例能創新，改七略四部為十二類，而章氏的辨章學術卻在復七略之古。章氏對於分類的主張，經過了幾度改變。在乾隆二十九年修天門縣志藝文考時，是用四部分類。到三十八年應聘纂修和州志藝文書時，改用七略的類例來部次群書，以條別學術的源流。漢代的七略，入兩晉後變為四部，是因為史書日增，無法附於春秋。文集漸多，不能括

於詩賦。章氏認為七略法尚保存了古代學在王官的遺志，能以部次治書籍，考鏡源流，可使人因委溯源，以想見墳籍之初。至於史書及文集並非不能用七略來部次。他說：

夫二十一史，部勒非難（按：其意為附入春秋）。至於職官故事之書，譜牒紀傳之體，或本官禮制作，或涉儒雜家言，不必皆史裁也。……夫集體雖曰繁賾，要當先定作集之人。人之性情，必有所近。得其性情本趣，則詩賦之所寄託，論辨之所引喻，紀敘之所宗尚，掇其大旨，略其枝葉，古人所謂一家之言，如儒墨名法之中，必有得其流別者矣（如韓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蘇軾之縱橫家，王安石之禮家）……家法既專，其無根駁雜類抄評選之屬，可以不煩而自治。（和州志藝文書序例）

很可惜他的和州志藝文書已佚，今僅存序例，不能完全詳悉他如何的把四部中史集兩部的書，分別部次到六藝諸子中。然而到了四十四年他撰校讎通義時，又修正他對分類的意見。宗劉篇云：

七略之流而為四部，如篆隸之流而為行楷，皆勢之所不容已者。史部日繁，不能悉隸以春秋家學，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一；名墨諸家，後世不復有其支別，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二；文集熾盛，不能定九流百家之名目，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三；鈔輯之體，既非叢書，又非類書，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四；評點詩文，亦有似別集而非別集，似總集而又非總集者，四部

不能返七略者五。凡一切古無今有，古有今無之書，其勢判如霄壤，又安得執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然家法不明，著作之所以日下也；部次不精，學術之所以日散也。就四部之成法，而能討論流別，以使之恍然於古人官師合一之故」。

不再堅持復返七略，而主張但就四部的成法，以條別學術的源流。章氏的見解何以會有這種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我們推測逃不外有兩個原因：第一、他在四十三年中了進士，有了功名，雖然沒有作什麼官，但總有顧忌。自卅八年後，四庫館已開，乾隆皇帝曾有上諭說經史子集四部，是古今不易的成法。章氏慑於天威，當然不便再唱反調，以攖其鋒。第二、大概是他經過編次和州志藝文書的經驗，深深體會到，執着一千餘年前七略的類例，來部次後世學術及體裁經過多次變遷的著作，處處扞格難合，不僅不能達到考鏡學術源流的目的，而且增加檢閱的困難。姑就序例所載，譬如他把閣奏議、工科奏疏歸六藝尚書部；釋常談、字學啓蒙入小學部。吳翰、孫廷鐸、孟思誼等三家制義附儒家部；韓文年編、陶詩考異二家歸名家部等等都是淆亂圖書的部次法。所以他後來說史部不能悉隸以春秋家學，文集不能悉定以九流百家的名目，恐怕這是主要的原因。

自四庫全書總目出，結束了幾百年來圖書分類紛亂的局面，四部法又定為一尊，成為制度。私家編藏書目錄的，大都依據四庫的類目，而鮮有更革。但也偶有一二特出之士，不從四庫，而

列創新的分類，那就是孫星衍的孫氏祠堂書目。孫星衍字淵如，江蘇陽湖人，乾隆五十二年舉進士，做到山東督糧道權布政使。他把家中的藏書編為平津館藏書記三卷、廉石居藏書記二卷，這兩部目錄是所藏的善本書志。嘉慶五年編的祠堂書目內編四卷外編三卷，則是藏書的總目，把藏書分為經學、小學、諸子、天文、地理、醫律、史學、金石、類書、詞賦、書畫、小說十二部，其下再細分四十五類。他的分類大抵出之鄭樵藝文略而頗有改革，去鄭氏的禮樂兩類而還歸經學，去五行而附入天文，改醫方為醫律。另把地理從史類析出而獨立，小說從諸子析出獨立，再增金石部。其分類中，如小學不入經學，金石離史而獨立，天文、醫律、類書、書畫不列諸子，書目不放在史學部而入類書部等等，都是可取的地方。只是部下的類目太過簡單，把醫律放在一部，顯得有點不倫不類。此目另有一個特別的地方，是把藏書區分為內外二編。以學有淵源，可資誦法的為內；詞有枝葉，不合訓詁的為外。他所謂的內外，有點像四庫把書分為著錄與存目。這種區分高下，全憑主觀，並無一定的界劃。因為孫氏編目的目的，本意在供宗族子弟，讀書循序漸進的指導。而不是目錄學的書目。不過在四庫成書以後，孫氏能夠不拘囿於四庫的成法，而矯然立異，其膽其識，實在值得欽佩。光緒中繆荃孫撰藝風堂藏書記及續記，即因襲孫氏祠堂書目的分類，只是把天文、醫律併入諸子類，把書畫改名藝術，由十二部變成十部而已。

清代又有一種新的目錄學體制衍生與發展。我國自來的目錄書，只著錄書名、篇卷數、作者，而不載明版本。自來的目錄學體制如小序與敍錄，只敍明一家或一書的學術淵源，而不載版本的形制與行款。自印刷術發明後，書的流傳較廣，書因所據以翻刻的底本有所不同，或校勘的精粗有別，或刻者的學識目的不一，所以同一書因版本的不同，內容往往有了差異。我國書目之記載版本，從現存的書目來看，始於宋尤袤遂初堂書目，所載明版本的，大抵是經史方面的書，因為這類書宋代雕印的較多。在明代僅有晁瑮寶文堂書目，目中間註明所藏的版本。明清之際的書目，如毛氏汲古閣、錢氏絳雲樓、及季振宜等各家藏書目，只遇宋元本才加以注出。到了嘉慶年間秦恩復編石研齋書目，才推廣尤袤的辦法，把所有著錄的書，皆注明其版本。自此以後，目錄注明版本，成為通例，著錄也愈後愈詳，與西洋目錄學，圖書編目必著明出版的年代、地域、及出版者相合。

我國自印刷術發明後，雕印書籍雖很盛行，然迄明正德以前，並未聽說藏書家有特別珍重宋版的。嘉靖以後，因覆刻宋本的風氣漸盛，藏書家才開始重視宋版，出高價徵求收購，甚至有用美婢來交換者。但宋代刻本，歷時既久，傳者漸少，於是有坊賈因緣射利，用覆刻本偽造宋本欺騙藏書家。根據明萬曆間高濂撰燕閒清賞牋中所描述，當時偽造的方法已是千奇百怪，無所不用

其極。收藏家為了防止他人受騙，於是開了珍賞鑒訂的一派，將他所藏的珍本各種情況記述出來，以供人參考。版本的賞鑒，導源於書畫的賞鑑。唐張彥遠撰歷代名畫記，專記書畫的裝裱標軸，及歷代收藏印記題跋，開書畫賞鑑一派的先河。自後收藏家遞相祖述，至明而益詳。明清之際，舊本書既為藏書家所重視，遂有仿書畫的例子，而作版本的賞鑑，開此例的是康熙時的錢曾所撰的讀書敏求記。踵其例者有乾隆嘉慶年間內府先後撰成的天祿琳瑯書目及後編。嘉慶以後，作者愈來愈多，體例方面也越來越詳審，幾幾乎形成了清代目錄學的主流。

這類賞鑑書志，在記一書的版式行款、刻工、避諱字、刻書牌記、序跋、歷代收藏印記題跋，以及紙墨字體刊雕裝訂的工拙等情況，有似敘錄。只是以書的版刻及外形為記述對象，而不是以闡介書的內容為主旨。雖然可資版刻的考訂及鑒別，而無關於學術的本末源流。在分類方面，這些書志目錄多不太重視，大抵因襲四庫，很少有超出其門類的。自目錄學的標準而言，這是一種別體。然而自清道光間張金吾撰愛日精廬藏書志，對於凡是四庫未著錄的書，皆予以解題；光緒間陸心源撰儀顧堂題跋，對於古書的著者能考四庫之未詳。近代的賞鑑書志如傳增湘藏園群書題記、莫伯驥五十萬卷群書跋文等，於書的內容論說漸增，寖有兼具敘錄體制的趨勢。

四部分類法創始於荀勗，修訂於李充，至隋志而確定，歷時一千餘年而不改。這並不是說其

法良意善，足以成為永久的制度，但因獲得歷代官府採用，遂能經久而不衰。雖然後世的學術日有分歧，著述的體裁亦多變異，惟有補充類屬，勉強隸入乙丙兩部，這種情形誠如章學誠所批評的：「以書籍亂部次」。非但辨章學術之意不存，就是區類主體的體例亦亂。宋明之世雖有有識之士，期圖改革，終因新法各有瑕疵，不足以成為楷模。自四庫總目出，四部法遂得獨尊於一時。然而自雅片戰爭後，海禁大開，西學東漸。同治光緒間，同文館、江南製造局相繼設立，學人紛紛譯介東西洋的學術。東西洋學術皆與中國舊學不同。而國人新著作的內容與體裁，也與舊籍異。四部分類法不能兼收舊籍，以之適用於新書，實枘鑿而方圓，格格不入。乃因外來的影響，生事實上的困難。歷時千餘年的四部法，遂呈動搖之勢。

清末改革四庫者，以張之洞的書目答問為最早。張氏任四川學政時，於光緒元年編書目答問，作為尊經書院學生讀書的指導。此書目雖然不是藏書目，然於我國各科重要典籍均有臚列，故分類也相當的細。因為是官目，不能不遵四庫的體制，但與四庫的類目略有出入。最顯著的，是將叢書獨立為部，不附雜家雜編，與經史子集合成五部，因為張氏的辨析，益暴露了四庫制度並不能包納一切典籍的弱點。張氏的書目，尚只是收的舊籍。至於東西洋學術的新著，不僅張氏書目及四庫法不能夠包容，就是編究往代的目錄也沒有適當類例來部次。所以清末編目者既乏依據

，於是各行其是。有的勉強插在四部之中，有的在四部之外，別立西學一部，以部次新書，再度形成我國圖書目錄分類的紊亂。例如光緒廿一年編的安徽中江書院尊經閣藏書目，卅三年編的浙江藏書樓書目，宣統三年涵芬樓編的藏書目等都是把新舊典籍的分別編目，不相厠雜。統一編目的則有光緒二十八年杭州藏書樓書目，分為經學、史學、性理（附哲學家言）、辭章、時務、格致（附醫學）、通學（叢書）、報章、圖表九類。三十年古越藏書樓藏書目分為學政二部，凡四十七類。民國八年的南洋中學書目，分為十四大類、五十七小類，連四庫經部的各類名都未保留，可謂徹底打破了四庫的範疇。這些過渡時期的目錄，都是編目者為了適應新學術及新體裁的書而創訂的。但此等新法不能合乎近代學術的分野，且系統也不清晰足以成為制度。所以到西洋杜威十進法傳入我國，經過改良以使適合部次我國典籍後，這些過渡時期所創訂的分類，遂歸於淘汰，沒有人再沿用它們。

美國杜威十進分類法，在滿清末年卽已被介紹來我國。但其法的分類本為西洋圖書而設，為中國書所設的地位甚少，尚無法直接採用以分類我國圖書。民國以來，經我國人不斷的研究，予以修訂增補，或遵杜，或仿杜，所製訂出的各種十進分類法，漸次為各圖書館採用。十進分類法成為近代分類的主流。然而四部法或由四部改良的分類法仍不絕如縷。揆其原因，蓋由於仿杜十

進法的類目，仍以西洋學術分類為主而製訂，未能顯現我國學術的特性，對於我國若干的舊籍尚乏妥善的安排。尤其在今日古籍大量影印傳佈之際，往往使編目的人感到部次歸類的困難。

我國的目錄學，是詳分類例以部次群書，而推闡各書的大旨，辨學術的源流本末，誌版本的異同優劣，俾使讀者依類目以知學術，因學而知求書，求書知道選擇版本的一種專門學術。故目錄學的主要對象是學術界，不僅是消極的便利查檢圖書，並能積極地指導學者如何去研究找資料，這與西洋目錄學在基本上似有不同之處。自元明以來我國目錄學衰微久矣，清代雖有四庫總目出，略呈中興氣象，而未幾又受西學東漸的衝擊，遂又一蹶不振。抗戰以前，日本曾利用庚子賠款，延請我國學者欲繼四庫總目之後，編修一部續四庫全書提要，雖然稿尚未完，所撰亦未甚佳，且原稿今有殘佚，然其志應足令國人興起。如何編纂一部合乎我國目錄學體制，且分類能顯現我國學術特色，包含古今典籍或續四庫總目的大目錄，是研究我國目錄者所待共同努力的方向。

中國目錄學的特色

以「中國目錄學的特色」為題來談，我覺得實深具意義。到底中國目錄學有些什麼特色？這也是值得我們今天來探討研究的問題。目前在台灣的每一所學校及縣市都設置有圖書館。圖書館中皆備有各種卡片目錄，甚且許多還印有書本目錄。現在我國圖書館的編目方法受西洋目錄學的影響很大，而我國傳統的目錄學中的若干優點，實未為圖書館界所瞭解，故現代的目錄對於一般讀書或作研究的人的帮忙並不太大。

我國與西洋在目錄學方面的源起及發展顯然循着不相同的路線。西洋目錄的發展是以一般民衆為服務的對象，整理編目着重容易查檢，所以圖書館中除分類目片外，還備有書名，著者等目錄片，以資索檢，只要讀者知道書名或著者姓名，即可迅速的查出該館是否藏有其書，並很快的檢出。這種編目方法對社會大衆，的確是很方便。但是對一個想做學問而不知如何着手的人，或作研究者，尤其是人文或社會科學研究者，想要知道該館收藏究有多少他所需要的資料，則發生了很大的困難。記得十多年前，胡適之先生返國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後，多次來台中霧峰中央圖

書館特藏組善本書庫看書，當時我正服役於中央圖書館，經常與胡先生接觸。有一次，胡先生談起返國所携的圖書不多，需多利用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書，而感到該館的目錄不便於查檢。胡先生的意思並不是說該館現有的目錄編的不好，而的是胡先生並不一定要看某書或某人的著作，他想知道的是該館所藏有那些書對他所欲研究的問題具有參考的價值，這個任務就不是現代圖書編目法所能勝任愉快的。當時胡先生曾促請該館編製一部合乎研究查檢的書目，但不兩年，胡先生就不幸去世了。大前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亞圖書館主任王正義先生返台時來故宮看我，談及目錄學的問題，他語重心長的說：「今日美國的圖書館學已經發展到了盡頭，現在的圖書館就好像一個大的百貨公司，五花八門，分門別類，要買某樣東西即可到某部門去購得，看起來井井有條。但一位真正作學術研究的人，想在裏面找尋所需要的資料，反而感到困難費事。」他並透露，美國學術界有見及此，思謀補救，最近支加哥大學圖書館長即將退休，學校當局擬打破傳統，遴聘一位從未獲得圖書館學位的教授學者來繼任，思借重他的構想，再由圖書館專家制定一套合乎學術研究的圖書整理編目方法。西洋的圖書館學能合乎一般社會大衆，而不能完全合乎學者的需要，這正是現今美國圖書館界所面臨的問題。我國目錄學的發展則不然，自來即以讀書人為服務對象，雖然並非盡善盡美，但對學者而言，它有若干特色足以彌縫西洋目錄學之不足。

目錄學是以圖書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學科，西洋名為 Bibliography ，日本稱為書誌學或書史學。我國前代稱為校讎學，包含的意義比較廣泛，清乾隆中葉才開始衍分，成為現在的校勘學及目錄學。何以要用「目錄」一詞來名這一學科呢？這必須先了解這兩個字的含義。

「目」字是一個象形文字，在甲骨文及鐘鼎文中皆可見到，它象人的眼睛外匡內瞳的形狀，故本義為人眼，管子所說：「目司視。」因為樹木的幹節之處，其紋與人眼相似，故又引申樹木的幹節也稱為目。人眼只有兩個，樹木幹節可以多至無數。故在先秦時代，目字應用甚廣，凡多數的名物一一條列出來則稱作「目」。譬如論語顏淵篇中記載顏淵問仁，孔子答稱：「克己復禮曰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但顏淵還不懂克己復禮的意思，希望孔子講詳細些，故又說：「請問其目。」孔子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目字就是將其細節要點一一舉出來。「錄」字，甲骨，鐘鼎皆未見，只有「彔」字。清代的小學家認為 就是錄的或體字。「彔」的本義是刻割雕鏤，歷歷可數。刻割須用刀，遂加金旁而成「錄」字。因為殷商卜辭係用刀刻，乃引申為記錄，著錄的意義。如隱公十年公羊傳：「春秋錄內而略外。」又由記錄再引申為有一定次序的記錄，譬如國語吳語記載黃池之會，吳師昧明進逼晉軍的營壘，晉定公遣使質問：「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今大國越錄，而造於敝邑之軍壘，敢請亂故？」晉使

指斥吳軍越錄，即說吳軍不遵守原來協商好日中開會的議程。故在先秦時代，「錄」字有一定次序的記錄之意義。

「目」與「錄」兩字在先秦時代均已成為習用的名詞，將此二字合成一詞是始於西漢成帝時的劉氏向歆父子，而見於文獻記載，則始於班固漢書敘傳：「劉向司籍，九流以別，爰著目錄，略序洪烈。」劉氏向、歆奉成帝之命，整理校勘內府的藏書，編成了兩部目錄——別錄與七略，奠定了中國目錄學良好的基礎。別錄是後代解題目錄之祖，七略是分類目錄之宗，為後世立下了楷模。當時所謂的目錄，是指一書的篇目及敍錄，例如劉向列子目錄，鄭玄三禮目錄。目是將全書的篇目一一條列出來，錄是介紹其書的作者，書的內容主旨及評論其得失。讀者在讀其書之先，讀了目錄的介紹後，可以對其書有了初步的認識，能幫助作進一步的瞭解。總括群書僅載書名而無敍錄的名為書目，例如東晉初李充所編的晉元帝四部書目。然而經過了東晉末年至南北朝時期的動亂，一般人對「目錄」一辭的意義已不甚明瞭，編目的只載書名而沒有介紹作者及書內容之敍錄的書目，也冒用目錄之名，實在是名實不符。自劉向，劉歆以降，歷代的目錄學皆強調我國目錄學的學術性，認為目錄學的意義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目錄書能指導讀者治學涉徑，能考訂古籍真僞，功用甚廣，故清代學者王鳴盛說：「目錄學是學中第一緊要事。」我現在將我

國目錄學中有別於西洋目錄學而具有特色的，分為四點來加以說明。

一、小序——小序是我國目錄學中重要體制之一。所謂小序，是目錄書中每一類或每一部的後面或在前面，有一篇文字說明這一部類學術的淵源及流變。如漢、隋二志於在每一部類書目之後，四庫全書總目則放在每類書目之前。也有將全目的小序輯在一起，置於目錄之首的，如劉歆七略的輯略，王儉七志的九篇條例，宋中興館閣書目的序例一卷皆是。小序的作用在介紹這一門類學術的起源，演變及其盛衰、優劣、得失。舉一個例子來作說明，例如漢志易類的小序，首先說明周易八卦，六十四卦爻辭及十翼的起源，其次說明經過秦始皇焚書而易何以能傳授不絕，最後說明漢代易學的分家，有列於學官者，有在民間傳授者，各家與內府所藏古文易經的異同。使我們讀了之後對此門類即有概括的認識，對初學者及專門研究的學者皆有很大的帮助，查尋專書來研讀也非常的方便。

我國古代的學術皆由中央王官所執掌，欲學者必以王官為師，世代傳授，而無民間講學。平王東遷後，諸侯勢力興起，各設官分職。中央王官無所執掌，遂散居四方，民間講學之風漸起，學術遂不斷的衍生出來。但是這些學術彼此之間多是有關連，有淵源，它們並不是孤立的。小序除了說明淵源流變外，也說明各門類學術在歷史上分合情形，各學術的關聯。除了可使讀者知道

此一門類是屬於那一方面的學術，還可知道與那些門類學術相通，對於找尋資料提供了線索。要研究一問題除了知道這一門類中應該有自己所需要的資料外，還可知道其他與此類有關聯的某些門類中也許有自己需要的資料。所以小序在這方面的作用是很大的，無論對初學者或作研究的人找資料皆有很大的貢獻。但是在中國歷代目錄書中，有小序體制的目錄並不太多。其已失傳而可考的除七略外，有劉宋王儉七志，梁阮孝緒七錄，隋許善心七林，唐元行冲群書四部錄，毋煚古今書錄，宋三朝藝文志、兩朝藝文志、中興藝文志、中興館閣書目等九家；存世的除漢、隋史志外，只有宋崇文總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明焦竑國史經籍志、清四庫總目五種。而且這五部目錄中，崇文總目小序已殘缺不全，晁志僅四部前有序，各類並無序，陳錄則小序僅有八類，皆不全。焦氏國史志及四庫總目的小序雖完備，然大體而論，大都說明他們著錄的意旨及門類分併改隸的原委，比起漢隋二史志的小序能通學術的流變，尚有一段距離。蓋因小序的撰寫，須用簡扼的文字說出其學術的淵源及在歷史上的演變，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此所以自舊唐書經籍志以後的史志，均不撰小序。故章學誠曾說：「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然而小序實在有它的價值，不僅可以指導學者研究學術，並提供了在相關各類別中找尋資料的線索，這是我國目錄學所獨有的特色之一。

二、敘錄—所謂敘錄，是目錄書中每一書名下的一篇介紹這部書的說明，後代或稱解題，或名提要。這種體制是劉向別錄所奠立的，他奉成帝之命校讎整理內府藏書，將每一種整理完畢後，即條舉其篇目而撰寫一篇敘錄，放在其書的前面。將所有各書的敘錄集起來即成一部目錄書1別錄。劉向撰寫敘錄的義例為：

甲、介紹作者的生平：因為任何一個人的著作，都脫離不了他的時代背景，先瞭解了作者生平及其學術淵源，則可清楚其時代背景，自然對其書能作進一步的瞭解。

乙、簡介書的內容：使讀者未看原書之先，便對此書有一個概略的認識，等到看書時就可知道某些地方應該特別注意，而進一步的研究。

丙、說明作者著書的原委：古人寫書大都是有所感觸，才以文字表達出他的感情及見解，決非無病呻吟。讀者先了解了作者著書的動機，自然能深刻的了解其書。

丁、介紹其書的優劣得失：這樣也可以增加讀者對其書的認識，但此種評介應出之客觀的立場。

撰寫敘錄的義例自劉向奠立後，後來的目錄學家大都仿效而作，雖然有詳略優劣之分，但對指導讀者讀書研究都有不同程度的貢獻。近代流傳最廣，最具學術價值的解題目錄是清乾隆年間所編

的四庫全書總目。讀者只要將某一類的各書提要細讀一遍，即可對該類學術獲得極豐富的知識，研究起來尋檢資料就可得心應手。張文襄公於光緒元年對四川尊經書院的學生講讀書應有門徑，曾說：「汎濫無歸，終身無得，得門而入，事半功倍。……此事宜有師承，然師豈易得。今為諸君指一良師，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讀一遍，即略知學術門徑矣。」（張氏輶軒語語學篇）。可知目錄書中的敍錄對於研究學術參考的重要。民國初年，日本人利用庚子賠款，在我國北平組織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主要工作之一，即從事續修四庫全書提要，延聘我國各科學者從事撰寫工作。直到抗戰發生，一共撰寫了清四庫未收之書兩萬多種的提要，其中一萬零七十種當年曾予以油印發行。原稿因大陸淪陷，情形無法知悉，油印本則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有一份，五年前由商務印書館整理出版。這部目錄的提要固然尚不及清四庫提要的精核富贍，也姑不論日本人發起這項工作的動機如何，其對於學者的貢獻則是無容諱言的。

小序及敍錄都是以學者為對象，從事學術的介紹，是中國目錄學所獨有的兩項體制，而為西洋目錄學所無。就中國歷代的目錄書而言，有敍錄的目錄實較多於有小序的目錄，其原因在兩者撰寫的難易有不同。近人余嘉錫目錄學發微中，曾引章學誠文史通義中所云：「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書教下）兩句話，來譬喻寫作的難易。寫敍錄是記注之事，古人立下之

義例，可資依循，只要將作者及書的內容介紹出來即可。雖然寫作有高下之分，但只要不離其宗旨總可敷衍成篇 寫小序就不同了，小序是撰述之事，須通悉各門類學術的起源，盛衰衍變的原由，才能預推它未來演進的跡向。周易繫辭云：「神以知來。」又云：「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故章學誠說「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漢隋兩志的小序，各類的撰述方式不一，古人並未立下撰寫的楷模，以供後人遵循，所以說它圓而神。圓則無方，神則無體，不可以從字句之間求之。要在通曉其學，則文成而法自可立。小序的撰寫雖然比較難，但與敘錄對讀者研究及尋檢圖書都有很大的助益，形成了中國目錄學體制中的兩大特色，古人稱目錄學是為人之學，就是這個緣故。

三、分類—自清末美國杜威的十進分類法傳入我國以後，我國圖書館學專家紛紛仿效或改進之，以分類中國的圖書，已為各級學校及公共圖書館所採用。我國的圖書分類，始於劉歆七略，他將圖書區分為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伎六略六個大類、三十八個小類。七略分類法為漢、魏時期內府藏書所沿用，本來是學術的分類法。到了晉代，因新的學術興起，舊分類法不能完全適用，於是改用概括之法，新創甲、乙、丙、丁的四部分類法，自西晉荀勗中經新簿開始，到東晉李充元帝四部書目才完成，而為南北朝秘閣藏書所沿用。至初唐編隋書經籍志又定

名為甲經、乙史、丙子、丁集，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歷宋元明迄清習用不衰，成為中國歷史上圖書分類的主流。雖然其間有不少的目錄學家思圖改革，別創各式各樣的分類，但因未獲得皇室藏書編目的支持，終不能成為楷摸而曇花一現。四部分類法不像七略是經過慎密思考而制定的，它的興起不過因學術的衍分併合而有變動，七略舊法不能適應之際，而暫行的概括之法。但因綱目簡明，再經過唐人的改進，才使它制度化，然而終不能掩蓋它先天的缺點——分類重書的體裁，不能條別學術，為後代的目錄學家所詬病。

四部分類法誠然不是一種良好的分類法，處理古籍就已經發生了許多問題，對於近代的著作更無法適合。然而引進的杜威十進法又如何呢？它雖適用於新著作，但對於中國舊籍的處理還不能暢所欲為。所以近幾十年來我國許多收藏舊籍較多的圖書館，大都採用雙頭馬車制，將新舊圖書分別編目，舊籍還是沿用四庫法或書目答問的五部法（經史子集之外增一叢書部），新書則用仿杜十進法。其偶或有將新舊圖書用十進法統一分類的，往往發生扞格不入的情形，不僅編目的人整編圖書歸類發生困難，讀者查目尋書也感到非常的不容易。尤其在今日，臺灣翻印古籍的風氣異常興盛，往年的善本舊籍，現在經過影印後都變成了新書，雙頭馬車制已不能適用，益形增加了圖書編目時的困難。相對的，作學術研究的人，特別是研究中國文史及社會科學方面的人，

想查檢書目來找尋資料也增加了困難。這種情形，在收藏學術性典籍不太多的一般公共圖書館，也許不太顯著。但在藏書比較豐富的大學或學術性圖書館中找資料的人，則很容易的感覺出來。

杜威的十進分類法把西洋學術區為九類，另立一個總類，來放置綜合性不屬某一學科的書。每一類下分十小類，每小類又可分十目，目下還可以再分，以至於無窮，非常的細密，可謂相當地有條理，我國的目錄學家即大體仿杜威的十進數序再略參四庫類目而編成中國圖書分類法，由各級圖書館來採用。杜法分類是否合乎現代西洋的學術姑且不論，即令合於現代學術區分，也未必能適用我國固有的學術。杜法太重視十這個成數，仿杜者為了遷就十進的數序，於是在類目方面就免不了拼拼湊湊，何況又參用未盡妥當的四庫類目，所以處處顯得扞格，編目及找書兩感其難。譬如我國傳統的經學，是我國文化的源泉。因為西洋沒有經學，現代的目錄學家或者將經書拆散，各依其內容分別歸之於哲學、歷史、社會科學等類中。或有不打散的，但也並不承認它是我國學術之一，而附置在總類下，設一類目來部次。把經書打散，依現代學術的分野來分別歸入各類，在理論上並沒有錯。但我國經學的建立，已有兩千年的歷史，十三經之名，自南宋迄今也有八、九百年，早已成為專門，歷代解經之作無數，就是現今傳世注解任何一種經書的專著皆不下數百種。這些解經的專著，如若皆從其內容來分類，却並不一定與原經歸入同一類中。譬如春

秋是史、左傳是史、公羊穀梁傳就不宜說是史書，至於春秋繁露、春秋尊王發微等等更不能把它們歸到歷史書。尚書是史、單注解其一篇的禹貢及洪範五行傳等是否能與尚書放在一類？假若各隨其書的內容來分類，解經的書就不一定與原經放在一類，想研究經學的人，是沒有辦法依據書目來找書的。至於不將經書打散，而附置在總類下的十進分類法，也非常的不妥當。所謂總類是為安置不能隸屬任何學科的書而設立的，很有點像四部分類法的子部雜家。然而經學的確是我國特有的學術，豈能貶抑視為辭典類書之儔，而不承認它是一門專門的學科？

此外尚有金石方面的書，也是我國獨特的一門學科，其內容龐雜，無所不通。有專刻儒家、釋家、道家的經典，有諛墓旌功的碑銘，有名家的詩文法帖，四部皆能涉及，所以我國前代的目錄學家往往獨立成一大類，如鄭樵在通志藝文略外，專立金石略；清孫星衍的祠堂書目，有金石一類。現代的分類法，將之歸入歷史考古門，絕不能顯出它的特性。又如數術方面的書，也是我國獨有的學術，所以自劉歆七略以來，多立一大類來部次。我國的數術之學，雖然未經實驗，不能合乎科學的標準，但仍有它的一套理論，大抵由歸納得來，與符咒巫術不能相提並論。近代的分類列在宗教的迷信門，實在是名實不符，讀者無法找書的。所以現代的十進分類法不惟不能彌縫四部法的缺點，反而增加了研究我國學術的人依目找資料的困難。

前面已講過，四部分類法之得以成為我國前代圖書分類的主流，並不是它法良意善，也不是其他家的分類一無可取，而是四部法崛起於偶然的機遇，歷代秘閣憚於更張而沿用下來，成為主流。故研究現代中國圖書分類者，不應只在四庫類目中找資料，應放開眼光去研究其他各家的分類，擷取其菁華，來編製適合於我國古今學術的圖書分類。像宋鄭樵通志藝文略、明代祁承㸁澹生堂藏書目錄、茅元儀白華樓書目、清代孫星衍祠堂書目等等，在分類方面皆各有其優點。譬如澹生堂書目在史部各體史書外，新增約史一門，以部次陳士元荒史、朱謀㙔邃古記、司馬光稽古錄一類的書。這些史書皆是在短短的十許卷中，記述數千年之事，既不同於紀傳、編年，也不是雜史、史鈔或教科書，在現在的分類法中也找不到適宜的地方來部次，而且約史之名，名實相符。又如白華樓書目依學分為十部：經學、史學、文學、說學、小學、兵學、類學、數學、外學，名稱劃一。其中類學包含辭典、類書、目錄等凡編集的書，名稱比總類要好。尤其說學一詞，最是妥切，可以解決千餘年目錄學家對於這類圖書處理的困難。宋鄭樵嘗說：「古今編書所不能分者五：一曰傳記，二曰雜家，三曰小說，四曰雜史，五曰故事。凡此五類之書，足相紊亂。」（校讎略編次之訛論）我國自先秦以來，有小說家一流，源出於稗官。魏晉以後，衍為筆記一種體裁，或記軍國的大政，或記時事的見聞，或是讀書時偶有心得，而筆記發揮自己的見解，或是

考訂民間習俗的謬誤，大抵隨意錄載，各類或多或寡皆具有。這一類型的書在四庫分類中很為複雜，大都依其記錄偏多的資料作為分類的標準。記載軍國大政多的入雜史，記載某人或某些人事跡較多的入傳記，讀書考訂較多的入雜家雜考，瑣事較多的入雜說或是小說類的筆記．異常分歧。四庫分類法已使查檢這類書的人感到困難，而現代十進分類也大抵沿襲四庫的類目，以雜史入史地類，雜說雜考入總類普通論叢，小說筆記放在語文類，由四庫的兩部衍成三部。普通論叢既難以顯示出雜說的特性，小說一詞，古今的意義也不同，使讀者從書目中找尋資料更為不易了。茅元儀的白華樓書目立有說學一門，我認為確是卓見，值得編製現代圖書分類法的學者來考慮研究。總之，我國舊有的分類法固然還沒有一種適合於現代，但其中的類目倒是有很多可以研究的。

四、編目法—中國有中國的一套編目部次法，西洋有西洋的編目部次法。固然西洋編目法很好，但是中國固有的也有許多優點值得參考。譬如同一類中所著錄各書編次的先後，中西處理的方式就不相同。西洋係按作者的姓的第一個字母的順序排列，第一個字母相同，則據第二三個字母來編排。現代的編目法亦仿自西洋，先按作者的朝代大分，同一朝代，則依其姓氏編為著者號碼，著者號碼或按四角號碼，或依其筆順。其優點是同一朝代同姓的作者都編排在一起，想查某姓作者的著作就很方便省時。我國舊編次法則不同，是按作者生存的先後或科第的先後來排列的

，自漢隋以來的傳統方法，同一類的書，大抵係按作者時代先後排列，但並無一定的標準。清初黃虞稷創了一個很好的編次法，他所編的千頃堂書目，在集部別集類係依科第中舉或中進士的先後來排列。乾隆間修四庫全書，編四庫總目時卽採用千頃目別集編次法，並加以擴大，所有各類的書都依科第的先後來編排，其沒有科第的，則按其時代。其用意在使同一類中同時的人的著作排在一起。當然並不是所有的著作都是有功名的人所著的，但是自唐以後的作者，可以說絕大多數是中過進士或擧人的。這樣編排法，其優點在便於硏究。我們硏究某一人、某一時代、或某種學術的演進，查資料就方便得多了，只要查到一人，其前後都是同時代或時代相近的人的著作，所以這種編次法是專為學術硏究而設，對一般大衆想找某一部書或某一人的著作，則並不太方便。

中國目錄學在編目還有一個特色，此特色實值得大大的闡揚、推廣。因為圖書分類是按學術的分野來擬定，而書却各有其特性。學術各有其源流，不能兼包並蓄，而書則不然，可以一下子介紹古代，一下子寫近代，一篇講哲學，一篇又述歷史，不妨旁通四達，與學術不能配合無間。現代編目法因為便為檢書的緣故，書目須與收藏相配合，一種書只能歸於一類。然而遇到內容複雜的書，譬如前面提到過說部方面的書，若僅編入一類，則其他不屬於此類的內容不能顯示出來。中國自宋以後的學者或出版業，喜歡編某一名家的全集，除了收錄其文章以外，也往往把他原

為單行而篇帙甚少的零星著作編入全集中，致使單行本不再流傳，或把若干人的著作編成叢書。例如歐陽修的易童子問三卷，本是歐氏關於周易的專著。因為編入歐陽文忠公全集中，單本即不傳。歐集依分類法編在文學類的別集中。研究易經的人就無法在易類中找到這部著作。對於研究的人非常不便，而且也增加編目者斟酌的困難。明代末年有一位目錄學家，浙江紹興會稽人祁承㸁針對這點，首倡了「通」、「互」兩種編目方法。他在萬曆四十八年，也就是泰昌元年，將他家所藏的近十萬卷書，編了一部澹生堂藏書目錄，此目民國初年刻在紹興先正遺書第三集中。他另寫了一篇庚申整書略例（這一年是庚申年，此篇略例收在澹生堂集），說明他編目採用了四種方法——因、益、通，互。因是因襲四部，說明他何以因襲四部分類法；益則說明他雖用四部法，但在類目方面有不少的增添，與前代並不一樣；通、互二法則是他編目的精義所在。清乾隆中會稽章學誠著校讎通義，其中有別裁、互著兩篇。實際上是承襲了通互二法而改用了意義比較顯著的名詞，不過章氏未承認而已。通就是別裁，所謂別裁者，凡是一部書中包含有幾種著作，將其中與全書不同隸屬在一類的著作裁別出來，各按其內容，分別著錄在它們應入的部類中，並在下面註明其出處。例如宋李綱的梁谿先生全集，其中有靖康傳信錄、建炎時政記兩種是歷史著作，應把這兩種裁別出來，編到史部雜史類中，在下面註明出梁谿先生全集，找書的人可以知道到

梁谿集中查到這兩種記載南、北宋之間的史著，祁承㸁的互即章學誠的互著。所謂互著者，凡一部書中內容龐雜，可依其不同的內容，重複著錄於不同的部類中，換句話說，同一種書可以編入不同的類目中，在其下註明「互見某類」，即指某類是此書的本類，圖書放置的處所。例如元劉一清的錢塘遺事，記載南宋的史事較多，但也有不少非關軍國大政的，則著錄入史部雜史類，另在子部雜家雜說也著錄，在下面註「互見雜史」，則其中雜說的內容可以顯現出來，取書可在雜史類中。如此，找資料的人不致有所遺漏，編目者也省了斟酌的苦惱。

別裁與互著的確是我國圖書編目法中兩項很好的補助方法，但在前代的目錄書中應用的很少，察其原因，祁氏死後不久，明代即亡了。祁氏的著作遭到清初禁燬，澹生堂書目明清兩朝未曾出版過。祁氏的集子，清初因禁燬而罕流傳，所以沒有發生影響。章氏著作流行時期，正是我國目錄在四庫總目籠罩影響之下，所以也沒有發生作用。直到民國才漸有開始用別裁法來編目的，但尚未推廣。現代的圖書館專家往往奢談仿效西洋的標題目錄。標題目錄固然很好，但比較繁難，需要大量的人力，而且因為繁複，於其中找所需用的資料，也不一定容易。假如能善用別裁互著兩種方法來編目，其事較標題目錄要簡單，其效用，我相信決不遜於西洋的標題目錄，值得現在的圖書館來研究推廣。

以上所講，只是我個人淺見所及。我國是一個文明古國，目錄學淵源很早，就是從真立系統到現代也有兩千年的歷史，其間經過不斷的改進，都是先賢們心血所寄。然而因其發展的路線，是以學者為主要對象。近百年來，因西洋文化的介入，民智開發，圖書館已不是昔日的藏書樓，而成為社會教育的重要機構之一，其功能非中國舊日的目錄學所能勝任愉快。然而西洋目錄學只適宜於一般公共圖書館，大學及學術性圖書館需要別尋蹊徑，而我國目錄學中有若干特色可以借鏡。我們固然不可故步自封，但也不應妄自菲薄，在西洋目錄學發展到不能配合學術界需要的今日，我們正宜溫故以知新，以克濟西洋目錄學之窮。

改革中國圖書分類芻議

中國圖書分類的問題，是自魏晋以後一千多年來我國目錄學者所感到困擾，而迄未能獲得合理解決的問題。在我國歷史上，圖書的分類，有兩個主流，即是「七略」與「四部」。「七略」是西漢哀帝初年劉歆所編的，是我國最早的一部有系統的圖書分類目錄。「七略」雖名為七，實際上是將當時所有的圖書分為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六略六個大類，另外的一篇輯略，則是敍說各門類學術源流文字的總輯，而不是類名。在這六個大類下，又各按圖書的內容，再區別門目，共分成三十八個小類。有大綱，有細目，類名與所著錄圖書的性質，也相符合，是一部相當合乎分類原理的目錄。後代的人每每稱述劉歆的分類，辨義不以體，也就是說他的分類在明學術的源流，不依圖書的體裁。然而實際上並不完全如此，劉氏固然有的承襲先秦以來的學術區分門類，但也得斟酌學術的蛻變與圖書的多寡，而並不一味的執着分類以義。譬如詩賦一類的書，漢世著作的很多，所以他別分為一略，而並不附於六藝略的詩類。蓍龜、雜占本出於易道，後來與陰陽五行合流，故劉氏列入數術略，而不附於六藝的易類。只有史書，劉歆的時代著

作還少，還不足以成為一門獨立的學術，所以他也就附入春秋，而未別立一類。後人但執著這一點，來證明劉氏分類以義，豈是劉氏的原意？

學術隨時代的演進而有所遷蛻，著述的體制，也不能一成而不變。東漢以後，歷史的著作日漸增多，流別也雜，已不是六藝春秋一類所能包容的。魏晉之世的文人，崇尚玄談，初則是祖述老莊虛無的學說，繼而轉為以煉丹服餌來養生。這一類的著作，諸子略的道家，固難比附；方技略的房中、經方，也不相合。此外還有新創的著作體裁，如魏文帝曹丕命王象、劉邵等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名曰皇覽，是按事物分類纂輯的書。梁庾仲容的子鈔，是摘抄諸子羣書一百多家，而編在一起的書。有經有史，或儒或墨。再加上方外釋家經典的盛行，都不是七略原有分類所能軌範的。於是四部分類法，遂得以乘時而起。但七略分類法的類名確當，又能條別學術，有它的優點，所以在四部法盛行後，有的目錄學家想予以規復，如劉宋時的王儉，蕭梁時的阮孝緒，隋許善心，以及清代的章學誠等是。許善心的七林早佚，它的分類不詳，不知與七略異同如何？王儉七志除因襲七略的六大類但略變更類名外，另增圖譜一類，並附錄釋道的著作各為一類，雖名為七，實際上分為九類，只是繼承了七略分類的精神。唯有清乾隆年間章學誠撰和州藝文志，全倣七略，一意復古。章氏生在劉歆之後一千七八百年，學術的變遷不知經歷凡幾，竟想恢復在

南北朝時代已滯礙難行的七略分類，簡直是胡搞，真可說是泥古而不化。不過他經過這一番試驗後，在晚年著校讎通義，也承認「七略之流而為四部，如篆隸之流而為行楷，皆勢之所不容已者也」（宗劉篇），放棄了恢復七略的主張。只有阮孝緒編的七錄，雖用七名書，但不是全做七略，他能擷七略的精神，採四部的特點，而斟酌損益，將圖書分為經典、記傳、子兵、文集、術技、佛法、仙道等七大類五十五個小類，是當時的一部比較妥切的分類目錄。後代沒有沿着他的方向來發展，是很可惋惜的一件事。

四部的興起本來不是一種經過愼密製訂的圖書分類法，它的初興原屬藏書的簿册，將圖書概括的區別為甲乙丙丁四部分，以便於收藏核檢，好像明代文淵閣藏書用千字文編號一樣。由晉代荀勗所編的中經新簿發其端，其後經過李充編晉元帝四部書目，更換乙丙兩部所收書的順序，到唐代初年魏徵撰五代史志（卽現在的隋書經籍志），才予以詳密的區分門類，四部之下，再分為四十五類，成為甲經、乙史、丙子、丁集四部的定型。四部分類法的缺點，主要在於名實不能相稱。旣稱曰經部，所收錄的應該僅限於我國傳統的經典。如古代雖有六經之名，但樂經早亡，自漢以來定名的五經、九經、十二經、十三經都無樂經。經部樂類所收的僅是後代論雅樂的著作，不在通稱的經典之列，又小學類的字書、韻書也不是傳統的經典。故樂與小學劉歆可以置之六藝

略，六藝者，禮樂射御書數，當然可以包括樂與小學。荀勗、李充列在甲部，與九經、十二經共在一部也不發生名實的問題。但隋志以降的四部放在經部，就不應該了。既稱為史部，應當僅限於歷史的著作。加上地理志書及典章政制，還勉強可以說得過去。但金石目錄類的書籍，又與歷史有何干係？竟也放在史部。四部法的子部最為雜亂。子書的意義，應該是著書立說，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能自成一家之言的書。然而隋志的子部，有記載實用的技藝，如天文、曆數、醫方等類，有摭拾神怪異聞的小說，有百家方伎的五行術數，都與談哲理的諸子混列在一部之內。尤有甚者，自隋志立此例後，替以後編目錄的，打開了一個方便之門，凡是一切古無今有，無部可歸的新增著作，都在子部中闢類安置。新舊唐志增加了藝術類，於是琴棋書畫篆刻成了子書；尤袤遂初堂書目增加了譜錄類，於是草木鳥獸蟲魚飲食器用也成了子書。類事纂輯的書，隋志附之雜家，新舊唐志獨立成類，四庫總目並彙輯叢編的書也附之雜家。到了民國初年，有的目錄甚至把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也列在子部，子部真成為後來圖書的淵藪，名實之相乖，莫此為甚。

四部的分類雖然不合理之處很多，但是它的部類比較簡單，易於藏檢，而且自晉以後，得到歷代政府秘閣藏書所沿用，儼然形成為一種制度。自宋以來，有好些目錄學家想圖謀改革圖書的分類。其中比較慎密卓立的，有宋鄭樵的藝文略，把古今圖書區分為經、禮、樂、小學、史，諸

子、天文、五行、藝術、醫方、類書、文凡十二大類，其下再區為一百五十五小類，小類之下，更分二百八十四個屬目。又有清代孫星衍的祠堂書目分為經學、小學、諸子、天文、地理、醫律、史學、金石、類書、詞賦、書畫、小說十二部，部下再區為四十五個類。固然他們兩人的分類並非沒有商榷的地方，但比起四部來的確要合理得多。然終因未能獲得官府編目的採用，也就不能發生影響力。四部的優勢一直到清代末年因外來的影響，才發生動搖。

自鴉片戰爭以後，海禁大開，西學東漸。同治光緒年間，同文館、製造局相繼設立，培養翻譯人才，紛紛譯介外國的著作。那些著作，都不是我國固有的學術所能包容的。而我國人因受外國學術的影響，著作的內容與體裁，也與舊有的典籍不同。這些新增的圖書，多不是四部分類法所能部次的。當時的圖書編目者鑒於我國既無成法可遵，為了適應新學術及新體裁的著作，或勉強納之四部；或在四部之外，別立西學一部，以類新書；或者乾脆打破四部的藩籬，而別創立新部類。這些各行其事，而不相師，所形成圖書分類紊亂的局面，到美國杜威十進分類法介紹到我國來後，才漸趨於平靜，而有所遵循。

杜威的十進分類法，是將一切的學術分為哲學、宗教、社會科學、語言學、自然科學、應用科學、美術、文學、歷史九大部。九部之外凡屬普通圖書如百科全書、雜誌等不能歸入上述任何

一部者，則另立為總類，共為十大部。每部又各分十類，每類各分十目，每目下仍可再各十分，以至於無窮。它的特點是部類目都用阿刺伯數字來代表，旣便於置架查檢，也便於記憶。惟杜氏的十進分類表本為部次西洋圖書而編製，其中為中國書所設的位置甚少，然因其法的簡便，故在清末介紹到我國後，就為我國圖書館從事分類編目者所注意研究，欲修訂增補其法，以求適合部次我國的新舊圖書。一直到民國七年沈祖榮、胡慶生二氏合編的仿杜威書目十類法出版，杜法才正式的應用到我國圖書的分類。自是以後，接踵而編製的很多，比較重要的有杜定友、查修、桂質伯、洪有豐、王雲五、裘開明、何日章、皮高品、賴永祥諸氏所編的分類法，為各圖書館分別採用。他們的分類或者是完全遵照杜威的成法，僅在杜法的空位及中間，或在杜法類號前面增加符號以安插中國書的類目，如查修、桂質伯、王雲五諸氏所編的分類法是，其目的在求西文及中文新舊圖書統一分類。其次為仿杜威十分十進的方法，但就杜氏的部類而有所分合變更，或者改易其先後次序；但也有少數幾家雖仿杜氏的數序法，而不全採用十分十進的。綜各家的分類雖分合詳略有異，大抵是沿襲杜氏所作的學術分類，而將四庫的類目打散，斟酌其性質，分別隸次杜法各部之下，以圖部次我國新舊的圖書。

我國是一文明的古國，歷史悠久，學術文化獨創一格，與歐美各國異；前人著作的體裁，也

與之有所不同。是故杜威所作的分類能夠總括歐美的學術，能夠部次我國現代的著作，但拿來部次我國的舊籍，則還有些扞格不入。因為我國舊籍的內容性質往往含混，很難辨別應歸入杜法的那一學科。還有的書，每一部裏面，往往含有新分類法中四五種門目以上，不知道應歸那一類才合適。是故杜威法為我國採用以來，已屆五十年，增補修訂者紛紛，迄今仍無統一之勢。除了若干小規模的圖書館，及藏舊籍甚少的圖書館，僅採用一種新分類法外，其規模較大，所藏書籍較多的圖書館，大都採用新舊併行制，或仍沿用舊的四部法。如中法、交通、南開、華西協合四大學，及浙江、河南兩省立圖書館的藏書用四庫法及增補杜威法分別編目。四川大學兼用四庫及杜定友法，湖北省立圖書館及無錫國學專修科則兼用四庫及王雲五法。其他如北大、清華、武大、四川省中山圖書館、北平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以及江西省立圖書館所藏的線裝舊籍，仍沿用四部法。尚有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的書目且改良四部的類目，以部次所藏的新舊圖書雜誌。民國九年北大圖書館整理藏書編目，當時司其事的即想用新的分類法來部次，經過多月的嘗試，最後歸於失敗，沒奈何，只有仍舊屈服於四庫的權威之下（見圖書館學季刊一卷三期，對于中文舊書分類的感想一文）。以倡中外圖書統一分類制的杜定友氏，他在民國廿二年主持的交通大學圖書館藏書編目，仍採新舊併行制。此無他，杜威所作的學術分類並不能完全概括我國的古今典籍。蓋我

國的典籍中，有的固可以合於現代的知識分野，有的則難以合乎現代的分類。其難以合乎現代分類的，茲姑就筆者思慮所及，提出幾類，試加研討：

六經是我國學術的源泉，故自劉歆七略首列六藝為一略。後世編目錄的，雖部類多寡或異，但無不以經列為首部。自西洋學術輸入後，往日不成問題的經部，至是也發生了問題。因各家主張的不同，遂有應折開部次及不應折開部次兩派，衆說紛紛，莫衷一是。主張經部應折開部次的，當以民國八年陳乃乾所編的南洋中學書目為最早。陳氏以尚書紀言，春秋記事為歷史之書，毛詩是韻文，論語孟子則與老莊管墨商韓諸子書相等。所以他編的書目以尚書、春秋隸於周秦漢古籍部的歷史類，三禮隸於禮制類，易為易類，論孟、孝經隸於諸子類儒家，詩經隸於詩文類。此雖將六經折開，但還同在一部之中。繼其說的有民國十七年王雲五先生增補杜威法而編的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其緒論云：

如經部之書本是一部古史，詩本文學，春秋也是歷史，三禮等書是社會科學，論孟是哲學。若嚴格按性質分，當然不能歸入一類。

所以他的分類法中，把易、孝經、四書列入哲學類，三禮入社會科學類，樂律類的書入美術類，詩經入文學類，書經與春秋入史地類。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嚴靈峰先生在新生報的星期專論上討論

中國圖書目錄分類問題，也作相類似的主張。他將我國圖書分為子、史、文、字、類、集六部，而擬將易、禮記、論孟入子部，周禮、儀禮、書、春秋入史部，詩經入文部。主張經部不應拆開部次的，當以洪有豐氏為首。洪氏在他所著的圖書館組織與管理一書第十二章中云：

攷易、書、詩、禮、樂、春秋六經之名，其源甚古。然依其性質，易義玄秘，賅儒道之學兼通，於禪理卜筮特其小用，應入哲學類。書述唐虞三代之政事，實古代之史。春秋、魯史記之別名，應入史類。詩為古代輶軒，所采里巷歌謠與朝廟樂章，為詩學之祖，應入文學類。禮以載古之禮制，應入社會科學類。古之樂經，今佚其篇。後世音樂之書，可入藝術類。經部之根本要籍，旣可以科學之方法，分隸各類，其他便可依其性質而分，無獨立一部之必要矣。但尚有可以參酌而未必遽無存在之理由者。中國學術以儒教為中心，儒教以經學為根據。五經（樂經己亡故不列）之名，其源旣古，而三禮三傳之名九經，又益以四書、孝經、爾雅名十三經，皆幾為一般學者所公認。揚子曰：『天地為萬物郭，五經為衆說郭』。故就其類似之點而觀之，經部與各類雖可強為分裂。而就其特殊之點而觀之，經學實羣言之奧區，而才思之神皋也。周秦諸子而後，義理攷據漢宋之爭，實為中國學術之兩大派別，而皆原本於經。故經部著述，任舉一類之書，其訓文釋義者，汗牛充棟，至少無慮數百種，固自有

特成一類之需要。今以附庸於他類，削足適履，毋乃不倫歟？夫一國之所以存立者，實賴文化以維繫之。經籍者，吾國文化之源泉也。獨標一部，以保存吾國固有之精神，是或一道也。

洪氏結尾雖說經部折開與不折開，究竟孰為妥切，尚有待研究。但他在十三年所主編的東南大學孟芳圖書館書目，卽以經為一部。他在自序中說：

今日中國各圖書館於編製中文書目有新舊之聚訟，莫衷一是。經史子集四部之舊分類法，於近日科學圖書日益增加，誠有未能應用之處。然為之改絃更張，以科學分類法自詡者，襲搴西制，支離繁瑣，強客觀之書籍，以從主觀之臆說，恐亦未免有削足適履之嫌。

故洪氏分類雖仿杜，而不全遵杜。他以經部獨立為類之說，為後來裘開明、陳子彝、桂質伯諸氏所做行。裘氏的哈佛大學中國圖書分類法，陳氏的中央大學區立蘇州圖書館圖書分類法，桂氏的分類大全，都以經獨立為部。裘氏的分類法，現今美國各大圖書館尚多採用，以編所藏的中國書。除了上述兩派外，尚有一派調和派，如沈祖榮、何日章、皮高品、查修、杜定友、賴永祥等家的分類法，對於經部，既不折開，但也不獨立為部，而將之附列入總類之下為一小類。關於這一個問題，試從各方面來討論。一國有一國的文化背景，所以一國有一國的學術特色，為求適合總

括其圖書，因之一國有一國的分類法，固不必完全捨己以從人，此所以世界各國的圖書分類尚無法趨於統一。歐洲國家是基督教文化所孕育成的，所以他們的分類往往以神學居首類，並不把聖經當作哲學或歷史書來看待。我國的經籍，無可置疑的，是我國文化的源泉。六經、九經之名，兩千年前就已有了，十三經之名，雖起得較晚，自南宋以來也有八九百年的歷史，早成為家喻戶曉。歷代的著作，多以十三經為中心，近代且為世界各國愛好我國文化者研究。是經學不僅為我國學術的中心，跟神學一樣，也是世界學術的一端。將經學立為一部，並不悖於現代學術的分類。至於將經學附於總類之下，筆者認為這種調和辦法，最不妥切。杜威的總類，是為安置不能隸屬某類學科而設立的，很有點像四部分類的子部，尤其像子部的雜家類。如果我們承認經學是我國特有的學術，就應獨立成類；若果不承認的話，那還不如乾脆折散各按其性質歸類。把經學放在總類之下與類書、目錄並列，其不倫不類，猶之如四庫把叢書放在雜家類中一樣。把經部書折散分類，除了在理論上有商榷的餘地外，還有一個實際的問題，那就是如何的把舊法經部的各書，都有適當的歸類。這一個困難，我相信凡是作過實際編目工作的人，都會有這個感覺。經部的書假如僅只有易書詩禮春秋等十三部經，那就好辦了，各按其內容性質分別歸類，可以說沒有什麼困難。但是還有那些數以千計的訓解注釋十三經的書怎麼辦？你隨着原來的經書分類吧，但發

揮經義的書的內容性質，並不一定與原經一樣，放在一起，那就違背了分類的定義。譬如春秋是史，左傳是史，公羊、穀梁說是史書也還說得過去。但是春秋繁露、春秋尊王發微等等，你決不能說它是歷史書。三禮是社會科學書，但是月令解、檀弓記、儒行集傳等書，相信任何一個編目的人，都不會把它們分到社會科學類去。假若各隨其內容來分類，解經的書就不一定與原經放在一類，想研究各經的人，除了乞靈於各種索引外，是沒有辦法根據書目來查書的。即令這些問題都解決了，還有那些五經總義類的書怎樣辦？你既不承認有經學，總不好意思在總類裏面安上一個經總義的類名吧！經部的分合是研究我國圖書分類的人所應當深思熟慮的問題。不分開固佳，但必須獨立成為一部，才能顯現這門學問的特色。分開也未嘗不可，但必須對所牽扯到的各項問題，先要作週詳的考慮安排。不是在各門學科中設個小類類名就算數，那樣只有徒增加編目工作人員的困惑。

金石之學也是我國專門學術之一，為世界其他國家所沒有的。我國石刻之興，遠在先秦，石鼓文是存世最早的刻石。秦漢以降，風氣漸盛。有把經典刻在石上的，如漢魏唐宋歷朝石刻的儒家經典，唐代所刻的道家經典。佛家刻石更多，有圖像、有經幢、有摩崖、有經碑。河北房山縣西域寺所貯自隋迄元刊刻的經碑，其數逾七千塊，是尚未完成的石刻大藏經。此外還有自秦以來歷

朝歷代紀功之銘，諛墓之碑。我國自蕭梁時代才知道用紙在石刻上以墨摹拓文字的方法，唐代且有專門為拓取文字而刻石的。鐘鼎彝器本是古代的禮器及食用的器具，自宋以來陸續出土的很多。因為古代鑄器的人往往在器物上鑄刻有文字以紀其事，成為後人研究的對象。宋代以後金石的研究成了一種專門的學問，著作的很多。有摹印器形圖象的，有訓釋文字的，有考述源流的，有編纂目錄的，有輾轉摹刻名家法書以充法帖的，種類繁多。以前的書目，部次這一類的著作，頗費斟酌，隋書經籍志附於經部小學，新舊唐書藝文志從之；宋史藝文志附入史部目錄，文獻通考經籍考從之；明陳第世善堂書目及清錢謙益絳雲樓書目則列入集部；四庫的分類，則以訓釋文字的入小學，摹印圖象的入子部譜錄，法帖入藝術，編目的入史部目錄，分別部次。按這種金石學，自成一個系統，核其內容，可以證經，可以資史，如唐宋以來的墓誌銘文，多出名家撰述，且為文學的作品。分之固不妥當，合之也無部可歸。故鄭樵於藝文略外，別撰金石略以志這類著作。清孫星衍祠堂書目及繆荃孫藝風藏書記均立為一部，以與經史分庭抗禮。近代的十進分類法把金石書與甲骨、簡牘、封泥、瓦當等合為古物學一門，附入史地類，這是沿襲自江蘇國學圖書館書目，而國學圖書館書目放在史部，則承自書目答問。把金石與甲骨等合為古物學，確比以前的辦法好。但列在史地，筆者認為還有值得商榷的餘地。金石所涉及的範圍甚廣，不能專指為史，

所以當張之洞書目答問出版後，有一位名叫江人度者即上書張氏，見他「置之乙帙，嫌其氾濫」。把金石古物放在史地類，筆者認為還不如放在總類，似乎要恰當些。若能仿祠堂書目自成一類，那更妥當了。此金石書的部次問題，是研究我國圖書分類者所當考慮的第二點。

宋鄭樵嘗說：「古今編書所不能分者五：一曰傳記，二曰雜家，三曰小說，四曰雜史，五曰故事。凡此五類之書，足相紊亂」（校讎略編次之訛論篇）。我國自先秦以來，有小說家一流，源出於稗官，是記載得之街談巷語，道聽塗說的。魏晉以後，衍為筆記一體，或記軍國大政，或述時事見聞，或者是讀書時偶有心得，而發揮自己的意見，或者是考訂俗習的譌誤。大抵隨意錄載，無所翦裁。雖則是所記述的或多或寡，或詳或略，大體各類都具有。所以前人類次，頗多相混。四庫全書總目也云：「案記錄雜事之書，小說與雜史最易相淆。諸家著錄，亦往往牽混」（子部雜家類雜說案語）。案四庫著錄的體例，以記述朝政及軍國大事的入雜史，其參以里巷閭談詞章細故的入小說筆記。然看四庫所著錄的情形，他也難得劃分清晰。譬如史部雜史類著錄的元劉一清錢塘遺事一書。此書乃雜記南宋一代的事，大抵雜采宋人說部書而成，並不悉關軍國大政。其中所採羅大經鶴林玉露為多，而鶴林玉露，四庫則著錄在子部雜家雜說。又如明葉子奇草木子多記元末明初的事，陶宗儀輟耕錄多記元代的大政，兩書的體裁內容多相類似，都是治史的人

所必取資的，而四庫以前者入雜家雜說，後者入小說筆記。像這一類的例子很多，四庫分類對於這種圖書已多部次未當，近代的十進分類亦沿襲之，大抵以雜史入史地類，雜說入總類的普通論叢，小說筆記列在語文類的小說，由四庫的兩部衍成分隸於三類。這在前人已感到部次不易的書，我相信現代從事編目的人一樣的也會感到困難。而且小說一詞的意義，古代與現代不同；普通論叢一辭更難顯示雜說的特性，其未妥尤甚於四庫。筆者認為這一類的書自學術源流來講，都是從稗官小說衍分的；從書的性質內容來看，雖詳略不同，大體相近似，曷不合為一部，或許容易部次查檢些。這種說部書的類次問題是研究我國圖書分類所當予以考慮的第三點。

我國陰陽五行、蓍龜、占候之術，本為易學的支流，是古代史官所職掌的。這類術技推五行休咎，生尅制化，以究造化之源，以徵人事的得失。雖然後世傳以雜說，流入妖妄，衍為術士之技，然自劉歆七略已專置一略，隋志以來的四部書目也都有專類來部次之。而古人用兵行軍，亦莫不依據以行事。固然近世通行的僅有相卜堪輿，而這門學問的古籍現在存世的很有不少。察其內容，雖然不能合乎科學的標準，但仍有它的一套理論，與符咒巫術不能相提並觀，決不能說是宗教或迷信。近代的十進分類法，或者是在宗教類闢術數迷信一門，或者並其門類而無之。無其門類的，不知何以安置這類書；就是用宗教迷信來概括的，也感到名實未符。這是研究我國圖書

分類所當予以考慮的第四點。

中外學術發展的路徑不同，古今著作的體裁也各異，拿百孔千瘡的四部舊法來部次新書，固然是格格不入；以十進新法想網羅古今，又豈能契合無間？是以雖杜威法傳入我國多年，國人倣效編製我國圖書分類表者紛紛，而一般的大圖書館仍多採用併行制，將新舊典籍分別來編目。但新舊的區別，也很難釐定一個標準來劃分。無論是從著作的時代、出版的年代，或裝訂的式樣，都無法訂出我們理想中的新舊來。所以新舊併行制，僅是過渡混亂時期權宜之計，不足以為準則。而且二三十年前翻印古籍的，究為不多。影印古籍的，尚多用中式線裝，與西式裝訂的新著作異架度置，分別編目，對於藏檢管理，困難還不太大。近年的影印古籍，則皆用西式裝訂，則無法與新書分置。而古籍翻印的範圍，日漸拓展，幾乎無類無之，古今的典籍最終將賴印刷的傳佈，而趨於混一，以新分類法編目的，勢必將遭遇日漸增加的困難。我國圖書的分類，囿於四部法達千餘年，方幸脫其窠臼，又復拘於西法十進。四部法以子部為無可類歸圖書的淵藪，其未盡合理處，正與十進分類以總類為淵藪等。然四部雖不合理的地方很多，因為定於一統，熟諳它的分類以後，任檢各家書目覓書，還無若何困難。而新法因各家異制，讀者反滋困惑，須靠索引以濟其窮。因之編製一部能夠網羅古今圖書，分類合理而類目清晰的新分類法，可以供各級圖書館採

用，實在是有迫切的必要。像嚴靈峰先生所提改革專屬舊籍分類的擬議，並不符合時代的要求。

師杜仿杜十進分類法的優點也很多，譬如把目錄與類書、叢書放在總類，非常妥切，就解決了我國幾百年來目錄學者討論不休的問題。它的缺點在太牽就現代科學的劃分，而忽略了我國固有學術的特性。把經學打開或放在總類，固然不妥，把三民主義放在總類，在我國說來，又何嘗適宜。其所以致此者，在杜法太重視十這個成數。姑不論我國，就以歐美而言，現在的學術未必如杜氏所分的僅有九類。再者學術以大包小，每一類所包含的部門，未必就恰好是十項。仿杜分類者為了遷就十這個數字，於是在類目方面就免不了拼拼湊湊。因之有將哲學宗教併為一類的，有將歷史地理併成一類的，有將語言文學併為一類的。並不是說這兩種不夠資格獨立，非得合在一起才能稱得上是一門學術，無非是為了湊成十這個成數而已。所以近五十年來研究分類的學者，感到義有未安，紛紛改來改去，但始終兜不出十這個圈子。這種情形，正與自宋以來的目錄學者，改來改去，始終脫不了四部的圈子相彷彿。因之筆者認為要編訂出一部合理的分類法，首先一定要解除十的束縛，才有施展的餘地。換句話說，類目要視實際的情形來釐定，不要拿客觀的書籍，來就主觀的數字。當然這牽扯到數序問題，號碼對於編目與典藏取檢很有用處，不能去掉。不過這個問題並不難解決，可以參照美國國會圖書館或歐美其他家的分類法，類碼方面甚至可以

用地支或者仿明文淵閣書目用千字文的順序，來替代英文字母。其次要將我國現存的古籍，通盤加以考慮，製定其類目，僅依據四庫的類目是不夠的。因為四庫著錄書有選擇性，它的類目，且不說不能總括乾隆以後的著作，就是乾隆以前的古籍也有找不到適當的地位的。關於這種問題要先明瞭我國古籍現存的究有若干？其書的性質如何？其合於現代知識分野的有那些類？其不合於現代知識分野的又有那些類？然後製訂其類別，詳為分析？不能用現代學科概括的，其類目名可以從前人的目錄中選擇或推敲改訂。如不先通盤考慮的話，遇到有些古籍翻印出來，編目的人往往會感到左支右絀，無所適從了。第三、新的統一分類的類名須要清晰，易知易曉，一定要能概括其下的門目，切忌含混籠統。因為讀者查書必定從類以求目，即目以找他所需要的書的。如果類目名不明確，讀者往往畏難，非得仰仗於索引了。

筆者不是研究現代圖書分類的，只是多年來從事編目工作，常常翻檢各家的書目而有所感觸。承本刊編者給我一個機會，因此不揣愚陋，把我縈迴腦際的想法提出來，獻曝於方家之前。也藉此拋磚引玉，希望同道們把你們的經驗及所遭遇的困難發抒出來，共同切磋研討。分類、的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三四十年前，著文討論的，不知凡幾。民國十七年中華圖書館協會曾有分類委員會的設置，集合專家來研究，雖然做了不少修壁補漏的工作，但也未見有何特殊的成就，可

微其事的不易。然一項事業的創立，不是一蹴可蹴的。如果大家認為一個合理的、統一的分類法，能夠為全國各級圖書館應用，有編製需要的話。只要具有信心，我相信在全國同道共同研究討論下，終必有達成的一天。

關於北平圖書館寄存美國的善本書

北平圖書館於抗戰期中寄存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善本書一百零二箱，於五十四年的冬天由美國交還我國政府，運回臺灣來，迄今已整整四年了。這批善本書在運回後經過有關的機關會同點驗後，由教育部撥交中央圖書館代為保管，並由中央圖書館於翌年的春天舉辦了一次公開展覽，將此二千多種善本，每種各展示一册，以公諸社會。接着中央圖書館又花了半年多的時間將之整理考訂編目，載入中央圖書館的善本書目增訂本中，以供各界借閱研究。五十七年冬，中央圖書館接受美國東亞圖書館界同仁的建議，將自美運返的北平圖書館善本編印單行本目錄，附載這批書在寄存美國期中所攝照顯微影片的膠捲編號，及書名、著者索引，以便利收藏該批書微捲的圖書館查檢。筆者從該批書的點驗、展覽、以迄整理考編，皆曾參與其事。也參閱了若干有關北平圖書館善本的文獻及書目，故所知略多。今當中央圖書館代保管的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即將出版之際，筆者認為有責任將所發現的事實向社會公佈。

首先筆者需要聲明的是：北平圖書館當年運到美國去寄存的，也就是現在中央圖書館所保管

的善本並不是該館所藏精品的全部。其次要告訴社會大衆的是，那些未運出的精品，還有大部分分至今仍下落不明，筆者相信這是我國學術界所關心的問題。在說明這個問題之先，容筆者把北平圖書館所藏善本、及其南遷、運美、運回、與點驗等經過情形作一簡單的敍述。北平圖書館所藏的善本書是以京師圖書館舊藏為基礎，加上該館成立後陸續增購的善本。京師圖書館是清末整理內閣大庫發現一批藏書後，由當時大學士管學部張之洞奏請設立的，又由兩江總督端方釆進了一批南陵徐氏積學齋、歸安姚氏咫進齋、海虞瞿氏鐵琴銅劍樓等所散出的珍槧舊鈔。內閣大庫所貯的，是明文淵閣的孑遺，而文淵閣的藏書又是襲自宋元秘閣，雖然因為歷代典藏的不善，損失的很多，壓存的宋元本也大多殘缺不完。但因為儲之秘閣，罕有人翻閱，故觸手若新，書品絕佳，而且頗多孤本秘笈，為世寶重。北平圖書館所藏甲庫的善本，曾編為書目，於民國廿二年刊行。在這部書目中，共著錄了三千七百九十六部，凡七萬八千一百九十九卷。這僅是平館所藏的甲庫善本部分，別儲的文津閣四庫全書、敦煌寫經、以及乙庫中的善本尚未入目。九一八瀋陽事變發生後，華北局勢動盪不安，政府顧及北平所貯國家文物的安全，下令南遷。北平圖書館將甲庫善本及普通庫中選出的珍本共五千餘種、六萬多册，與敦煌寫經、輿圖、金石拓片、珍貴的西文書籍等，於民國廿三年繼故宮博物院之後，南遷上海，存放於公共租界倉庫。及抗戰爆發，上海

淪陷，歐戰繼起，公共租界也不安全，平館善本乃又遷貯法租界的震旦大學內，因當時日本與法國維琪政府還維持邦交。但國際局勢瞬息萬變，租界終岌岌不安，所以當時北平圖書館袁同禮館長，委託我駐美大使胡適之博士，與美方洽妥，於民國三十年將存滬的善本選提了二千九百多種二萬餘册，分裝了一百〇二箱，分批船運美國，寄存國會圖書館內，俟戰事結束後，再物歸原主。這一百〇二箱善本書於卅一年初全部運達美國。在雙方協議下，由國會圖書館將寄存的善本書除了極少數外，都攝製成顯微膠捲，共一千〇六十三捲，除贈送我國國立中央、北平兩圖書館及中央研究院正片各一份外，負片由該館保管，以備世界各國圖書館購藏正片拷貝之用。而寄存的善本書箱則由平館職員王重民君及袁同禮館長相繼負典藏之責。卅四年抗戰勝利後，此批寄存的善本書已洽妥運回，終因大陸局勢不安，而寢其議。

五十四年二月，袁同禮先生在美病故，平館寄存的善本無人掌管，現任故宮博物院院長蔣慰堂先生，那時尚在中央圖書館館長任內，恐怕那批善本因乏專人典守，而有散失之虞，乃呈文教育部請予索回，經教部核准，透過外交部與美國國務院接洽，很快的獲得了國會圖書館的同意，即於當年的十一月與寄存美國的西北科學考察團所發掘的居延漢簡一併委託美國軍艦運返臺灣。教育部為昭鄭重計，在善本運達後，邀請了立法院、監察院、中央研究院、經濟部各派代表（尚

清外交部雖也曾邀請，惟未派代表參加），會同教育部及中央圖書館予以開箱點驗。點驗後除造冊呈行政院核備外，由教部委交中央圖書館保管，俟大陸光復後再歸還原館。

點驗工作是從五十五年元月五日開始，每日視其繁簡點驗三箱至十箱不等，迄當月十九日結束。其程序是俟點驗人員到齊後察看我駐美大使館所加封條無損後，再啓封開箱，木箱內又有馬口鐵皮套箱，箱口均用錫銲接密封，保存得相當好。點驗是依據我駐美大使館複印的民國三十年三月北平圖書館所造具的裝箱清册來核對箱內現有圖書。該館所造具的裝箱清册只有一百箱的書目，而運存美國及運回臺灣的實際有一百〇二箱。這溢出的二箱，則沒有裝箱書目。大抵或因為在美時曾攝製微片及保管人員檢查過，曾經過多次開箱，所以每箱貯放的圖書，與裝箱清册閒有參差。或者是目載甲箱，而書實放置在乙箱；或者是丙箱所短缺的卷册，正是丁箱所多出的。這類情形，不一而足。然而這種情形，僅是屬於裝箱放置的錯誤，並不是不符。至於書與目不相符合的情形有三類，一是有書而裝箱目錄中未列載，二是實際册數或卷數與裝箱目不符，三是裝箱清册中已列載而書不見。有書而清册未載的，共計五十九種三百九十七册，這是因為運出的善本比原造裝箱清册多出二箱，這溢出的兩箱，當日未列目的緣故。册數不符的有十六種，或是較原册多出，或者是短少，然因其書的卷數並無殘缺，大抵是造册時記載的錯誤。只有活字木太平御

覽缺最後一函十册，明萬曆刻本闕書缺首尾各一册，裝箱清册中有保管人員加註「遺失」字樣，這兩種所少册數應當是運存美國後缺失的。至於目有而書無的共計十一種四十九册，內凡金版一種一册，元版一種三册，餘則爲明版及抄本。這十一種中除抄本兩宋名賢小集一種，因當年曾攝製微片，可以確定係運到美國後所遺失；及元版兩漢詔令在民國三十一年已從上海運回北平，可以確定未裝箱運美外，其餘九種則不知究係當日未裝箱運出？抑運抵美國後再遺失？現在把這十一種書目列後，以備查考：

邇言十六卷二册　明萬曆刻本

崇慶新雕改併五音集韻存三卷一册　金刻本

西漢詔令存八卷三册　元刊本　此書見載於三十二年北平圖書館自滬上運回北平分類清册，惟作二册

錦里耆舊傳四卷二册　抄本

輿地廣記三十八卷二册　抄本　以上兩種均有黃蕘圃批校

萬曆杭州府志一百卷二十册　明萬曆刊本

釋藥集韻存一卷一册　明嘉靖刊本

太史曆漸山文集四卷四册　明萬曆刊本

王椒園先生集四卷四册　明萬曆刊本

鄧定宇先生文集四卷四册　明刊本

兩宋名賢小集存四十三卷六册　抄本　此書美國會圖書館曾攝照微捲，其順序號及膠捲號為 1686 FRNo. 737 (1~503)

前面已提到過，平館善本在運存美國後不久，在雙方的協議下，曾攝製了一套顯微膠片一千〇六十三捲。一九五九年日本東洋文庫曾把這套微片膠捲，依其順序編寫成為書目，名曰「擬備中國書目」。平館運美的善本並未全部攝製微片，其中尚有少數未曾攝製的。這有幾種可能的情形：一是美國方面藏有其本，勿庸攝照平館藏本；二是平館運美善本中有若干複本，不需要攝照；三是攝照時可能是有所遺漏。這些曾運美但未攝照微片的書，從即將出版的中央圖書館保管平館善本書目中可以看出來。但可以確定的一點，是凡已攝照微片的，應該是曾經運到美國去過的圖書。然而經過我們拿微捲書目來核對的結果，有二十四種一百二十六册善本，曾攝製微片，但裝箱清册及運回善本均無，這些也應當是運存美國後才遺失的，至於何時或如何遺失，則不得而詳，所幸其中並沒有什麼太多較珍貴的書。現在我也把書目開列在後面，並註明書目順序及微捲

編號：

唐書存八十八卷十五册　元大德間建康路刊本361 FRNo. 196 (735~1684) 197 (1~1613)

唐書存十五卷四册　元大德間建康路刊本362 FRNo. 198 (1~511)

正史韻姓三十卷三十册　明抄本525 FRNo. 279 (1~1152), 280 (1~1179), 281 (1~354)

隋書存五卷一册　宋刊元印本1009 FRNo. 471 (829~907)

隋書存八卷二册　宋刊元印本1010 FRNo. 471 (908~1016)

隋書存二十五卷七册　宋刊本1011 FRNo. 471 (1017~1108), 472 (1~252)

秋泉先生遺稿一卷一册　明楊鑑撰　抄本1845a FRNo. 823 (1017~1067)

說文部目一卷一册　清胡澍撰　稿本1845b FRNo. 823 (1068~1113)

繩其武齋自纂年譜一卷一册　清黃贊湯撰　抄本1845c FRNo. 823 (1114~1171)

壹齋詩文集六卷三册　清黃鉞撰　稿本1845d FRNo. 823 (1172~1282)

編註本草騈文便讀十卷十六册　清華壎撰　稿本1845e FRNo. 824 (1~778)

汲古閣北史校記不分卷八册　不著撰人　稿本1845f FRNo. 824 (779~1114)

銀洋珠寶譜不分卷一册　不著撰人　抄本1845g FRNo. 825 (1~85)

玉器皮貨譜不分卷一册　不詳撰人　抄本1845h FRNo. 825 (89~162)

貿易須知輯要二卷一册　不詳撰人　抄本1845i FRNo. 825 (163~203)

興業須知錄一卷一册　不詳撰人　抄本1845j FRNo. 825 (204~259)

珠譜不分卷一册　清眉山氏撰　抄本1845k FRNo. 825 (260~342)

川匯奏稟二卷二册　不著編人　抄本1845l FRNo. 825 (1~128)

遵西齋尺牘二卷二册　清王蘇霓撰　抄本1845m FRNo. 825 (129~274)　以上二種微捲號疑有誤

新修成都府志五十八卷二十四册　明馮任修　張世雍等纂　明天啓刊本2000 FRNo. 905 (201~1051), 906 (1~975)

古樂府二卷一册　明李先芳撰　明嘉靖刊本2618 FRNo. 1055 (591~651)

梅屋詩餘一卷一册　宋許棐撰　抄本2702 FRNo. 1063 (56~61)

梅詞一卷一册　宋朱雍撰　抄本2703 FRNo. 1063 (63~70)

五峯詞一卷一册　元李孝光撰　抄本2704 FRNo。1063 (72~81)

我與北平圖書館寄存美國的善本發生接觸，始於民國五十四年。雖則在三十七年美國國會圖書館曾贈送了中央圖書館一套平館善本微片，但沒有運到臺灣來，在南京時因忙於館藏善本的考編，也沒有時間去閱覽。五十四年的春天蔣慰堂先生交給我一本從中央研究院傳抄來的日本東洋文庫所編微片目錄，命我查閱內中所收書的情形。因為這本目錄只是依微捲的順序編錄，而不是分類書目，所以倉卒間對平館運美善本還無法獲得一個全面的了解，只是感覺到其中有若干的宋元版，及好些中央圖書館所未藏的典籍。及善本書運回臺北清點時，那時中央圖書館的善本書尚存放臺中書庫，筆者因負有典藏重責，不能久離，故點驗工作未能始終其事，僅只參加了開始的兩天。雖只有兩天，因為是目睹，對平館的善本才多了一層印象。當這批書整理考編時，係由筆者主持，每一部書都經過寓目，才有全盤的了解。在全部考編整理竣事後，筆者發現了一件令人感到奇怪的事實，怎麼北平圖書館所藏的幾部鎮庫之寶，如北宋本文苑英華、南宋版歐陽文忠集、春秋左傳等沒有見到？這幾部都是內閣大庫的書，宋代秘閣舊藏，還保存著宋代原裝舊式。筆者早年在圖書館學季刊一卷二期，讀馬叔平先生「中國書籍制度的研究」一文，曾看見過這幾部書的照片，故印象特別深刻，此數書在民國廿二年平館善目中也有著錄。另外蔣慰堂先生想看平

館所藏的宋版李太白文集，在運回臺灣的善本中，也沒有發現。宋版李太白集是清康熙間繆曰芑繙刻的祖本，除了日本靜嘉堂藏有一部外，平館所藏是國內僅存的一部。因之筆者又仔細的查閱原造裝箱清冊、清點的底冊、以及微片目錄，都沒有找到這幾種書的踪迹，可以確定當年並沒有運到美國去。依照常情來判斷，假若為了安全的緣故，選取携運的物件，毫無可疑應當是先檢最貴重的。是什麼理由當日北平圖書館主持選書裝箱的人，把這幾部該館最珍貴的孤本秘笈給遺漏了？就因為心中有了這個疑問，於是筆者借到了一部民國廿二年平館所編印的善本書目來作全面的核對。這一核對的結果，使筆者深深欽佩當日負責選書的人對版本目錄學造詣之高，不僅把若干珍貴的宋元版給留下了，好些稀珍的明版、舊鈔及名家批校題跋的書，也沒有讓它運出來。除了前面擧出的幾種而外，其他如宋版朱震漢上周易集傳、張洽春秋集註、司馬溫公通鑑、朱熹十朝名臣言行錄、岳珂桯史、眉山新編十七史策要，金版尚書註疏，元版保八周易繫辭述、熊良輔周易本義集成、李燾續資治通鑑、戰國策校註，明版李廉春秋諸傳會通、寰宇通衢、聽雪蓬詩集、誠齋雜劇、宋抄本仙源類稿、宗藩慶系錄等等，都是僅存或傳世極罕的孤本秘笈。再如平館所藏清黃蕘圃批校的書共有四十四種，就有二十五種未運出來。固然精品也有漏網運出的，但在份量上或比例上都不及留下的重與多。當然我們也不能一定說沒有這種可能，當年主持其事的人，

僅是隨便挑選，沒有留意，而把若干珍貴的圖書給選漏了。但是在我細察他們對善本選留的情形以後，不得不把這個假設推翻。茲隨便舉出幾個例子來說明：譬如宋相臺岳氏刊本周禮（此本據今人的考證，實刻於元代），平館藏有兩部殘帙，一本五卷，一本僅存一卷，運出的是一卷殘本，而把五卷殘本留下了。如宋版樂書（此本實為元刻），運出的是三部殘本，却把二百卷的足本留下了。其他如宋版後漢書、魏書、唐書、大唐西域記、蘇文忠公集、皇朝文鑑、文選、元版資治通鑑、金陵新志、故唐律義疏、大學衍義、黃氏日抄等等都是這種情形，留卷數多的本子，而選運少的。假若同一書而版本不同的，則儘可能留下好的本子，如後村居士集、聖濟總錄二書，運出的是抄本，而把宋版或元版留下來。如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一書，平館藏有三部抄本，他們留下了鮑廷博及吳翌鳳兩位名家的抄校本，運出的只是一部萃古齋抄本，這一類的例子也很多。假如某書只有一部，而為精品的話，往往被留下。譬如傳記類譜牒把兩種宋代抄本留下，登科錄中僅把黃蕘圃校跋的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留下，這種例子多得更不勝枚舉。你能說這是無意的漏選嗎？當然也有的確留下來的是比較差的本子或卷帙較少的殘本，但在比例上佔的很小。這決不是倉促間無意的疏忽，何況平館善本運存美國是預為之計，非倉促搶運可比。後來讀到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錢存訓先生所寫的，刊載於傳記文學十卷二期「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籍運美經

過」一文，才知道當年在滬上主持選運的人，是袁同禮館長及徐森玉先生，並由王君重民協助。徐先生是前輩版本專家，袁館長及王君也都深通版本目錄，那就無怪乎選留之精了。

平館甲庫所藏善本根據民國廿二年該館所編印的目錄，共計三七九六種。運存美國的合裝稱書目所載二八八三種、及實已運出而目未載的八十三種，總共二九六六種，則留下未運出的甲庫善本共有八百三十種。當年負責選書諸公，假若果真抱有這種頑固的想法，像在清末皕宋樓藏善本售於日本岩崎氏靜嘉堂後，有少數國人所持「異域言歸，反不若臺城一炬」的觀點，不願意把精品運到海外去。卽令留下的善本，萬一不幸在日本軍閥的鐵蹄蹂躪下損燬了，他們固然因失職而難辭其咎，我們對他們的用心多少還能曲諒。其實寄存不過是暫時性的，將來還可以運回，與售讓域外不同，兩者無法比擬。所幸遺留在滬上的善本書並未遭受到不可抗力意外的損失，然而却有一部分的精品似乎在人為下失去了它們的下落。

據錢存訓先生「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籍運美經過」一文記載說，當平館善本全部運達美國消息傳抵上海時，當時華北敎育總署督辦周作人兼任北平圖書館館長，得訊後派秘書王古魯至滬查訪存書，「但在一處民房及科學社查到一部分中西文書籍，接着便分批運返北平。可是因為各書化整為零，王君僅知一部，還有存在他處的敦煌寫經以及其他多種未被發現。這樣上海的殘局，一

直維持到三十四年日本投降，才將殘留的善本，以及新購的圖書等集中移存到一所由政府接收分配的上海寶慶路十七號住宅，作為分館的辦事處」。民國卅一年運回北平的甲乙庫餘存善本及金石拓片與圖等，在翌年該館曾編印了一部分類清冊，此清冊、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有一部，承錢先生複印了一份寄給我。書首有傅增湘一序，據序文知運回北平的，凡中文書一百三十六箱，西文書一百四十二箱。中文書共計二千四百八十五部、三萬一千三百十四冊。平館未運往美國而遺留在上海的甲庫善本八百多種，照說應該是在這次運回北平去的。然而我們仔細核對這本分類清冊，只找到了二百八十多種，其中較重要的有宋版雷峯塔經咒、漢書殘本四部、文選、皇朝文鑑等，元版兩漢詔令、秋澗大全集、黃文獻公集、文章正宗等宋元版八十餘種，其餘為明版或抄本，黃蕘圃批校的書，只有書敘指南、湖山類稿、湖山外稿三種。另外還有五百多種善本既未運回北平，又到那裡去了呢？據錢先生的那篇文章記載，卅一年王古魯到上海去並沒有把平館殘存的圖書全部覓出運回北平，「還有存在他處的敦煌寫經及其他多種未被發現」。就我們所知未運回北平的重要圖書，除了敦煌寫經而外，尚有明清輿圖。至於殘留的究竟有無甲庫善本？有多少？因錢先生的文章以及近人均未記述，則不得而詳。不過從運返北平的甲庫善本看來，除了經部書一部都沒有以外，史子集三部的書各類都有。由這種情形來推測，只有經部的書當時可

能是單獨放置一處，未被發現，史子集三部的書照我們的經驗，應當是放置在一起的。尤其是平館善本的複本頗多，不可能同一書的幾部複本，而分別放置幾處地方。所以說那不明下落的五百多種，假若不是在上海被特別隱匿，那就是在運返北平後出了問題。五百多部至少有好幾千冊書，並且其中絕大多數是精品，假若果真留存在上海辦事處的話，三十八年中央政府撤離大陸時，相信一定會把它携運出來。平館留存的明清輿圖十八箱，當局尚未忘記運來臺灣，當然更不會把數量較多且更珍貴的善本精品讓它淪於匪手。因此筆者揣測那些善本不是在卅一年運返北平後失了踪迹，就是在上海時早已化整爲零了。筆者曾仔細核查了幾種匪區圖書館出版的善本書目，發現了三兩種似乎是失踪的平館善本。在民國四十八年（一九五九）出版的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著錄了一部明萬曆刻本湖廣總志，殘存卷三十八、卷四十二至四十五、卷五十、卷五十二至卷五十八，共存十三卷、又有一部萬曆刻本襄陽府志，殘存卷一至九，卷十一至五十一，共五十卷。這兩部書據凡例是該館在民國卅八年以前收購的。按平館失踪的善本中也有此二種書，湖廣總志殘存廿二卷，比京館收購的僅多出卷十九、廿三、廿四、卷六十至六十四、卷七十五共九卷，其餘十三殘卷與該本所殘全同。襄陽府志則平館原本殘存四十二卷，比此本僅少卷十一至十八凡八卷。又按民國四十六年（一九五七）出版的上海圖書館善本書目地理類中著錄了一部明萬曆刻本雲門

志略殘存卷一至三凡三卷，平館失踪的善本也有此書，殘存的卷數相同。兩目中還有其他可疑的書，因為是全帙，而同版本的書傳世的也不止一部，僅從簡目的著錄還無法看出它的特徵是否卽平館所佚，而這三種殘本則大有可疑，尤其是湖廣總志僅比平館舊藏本前面少三卷，後面少六卷，中間存卷全同。此書傳世極罕，而全書卷帙較鉅，凡九十八卷，罕有如此湊巧傳世的兩部殘本，殘存的情形一樣，故筆者推測必是將平館舊藏本留下前面的三卷、後面的六卷，而以中間的售出。這與北平圖書館鈐蓋收藏印章有關，平館的藏章往往僅蓋於首册之首葉及末册之末葉，有時蓋在護葉上，中間的各册俱未蓋印，若去其首尾二册或割去鈐有印章的護葉，卽無人能知其為平館的藏書，故改造極易。若果筆者揣測的不錯，則這些下落不明的善本，很可能已經有些化公為私了。

復次，平館從上海運美的書與裝箱清册不相符合，也有若干啓人疑竇的地方。平館造具裝箱清册是在卅年三月，而書箱交運是在十月以後，從實際交運較原清册多出二箱，箱中之書與清册亦不盡符，以及原已裝箱的元版兩漢詔令，後來又提出留下（此書見載於運回北平圖書分類清册）等情形看來，在裝箱後一定又重行開啓改動過。既已改動及增加箱件，而且時間也從容，何以不更正及增補清册？依照常情增選運出的書應裝入增加的一〇一及一〇二箱中，然而原裝箱目未

載而後增的書却有大部分共三十六種裝在第三十九及五十三兩箱中。這沒有目錄的三十六種書中，有宋版九種，元版七種及明清刻本若干。這幾種宋元版除了宋版文選是兩册，其餘都是一册殘本。然而平館所藏的這些宋元明版並不僅只是一册殘本。如宋刻大唐西域記，平館所藏十二册全，而運出只第九卷一册；如皇朝文鑑平館藏有六十五卷，而運出的只第卅二卷一册；如崇古文訣平館藏十七卷，而運出者只第一册序與目；如元版國朝文類平館藏有殘本廿二卷，而只運出第四七、四八兩卷一册；如明天順本大明一統志平館藏六十卷，而運出只第十一至十三卷一册；如正統本五倫書平館藏六十二卷全，而只運出第卅三卷一册；如明內府寫本承天大志平館藏有三卷，而只運出第卅六卷一册。此例尚多，無須縷數。一書之當放置一處，不使折散，雖幼兒亦知為之。以當日負責諸君之博通，竟有此等之事，誠令人百思不解其故。使得那些書大海睽隔，迄今二十餘年，猶不能珠聯璧合。還有裝箱清册所未列載而運回臺灣的書有清代殿本古文淵鑒、勸善金科、萬壽盛典初集、御製詞譜四種殘本，及清刊天問圖一册，這根本不是北平圖書館的甲庫善本，在平館善本書目中沒有著錄的，就是在現在也還不夠善本的標準，尤其是勸善金科一書上面僅鈐了「朱希祖」、「光竟先生獨志堂物」二印記，而沒有北平圖書館的藏章。不知道當年竟何以費那麼大的事，遠渡重洋，運到美國去保存？這也是叫筆者百思不解的疑問。因之筆者對現在運

回臺灣來的北平圖書館善本書，是否就是當年運到美國去寄存的全部？實深致懷疑。那失踪的五百多種善本，都是國寶，是我國的重要文化遺產，凡我國民都有權利想知道它們的下落。當年主持的人，袁同禮館長已經故世，而實際從事選書裝箱工作及在美典管的王君現在還在大陸，有責任把當年的實在情形作一報告。尤其為了你的清白，假若是清白的話，更應該表白，指出失踪善本的下落。筆者聞見狹陋，所知不廣，故希望凡清楚當年遺存上海善本情形的同胞們，把所知道的消息予以報導出來，作為這椿公案的文獻。更期望政府對那些失踪善本的重視，在光復大陸後予以調查追究，使能合浦珠還。筆者並附帶提醒海內外的圖書館一聲，希望你們在收購善本書時，請多加留意，不要輕易的購進贓物，尤其是美國的東亞圖書館界。因為根據筆者的聞見所及，過去卽有這類銷贓海外的先例，所以要特別請美國圖書館界同仁，予以審慎。關於那些失踪的善本，包括宋金元版八十餘部、宋鈔本二部、黃蕘圃批校本二十二部、明代方志百餘部、以及其他明版、稿抄批校本等書的書目，筆者將另為文披載，備作將來查考的一項記錄。

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闕書目

國立北平圖書館所藏的善本圖書，自民國二十三年以來，數歷播遷。初因華北局勢的動盪，奉令自北平悉數南遷上海。抗戰爆發後，為了安全，於三十年選了二千多部，分裝一百〇二箱，運到美國首都華盛頓國會圖書館去寄存。五十四年二月、北平圖書館前館長袁守和先生在美病故，這批寄存的善本缺人典管，因由我政府當局予以索回，於當年的冬天運返臺灣，委交中央圖書館代為保管。筆者以職務的關係，主持該批善本的整理編目與典藏，發覺運返的圖書與該館當年運美寄存時所造具的裝箱清冊，及在美所攝製的顯微膠捲書目，未能盡符。尤其令筆者驚訝的是：該館所藏的精品，有好多不在選提運美保存的書中。這種情形，實悖於情理，因而對其事發生懷疑。乃檢取廿二年平館所編印的善本書目，核對運返的現存圖書，其結果有八百多部善本，當年未運出來。又復檢取卅一年平館派員將該館未運美而遺留在上海的存書運返北平後，所編印的分類清冊，那些未運美的善本，有二百多部在這次運回北平去了，然而仍遺留下五百多種。這留下的五百多部，抗戰勝利後，是否全部或部份運回北平，以無資料可徵，無法詳悉。然而筆者從

有關的資料來推測，確信至少有若干的宋元精品，不在現在北平圖書館的藏書中。這五百多種書，大多數是存世稀罕的珍本。究竟其中是些什麼書？我相信凡我國人，都一定關心的。關於平館善本的收藏、播遷、運美寄存，運回清點等經過，筆者曾撰寫了一篇「關於北平圖書館寄存美國的善本書」，刊載「書目季刊」第四卷第二期。現在我把這所不詳下落的五百七十三部書，編爲闕書目，列舉出來，以備文獻，以供光復大陸後查索的參考。這個書目，係依其版本列載。不按分類。各項書著錄的順序，全依據平館善本書目，俾便於覆按。間有平館書目版本項著錄顯然錯誤者，則酌予改正。否則，雖有可疑，仍從原目著錄。筆者謹識

甲、宋本之部

漢上周易集傳存九卷　宋朱震撰　宋刻本　存卷三至十一

大易粹言存八卷　宋曾穜撰　宋刻本　存卷六十至六七

詩集傳二十卷　宋朱熹撰　宋刻明印本

周禮存五卷，漢鄭玄注　存卷七至十一

京本春秋左傳存五卷　宋刻本　存卷六、七、十二、十六、二九

監本春秋穀梁注疏二十卷　唐楊士勛撰　宋刻明印本

監本春秋穀梁注疏存十卷　唐楊士勛撰　宋刻元印本　存卷十一至二十

春秋集注存五卷　宋張洽撰　宋刻本　存卷七至十一

史記存一卷　漢司馬遷撰　宋裴駰集解　宋刻元印本　存書二

史記存四十卷　漢司馬遷撰　宋裴駰集解　宋刻明印本　存本紀七至十二、表一至五、世家一至八、列傳十七至二九、六三至七十

漢書存三十八卷　漢班固撰　唐顏師古注　宋刻元印本　存志七中下至十，傳三一至六十、六七下至七十

後漢書存四十四卷　宋范曄撰　唐李賢注　宋刻明初印本　存志十一至二二、傳四至六、十五至十九、二二至二四、三三至四四、六四上至六九下

後漢書存六十三卷　宋范曄撰　唐李賢注　宋刻明初印本　存紀一至三、志六至九、十三至十五、十九至三十、傳七至八、十六至十九、二五至三十上、三九至四一、四五至五二、五八至六四上、六七至七五、七八至八十

三國志六十五卷　晉陳壽撰　宋裴松之注　宋刻元明遞修本

南齊書五十九卷　梁蕭子顯撰　宋刻明印本

魏書存七十二卷　北齊魏收撰　宋刻元印本　存目錄、紀一至十二、傳一至二八、三一至三二、四二至五八、六六至七七、志五

魏書一百十四卷　北齊魏收撰　宋刻明印本

魏書存九卷　北齊魏收撰　宋刻明印本　存傳七中下、志六、九至十、十三至十四、十七至十八

隋書存四十卷　唐魏徵撰　宋刻明印本　存志一至四、十六至十九、傳五至二二、三七至五十

唐書存一百三十卷　宋歐陽修、宋祁撰　宋刻元印本　存目錄、紀一至十、志一至三三、三五至三七、表十下、十四至十五、傳十七至三四、八一至一四〇上、一四五至一四七

資治通鑑存四十四卷　宋司馬光撰　宋刻本　存卷十至十二、七四至八一、九十至九二、一二二、一二六、一二八、一三二至一三三、一四五至一四七、一六〇至一六二、一七二至一七四、一八七至一九一、一九三至一九五、二二五至二二七、二四〇至二四二、二五四至二五五

眉山新編十七史策要存一百九卷　宋刻本　存史記六卷、漢書一至十五、二二至二七、後漢書二十六卷、魏志一至四、蜀志二卷、吳志五卷、晉書六至二一、南齊書三卷、梁書三卷、陳書二卷、元魏書八卷、周書二卷、隋書三卷、唐書一至四、十至十三

桯史十二卷　宋岳珂撰　宋刻元明遞修本

重修事物紀原集存二卷　宋高承輯　宋刻本　存卷七至八

錦繡萬花谷存六十九卷　宋刻本　存目錄、前集一至八、十一至十九、二一至二五、二九、三一至三三、三五至四十、後集二至三七、別集二四

歐陽文忠公集存七十卷附錄存三卷　宋歐陽修撰　宋刻本　存卷五一至六五、七一至八九、一〇二至一一八、一二五至一四三、附錄存卷一至三

歐陽文忠公集存十一卷、宋刻本　存卷四十至五十

蘇文忠公文集存十一卷　宋蘇軾撰　宋刻本　存卷二、十七、三二至三三、三八、四十、後集卷十七、和陶詩卷四、奏議卷一、六、十

晦菴先生文集存二十五卷　宋朱熹撰　宋刻元印本　存卷一至六、十五、二九、三三、三五至三六、三九、四四、五四、五六、七七、八十、八二、八六、九一至九五上、九六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存八十七卷　宋刻明印本　存目錄、卷一至四、九至三三、三七至四三、四九至六十、六七至七二、七五至八一、八五至九一、九五至九七、續集一至十一、別集一至五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存五十三卷　宋刻明印本　存卷十一至十七、二一至三五、四十至四四、四七至五一、五九至六二、六六至六八、七二至七三、七七至八十、九二至九四、別集六至十
後村居士集存四十八卷　宋劉克莊撰　宋刻本　存卷一至二八、三十至三二、三四至五十
河南程氏文集存八卷　宋程顥程頤撰　宋刻本　存卷一至八
文苑英華存一百卷　宋李昉等輯　宋刻本　存卷六〇一至七百
西山真先生文集存二卷　宋真德秀撰　宋刻本　存卷十四至十五
皇朝文鑑存二十四卷　宋刻元印本　存卷十七至十九、三三至三五、四一、四三、四八至四九、六五至七十、七六、八七至九三
苕谿漁隱叢話存十一卷、宋胡仔撰　宋刻本　存卷五至十五

乙、金元本之部

周易繫辭述二卷　元保八撰　元刻本
周易本義集成十二卷　元熊良輔撰　元刻本
周易集說存十卷　元俞琰撰　元刻本　存下經、文傳上下、彖傳上、象辭上下、文言、說卦、序

卦、雜卦

尚書註疏存十卷　唐孔穎達撰　金刻本，存卷六至十、十六至二十

魁本大字釋音句讀毛詩存三卷　元刻本　存卷四至六

詩傳通釋大成二十卷　元劉瑾撰　元刻本

詩集傳附錄纂疏存八卷　元胡一桂撰　元刻本　存卷一至八

禮記集說存八卷　元陳澔撰　元刻本　存卷一至八

禮書存二十七卷　宋陳祥道撰　元至正七年福州路儒学刻明印本　存卷七三至七四、七七、八五至九二、九六至一〇三、一一九至一二四、一二六至一二七　按平館原目作宋刻明印本，實非。

春秋胡氏傳纂疏存十八卷　元汪克寬撰　元刻本　存卷一至六、九至十四、十九至二四

春秋胡氏傳纂疏存四卷　元汪克寬撰　元刻本　存卷二三至二六

新刊類編歷擧三場文選春秋義八卷　元劉霖撰　元刻本

皇元大科三場文選四書疑一卷周易疑一卷易義二卷書疑一卷書義一卷　元周旉孝輯　元刻本

皇元大科三場文選四書疑一卷周易疑一卷易義二卷　元周旉孝撰　元刻本

樂書二百卷　宋陳暘撰　元至正七年福州路儒學刻明印本

樂書存五十五卷　宋陳暘撰　元至正七年福州路儒學刻明印本　存卷四八至六一、七七至一一〇、一二五至一二八、一六八、一六九、一七一　按平館原目作宋刻，實非

六書故存十二卷　元戴侗撰　元刻本　存卷一至三、六、十六、二一、二四、二七、二八、三一至三三

廣韻存三卷　宋陳彭年等撰　元刻本　存卷三至五

廣韻存二卷　宋陳彭年等撰　元刻本、存卷四、五

崇慶新彫改併五音集韻存三卷　金韓道昭撰　金刻本　存卷一至三

新彫改併五音集韻存八卷　金韓道昭撰　金刻元印本　存卷一至三、五至九

泰和五音新改併類聚四聲篇存四卷　金韓道昭撰　金刻元印本　存卷一至四

書学正韻三十六卷　元楊桓撰　元刻本

史記存三卷　漢司馬遷撰　宋裴駰集解　唐司馬貞索隱　元刻本　存書一、三、四

三國志存五卷　晉陳壽撰　宋裴松之注　元刻本　存卷十五至十九

南史八十卷　唐李延壽撰　元明刻配本

北史存三十六卷　唐李延壽撰　元刻本　存紀二至五、傳十三至十四、二六至二八、三五至四九、六六至七三、八二至八五

北史存三卷　唐李延壽撰　元刻本　存紀二至四　按此殘帙據平館原目共存二十九卷（實三十卷），除此三卷外，其餘二十六卷（實二十七卷）今已運存臺灣

北史一百卷　唐李延壽撰　元明刻配本

隋書八十五卷　唐魏徵撰　元刻明印本

宋史存一百三十六卷　元脫脫等撰　元刻本　存紀十九至二二、四三至四四、志四、六至七、十七至二十、二八至二九、三七至三九、四八、五六至五七、六三至六五、七四至七六、七九至八十、九十至九七、一〇〇至一〇三、一〇六至一〇九、一一三、一二三、一二六至一二八、一三〇至一三一、一三四至一三八、表六至八、十二至十三、二七、三十、傳二二至二三、二六上、二八至二九、三二至三三、三六至三八、五十至五一、六十至六一、六四至六七、七十至七一、七八至七九、九二至九三、九六至九七、一〇〇至一〇二、一〇七至一〇八、一一一至一一二、一一七至一一八、一四八至一四九、一五一至一五二、一五八至一六三、一六八至一七〇、一八八至一八九、二〇〇至二〇四、二〇九至二一二、二二〇至二二

一、二五四

宋史存十二卷　元脫脫等撰　元刻本　存紀三九至四十、志二三、二九、三六、一一九、表二五、傳十七至十八、六四至六五、九七

金史存四十三卷　元脫脫等撰　元刻本　存目錄上、本紀五、志七、九至十、十四至十九、二一至二六、二九、三二至三四、三六至三九、表一至三、傳三至五、十五至十六、二五至二八、三六至三八、四一、四九至五十

金史存五十四卷　元脫脫等撰　元刻本，存目錄二卷、本紀三、志五至六、八、十六至十七、二十至二七、三十至三一、三三至三四、三六至三八、傳十、十三至十四、十七至十八、二十至二二、三一至三五、三九至四一、四六、四八至四九、五一至五三、五九至六二、六六至六七、七十、七二至七三

資治通鑑存六十四卷　宋司馬光撰　元刻本　存卷四至五、九至十一、十五至十七、二四至二九、三九至五九、六三至六五、七六至七九、一五八至一六九、一七七至一七九、二四二至二四三、二四五至二四七、二八六至二八七

續資治通鑑前集十八卷後集十五卷　宋李燾撰　劉時舉續　元刻本

金陵新志存十二卷　元張鉉纂修　元刻本　存卷四至十五

文獻通考存二百八十二卷　宋馬端臨撰　元刻本　存目錄、卷三至七三、七七至八一、八八至一○二、一○六至一二○、一二八至一三一、一三六至一四八、一五六至一六七、一七一至一八七、一九三至二三三、二四五至二五三、二五七至二七七、二八七至三一○、三一五至三四八

文獻通考存一七九卷　宋馬端臨撰　元刻明印本　存序目、卷三至二五、二八至三一、三四至三九、四二至四四、四七、五一至五二、五八至六二、六四至七十、八二至九五、九七至一一○、一一二至一一四、一一六至一一九、一二一、一二八、一三二、一三七至一四九、一六七、一九一至一九九、二一九至二二九、二三四至二五五、二六六至二七一、二九六至三○五、三一五至三一八、三三二至三三九、三四三至三四八

文獻通考存一百十三卷　元刻明印本　存目錄、卷九至十二、三七至五三、七六至八十、八九至九三、九八至一○八、一一五至一一九、一二六至一三六、一四六至一五二、一五九至一六四、一七六至一八三、一九三至二○九、二七二至二七八、二八七至二九○、三三七至三四二

故唐律疏議存八卷附纂例存一卷　唐長孫無忌等撰　元刻大字本　存卷十五、二四、二六至三十、纂例上
標題注疏小学集成存三卷　元刻本　存卷八至十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存二卷、宋真德秀撰　元刻本　存乙集卷二二至二三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存四十五卷　宋黃震撰　元刻明印本　存卷二至四、十二至十四、二六至二九、四七至五四、六十至六二、六四、七一至七二、七四至八十、八二至八八、九十至九一、九三至九七
補註釋文黃帝內經素問存五卷　元刻本　存卷八至十二
補註釋文黃帝內經素問存五卷　元刻本　存卷五至八
大德重校聖濟總錄存五卷　宋徽宗勅撰　元刻本　存卷三至四、一二八至一三〇
大德重校聖濟總錄存六卷　元刻本　存卷二下、六五至六六、七一、九三、一五〇
玉海二百四卷　宋王應麟撰　元刻明印本
小學紺珠十卷　宋王應麟撰　元刻明印本
新編詔誥章表事文擬題存二卷皇元大科三場文選二卷新編詔誥章表事實四卷　元刻本　擬題存卷

四至五

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卷　唐釋實叉難陀譯　元刻本

景德傳燈錄存八卷　宋釋道原撰　元刻本　存卷二至四、十至十一、十六至十八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存一卷　宋釋法應撰　元釋普會續輯　元刻本　存卷四

高峯龍泉院因師集賢語錄存十卷　元釋如瑛輯　元刻本　存卷一至十

廬山蓮宗寶鑑存二卷　元釋普度撰　元刻本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存十九卷　元釋明本撰　元刻本　存卷一至九、十一至二十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存九卷　元趙道一撰　元刻本　存卷二一至二七、三四至三五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存三十八卷　元虞集撰　元刻本　存卷一至二十、二五至二七、三三至四三、

四七至五十

柳待制文集存六卷　元柳貫撰　元刻本　存卷十至十五

陳衆仲文集存七卷　元陳旅撰　元刻本　存卷一至七

三聖集一卷　元釋梵琦編　元刻本

中州集存四卷　金元好問輯　元刻本　存卷三至六

國朝文類存二十二卷　元刻本　存卷五至六、二九至三二、三九至四十、四二至四三、四五至四六、四八、五一至五四、五七至六十　按原目著錄二十二卷，其中卷四七、四八兩卷已於民國三十一年運返北平。

國朝文類存十七卷　元刻本　存目錄、一至九、三七至四一

新刊類編歷擧三場文選古賦存六卷詔誥存三卷　元劉貞輯　元刻本　存古賦一至六、詔誥一至三

丙、明本之部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晉杜預撰　明刻本

春秋諸傳會通存十七卷　元李廉輯　明初刻本　存卷一至五、十一至十九、二二至二四

四書詳說存十四卷　明曹端撰　明正統刻本　存大學、中庸、論語六至十四、孟子一至二、七

孟子節文七卷　明劉三吾撰　明洪武刻本

六書溯原直音二卷　明吳元滿撰　明萬曆刻本

華夷譯語一卷　明火源潔撰　明刻本

唐書存六十卷、宋歐陽修、宋祁撰　明刻本　存紀一至十、志一至五十

元史存五十一卷　明宋濂等撰　明洪武刻本　存紀二三、三五至四三、志九至十一、十七至二十、、三六至三七、四二至四四、五十至五三、傳八、九至十六、二六至三十、三四至四四

元史存九十二卷　明宋濂等撰　明洪武刻本　存紀二八至三二、志一至二、五至十二、二六至二八、四四至四九、表一至六、傳一至五、十三至十六、二一至二四、二八至三一、三六至五三、五七至八一、九五至九七

元史存三十一卷　明宋濂等撰　明洪武刻本　存紀六至七、十四至十五、十七至十八、志三二至三三、傳十六至二十、三七至三八、四四至四五、六三至六五、七五至八二、九三至九五

皇明詔制八卷　明嘉靖刻本

綸綍錄六卷　明周永春輯　明刻本

司銓奏草八卷　明王國光撰　明萬曆刻本

滇臺行稿四卷　明徐栻撰　明萬曆刻本

督餉疏草五卷　明畢自嚴撰　明天啓刻本

餉撫疏草存四卷　明畢自嚴撰　明天啓刻本　存卷一至四

留計疏草二卷　明畢自嚴撰　明天啓刻本

度支奏議堂稿二十卷新餉司三十六卷邊餉司十一卷山東司七卷浙江司一卷湖廣司二卷四川司五卷江西司一卷廣東司一卷廣西司四卷雲南司十七卷貴州司二卷福建司四卷山西司二卷河南司一卷册庫一卷陝西司四卷　明畢自嚴撰　明崇禎刻本

抽簪罪言一卷　明畢自嚴撰　明崇禎刻本

南庾奏議八卷　明呂維祺撰　明崇禎刻本

太常磊齋吳公殉節實錄一卷　明吳繁昌輯　清初刻本

勞母哀榮錄一卷　明萬曆刻本

古今列女傳存二卷　明解縉等撰　明永樂刻本　存卷一、卷三

王謝世家二十八卷　明韓昌箕撰　明天啓刻本

昭代明良錄存十七卷　明童時明撰　明萬曆刻本　存卷一至十、十四至二十

殿閣詞林記存十八卷　明廖道南撰　明刻本　存首十八卷

寰宇通衢一卷　明洪武刻本

大明一統志存五十七卷　明李賢等纂修　明天順刻本　存卷十四至三五、四一至五一、五九至六六、六九至八二、八六至八七、按原目存六十卷、其中之十一至十三凡三卷已運臺

大明一統志存四十七卷　明天順刻本　存卷二二至三四、三七、四九至七一、七四至七八、八一至八二、八五、八九至九十

大明一統志存三十六卷　明天順刻本　存卷八至十八、二五至三五、三八至四十、四五至四八、五六至六十、六五至六六

上元縣志十二卷　明程三省李登纂修　明萬曆刻本

江寧縣志十卷　明王誥劉雨纂修　明正德刻本

姑蘇志六十卷　明王鏊纂修　明正德刻本

崑山縣志八卷　明周世昌撰　明萬曆刻本

休寧志存三十二卷　明程敏政纂修　明弘治刻本　存一至十九、二六至三八

休寧縣志八卷　明李喬岱纂修　明萬曆刻本

泰安州志六卷　明任弘烈段廷選纂修　明萬曆刻本

新泰縣志存七卷　明趙希忭安選纂修　明天啓刻本　存卷四至十

曲阜縣志存四卷　明孔弘毅纂修　明崇禎刻本　存卷一至四

寧陽縣志存二卷　明萬曆刻本　存卷三、五

單縣志二卷　明夏維藩周衛陽纂修　明隆慶刻本

新修館陶縣志存一卷　明李沖奎趙邦治纂修　明萬曆刻本　存卷三

益都縣志存五卷　明田仰纂修　明萬曆刻本　存卷五至卷九

臨朐縣志存二卷　明王家士祝文纂修　明嘉靖刻本　存卷一至二

福山縣志存四卷　明宋大奎郭如泰纂修　明萬曆刻本　存卷一至四

浮山縣志不分卷　明許安纂修　明嘉靖刻本

儀封縣志存二卷　明張鹵纂修　明萬曆刻本　存卷三至四

衛輝府志十六卷　明萬曆刻本

磁州志存六卷附誌一卷　明趙範諸觴纂修　明萬曆刻本　存卷一至五、八

雍大記三十六卷　明何景明纂修　明嘉靖刻本

城固縣志六卷　明楊守正胡璉纂修　明嘉靖刻本

泰安志九卷　明胡纘宗纂修　明嘉靖刻本

湖廣總志存二十二卷　明徐學謨纂修　明萬曆刻本　存卷十九、二三至二四、三八、四二至四五、五十、五二至五八、六十至六四、七五

湖廣總志存十五卷　明徐學謨纂修　明萬曆刻本　存卷五十至五五、五九至六七

岳州府志存七卷　明鍾崇文方啓纂修　明隆慶刻本　存卷五至七、十一至十四

歸州志存二卷　明萬曆刻本　存卷三至四

江華縣志存六卷　明杜漸費栢纂修　明萬曆刻本　存卷一至六

辰州府志存七卷　明馬協吳瑞登纂修　明萬曆刻本　存卷一至六、八

萬曆杭州府志一百卷　明陳善纂修　明萬曆刻本

續修嚴州府志二十四卷　明呂昌期俞炳然纂修　明萬曆刻本

八閩通志八十七卷　明黃仲昭纂修　明弘治刻本

僊溪志存十卷　宋黃巖孫撰　明陳遷重修　明弘治刻本　存卷一至十

大田縣誌存三十卷　明劉維棟纂修　明萬曆刻本　存卷二至三一

寧化縣志存九卷　明張士俊陰維標纂修　明崇禎刻清順治修補本　存卷一至九

邵武府志存九卷　明陸懋昭黃仲昭纂修　明弘治刻本　存卷八至十六

泉州府志二十四卷　明陽思謙黃鳳翔纂修　明萬曆刻本

廣州志存九卷　明吳中王鳳文纂修　明成化刻本　存卷十四至十五、二三至二六、三十至三二

仁化縣志存一卷　明司馬暐纂修　明萬曆刻本　存卷上

惠州府志存十四卷　明程有守楊起元纂修　龍國祿呂時煥增修　明萬曆刻本　存卷一至六、十四至二一

永安縣志三卷　明葉春及郭之藩纂修　明萬曆刻本

永安縣志三卷　明葉春及郭之藩纂修　明萬曆刻本

廣西通志六十卷　明林富黄佐纂修　明嘉靖刻本

桂林郡誌存十二卷　明陳璉纂修　明景泰刻本　存卷一至八、十九至二二

雲南圖經志書十卷　明鄭顒陳文纂修　明景泰刻本

貴州圖經新志十七卷　明趙瓚王佐纂修　明刻本

延綏鎮志存七卷　明鄭汝壁劉餘澤纂修　明萬曆刻本　存卷一至六、八

三關志存七卷　明廖希顏修　明嘉靖刻本　存卷一至七

茅山志存三卷　元劉大彬撰　明初刻本　存卷二、四、十三

城陽山志三卷　明許志古撰　明刻本

西嶽華山誌一卷附錄一卷　金王處一撰　明萬曆刻本

衡岳志存七卷　明曾鳳儀撰　明萬曆刻本　存卷二至八
雲門志略存三卷　明張元忭撰　明萬曆刻本　存卷一至三
南河志十卷南河全考二卷　明朱國盛徐標撰　明崇禎刻本
嶺海名勝記存十九卷　明郭棐撰　明萬曆刻本　存卷一至十五、十七至二十
祠山事要指掌集十卷　宋周秉秀撰　明宣德刻本
殊域周咨錄二十四卷　明嚴從簡撰　明萬曆刻本
福建運司志存二卷　明林大有撰　明嘉靖刻本
古今治平略三十三卷　明朱健撰　明崇禎刻本
兩淮鹽法志存九卷　明史起蟄撰　明嘉靖刻本　存卷一至六、十至十二
福建鹺政全書二卷　明周昌晉撰　明天啓刻本
御製大誥續編一卷　明太祖敕撰　明刻本
御製大誥三編一卷　明太祖敕撰　明刻本
大誥武臣一卷　明太祖敕撰　明刻本
御製新頒大明律例註釋招擬折獄指南十八卷　明刻本

憲綱事類一卷風憲忠告一卷　元張養浩撰　明弘治刻本
御史箴集解一卷　明薛瑄撰　明弘治刻本
朱子語類存六十卷　宋黎靖德輯　明成化刻本　存卷一至六、十五至三五、四四至六一、八三至九七
晦庵先生語錄類要存十四卷　宋葉士龍輯　明成化刻本　存卷七至十二、十至十四、十六至十八
心印紺珠經二卷　元朱撝撰　明嘉靖刻本
普濟方存十九卷　明朱橚撰　明永樂刻本　存卷三一、三四、四五至四六、四九、五二、五八、六三、七二、八十、八二至八四、八七至八八、一〇二、一〇四、一一六、一四〇
釋藥集韻存一卷　明程伊撰　明嘉靖刻本　存卷上
仙傳外科集驗方一卷　明趙宜真撰　明洪武刻本
秘傳外科方一卷　明洪武刻本
仙授理傷續斷秘方一卷　明洪武刻本
茶經一卷　唐陸羽撰　明刻本
閩中荔支通譜十五卷　明鄧慶寀撰　明崇禎刻本
顏氏家訓二卷　北齊顏之推撰　明正德刻本

多能鄙事十二卷　題明劉基撰　明刻本

邇言十六卷　明孫宜撰　明萬曆刻本

疑耀七卷　明張萱撰　明萬曆刻本

邇訓二十卷　明方學漸撰　明刻本

三戌叢譚十三卷　明茅元儀撰　明崇禎刻本

畸人十篇二卷　明利瑪竇撰　明萬曆刻本

青泥蓮花記十三卷　明梅禹金輯　明萬曆刻本

今獻載言存十四種十四卷　明刻本

選類程文策場便覽存七卷　明馬子諒輯　明景泰刻本　存卷一至七

酉陽雜俎前集二十卷續集十卷　唐段成式撰　明刻本

花鳥爭奇三卷童婉爭奇三卷風月爭奇三卷蔬果爭奇三卷山水爭奇三卷茶酒爭奇二卷梅雪爭奇三卷

明鄧志謨撰　明刻本

萬福問答景德傳燈全錄存十卷　宋釋道原撰　明刻本　存卷七至十二、十七至二十

夾註輔教編孝論要義存三卷　宋釋契嵩撰　明正統刻本　存卷四至六

廣清涼傳存二卷　宋釋延一撰　明刻本　存卷上、中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拈古請益錄二卷　宋釋正覺拈古　元釋行秀評唱　明刻本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存二卷　元釋明本撰　明刻本　存卷六至七

淨土詩一卷　元釋明本撰　明洪武刻本

諸佛如來菩薩名稱歌曲一卷　明成祖撰　明永樂刻本

八識規矩補註二卷　明釋普泰撰　明正德刻本

周易參同契發揮三卷釋疑一卷　元俞琰撰　明洪武刻本

周易參同契註存二卷　元陳致虛撰　明刻本　存卷上、中

周易參同契註解三卷　元陳致虛撰　明刻本

悟眞篇三註三卷　宋張伯端撰　薛式等註　明刻本

新刊足本類編全相啓聖實錄前集一卷後集一卷　明永樂刻本

許旌陽事蹟圖一卷　明刻本

上清靈寶大成全書四十卷　明周思得撰　明宣德刻本

河東先生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附錄二卷傳一卷　唐柳宗元撰，宋韓醇音釋　明萬曆刻本

歐陽文忠公集存一百〇五卷　宋歐陽修撰　明刻本　存卷十至五十、五五至六五、七十至七五、
七九至八五、九三至九六、一〇二至一〇八、一一三至一一四、一一七至一二三、一三一至
一三六、一四〇至一四三、一四七至一五三、附錄三至五

草廬吳先生文粹五卷　元吳澄撰　明吳訥輯　明宣德刻本

御製文集二十卷　明太祖撰　明刻本

市隱堂詩稿五卷　明魯藩朱頤⿰女屋撰　明崇禎刻本

朱一齋先生文集十卷　明朱善繼撰　明成化刻本

蒲山牧唱一卷　明魏觀撰　明成化刻本

白雲稿存七卷　明朱右撰　明初刻本　存卷一至七

聽雪蓬先生詩集七卷附錄一卷　明劉秩撰　明洪武刻本

易齋稿十卷附錄一卷　明劉璟撰　明刻本

盤谷集十卷　明劉廌撰　明刻本

石田稿三卷　明沈周撰　明弘治刻本

翠渠摘稿八卷　明周瑛撰　明嘉靖刻本　孔廣陶跋

瓜涇稿二卷　明徐源撰　明正德刻本
少傅野亭劉公遺藁八卷　明劉忠撰　明嘉靖刻本
翰林羅圭峯先生文集十八卷　明羅玘撰　明刻本
會文恪公文集十卷　明會鐸撰　明隆慶刻本
樵風十卷　明湛若水撰　明刻本
張禺山戊巳吟三卷附作詩一卷續一卷　明張含撰　明嘉靖刻本
撫上郡集一卷　明周金撰　明嘉靖刻本
定齋先生詩集二卷　明王應鵬撰　明嘉靖刻本
楊升菴詩五卷　明楊慎撰　明嘉靖刻本
乙巳春遊稿五卷　明李濂撰　明嘉靖刻本
嵩渚文集一百卷　明李濂撰　明嘉靖刻本
過庭私錄七卷泉亭外集一卷　明吳鼎撰　明嘉靖刻本
樊氏集十二卷　明樊鵬撰　明嘉靖刻本
三巡集稿一卷　明蘇祐撰　明嘉靖刻本

均奕集一卷　明郭鳳儀撰　明嘉靖刻本
許默齋集四卷　明許論撰　明刻本
少室山人集二十五卷　明楊本仁撰　明嘉靖刻本
王椒園先生集四卷　明王納言撰　明萬曆刻本
五嶽山人集三十八卷　明黃省曾撰　明刻本
序芳園稿二卷　明趙伊撰　明萬曆刻本
吳疎山先生遺集五卷　明吳悌撰　明萬曆刻本
白華樓續稿十五卷　明茅坤撰　明刻本
高文襄公集四十四卷　明高拱撰　明萬曆刻本
萬文恭公摘集十二卷　明萬士和撰　明刻本
公餘漫稿五卷　明王崇古撰　明隆慶刻本
張洛南文集十二卷　明張成敎撰　明萬曆刻本
少司馬谷公文集二卷　明谷中虛撰　明天啓刻本
周叔夜先生集十一卷　明周思兼撰　明萬曆刻本

自由堂稿十二卷　明馬三才撰　明嘉靖刻本
東岱山房詩錄二卷外集一卷江右稿上一卷　明李先芳撰　明嘉靖刻本
徐氏海隅集二十二卷　明徐學謨撰　明萬曆刻本
曹太史含齋先生文集十五卷　明曹大章撰　明萬曆刻本
李子田詩集四卷一悅園稿一卷　明李蓘撰　明刻本
太虛軒稿一卷　明胡直撰　明萬曆刻本
玉介園存稿十八卷附錄四卷　明王叔杲撰　明萬曆刻本
何震川先生集二十八卷　明何洛文撰　明天啓刻本
萬一樓集存四十八卷　明駱問禮撰　明萬曆刻本　存卷十一至五六、續集一至二
玩梅亭集稿二卷　明柴惟道撰　明刻本
黄淳父先生全集二十四卷　明黄姬水撰　明刻本
結蝶集八卷　明鄭若庸撰　明隆慶刻本
隆池山樵詩集二卷　明彭年撰　明刻本
西村詩集二卷補遺一卷　明朱朴撰　明萬曆刻本

陳徵士集四卷　明陳鑒撰　明刻本

王文端公詩集二卷奏疏四卷尺牘八卷　明王家屏撰　明萬曆刻本

鄧定宇先生文集四卷　明鄧以讚撰　明刻本

蒼園集八卷　明李應徵撰　明萬曆刻本

游參知藏山集十卷　明游朴撰　明萬曆刻本

薊下稿一卷中州稿一卷遼陽稿一卷田居稿一卷西征稿一卷河上稿一卷東省稿一卷都下稿一卷南中稿二卷場居稿二卷　明李化龍撰　明萬曆刻本

薜荔山房藏稿十卷　明敖文禎撰　明刻本

負苞堂詩選五卷文選四卷　明臧懋循撰　明天啓刻本

藏徵館集十五卷　明劉黃裳撰　明萬曆刻本

石倉文稿五卷桂林集三卷武林稿一卷荅上篇一卷掛劍篇一卷海色篇一卷巴草一卷蜀草三卷雪桂軒草一卷雨河行稿一卷潞河集一卷　明曹學佺撰　明崇禎刻本

遯園漫稿四卷蟄菴日錄四卷雪堂隨筆五卷銷夏小品一卷金陵臥遊六十咏一卷　明顧起元撰　明刻本

西征稿八卷　明傅振商撰　明萬曆刻本

素雯齋集三十八卷　明吳伯與撰　明天啓刻本

詠懷堂詩集四卷外集二卷　明阮大鋮撰　明崇禎刻本

笑玉軒集一卷計偕集一卷瀕雲集存上卷游羅浮集一卷七星巖集一卷粵閩漫集一卷燕臺集一卷秋似亭集三卷退食軒集一卷郢中集一卷巴音集一卷　明謝士章撰　明天啓刻本

携劍集四卷恒西游草一卷　明俞景寅撰　明萬曆刻本

陳履吉采芝堂文集十六卷附録一卷　明陳益祥撰　明萬曆刻本

未學菴詩集十卷集外詩一卷附錢孫艾頤仲遺稿一卷　明錢謙貞撰　汲古閣刻本

珵美堂集一卷沙上集一卷　明水佳胤撰　明萬曆刻本

菉居詩集一卷　明張縉彦撰　明崇禎刻本

笑依子螢芝集七集禪栗林二卷　明張明弼撰　明天啓刻本

紡授堂詩集八卷文集八卷二集十卷　明曾異撰撰　明崇禎刻本

人琴集七卷　明錢繼章編　清初刻本

楚辭過註五卷　明來欽之撰　清順治刻本

詩法正論一卷　元釋用和撰　明刻本

新續古名家雜劇存八卷　明刻本

雜劇三集存十四卷　清鄒式金編　清順治刻本

誠齋雜劇二十五卷　明周藩朱有燉撰　明周藩刻本

重校玉簪記二卷　明高濂撰　明繼志齋刻本

夢花酣二卷　明崇禎刻本

重校四美記二卷　明文林閣刻本

新刻出像音註岳飛破虜東窗記存一卷　明富春堂刻本　存卷上

張文獻公集十二卷　唐張九齡撰　明嘉靖刻本

楊盈川集十卷附錄一卷　唐楊炯撰　明萬曆刻本

孟浩然集三卷　唐孟浩然撰　明刻本

岑嘉州詩七卷　唐岑參撰　明正德刻本

歐陽行周文集十卷　唐歐陽詹撰　明弘治刻本

李文十八卷　唐李翱撰　明嘉靖刻本

李文饒公文集二十卷別集十卷外集四卷　唐李德裕撰　明萬曆刻本

沈下賢文集十二卷　唐沈亞之撰　明刻本

唐皮日休文藪十卷　唐皮日休撰　明萬曆刻本

唐黃先生文集八卷附錄一卷　唐黃滔撰　明萬曆刻本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八十卷　宋司馬光撰　明刻本

宛陵先生文集存三十三卷　宋梅堯臣撰　明正統刻本　存卷八至四十

淮海集四十卷後集六卷長短句三卷　宋秦觀撰　明嘉靖刻本　莫棠跋

龜山先生集四十二卷　宋楊時撰　明萬曆刻本

華陽集四十卷　宋張綱撰　明萬曆刻本

和靖尹先生文集十卷附錄一卷　宋尹焞撰　明嘉靖刻本

重刊横浦先生文集二十卷心傳錄三卷日新一卷孟子發題一卷附錄一卷　宋張九成撰　明萬曆刻本

竹洲文集十卷附錄一卷　宋吳儆撰　明刻本

羅鄂州小集五卷附錄二卷　宋羅願撰　明洪武刻本　何焯跋

文公感興詩通一卷　元胡炳文撰　明成化刻本

蛟峯批點止齋論祖一卷　宋陳傅良撰　方逢辰批點　明成化刻本
蛟峯批點止齋論祖一卷　明刻本
梅溪先生廷試策奏議五卷文集二十卷後集二十九卷　宋王十朋撰　明正統刻本
慈湖先生遺書十八卷　宋楊簡撰　明刻本
滄浪先生吟卷二卷　宋嚴羽撰　明嘉靖刻本
秋崖先生小稿四十五卷又三十八卷　宋方岳撰　明嘉靖刻本
文山先生文集存十四卷　宋文天祥撰　明刻本　存文集卷七至十七、別集一至三
臨川吳文正公集存二十八卷　元吳澄撰　明正統刻本　存卷四一至五十、五三至七十
臨川吳文正公集四十九卷外集三卷附錄一卷　明宣德刻本
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文集存八卷　元程鉅夫撰　明洪武刻本　存卷十六至二十三
道園學古錄存十七卷　明景泰刻本　存卷一至十、四四至五十
青陽先生文集六卷附錄二卷　元余闕撰　明嘉靖刻本
高皇帝御製文集二十卷　明太祖撰　明刻本
胡仲子集存五卷　明胡翰撰　明洪武刻本　存卷六至十

海叟集四卷　明袁凱撰　明初刻本

頤菴文選存一卷　明胡儼撰　明永樂刻本　存卷下

遜志齋集二十四卷附錄一卷　明方孝孺撰　明正德刻本

東里文集存十二卷　明楊士奇撰　明正統刻本　存卷一至六、二十至二五

東山詩集二卷　明劉大夏撰　明刻本

震澤先生集三十六卷　明王鏊撰　明嘉靖刻本　張雋跋

韋菴集二卷　明皇甫信撰　明嘉靖刻本

空同集六十四卷　明李夢陽撰　明萬曆刻本

齊雲山史一卷　明葉靜泓撰　明嘉靖刻本

遵巖先生文集二十五卷　明王慎中撰　明隆慶刻本

長嘯軒近稿一卷續草一卷　明陳純撰　明萬曆刻本

貽美堂集二十四卷　明祝以豳撰　明天啓刻本

緑滋館稿九卷　明吳士奇撰　明刻本

李氏文集二十卷　明李贄撰　明刻本

坐隱先生訂譜不分卷集十一卷戲墨一卷　明汪廷訥撰　明萬曆刻本

勾曲游稿一卷西漢草一卷　明陳魁文撰　明萬曆間刻本

陳太史無夢園全集三十四卷　明陳仁錫撰　明崇禎刻本

中唐詩存十一家七十七卷　明蔣孝編　明嘉靖刻本

唐詩二十六家五十卷　明黃貫曾編　明嘉靖刻本

三袁先生集五卷　明刻本

續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存七卷　明鄭柏輯　明刻本　存一至七

新刊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三十五卷　宋樓昉輯　明刻本

萬首唐人絕句一百一卷　宋洪邁輯　明嘉靖刻本

皇明文衡一百卷　明程敏政輯　明嘉靖刻本

松陵集十卷　明弘治刻本

蓬萊閣集十卷　明王雲鷺輯　明萬曆刻本

黃鶴樓集三卷　明孫承榮輯　明刻本

少微莊樂隱集一卷名公倡和集一卷　明劉亮采輯　明天啓刻本

增修詩話總龜前集四十八卷後集五十卷　宋阮閱輯　明嘉靖刻本

碧山樂府三卷　明王九思撰　明正德刻本

遊仙窟一卷　唐張鷟撰　日本文保刻本

丁、稿本

宋會要不分卷　清徐松輯　稿本

碩薖集不分卷　明王雨謙撰　稿本

張子文粃十八卷詩粃五卷　明張岱撰　稿本

戊、抄本之部

大金國志四十卷　宋宇文懋昭撰　明抄本

仙源類譜存二十九册　宋史浩等纂修　宋抄本

宗藩慶系錄存二十二册　宋抄本

金陵新志存六卷　元張鉉纂修　明抄本　存卷一至二、四至五、十四至十五

萊州府志八卷　明龍文明趙燿纂修　抄本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二十卷　宋李心傳撰　吳翌鳳抄本

承天大誌存二卷　明內府抄本　存卷十八至十九　按原目著錄存三卷，其中之第三六卷已運臺

御製大誥一卷　明太祖敕撰　明抄本

金陵古金石考一卷　明顧起元撰　抄本

奕慶藏書樓書目四卷　清祁奕慶撰　抄本

回回藥方存四卷　明抄本　存目錄下、卷十二、三十、三四

普濟方存三十五卷　明朱橚撰　明抄本　存卷八至十、十六至二一、二三至二七、三四至三六、四十至四三、一二四、一三二至一三四、一四九、一五四、一五八至一六五

仙傳外科秘方十一卷　明趙宜真撰　抄本

孫真人海上仙方一卷　經鉏堂抄本

纂圖類方馬經存二卷　明朝鮮抄本　存卷六至七

說郛存五十五卷　元陶宗儀編　明抄本　存卷六至十一、十五至十六、二一至四三、六四至八十、八五至九一

說郛存十二卷　明抄本　存卷三至四、二三至三二
小學紺珠存二卷　宋王應麟撰　明抄本　存卷五至六
千家姓三卷　明吳伯宗撰　清鍾萬補　管庭芬抄本　管氏手跋
校正新增青瑣高議存前集五卷後集八卷　宋劉斧撰　明抄本　存前集卷一至五、後集一至八
沈下賢文集十二卷　唐沈亞之撰　抄本
李羣玉詩集三卷後集五卷　唐李羣玉撰　明抄本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存五十卷　宋朱熹撰　明抄本　存卷八至十三、十八至三二、三九至四七、五一至五二、六三至六五、七十至七二、八一至九十、九五至九六
平菴悔稿不分卷後編不分卷　宋項世安撰　抄本
益齋亂稿十卷　元李齊賢撰　抄本
危太僕集不分卷　明危素撰　明抄本　葉煥恭跋
西村先生集二十八卷　明史鑒撰　抄本　徐渭仁跋
唐愚士詩不分卷　明唐志淳撰　明抄本
鹿城詩集存三卷　明梁辰魚撰　抄本　存卷一至三

玉蟬菴散編六卷　明鄭邦祥撰　抄本

兩宋名賢小集存四十三家四十三卷　觀稼樓抄本

元音遺響十卷　元胡布張達劉紹撰　抄本

文苑英華存十卷　宋李昉等輯　明抄本　存四三一至四四〇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存四卷　宋葉蕡輯　明抄本　存卷十四至十七

文房四友除授集一卷　宋鄭清之等撰　裘杼樓抄本

梅屋詩餘一卷　宋許棐撰　抄本

梅詞一卷　宋朱雍撰　抄本

五峯詞一卷　元李孝光撰　抄本

鴛鴦塚二卷花筵賺二卷北曲譜十二卷　明范文若撰　抄本

雙蝠璧二卷　明鄒玉卿撰　抄本

陸士龍文集十卷　晉陸雲撰　明抄本　孫原湘跋

張說之文集二十卷　唐張說撰　明抄本　彭元瑞跋

皇甫持正文集六卷　唐皇甫湜撰　抄本

呂衡州文集十卷　唐呂溫撰　抄本

唐秘書省正字先輩徐公釣磯文集十卷　唐徐寅撰　抄本

宋穆參軍先生文集三卷附錄一卷　宋穆修撰　擒藻堂抄本

河南先生文集二十七卷附錄一卷　宋尹洙撰　明抄本

孫明復小集一卷　宋孫復撰　抄本

劉原父公是先生集不分卷　宋劉敞撰　抄本

安岳馮公太師文集存十二卷　宋馮山撰　抄本　存卷一至十二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十六卷　宋祖無擇撰　抄本

文潞公文集四十卷　宋文彥博撰　抄本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稿十卷附錄一卷　宋朱長文撰　抄本

謝幼槃文集十卷　宋謝邁撰　抄本

慶湖遺老集存一卷附拾遺一卷後集補遺一卷　宋賀鑄撰　明抄本　存卷九

劉左史文集五卷　宋劉安節撰　抄本

傅忠肅公文集三卷　宋傅察撰　抄本

石林居士建康集八卷　宋葉夢得撰　抄本
陵陽先生詩四卷　宋韓駒撰　抄本
和靖尹先生文集十卷附錄一卷　宋尹焞撰　抄本
雪溪詩五卷　宋王銍撰　抄本
紫微集二十卷　宋呂本中撰　抄本
汪文定公集十三卷附錄一卷　宋汪應辰撰　抄本
嵩山居士集五十四卷　宋晁公遡撰　抄本
默堂先生文集二十二卷　宋陳淵撰　抄本
夾漈遺稿不分卷　宋鄭樵撰　抄本
樂軒先生集八卷　宋陳藻撰　抄本
野處類稿二卷　宋洪邁撰　抄本
梅山續稿十七卷雜文一卷長短句一卷　宋姜特立撰　小山堂抄本
裨幄集一卷　宋趙萬年撰　抄本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三十六卷　宋方大琮撰　抄本

後村居士集五十卷　宋劉克莊撰　經鉏堂抄本
後村先生大全集存四十九卷　抄本　存卷一至四九
雪磯叢稿五卷　宋樂雷發撰　抄本
竹溪鬳齋十一稿續集三十卷　宋林希逸撰　抄本
滑齋先生文集四卷　宋何夢桂撰　抄本
紫岩于先生詩選三卷　宋于石撰　趙輯寧抄本
寧深齋稿一卷　宋陳深撰　曹倦圃抄本
張淮陽詩集一卷樂府一卷　元張弘範撰　抄本
剡源戴先生文集二十六卷　元戴表元撰　抄本
養蒙先生文集十卷　元張伯淳撰　抄本
知非堂稿六卷　元何中撰　曹倦圃抄本
貢文靖公雲林詩集六卷附錄一卷　元貢奎撰　曹倦圃抄本
揭文安公集六卷　元揭傒斯撰　抄本
翠寒集一卷　元宋旡撰　抄本

檜亭稿五卷　元丁復撰　抄本

柳待制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　元柳貫撰　抄本

蛻菴詩四卷集外詩一卷詞二卷　元張翥撰　擷藻堂抄本

李五峯集不分卷　元李孝光撰　抄本

藥房樵唱三卷附錄一卷　元吳景奎撰　抄本

不繫舟漁集十六卷　元陳高撰　抄本

居竹軒詩集四卷　元成廷珪撰　知不足齋抄本

所安遺集一卷　元陳泰撰　戴光曾抄本　戴氏並跋

鹿皮子陳先生文集四卷　元陳樵撰　抄本

林外野言二卷　元郭翼撰　抄本

龜巢稿十七卷　元謝應芳撰　抄本

樵雲獨唱不分卷　元葉顒撰　抄本

靜思先生詩集二卷　元郭鈺撰　抄本

來鶴草堂稿一卷旣白軒稿一卷竹洲歸田稿一卷鶴亭倡和一卷　元呂誠撰　抄本

吳興沈夢麟先生花谿集三卷　元沈夢麟撰　抄本

鄭君孚詩集一卷　抄本

北遊詩一卷　元釋梵琦撰　抄本

翠屏詩集二卷文集二卷　明張以寧撰　抄本

白雲稿存五卷　明朱右撰　抄本　存卷一至五

白石山房逸稿二卷附錄一卷　明張丁撰　抄本

始豐稿六卷　明徐一夔撰　抄本

陶情稿六卷　明易恒撰　抄本

春雨軒集八卷　明劉昺撰　抄本　又一部

望雲集五卷　明郭奎撰　文瑞樓抄本

東皋錄一卷　明釋妙聲撰　抄本

補刊全室外集九卷續一卷　明釋宗泐撰　抄本

項襄毅公遺稿一卷　明項忠撰　抄本

少傅野亭劉公遺藁八卷　明劉忠撰　抄本

東谿遺稿四卷紀行稿一卷附錄一卷　明陳諮撰　抄本

玄菴晚稿二卷　明繆孔暉撰　抄本

南宋羣賢小集存六家十二卷　抄本

三家宮詞三卷　汲古閣抄本

蘇門六君子文粹存二十一卷　宋秦觀等撰　明抄本　存卷三至六、十五至二五、五四至五九

玉臺新詠十卷　陳徐陵輯　抄本

樂府詩集存七卷　宋郭茂倩輯　明抄本　存卷一至七

濂洛風雅七卷　元金履祥輯　抄本

全唐詩逸三卷　日本上毛河世寧輯　抄本

聖宋文選全集三十二卷　抄本

中興羣公吟稿戊集七卷　宋陳起輯　抄本

增廣聖宋高僧詩選前集一卷後集三卷　宋陳起輯　亦有生齋抄本

中州啓劄四卷　元吳宏道輯　抄本

草堂雅集十三卷　元顧瑛撰　抄本

大雅集十三卷　元賴良輯　抄本
乾坤清氣十五卷　明偶桓輯　抄本
敦交集一卷　元魏仲遠輯　抄本
滄海遺珠四卷　雲谷山房抄本
皇明野朝記錄存六册　明抄本
坡門酬唱二十三卷　宋邵浩輯　抄本
四明文獻不分卷　明鄭真輯　抄本
玉山名勝集四卷　元顧瑛輯　抄本
諸家老杜詩評五卷　抄本
詩話補遺三卷　明楊慎撰　明淡生堂抄本
陽春白雪前集四卷後集五卷　元楊朝英輯　抄本

己、名家批校題跋本

續資治通鑑十五卷　宋劉時擧撰　抄本　清黃丕烈校並跋、又陸心源跋

元朝名臣事略十五卷　元蘇天爵輯　抄本　清張紹仁校並跋、又黃丕烈跋
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一卷　抄本　清黃丕烈校並跋
順治九年壬辰科進士三代履歷一卷　清順治刻本　阮元陳希曾張惠言等題跋
順治十二年乙未科進士三代履歷一卷　清順治刻本　翁方綱王芑孫趙懷玉等題跋
順治十五年戊戌科進士三代履歷一卷　清順治刻本　葉紹本洪亮吉繆荃孫等題跋
錦里耆舊傳四卷　宋句延慶撰　抄本　黃丕烈校並跋
蜀檮杌二卷　宋張唐英撰　抄本　黃丕烈校並跋
輿地廣記三十八卷　宋歐陽忞撰　抄本　周錫瓚黃丕烈校並跋
剡錄十卷　宋高似孫纂修　抄本　黃丕烈校並跋又吳翌鳳跋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二十卷　宋李心傳撰　清鮑以文抄校本　周星詒跋
素問六氣玄珠密語十七卷　明抄本　清黃丕烈校並跋
文房四譜五卷　宋蘇易簡輯　抄本　清黃丕烈校並跋
淮南鴻烈解二十八卷　漢劉安撰　高誘注　明抄本　清黃丕烈校並跋
顏氏家訓二卷　北齊顏之推撰　明嘉靖刻本　清黃丕烈校並跋

顔氏家訓七卷附考證一卷　抄本　清鮑以文校
猗覺寮雜記二卷　宋朱翌撰　清吳翌鳳校抄本
寓簡十卷　宋沈作喆撰　抄本　清鮑以文校並跋
藍浦筆記十卷　宋劉昌詩撰　抄本　清黃丕烈校並跋、又吳翌鳳陳鱣跋
蘆浦筆記十卷　抄本　阮文元校
賓退錄十卷　宋趙與時撰　抄本　清王聞遠黃丕烈各校並跋
唐語林三卷　宋王讜輯　明嘉靖刻本　清何焯跋
唐語林三卷　明抄本　清黃丕烈跋
詩律武庫不分卷　宋呂祖謙撰　明抄本　清黃丕烈校並跋
王摩詰集六卷　唐王維撰　清康熙刻本　清黃丕烈校並跋
呂衡州文集十卷　唐呂溫撰　抄本　黃丕烈校並跋
毘陵集二十卷　唐獨孤及撰　明抄本　黃丕烈校並跋
姚少監詩集六卷　唐姚合撰　清康熙刻本　黃丕烈校並跋
清塞詩集二卷　唐周賀撰　汲古閣抄本　毛晉跋黃丕烈校並跋

溫庭筠詩集七卷別集一卷　唐溫庭筠撰　抄本　馮武跋

玄英先生詩集十卷　唐方干撰　明抄本　毛綏萬及黃丕烈校

碧雲集三卷　唐李中撰　汲古閣刻本　黃丕烈校並跋

司空表聖文集十卷　唐司空圖撰　抄本　王宗炎校並跋

彭城集四十卷　宋劉攽撰　抄本　沈叔埏校

增廣箋註簡齋詩集三十卷無住詞一卷　宋陳與義撰　胡穉註　抄本　鮑以文校

南湖集十卷　宋張鎡撰　抄本　鮑以文校

翠微南征錄十一卷　宋華岳撰　抄本　王士禎跋

閑閑老人滏水文集二十卷　金趙秉文撰　抄本　李兆洛跋

秋澗先生大全集一百卷　元王惲撰　抄本　王宗炎校並跋

道園遺稿六卷　元虞集撰　抄本　翁方綱跋

唐御覽詩一卷　唐令狐楚輯　明趙均抄本　黃丕烈跋

天下同文前甲集存四十三卷　元周南瑞輯　抄本　馬思贊跋　存卷一至十六、十九至二九、三二至三三、三六至四十、四二至五十

文心雕龍十卷　梁劉勰撰　明萬曆刻本　徐渭仁校

祁承㸁及其在圖書目錄學上的貢獻

從傳世以及可考的明代書目來看，大抵或多或少受到明正統年間內府所編文淵閣書目的影響，一般整理藏書編目的，多把書目視作供檢點的賬簿，不僅沒有產生過一部能合乎我國目錄學標準體制的目錄，能求其類例清晰，部次有條理，已經是很難能可貴的了。對錄略之學作理論上的發明，則更不多見。所以自清以來有關目錄學的論著中，很少有對明代目錄稱述的，更不要說作深入的研究而翔盡的介紹。誠然，從中國目錄學演進的歷史來看，有明一代可以說是貢獻比較少的一代，但這絕不能說明代的目錄學家毫無所貢獻，因為遭易代之際，文獻散佚，或遭禁毀，不為後世知曉，致湮沒而不彰。筆者多年來研究中國目錄學，發現明萬曆天啓間的一位藏書家祁承㸁，他在圖書目錄學上的識見，比之宋代的鄭樵、清代的章學誠實毫無遜色。他對圖書愛好之深，採訪之勤，編目部次之精，都值得現代從事圖書館事業的人員來效法。他對類例及部次方法的創見，在西洋分類法介紹來我國已有六十多年，猶新舊兼施，左支右絀，迄無妥善安排之際，也值得我們來慎思研究。溫故以知新，或能啓發訂製出新的分類法，可以將古今新舊冶於一爐。筆者爰

本着抉微顯隱，發潛德之幽光的心情，對這位先賢在圖書目錄學上的識見，嘗試地作一分析介紹。

祁承㸁在明史中沒有他的傳，就是收明代詩人小傳最豐富的錢謙益編列朝詩集小傳，也未載祁氏。只有康熙年間朱彝尊編的明詩綜中有他很簡短的一篇小傳，不過二三十字。清末葉昌熾所撰的藏書紀事詩中，也載了祁氏澹生堂集但是關於祁氏的生平，引書也很簡少。這大概是因為祁氏的澹生堂集是清初屬於全燬的禁書，而他朋友或同時人的著作，也大多遭受禁燬，資料難獲的緣故。民國以來，那些清代的禁燬書紛紛復出，所以現在我們知道的祁氏，要比清人多得多。關於他的生平，有他的一位晚輩，他兒子彪佳的同年長洲陳仁錫，在他去世後，撰寫了他的傳及墓表各一篇，載在陳氏的無夢園集中。此外還有他的朋友李維楨、張鼐、陳繼儒、梅鼎祚等人所撰的贈序或澹生堂集序也都存世，或載在他們的文集中，或附在澹生堂集的卷首。承㸁自己的澹生堂集，除了清乾隆間鮑廷博曾從其中輯出藏書訓略等四篇名為澹生堂藏書約，刻入知不足齋叢書，在清代已流傳外，其全集二十一卷近代亦傳世。前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有一部明崇禎間原刻本，恐怕是天壤間僅存的一部孤本。祁氏喜歡記日記，所以從他的全集中，對他生活的片斷，可以知道得相當的詳盡。

關於承㸁的生卒年，依據陳仁錫所寫的墓表，說「享年六十有四，崇禎元年（西元一六二八）冬月寢疾卒」。由此推算，則他生於嘉靖四十四年（一五六五）。祁承㸁字爾光，號夷度，又號曠翁。是春秋時晉國大夫祁奚的後代。他的先世本為河南汴梁人，宋靖康之亂時始南遷，卜居於浙江會稽，後世遂為會稽人。祁氏是山陰的望族，他的高祖司員、祖父清、伯父汝東都是兩榜進士出身。司員由監察御史而歷知徽州、池州兩府，清由禮科給事中官至陝西布政使，汝東官兩淮都轉運使。承㸁的第三子彪佳登天啓二年進士，歷官都御史應天巡撫，在弘光元年（一六四五）清兵南下時死節，可謂一門纓紱相繼。承㸁自幼聰慧，甚得他祖父的鍾愛，宦遊時都携在身邊，遇有客人來拜訪，每每喚他出來屬對，他雖然還未入學唸書，都能立刻應答，用詞也很恰當。可惜他快樂童年的時間不長，隆慶四年（一五七〇年）六歲時祖父去世於陝西布政使的任上。八歲時，他的父親又棄養。此後他與他的遺腹弟承勳在嫡母的撫育下日漸成長，入縣學為諸生，後入南京國子監，嘗從理學家嵊縣周汝登受業。承㸁也很有幹才，在鄉給事徭役時，為晉江蘇濬所賞識，聲譽漸起。只是他在舉業方面不得意，從萬曆乙酉十三年以後，屢次參加鄉試，均未考中，這是他母親在萬曆廿二年臨終時，未能看到自己的兒子成立，所感到失望的事，也是他所最感到懊喪的事。因為他之亟欲博取功名，主要是為了他的母親可以獲得朝廷的誥封，以報答她茹苦

含辛守寡撫子成人，雖然他本人對於作官的興趣並不太濃。按照明代的法律，婦人來達三十歲而守節的，才可以獲得政府的旌表。而他的母親居孀時已經三十三歲，要想朝廷誥封，只有他這個長子從功名中博取了。然而竟天不從人願，他一直到萬曆二十八年（一六〇〇）才考取舉人，三十二始中進士，這時他的母親已經去世十年了。所以他登第任官後的第一件事，是寫一篇告先父「文化，以慰他母親在天之靈。這是一篇文情並茂好文章，載在澹生堂集卷十五。

承㸁登第後，派為安徽寧國縣令，三載政績，治行卓異，調知長洲縣。適逢大旱，他施行糴米法，輸粟平糶以賑濟災民。三十八年入覲，吏部因為他在地方上的治績優良，原來有意陞擢。然而他抵京以後，僦賃寺廟一榻，每天諷誦宋朝楊龜山及無垢和尚的詩文，以等待派令，而從不奔走於權要之門，所以本來有的清華之譽就此低落了，僅改調為南京刑部主事一個閑差，後改兵部，遷員外郎。到四十三年九月才擢升吉安知府，甚得地方上的愛戴。然而在任僅一年多，受到同僚的排擠誣陷而降秩，承㸁也不上書申辯，於四十五年三月罷官歸。出城之日，吉安士民群集攀轅哭泣，道路為之阻塞。承㸁鄉居時，除了整理家園外，從事纂輯的工作，兩浙著作攷即纂修於此時。翌年秋天，三子彪佳攷中浙江鄉試，須赴京參加四十七年己未科的會試。因彪佳自幼身體孱弱，出門遠行，承㸁不放心，遂親自陪同前往。抵京後，這一科彪佳雖來中試，而承㸁受朋

友的慫恿，乃投牒吏部，補山東沂州同知，未幾遷宿州知州，消弭了幾乎爆發的當地煤礦工人的變亂。天啓初升北京兵部職方郎中，後來歷遷河南按察僉事，兼河北參議、備兵磁州。崇禎元年，晉陞江西參政。這時他已患疾在身，尚未到官，就去世了。

承㸁雖是進士出身，在宦場中浮沈了二十多年，也有不少的政績及貢獻，甚至當時的輿論，認為他有才幹，可以寄以方面的重任。然而他真正的性趣所在，還是蒐藏圖書與裒輯文獻。承㸁的嗜愛書，他自己常說是與生俱來的，愈老愈篤。他與友人潘曾紘（字昭度）的信說：「如弟嗜書，嘗自笑為海濱奇癖」。與鄂文學函亦云：「不佞魚蠹之癖，年衰而嗜彌篤」（俱見澹生堂集卷十八）。據他在藏書訓約中自述說：他在十歲僅習句讀還不能通書中文義的時候，就已開始喜歡書，常常跑到樓上貯放他祖父遺書的房閣裏，披籍摩娑，就好像小孩見到了喜愛的玩具般，不忍釋手。他的母親在樓下迭聲催促他去上學，還移時不肯下樓。一直要到他的母親開始訶責，才戀戀不捨的離去。所以他說：「夫余之嗜書，乃在於不解文義之時，至今求之，不得其故，豈真性生者乎」？

承㸁集藏圖書，前後有兩次。第一次在青年時代，以他祖父的幾架遺書為基礎，加上自己的採集，凡他太太的陪嫁，他的束脩所得，以及平日節省的錢，都購買了書，一共集有一萬多卷。

這第一次的藏書，貯放園中的載羽堂，不幸在萬曆二十五年（一五九七）冬天的一個晚上，因傭人不慎引起了火災，藏書全部焚燬，片楮無存。然而承爜並未因為遭受了這次打擊而氣餒，繼續的辛勤蒐求，數量比以前更豐富。在他的密園中，構築藏書樓來貯藏，署曰：「澹生堂」。這第二次的藏書，從二十六年採集起，到四十一年夏天他整理排架時說：「以視舊書，似再倍而三矣」。十五年的蒐求，大約有四五萬卷。又經過了十五年，到崇禎元年他去世後，據他的兒子彪佳所著寓山注卷下八求樓篇云：

昔鄭漁仲論求書之道有八……先子每師其意，窮搜博採，凡積書十萬餘卷，為約以訓子孫。

十萬多卷真不是一個小數目，我國前代秘閣藏書以隋大業中兩京嘉則殿藏至三十七萬卷為最多，但是其中重本很多，如不計複本，則不過三萬多卷。其次是初唐時內府所藏，也就是隋書經籍志著錄的，有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而至盛唐以迄明代，秘閣藏書最盛的時候，也只有五萬多卷。清修四庫全書，著錄的不過七萬九千〇七十卷。私家藏書中像宋代陳振孫家藏至五萬一千多卷，已經是相當的豐富了。承爜的家庭雖稱溫飽，但並非饒富，三十年之間能蒐藏到十萬多卷，假若不是他嗜篤典籍，窮搜博採，是不可能達到這麼龐大的數字的。

承㸁藏書的來源有四：第一當然是收購，這是他藏書主要的來源。他買書是零星的搜購，不像有錢的藏書家，整批的購進他家所藏。承㸁買書甚勤，無論是家居，在任所，公差出巡，或旅行遊歷，隨時隨地都在採訪典籍，從不放過買書的機會。家居時除在本縣外，時常赴郡城杭州搜尋。在南京作官時，則收購於白下。赴京師趕考，則蒐集於燕京。杭州及南北兩京等三地，都是當時全國書籍集散之地，採購比較容易，只是他經常的感到行囊蕭索，苦於不能多買。他在藏書訓約中自述說：「艱難不避，譏訶不辭，節縮饔飧，變易寒暑時，復典衣銷帶，猶所不顧」。他的藏書銘文云：「節衣縮食恒不給」，都是他辛勤購書的寫照。他雖然勤於買書，但也不是見書就收，而是有所選擇，這就是他所說的審輕重。他在藏書訓約中說：

> 得史十者，不如得一遺經。得今集百者，不如得一周秦以上子。得百千小說者，不如得漢唐實錄一，此其書之不相及也。購國朝之書十，不能當宋之五也。宋之書十，不能當唐之三也。唐之書十，不能當漢與六朝之二也。漢與六朝之書十，不能當三代之一也。此其時代之不相及也，總之，所謂審輕重者也。

他在與友人潘曾紘的信中對他選購圖書的見解寫得最清楚，他說：

> 弟為諸生時，便耽志此道，大約覓古董，必須先具賞鑒，乃可稱收藏家。若只云漫爾收

藏，則篋中十九皆贋物矣，雖多奚為。所以每遇古人書，便須窮究其來歷。大約以文獻通考及藝文志所載者為第一格，次之則前代名賢之著述，再次之則近代名賢之著述，然著述之中，以表章九經為第一格，次之則記載前代治亂得失事，再次之則考證古今聞見所未及事。若只以詩文鳴於時，無論近時，雖前代亦不是甚珍。但漢唐之書存者最少，有一部行世者，即當收此一部。宋元人之集十不存一，而世人所見者，亦不過眼前抄襲字句為舉業家用，如歐蘇曾王之類。不知如范香溪、李端叔、晁无咎、陳古靈之類，亦然有大家風度。若張文定、韓持國、田表聖、尹師魯、文潞公、韓魏公、范文正公、司馬溫公，雖不在字句中爭奇，然一代名臣，何可不收。至元人如王秋澗、劉靜修、貢玩齋、柳文肅之類，皆一代大手筆，與楊廉夫、王元章諸公以樂府詩歌鳴世者不同。故弟於文集中凡宋元人遺稿，倘得寓目，亦無不抄錄而存之。蓋文集一事，若如今人所刻，即以大地為書架，亦無可安頓處，惟聽宇宙之所自為銷磨（澹生堂集卷十八）。

所以他搜訪圖書，對於宋元名賢的著作以及宋元以前的秘笈，特別留心蒐求。雖然是殘編斷簡，也決不輕易放過。宋鄭樵嘗論析採訪圖書有八種方法：一即類以求，二旁類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求之公，六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之求。承㸁蒐藏書也依據鄭氏採訪的方

方法，所以他購書並不僅限於書肆。他自述說：「凡試事過武林，遍問坊肆所刻，便向委巷深衢，覓有異本，卽鼠餘蠹剩，無不珍重市歸」。他的友人楊嗣昌於萬曆四十七年作澹生堂初集序也說：

先生求書都邑坊市列肆之林，公私廨舍掌故之府，名山壞宅壁蠹之餘，委巷窮簷斷爛攤地和合壜墻之物，往往搜獲秘文。其所不得，或千里題緘，因人覓募。

可以說無孔不入的採訪，故收獲也多。殘本如有可以配補的，也儘可能抄配補全。他除了自行覓購以外，也常常函託朋友代爲徵訪，如楊嗣昌序所謂的千里題緘，因人覓募」。從澹生堂集所載的尺牘中可以看到他託人代訪求書的事頗多。如與陶公望函：

近有一事，敢與兄約，吾兩家世受易，豈可略于世業。復錄得竹居王孫家抄本數十部，合之家藏，可得二百種，皆前賢專門之學。而吾浙藏書家，惟苕上最多，有前賢解易之書，幸多方訪求（卷十八）。

又如與郭青螺（名子章）函：

「凡老公祖郭槃所藏如宋元人之文集，除耳目常見之外，或前代與國朝記載及小史之類，俱煩命掌記者，錄一目見示。如向所未曾經目，則當借抄。在宋朝如劉須溪諸公，皆貴鄉

人，其遺集定有副本也。外一單皆貴鄉前輩名公也，其集有存於其子孫者，並一查示之」（卷十七）。

除了上述採購及函託友人訪購的方法而外，他還與朋友們組織了一個搜書會，利用多數人的耳目，搜集秘本，互相傳錄，不能如約者，訂有罰則。數馬歲記云：

與蕭之及二三同調，為搜書之會，期每月務得奇書及古本若干，不如約者罰（卷十二）

他後來又致函徐季鷹邀請參加，從該函中可以看出搜書會採訪秘本的效果很好，該函云：

苦于僻居海濱，聞見有限，必須相結同志者五六人，各相物色。而又定之以互易之法，開之以借錄之門，嚴匿書之條，峻稽延之罰，秘本不踵而集（卷十八）。

承㸁因為運用採訪的方法精到廣泛，所以他自云藏書每月均有增加，而且其中頗多罕見的秘笈。

他的藏書的第二個來源是受贈。像這一類朋友餽贈的數量大概不會太多，恐怕好書也很少。他在藏書訓約中嘗云：「間有見貽，槩以坊梓，且多重複」。這種贈書大概就是明代官場中流行的書帕本。不過贈書中也偶有精好的而為承㸁喜愛的。例如澹生堂集卷十四讀書雜記中所記載，治水使者朱敬韜贈他一部萬曆本秦少遊淮海集，云：「寫刻俱精，老眼得此甚快」。又葉瑛石送他一部季本（字彭山）手筆批校的資治通鑑詳節一百卷，云：「所標識皆蠅頭粟粒字，而筆畫勁

逸，如鐵鶯翩翻。兼以書久失板，止此抄本僅存，真足珍也」。但像這類受贈比較精好珍罕書的情形比較少。

他的藏書第三個來源是傳抄。例如讀書雜記中所載陶宗儀說郛，云：「余此書以甲寅（萬曆四十二年）錄之於白門。又澹生堂集卷十三戊午曆（按卽萬曆四十六年日記）：二月初八日記：「借錄元次山漫叟拾遺一卷」。二十九日記：「錄完會稽掇英集，同兒子手校一過」。傳抄的多是當代沒有刻過而無法購得的書，只有出之借錄一途。澹生堂抄書多用白棉紙上印藍絲欄，版心下方有澹生堂字樣的專用紙抄寫。或承㸁手抄，或請人代錄，抄畢後，他往往手校一過。清全祖望嘗云：

> 夷度先生，精於汲古，其所抄書，世人多未見。校勘精核，紙墨潔淨（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曠亭記）。

所以澹生堂抄本為後代藏書家所特別珍貴。

他藏書的第四個來源是交換。承㸁的家貲既然並非富有，所以他為了增益藏書，除了購買傳抄以外，也使用交換的方法。他朋友或官場往來贈送他的書，或他委託各地友人代收購的書，其中往往有重複的本子。這些複本，他留着無甚用處，所以拿來與他人或坊肆交換，卽是他在藏書

訓約中所謂的：「兼以所重，易其所闕」。譬如澹生堂集卷十一數馬歲曆中記載，他於萬曆四十一年從南京出發，視察江南各地馬政後休假回鄉，途經杭州書肆，說：「余適攜重籍數匧，易書五十六種。復購得三十二種，共計一千二百餘卷」。可以看出他將複本隨時帶在身邊，以備交換。像這類交換的例子在他的文集中雖不多見，但從一次的交換，達到五十六種數百卷的情形來推想，恐怕在他的藏書來源中，僅次於收購，而佔到第二位。

承㸁採訪圖書，除了靈活地運用鄭樵求書的八種方法外，他並提出了三種基本原則。他在藏書訓略中說：

夫購書無他術，眼界欲寬，精神欲注，而心思欲巧。

所謂「眼界欲寬」，是訓誡他的子孫不可以自己所藏的為滿足，須博覽往代的目錄以及近時他家的收藏，博聞才可以多識，隨時增益所不足。其意義在現代來說，圖書館負責採訪的，不可僅據坊肆的出版書目來採購，還需要主動的去搜集資料，參閱其他圖書館的書目，以及各種書刊上所刊載的圖書消息，遇有本館所無的，卽設法採購。承㸁採訪書卽隨時隨地留意有關圖書的資料，對於各種書中所附列的引用書目，也不輕易放過。譬如他閱吳興閔元衢所著的湘錄，看到其引用書目中，有幾種是他藏書所沒有的，卽開列書單，致函吳興的友人潘曾紘，託他向閔氏詢問（見

集卷十八）。又如他偶然地在記聞中發現有數種稗史，不僅他自己沒有，紹興府內的藏書家也未藏，於是遠函友人詹席之，請他代為查訪借錄。這就是他所謂的眼界欲寬，亦卽聞見要廣，如此採訪，才能多獲秘本。

所謂「精神欲注」者，是他訓誡子孫要以採訪圖書及讀書為嗜好，要持之有恒，要有恨不能讀所未見的書的渴望。假若能如此，他說：「則物聚於所好，奇書秘本多從精神注向者得之。」承㸁的求書，就有鍥而不捨的精神，有所聞秘笈，必定多方設法未徵訪，非得之而後快。

所謂「心思欲巧」者，他提出了三種增加或採訪圖書的方法。一為輯佚法。他說：

書有著於三代而亡於漢者，然漢人之引經多據之。書有著於漢而亡於唐者，然唐人之著述尚存之。書有著於唐而亡於宋者，然宋人之纂集多存之。每至檢閱，凡正文之所引用，註解之所證據，有涉前代之書，而今失其傳者，卽另從其書，各至錄出。……此不但吉光片毛，自足珍重，所謂舉馬之一體，而馬未嘗不立於前也（藏書訓略）

凡古書失傳的，可以從前人書中所徵引者各為錄出，裒集為一編。按輯古佚書法就現存的資料來看，大概肇始於北宋，黃伯思東觀餘論卷下跋慎漢公所藏的相鶴經，謂其書是從馬總的意林，及文選鮑照舞鶴賦李善注輯出裒合而成。南宋時有王應麟輯齊魯韓三家詩的佚文為詩考，又輯鄭玄

注周易的佚文。惟自元以後仿行的不多，只有元末陶宗儀纂說郛時才輯了若干種，載入說郛的古典錄略、墨娥漫錄、諸子隨識、廣知、諸傳摘玄等篇中，但每種僅止數條，不過聊備一格，不足以成書。到了明代末年才漸有踵行之者，較著名的如華容孫穀所輯的古微書，其他有若干明末刻本唐以前的小說，實在是從太平廣記中輯出編成的。入清以後，輯佚法大行，像王謨、嚴可均、趙在翰、湯球、茆泮林、馬國翰、黃奭等人，都以輯佚名家。這種風氣的盛行，是否受了祁承㸁的影響，固然無法確定。但承㸁提倡之功，也不可沒。

二是分析法。他認為將一部書中無重要意義的附錄，或一部書的本文及注文，可以將它們分析變成兩部書。他舉例說，如唐杜佑的通典是載唐以前的典章制度，而後人將宋代歐陽修、呂祖謙等人的議論編附入書中，而成為「增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一書，與考案唐代的典故無涉。又如水經酈道元注、世說新語劉孝標注，注本行，而原書之名反不彰。像這一類的書，不如析之為二，使並存於宇宙之間。按合經於注，或將有關的資料採輯附入本書中，本為方便讀書的人，今祁氏欲反其道，雖然能增加藏書的數字，而無益於用，故此法沒有人仿行。

他說的第三個方法，是將刻書的序文纂輯為目，以備採訪。他說：

若夫前代遺書，見有鏤板，或世家所秘，省郡所藏，即同郡共里，尚難兼收。況專有刻

而吳未必知，蜀有本而越未能遍，如此者更多也。又安能使其無翼而飛，不脛而走哉？且購書於未集之先易，何也？凡書皆可購也，即因地因人因家因代無不可者。購書於書稍集之後難，何也？海內通行之書，大都此數十百種耳，倘一概求之，或以千里郵至，或以重值市歸，乃開篋，而已有在架矣，有不意興索然者乎？余謂古書之必不可求，必非昭代所梓行，則必見序於昭代之筆。其書即不能卒得，而其所序之文，則往往載於各集者可按也。今以某集有序某書若干首，其書之序刻於何年？存於何地？採集諸公序刻之文，而錄為一目，自知某書可從某地求也，某書可向某氏索也。置其所已備，覓其所未有，則異本日集，重複無煩，斯真夜行之燭而探寶之珠也。

這一種方法對於現代圖書館採訪而言，因為出版的消息，都可以檢查書刊報章而獲得，隨時編製採訪目片即可，而無甚意義。但假若要採訪民國初年及清代刻印的圖書，這種裒輯刻書序文為一目的方法，仍值得我們參考。而祁氏採訪圖書深入的精神，尤值得後人效法。

圖書採集得以後，第二步工作是分類編目排置。若搜輯來的圖書隨意堆置而不編目，或考雖編成一本簿錄而類例不明，則也無從查檢，或是查檢費時，也就失去了圖書的功能，失去了藏書的意義。祁承㸁在藏書達到了約四五萬卷的時候，在萬曆四十一年的夏天，乘着巡視江南馬政的

機會而休假回家，率領兒子及傭工們整理藏書作分類排架的工作。這一年大概他未編成書本目錄，不能詳知分類的類目，不過對於他排架的類例，從他在這年所撰的藏書訓略中尚可以窺見。這次編目排架在分類方面大抵依據馬端臨文獻通攷經籍攷的四部而略有增益改訂。他說：

書有定例，而見不盡同，且亦有無取於同者，如王伯厚以聖文冠經籍，陸文裕做之，而焦氏亦首列制書。余以國史一代之典章，自宜尊王；而家藏一人之私藏，不妨服聖。仍以六經冠之群書，而特以文由聖翰，事關昭代者，每列於各類之首，則既不失四部之體，而亦足表尊周之心，是亦一見也。宋儒理學之言，概收於子，似矣，然強半皆解經語也。漢之訓詁何以列於經，而獨宋儒之子乎？如正蒙、皇極、及程朱語錄、近思傳習之類，余欲做小學之例，而別類以理學，是又一見也。禮樂之從六籍，固也。但後世之所謂禮者，多儀注之類耳。……余謂一代之禮樂，猶一代刑政，從典故儀注之後，而附之史，是亦一見也。……又如厚德錄、自警編、顏氏家訓之類，雖列於子，而實垂訓者也，余欲別纂訓為一類，而附於小學之後，是又一見也。古之詞命所以通上下者也，自以奏疏為對君之體，而與書記分。夫奏疏既以列於集之外，書記何以獨混於集之中。余以為宜做奏疏之例，別以書記一類附文集後，是又一見也。夫類書之收於子也，不知其何故？豈以包宇宙而羅萬

有乎？然而類固不可以概言也，如山堂考索，六經之源委纖備詳明，是類而經者也。杜氏通典、馬氏通考、鄭氏通志，歷朝令甲，古今故典，實在於此，是類而史者也。又如藝文類聚之備載詞賦，合璧事類之詳引詩文，是皆類而集矣。又如一人一時偶以見聞雜筆成書，無門類可分，無次第可據，如野客叢談、戴氏鼠璞、夢溪筆談、丹鉛諸錄、學圃萱蘇、焦氏筆乘之類，既不同於小說，亦難目以類書，此正如元美所謂騷與詩賦，若竹與草木自為一類者。余謂宜名雜纂，而與類書另附四部之後，是又一見也。

依據所述，他對分類部次的見解，是將御製及國朝史列之於各類之首。於經部增理學類，於小學類增列纂訓一目，於史部增禮樂一類，於集部增書記一類。又將類書細分，將聞見雜記的書總歸為一類名之雜纂，而將類書與雜纂附之四部之後，是雖說四部，實分六部。這些有的是依倣隋書經籍志，有的是沿之鄭樵通志藝文略及文淵閣書目，至於集部增書記類，類書詳分，將雜記之書總為一類，則是他所首創。關於雜記見聞的書，我國自來編目的人感到區類為難，宋鄭樵嘗說：

「古今編書所不能分者五：一曰傳記，二曰雜家，三曰小說，四曰雜史，五曰故事。凡此五類之書，足相紊亂」（校讎略編次之訛論）。

這一類的書，若溯其淵源，是出之先秦稗官野史小說家，魏晉以後，衍為筆記一種體裁，或者記

軍國大政，或者錄述時事見聞，或者是讀書的心得，或者是攷訂俗習的譌誤，大抵隨意錄載，而無所翦裁。雖然各項記述多寡不一，大體各類皆有，而不專主於一類，所以前人類次，容易相混。四庫總目子部雜家類雜說的案語也云：「案記錄雜事之書，小說與雜史最易相淆。諸家著錄，亦往往牽混」。今承㸌把這類的書，總為雜纂一部，附在四部之後，遠比四部分類法散在各類為妥當，不能不說是他的識見超人，可惜這年的編排沒有寫為書本目錄留傳下來，不能詳知他的雜纂類中著錄部次的情形。崇禎中歸安茅元儀編家藏書為白華樓書目，區類為九學十部，其中之說學、類學，似乎是因襲自祁氏的雜纂與類書。這種區類法，入清以後，可惜沒有人來沿襲，也就不為人所知了。

萬曆庚申四十八年，也就是泰昌元年的春天，承㸌由沂州同知陞任宿州知州，在赴官前他又休假回家，將他的舊藏及新增的圖書又重新整理了一次，編寫了一部目錄，凡八冊，即是千頃堂書目著錄的澹生堂家藏書目八卷。這部書目一直到清光緒十八年徐友蘭才刻入紹興先正遺書第三集中，分為十四卷。他並寫了庚申整書小記及整書例略二篇文字，說明他集藏及整理編目的經過及區類的凡例，後並附類目，收在澹生堂集卷十四。這是兩篇對中國目錄學很有價值的文章，值得我們來研究。

自從鄭樵把書籍比喻為士兵，編次書目就好像是將軍部勒士兵一樣，後來論分類的多沿其說。華亭陳繼儒說祁承㸁對於他的藏書，也「悉以兵法部署之」（澹生堂集序），承㸁不盡把軍事術語應用到編目，而且更應用到採訪、交換、閱覽等，換句話說，即將軍事學應用到圖書館學。

他在庚申整書小記中說：

手標秘帙，親兵同渡江之八千；牀積奇編，愛士如成師之一旅，此吾之用寡法也（案：此即他的特藏珍本）。標緗觸目，絕勝十部鼓吹；鉛槧由心，不減百城南面，此吾之用衆法也。架插七層，籍分四部，若卒旅漫野，而什伍井然；若劍戟摩霄，而旂旗不亂，此吾之部勒法也。目以類分，類由部統，暗中索摸，惟信手以探囊；造次取觀，若執鏡而照物，此吾之應卒法也。聯寡以成衆，積少以為多，抽一卷而萬卷可窺，舉一隅而三隅在目，此吾聯絡駕馭之法也。借錄不出於園門，取觀不歸於私室；朝帙勤收，如絕流之不遺涓滴；盡餘必理，同牧馬之去敗羣，此吾堅壁清野之法也。以我精騎三千，勝君贏卒十萬。盡翻窠臼，欲搥黃鶴之樓；獨識筌蹄，直上赤虹之座，此吾用寡以禦衆之法也。轉覓轉奇，日繁日異，以我所餘，易人所有，雖不無得隴望蜀之譏，然每收拔趙豎劉之幟，此吾又借資於人而因糧於敵之法也。奇書未獲，雖千里以必求；異本方來，即片札之必珍。近而漁

唱，遠及雞林，往往聚海外之編摩，幾不減域中之著作，此吾又驅市人戰而令女子陣者也」。慨遺書之難遇，殘闕必收；念物力之不克，鼠囊並採。或補綴而成鶉結之衣，或借錄而合延津之劍，此及吾之收散合奔而轉弱為強者也。

承爣對於他的藏書分類編目的方法，據整書例略所述，係採用「因」、「益」、「通」、「互」四種方法。所謂「因」，是他因襲四部的分類。自漢劉歆七略以來，我國的圖書分類主要有七略四部兩大系統，此外別裁異製的，宋代則有鄭樵區分為十二大類，入明以後，更是各家分岐。承爣認為其他各家的分類法各部類間所著錄的書多寡太不平均，「多者則叢聚而易淆，寡者又寂寥而易失」，總不如四部的分類，簡而盡，均而詳，部下有類，類下有目，好像絲之引緒，網之就綱，井然有序，雜而不紊，無論是檢閱或是收藏，都非常的方便，所以他編目採用四部的分類。

所謂「益」者，是他雖用四部法，但感到有若干的書，前代的四部目部次並不完全妥當，所以新增益若干的類目。他說：

> 益者，非益四部之所本無也，而似經似子之間，亦史亦玄之語，類無可入，則不得不設一目以彙收；而書有獨裁，又不可不列一端以備考。故洪荒邈矣，而竹書紀年之後，有荒史，有邃古記，有考信等編；世代縈矣，而皇極經世之後，有稽古錄，有大事記，有世略治

統等書。此數十種　，皆於十許卷之中，約千萬年之事。既非正史之敍述，亦非稗史之瑣言，蓋於記傳之外，自爲一體也」，故益以約史者一。性理一書，奉欽纂于文皇，雖近錄宋儒之詮述，而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他如伊洛淵源、近思錄，及真文忠公之讀書記，黃東發之日抄，與湛文簡公之聖學格物通，王文成公之則言、傳習錄，或援經釋傳，或據古證今，此　六經之註脚，理學之白眉，豈可與諸子並論哉。故於經解之後，益以理學者二。代制出於王言，非臣子所敢自擅；經筵關乎主德，非講義之可例觀。然而兩者皆無專刻，惟各取本集之所載，而特附其名目於詔制經解之內，故益代言經筵者三。叢書之目，不見於古，而冗編之著，疊出于今，既非旁搜博採，以成一家之言；復非別類分門，以爲考覽之助，合經史而兼有之，採古今而並集焉，……斷非類家所可併收。故益以叢書者四。文有滑稽，詩多艷語，搜耳目未經見之文，既稱逸品；摘古今所共賞之句，獨誇粹衷，非可言集，而要亦集之餘也。益餘集者五。其他各目所增，固難概數」。

於經部設理學一類，雖說是前代四部目所沒有的，但他乃仿自文淵閣書目，在他四十一年整理排架時，卽已設立此類。文淵目雖不是四部分類，但類目的排列大致因襲四部，在四書類後有性理類，承㸁不過改爲理學而已。經部之有小學類，已經是名實不稱，然而尚可諉之承㸁襲六藝略而

來，今祁氏再增以理學，更是蛇足，是否妥當，大有商榷的餘地。至於其他所增的各類名，則是祁氏新創的。在我國的歷史舊籍中，有若干種都是在短短的幾卷書中，敘述千百年的史事，有似於現代的通史之類的教本。既不是正史的記載，也不是史鈔的節略。前代的書目對於這些書的區類實在感到處理為難，大多依其體裁未分類，或入編年，或入別史，或入雜史，或入史鈔，都不甚妥當。今祁氏將之彙為一總，標名約史，遠比舊目的分別歸類要恰當，而且類名清晰，望文可以生義，可惜後代的書目還未有仿效的。總集許多種書而彙為一編，肇始於南宋寧宗時俞鼎孫輯儒學警悟，稍後有左圭百川學海。明正德嘉靖以後，這種編刻群書的風氣轉盛。清康熙以降，更多以輯刻叢書而名家的。前代書目著錄這種彙輯的書，如文淵閣書目、千頃堂書目，都附於類書中，四庫總目則列在雜家雜編。而祁氏在叢書剛盛行之初，就把它獨立成類，不能不說是有識見。近代研治目錄學史的人，多以為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始創立叢書部，或以為清乾隆間姚際恒好古堂書目的區分「經史子集總」，是近世別立叢書部的濫觴，却不知道在前明萬曆末年祁承㸁就已經將叢書獨立成類了。因為其時的叢書數量尚不多，不足以與四部相頡頏，所以附在子部。在我國前代四部書目中，大抵將集部區分為別集、總集、詞曲、詩文評四類，或有將楚辭析出獨立成類的。我國集部中有許多專輯俳詞或艷語的詩文，或專著迴文璇璣一類的詩，或專摘古今共賞的

儷句，像這一樣的詩文集，前目大都按體裁來分類，或入總集，或列別集。然而這類的詩文與傳統的抒情、敍事、或議論等文體決不相侔，若部次在總別集則無法顯現其特性，而不易查檢，所以承㸁專立一類來著錄。雖然用餘集的類名，不及後代用雜詩文爲類名來得妥當，但不能不推尊祁氏的首創。其他所新增的類目，很多都值得我們再作進一步的研究。

所謂「通」，是流通於四部之內；古人有很多的著作，本來是單行的，因爲卷帙甚少，後人或編輯入文集中，或附錄其他有關的書中，則單行本不傳。假若編目時僅著錄其集或本書，則這些所附載與本書或文集不同類目的專篇或專卷，則讀者無從查檢，也無從知曉，所以他創立「通」的方法，將那些附載的而與本書不同類例的專篇或專書，都分別摘出篇名或書名著錄於其應入的本類中，而於其下註明原載某書或某集之內，以便檢閱，他舉例說：

古人解經，存者十一，如歐陽公之易童子問，王荊公之卦名解，曾南豐之洪範傳，皆有別本，而今僅見於文集之中，惟各摘其目，列之本類，使窮經者知所考求，此皆因少以會多者也。又如靖康傳信錄、建炎時政記，此雜史也，而載于李忠定之奏議（按又載于梁溪先生集）；宋朝祖宗事實及法制人物，此記傳也，而收於朱晦翁之語錄；如羅延平之集，而尊堯錄則史矣；張子韶之集，而傳心錄則子矣；他如瑣記稗史小說詩話之類，各自成卷

，不行別刻，而附見於本集之中者，不可枚舉。即如弇州集之藝苑巵言、宛委餘編，又如馮元敏集之藝海泂酌、經史稗談，皆班籍可見，人所知也。而元美之名卿蹟記，元敏之寶善編，即其集之小傳者，是兩者久矣不行，苟非爲之標識其目，則二書竟無從考矣。凡若此類，今皆悉爲分載，特明註原在某集之內，以便檢閱，是亦收藏家一捷法也。

所謂「互」，他說：

互者，互見於四部之中也。作者既非一途，立言亦多旁及，有以一時之著述，而倏爾談經，倏而論政。有以一人之成書，而或以擴古，或以徵今，將安所取衷乎？故同一書也，而於此則爲本類，於彼亦爲應收；同一類也，收其半於前，有不得不歸其半於後。如皇明詔制，制書也，國史之內，固不可遺，而詔制之中，亦所應入。如五倫全書，勅纂也，既不敢不尊王而入制書，亦不可不從類而入纂訓。又如焦氏易林、周易古林，皆五行家也，而易書占筮之內，亦不可遺。又如王伯厚之玉海，則玉海耳，鄭康成之易、詩、地理之考、六經、天文、小學紺珠，此於玉海何涉，而後人以便於考覽，總列一書之中，又安得不各標其目，毋使漏落者乎？其他如水東日記、雙槐歲抄、陸文裕公之別集、于文定公之筆麈，雖國朝之載筆居其強半，而事理之詮論亦略相當，皆不可不各存其目，以備考鏡。至

若木鍾臺集、閒雲館別編、歸雲別集外集、范守己之御龍子集，如此之類，一部之中，名籍不可勝數，又安得概以集收，濶無統類。

我國的古籍中有若干書，其作者撰述原無一定的主旨，立言每每旁及，尤其是雜記見聞一類的書為甚，常使編目的人感到區分類目為難。再者，古籍中也常有兩通的，依書的學術淵源可入一類，依體裁又可歸之另一類。在萬曆四十一年承㸁第一次整理藏書排架時，為處理內容龐雜的書，曾將它們集在一處，名曰雜纂部，附在四部之後。這當然是一個解決編目困難的辦法，但若雜纂部中再不能細分，對於檢閱目錄的人，還是不容易查到他所想要尋覓的資料。所以承㸁又進一步創立「互」的編目方法，一種書按其內容的分歧可以分別著錄於兩類以上的當入的部類，一為本類，其他則註明互見某類。所以澹生堂家藏書目中，「往往有一書而彼此互見，有同集而名類各分者，正為此也」。

「通」與「互」這兩種部次編目的方法，真是目錄學上了不起的發明，可以帮助解決編目的人編目時所遭遇到分類無所適從，顧此失彼的困擾，使讀者檢閱書目時，循類查檢，很容易獲得他所需要的全部資料，不致有所遺漏。這兩種方法就是後來章學誠所創的「別裁與互著」，通卽別裁，互卽互著。章氏在所著的校讎通義中，說他所創的方法是推本於劉歆七略而來的，對於祁

承㸁如支字未提。然而依據他所擧七略中互著的十個例子，實際上只是因為兵書略與諸子略的校讎者非一人，尤其兵書略是由專家任宏論次，本來是別行的，所以與諸子略中偶有重複著錄的書。這種情形在後代的書目中也屢見不鮮，尤以宋史藝文志為甚，這只是編目者一時的疏忽，但決不能說是劉歆或其他目錄的作者曾經創立了互著的凡例。所以後來班固依據七略修漢書藝文志，將兵書略中重複著錄的十種書給刪去了。至於別裁，章氏僅在七略中找出了弟子職與管子，及孔子三朝記與禮經兩個例子，但這也不能作為劉歆曾用裁篇別出方法的證明，因為弟子職及三朝記二書可能在漢代本已單行，並不一定是從全書裁篇別出而著錄的。這種例子在後代的書目中更多，一為單行本，一附在全集中，收藏家當然分別著錄。假如劉歆眞是曾用別裁的方法，那禮經一百三十一篇及諸子中很多都可以裁篇別出，決不致於僅存弟子職與三朝記兩個例子。章學誠也是會稽人，是祁氏的鄉後輩，其生（章氏生於一七三八年乾隆三年）不過比祁氏晚一百七十五年。雖然祁氏所著的澹生堂集在清初遭到禁燬，但浙江是我國藏書的淵藪，藏書家中應該不乏秘密收藏的，例如寓居杭州的歙縣鮑廷博就曾自是集卷十四中輯出了藏書訓略等三篇名曰澹生堂藏書約，刻入知不足齋叢書中。以章氏的博學多聞，對於鄉賢尤其是本縣的一位大藏書家，不應該毫無所知。即令他未能見到全集，但澹生堂是山陰著名的藏書樓，祁承㸁所編的書目在清代流傳不絕如

蛛，章氏對他編目的方法，也不應一無所悉。而章氏創別裁互著二法但推本於七略，對於祁氏一字不提，實在難免有掩前賢之美之嫌。祁氏所創的「通」「互」二詞，雖然不及章氏用「別裁」「互著」來得清晰，但論析這兩種方法的運用，卻比校讎通義別裁互著二篇要透澈得多。要想使編目匯類妥當，便於查檢，通、互二法可以說是編目者的兩件利器，如果運用得宜，其效果決不遜於近代西洋的標題目錄，而且要比標題目錄簡明易查。然而很可惜祁氏創之於前，章氏繼之於後，我國的編目者多憚煩難，尚未見有仿效者。近代只有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所編書目，將叢刻的書別裁分著於各類，日本京都人文科學研究所出版的漢籍分類目錄也仿行之，雖然僅止將叢書部分別裁，已頗便於讀者查檢，可以見此方法的效用。近代的圖書館學家多倣效西洋修書編製標題目錄，而將我國前賢所創制的良好方法捨棄不用，可謂失之眉睫之前。這兩種編目方法的使用還有待我們來研究推廣。

承㸁將他的藏書匯分為四部四十六類，凡經部十一類、史部十五類，子部十三類，集部七類，類下有目，共二百三十五目，頗為詳盡。子目雖是參考通志藝文略及焦竑國史經籍志而來，但比之二家要審慎。因為二家的部次大半係依據舊目，實未嘗見到原書，故頗為雜亂。而祁氏的編目，則是確有其書，故無濫入的弊病。在類目上除新增的以外，雖不出宋代目錄的範圍，但在部

次方面却比前人合理得多。譬如將墨法名縱橫四家與雜家合稱為諸子類，就比宋尤袤遂初堂書目及清四庫總目附入雜家為合理，樂經早佚，故經部不立樂類，而於史部設禮樂類，以部次後代的律呂儀注之書，也比其他書目於經部強立樂類為妥。他的類例實有許多地方值得現代研究中國圖書分類的學者研究參考。

承爜收藏書，固然是他的癖好，但也並不是像洪亮吉北江詩話中區分藏書家五等中的收藏家，「專搜采異本，上則補石室金匱之遺亡，下可備通人博士之瀏覽」。他嘗引王世貞的話說：「世有勤於聚而儉於讀者，即所聚窮天下書，猶亡聚也。世有侈於讀而儉於辭者，即所讀窮天下書，猶亡讀也」。蓋他藏書的主要目的，在供他自己閱讀，搏通以致用，並以之遺留子孫，使他們也能向學。所以他藏書不像王世貞、朱大韶、項元汴等人特重宋版，但求網羅豐富。固然他的藏書中也不乏宋版，譬如後來藏書散出時引起黃宗羲與呂留良交惡的一部王稱東都事略，就是宋刻。他的藏書除了供自讀外，當然也供族人或親友們借閱，但訂有相當嚴格的閱覽規則。藏書訓略云：

子孫取讀者，就堂檢閱，閱竟即入架，不得入私室。親友借觀者，有副本則以應，無副本則以辭，正本不得出密園外。

此舉在防止藏書流散遺失，蓋承㸁一生辛勤搜集，感到得來不易，故加意護持。他在晚年刻了一方藏書銘印，鈐蓋在藏書上，其文曰：

澹生堂中儲經籍，主人手校無朝夕。讀之欣然忘飲食，典衣市書恒不給；後人但念阿翁癖，子孫益之守弗失。

在藏書訓中亦諄諄告誡子孫，說：

爾輩目睹爾翁一生精力，耽耽簡編，肘敝目昏，慮衡心困，艱難不避，譏訶不辭，節縮饔飧，變易寒暑，時復典衣銷帶，猶所不顧，則爾輩又安忍不竭力以守哉？至竭力以守，而有非爾輩之所能守者，夫固有數存乎閒矣。今與爾輩約，及吾之身，則月益之；及爾輩之身，則歲益之。子孫能讀者，則以一人畫居之，不能讀者，則以衆人遞守之。入架者不復去，蠹嚙者必速補。

可以想見他藏書收集的艱辛及護持的備至。在他去世後，其子彪佳尚能繼守並略有增益。甲申之變，清兵入關，戰火延及江南。乙酉彪佳殉國，澹生堂的藏書遂貯雲門山寺，卽承㸁少年讀書的地方，竟也逃過了大厄。迨康熙初年，其孫理孫、班孫因謀變被禍，一遣戍遼左，一鬱鬱而亡，（見全祖望結埼亭集卷十三祁六公子墓碣銘），祁氏門庭遂趨衰微，藏書流散售出，大部份爲黃

梨洲、呂用晦所購得，一部份後來集之於仁和趙氏的小山堂。承燦一生以收集及維護藏書爲念，但卒後不及五十年，竟全部星散人間。這大概就是他所說的「固有數存乎闕」，非人力所能守得住的了。

承燦不僅勤於徵集圖書，他讀書及從事撰輯也很勤快，即他所說的，不僅能藏，更要能讀能辟。凡他入藏的書，幾乎無不閱覽。他常常解答他人的諮詢，如集卷十八上李為鑑函，即答覆李氏所詢有關許慎說文解字的問題。陳繼儒撰澹生堂全集序曾說：

> 公累官至大參，青袍素被，生平無他嗜，獨嗜書。其所藏幾與宛委山等而悉以兵法部署之。宴坐密園內，環書爲巢，抽取何籍，輒指某架某部，而十不失一焉；徵問故實所自出，輒指某書某卷幾行，百而不失一焉。料揀貫串，巍然推東南一大儒矣。

可以想見他對所藏書的熟悉。熟悉藏書，才能以供讀者的諮詢，協助讀者查檢所需要的資料，這正是從事圖書館工作的人所應具備的條件之一，這樣、圖書館才能獲得學術界以及一般社會大衆的重視。

承燦一生喜好裒輯古人的遺書，表章前哲的遺範，故編纂的著作甚多。見於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著錄的有國朝徵信叢錄二一三卷（按此見類書類，又別史類著錄作皇明徵信叢錄二二〇卷）、

澹生堂餘苑六〇四卷（按集卷十八與鄭文學函云：「不佞……尤善小史稗官之類，曾搜取四部之餘，似經非經，似集非集雜史小說，裒而集之，名為四部餘苑，函以百計，種以二千計，每二十種為一函，俟成帙之後，聽海內好事者各刻一二函，此亦宇宙間一大觀也。然搜之者已十年，僅得一千八百餘種，不但不佞之心力竭，即世間之書籍亦竭矣」。則是全書凡一千八百餘種，與千頃目異。又傳世有抄本，見叢書大辭典，凡收書一八六種，七六七卷，亦與千頃目不同）。諸史藝文鈔三十卷，兩浙著作考四六卷（按集卷十八與陶公望函云為六四卷）、牧津四十四卷（按與陶公望函云五十卷）、澹生堂集及澹生堂雜稿無卷數（按今傳澹生堂集二十一卷）。此外見於其集而千頃目未載者，有纂古今人世之事，似佐談笑的世苑，卷數不詳。以上皆已成書者。據其集中所述，已纂而未完成的尚有友鑑、前賢大事紀、古今統等，可見其編纂之勤。今除澹生堂集、牧津、及餘苑三種尚存外，餘均不傳。

綜祁承㸁的一生，從十歲開始，即與書結了不解緣，自少年時代即致力於收藏書，以後雖在宦海中打滾了二十多年，但仍不忘利用暇時與書為伍。他對圖書採訪方法的週密，與鍥而不捨的精神；他對圖書編目部次方法不墨守成規，而能不斷的研究推陳創新；他對圖書愛護之深；他不僅喜歡收藏，也喜觀閱讀書，俾熟習於所藏，而能應答他人的諮詢。他也喜歡從事纂輯，旣可表

韋前賢的遺範，也便利他人來閱讀，這種種皆可以說明他是我國的一位標準圖書館員。他不僅只是在目錄學上的創見，值得我們欽仰，而他對圖書館事業的熱忱與負責的精神，尤值得現代從事圖書館工作者來效法。

編後記

瑞卿先生從事圖書館工作，轉眼已屆三十餘年，凡圖書館從業人員及從事學術研究者，無人不曉先生精於版本目錄之學，然而鮮有人知先生治斯學之基礎實出諸研究歷史所用的比較方法和考據功夫。

瑞卿先生湖北孝感人，自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即進入國立中央圖書館工作，現任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長職。先生交遊素、見識多、聽聞廣，暇時鑽研圖書版本目錄之學，或為文散諸報章雜誌以示來者，或設教登杏壇以啓後學。不辭辛勞，不畏寒暑，人有所求，必詳加剖析解說，務啓其茅塞而後已。

學海出版社將先生版本目錄學有關論文凡二十八篇，名曰「版本目錄學論叢」以饗讀者，讀斯文，不僅能洞悉中國圖書目錄學之演變。書本雕刻之源流，亦能親炙先生精湛之治學方法云。

丁巳年梅雨時節王民信後記。